

目 錄

翻譯研究

- 03 賀瀟瀟 論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建設及數據管理問題與解決路徑
15 韓 赫 宮英瑞 漢語文化負載詞英譯策略研究
27 馬 曉 孫繼成 美國漢學家李克《管子》英譯本譯者引言的漢語回譯策略研究

文學研究與文化比較

- 45 劉詩姣 趙 斌 論《大湖消息》的“自然”意識及“生態寫作”實踐
57 汪 薇 王肯 文化數字化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的機遇與路徑
71 李 言 論“女俠”書寫的現代性演進
87 汪東蘊 朱雨露 從女權主義角度分析《簡·愛》中的三次“孤立”
107 楊茜茜 段紅梅 概念隱喻在《傳青主女科》中的應用研究
121 鄭 宏 漢語“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語法化考察
135 高 帥 全球化時代下跨文化教育的實施——兼論學校教育中的跨文化能力
149 奧卡福爾C.O. 朱信遠 蔡青源 金昌賢 麗水市留學生交通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評估
173 李 明 韓國視域下的中國精釀啤酒產業現狀及對策

漢語教學

- 193 鄭茹娟 劉 玥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生媒介素養現狀調查與分析
207 程德祥 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助力高師聲樂教學高質量發展
217 樂 慧 張 冉 神話《大禹治水》的國際漢語教學設計——兼論水神大禹和波塞冬的比較
229 崔 萍 女性發展與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係探究
239 劉玉坤 中國文化融入英語教學研究——以小學英語教學為例

書 評

- 257 劉楚雲 林麗玲 跨學科思維下培養實用翻譯人才的教育創新——《翻譯項目管理：實操、案例與研究》書評
263 裴 蓓 個體經驗、公共經驗和詩意的連接——談蕭相風的《詞典：南方工業生活》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譯研究

論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建設 及數據管理問題與解決路徑

賀瀟瀟¹

（中國外文局翻譯院，中國北京，100037）

摘要：為配合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加強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加快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建設，在借鑒聯合國語言地圖和美國互動語言地圖等相關人才數據庫和我國部分省市區域性人才數據庫建設經驗基礎上，系統梳理出我國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建設中在線評價指標體系建設，個人數據信息的合法公開和隱私保護，利用技術和信息手段保證數據準確并實時更新技術障礙。由此，應過中國翻譯協會專家人才庫等公開徵集人才入庫信息，打通封閉式數據庫與外界聯繫，通過全國翻譯資格（水平）考試、翻譯職稱評審等級等信息關聯，實行分級培養管理，讓國際傳播人才庫與地方外辦翻譯人才資源形成雙向交流機制，服務中央地方重大外宣外事項目等。

關鍵字：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信息關聯；分級管理

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加強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塑造主流輿論新格局，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強化網絡、數據安全保障體系建設等要求，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布了“十四五”規劃建議要點，提出中國自力更生“雙循環”發展模式，并堅定不移建設製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

¹ 賀瀟瀟，女，遼寧瀋陽人，碩士，主任編輯，中國外文局翻譯院國際傳播部副主任（主持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翻譯與國際傳播人才培養，電郵：45059045@qq.com。

數字中國等關鍵核心技術重大突破。¹

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建設和數據管理是指基于互聯網工作平臺，運用以資料庫和互聯網技術為基礎的人工智能技術，對國際傳播和翻譯等相關領域人才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加工，建立系統服務對外傳播黨政文獻、領導人著作、講話、外宣圖書、期刊雜誌網絡新聞宣傳內容為主的人力資源調配數據庫，進而在此基礎上建立具備國際傳播翻譯綜合服務功能型數據庫。建設該人才庫是能有效提升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能力，服務黨的對外傳播事業的重要创新型舉措，是配合“十四五”創新技術舉措有效組成部分，更是落實習總書記二十大報告講話精神的重要舉措。本文擬從國內外國際傳播翻譯人才數據管理技術發展現狀入手，分析我國建設國際傳播翻譯人才數據庫待解決主要矛盾并提出人才庫建設實施具體路徑。

一、國內外相關人才庫數據管理技術發展現狀概述

數據管理技術具體指人們對數據進行收集、組織、存儲、加工、傳播和利用的一系列活動的總和，該項技術經歷了人工管理、檔管理、數據庫管理三個階段。每一階段的發展以數據存儲冗餘不斷減小、數據獨立性不斷增強、數據操作更加方便和簡單為標志和特點。數據庫技術是在 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以來，計算機性能得到進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出現了大容量磁盤，存儲容量大大增加且價格下降基礎上，才有可能形成克服檔系統管理數據時的不足，而滿足和解決實際應用中多個用戶、多個應用程序共享數據的要求，從而使數據能為盡可能多的應用程序服務。

目前，國際和國內有已建成的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同類數據庫，我國相關人才庫建設多集中于省市外事部門，如上海、天津、四川、海南、淄博和宿州等地政府外事部門都建有本地區翻譯人才數據庫，用于緊急調配使用語言服務人才，人才類型多集中在外語口筆譯，實施單位多為各地外事部門或高校科研機構等，中國外文局等單位還曾對外正式發布中國外文局高端翻譯人

¹ 張立，以數字化驅動中國式現代化，紅旗，2023 年 21 期。

才庫等。目前，我國與國際傳播相結合的專項翻譯人才數據庫建設仍為空白領域。

國外比較典型的相關數據庫項目是美國互動語言地圖，美國教育部從 1958 年開始就委托現代語言協會定期開展外語資源調查，至 2010 年已經組織 22 次大規模調查，對於美國外語教育動態了如指掌。美國人口普查把語言列為調查內容，現代語言協會利用人口普查資料建設了美國語言數據庫（亦稱美國語言地圖），其中錄入了小到城鎮、郵政區的使用各種語言的人數，還可提供非英語母語人士的背景信息。美國軍方建設了接近實時在綫的“語言備戰指數系統”，詳載使用各種語言的人員名單、水平、單位等信息，以備隨時進行供需分析和調用。¹

“世界語言地圖”項目起源于 1993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立項的“世界瀕危語言計劃”。目的是提高各國政府相關部門、語言使用者及公眾對語言瀕危現狀和保護世界語言多樣。本世紀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先後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普及網絡空間及促進並使用多種語言的建議書》，獲得了全球廣泛的支持和認同並提出了加強世界語言的多樣性，尤其是促進多語言在互聯網上的發展的倡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還與中國語種最多的語言服務集成服務商“全球說”于 2016 年 7 月達成全球合作夥伴關係。雙方的合作將從設全球性語言平臺、提高語言保護技術與能力、建立語言保護意識三個方面展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全球說還于 2017 年 7 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世界語言地圖”中國辦公室。²

二、中國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建設面臨的問題

新時代國際傳播能力與翻譯能力發展 對於兩者都提出更加嚴格和專業化

¹ 中國語情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http://ling.whu.edu.cn/index>。

² 世界語言地圖明年將面世 騰訊雲與全球說合作構建全球語言平臺，<http://appweb.scpublish.cn/news/wx/detail?newsid=78479>，2023 年 11 月 10 日。

的需求，翻譯與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更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追求更好的國際傳播效果，無法將兩者簡單分割，我們需要更多促進翻譯能力與國際傳播能力一體化建設的實質性舉措。建設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兩個領域都共同面臨以下難點問題。

（一）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在綫評價指標體系建設。

執行力是衡量各專業人才的重要標準。國際傳播翻譯人才的標準可以從學歷、職稱、綜合能力、專業水平及實踐等方面入手，但人才最重要的是實操能力，不能做紙上談兵的人才。人才的綜合素質很難用學歷體現出來，所以在進行國際傳播翻譯人才評價時，不僅衡量專業學位和學歷等，更要建立起科學的人才評價體系，選拔出高水平的綜合型跨學科人才。

國際傳播翻譯人才評價指標體系可由以下幾個評價維度構成，國際能力量表維度，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公務員考試、記者資格考試、相關專業研究生入學考試、相關部委部門公務員考試等考試，翻譯與新聞類職稱評審，個人發表、出版及參與研討成果等維度。

《中國英語能力等級量表》研發案例能為國際傳播翻譯人才評價指標體系建設工作提供一定的經驗借鑒。2018 年，經教育部審核通過并正式發布的《中國英語能力等級量表》是首個面向中國英語學習者發的能力量表，這一量表首先具備一支來自國內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 200 多人的國際化研究團隊，這是研發結果可與世界對接的有利前提。其次，量表為國內外考試提供銜接定位的統一標尺，提升考試的可比性，推動國內外考試的對接與互認。再次，量表構建了筆譯和口譯能力量表，為翻譯教學和測試的開展提供支撐，促進學習者翻譯能力的培養，填補國內外語言能力量表尚未包含翻譯能力的空白，為國際語言教育界貢獻了中國智慧。¹

¹ 《中國英語能力等級量表》詳細標準（完整版），英語學習資源中心，<https://mp.weixin.qq.com/s?biz=Mzg30DEwNTQ4NQ==&mid=2247488819&idx=2&sn=0fb499ab329fe5610732e71c43d42a76&chksm=cf1993d1f86e1ac719432a07ef1b3849c69348bd6c27b1ff8872d7cec4312967cff294964f51&scene=27>，2023 年 9 月 3 日。

建設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還需要制定國際傳播專業人才相應技術等級評價標準，作為入庫人員硬件指標。同時，提供在綫測評國際傳播翻譯人才的評價指標體系和網絡平臺。除了指標體系建立，在綫識別不同提交信息，并在信息中甄選出高端人才，需要對機器進行學習訓練如何處理國際傳播與翻譯兩個專業水平不平衡問題，如何判斷評價指標體系以外的其他標準參考值等。

全國職業信用評價網是經國務院國資委、人社部、教育部三部門支持，中央財政投資，政府所屬的國家級人力資源職業信用評價信息數據源平臺，是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備案的事業單位網站，是人社部人力資源服務許可單位。全國職業信用評價網為企事業單位和個人提供職業信用、就業信息和職業能力水平評價服務的國家級人力資源網絡平臺，是涵蓋人力資源各項服務的數據源中心和職業能力水平評價中心，是國內唯一部委直屬職業信用服務單位。

全國職業信用評價網人才入庫證書備案，并頒發註冊信息登記卡，其個人資料進入人才庫，納入人才管理系統，可作為用人單位在人員招聘錄用、考核、晉升、晉級的重要依據，同時可成為職稱評審申報、職業資格考試、註冊資格登記等參考依據。

例如外語類職業證書英國劍橋翻譯學會國際英語教師認證（TESOL）獲得首批入庫證書資格。其中，CAT-UK TESOL 與科技部國外人才研究中心 TEFL in¹China 雙證聯考項目被評定全國 TESOL 專業人才庫入庫資格中級入庫資格。

（二）平衡個人數據信息的合法公開和隱私保護。

近年來，由于數據濫用、信息騷擾、隱私泄露、網絡暴力等引發社會爭議現象層出不窮，人們對於個人隱私保護與數據安全愈發關注。完善網絡公開個人數據相關政策法規，成為社會各界的普遍呼聲。鑒于此，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建設工作應在充分調研和問詢基礎上，平衡個人數據信息合法公開和隱私保護之間的關係。在日常語境下，隱私與個人信息似乎常常被混為一談。然而在

¹ 英國劍橋翻譯學會認證的 TESOL 證書，中科 TEFL 報考中心，
https://zhuanlan.zhihu.com/p/601693859?utm_id=0，2023 年 9 月 30 日。

法理上，二者實際上被區分為相互聯繫的兩個概念。《民法典》界定，“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願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強調了信息的私密性。而“個人信息”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各種信息，強調信息的可識別性。國際傳播翻譯人才信息主體的姓名、住址、生物識別信息、行踪信息等都可以納入隱私保護範疇。而隱私與個人信息的重疊部分在於，部分私密的個人信息也適用隱私權保護的有關規定。由此，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個人信息中有利於提高人才辨識度和專業優勢的專業化信息，是人才數據中必須具備的“個人 id”必備信息，可在中央和國家機關一定數據庫使用人員範圍內，部分公開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個人信息，以提高人才數據信息實際應用目的。

中國外文局翻譯人才庫為滿足用人單位多樣性、細緻化人才分類需求，並提高國際傳播人才個性辨識度，還增加對翻譯人才專業領域分類梳理功能，根據人才經歷和代表作新增口筆譯擅長領域兩大分類，歸入時政、社科、文學、綜合等類別。筆譯人才進一步細分為時事政治、人文社科、文學藝術、軍事科學、法律法務、金融財經、電子科技、生物醫學、建築工程、遊戲娛樂、石油化工等專項擅長領域，口譯人才細分為外交談判、文化交流、軍事科學、法律法務、外貿商務、金融財經、生物醫學、電子科技、建築工程、石油化工等專項擅長領域。翻譯人才專業領域標籤為人才數據精細化群組分類奠定了前期基礎，能夠直觀反映其專業強項，可大大提高數據庫作為外宣領域人力資源檢索工具的查閱效率，更好滿足黨和國家對外傳播工作需求，早在 2007 年，上海便成立了 110 接警翻譯志願者人才庫。這些分類功能越細化越是可以通過數據庫信息全面完善每一位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個性化特徵，避免通過公開敏感信息精確識別人才數據信息。¹

（三）利用技術和信息手段保證數據準確並實時更新

一般情況下，數據庫建設需要通過人工清理、機器錄入等多種方式整合

¹ 外語接警翻譯志願者人才庫成立，北京晚報，2007 年 01 月 10 日，<http://www.sina.com.cn>，2023 年 11 月 1 日。

多渠道數據來源，為保障人才信息相對完整并及時更新，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應力求完善聯絡信息數據，對全國翻譯人才加強綜合性管理。人才庫可以通過中國翻譯協會網站及相關活動獲取人才個人信息，多數入庫專具有準確的姓名、單位、地理位置及聯絡方式等信息。此外，還可以通過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中心網絡系統徵集信息等方式獲取考試專家委員會專家、翻譯考試一級口筆譯和同傳的優秀考生、全國翻譯專業碩士學位高校教師及畢業生等獲取翻譯人才的最新動態信息。上述各類人才信息在數據庫中被規範化加工處理，能通過語種、單位、地區等實現統一檢索、篩選等。但對於錯誤和冗餘信息的篩選、刪除和修改需要機器學習更多算法，通過更多其他數據庫比對，提升報錯、改錯等功能。

保障人才庫信息實時更新，可選取部分青年翻譯人才為測試對象，設計開發網絡信息徵集系統，對通過一級考試和取得同聲傳譯證書考生的個人身份、教育背景、工作經歷等信息進行跟踪式收集管理。網絡徵集信息雖可確保數據庫信息及時更新，但保持與數據庫中人才粘性互動，定期徵集信息反饋以提高更新效率仍是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要面臨的一大技術難題。

三、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建設途徑探討

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作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提升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重要舉措之一，其研發工作旨在通過系統梳理翻譯和傳播領域專家資源，整合高素質翻譯人才和國際傳播人才隊伍，搭建專業化、信息化和社會化的國際傳播翻譯人才數據平臺，為外宣外事部門和其他國際傳播機構提供服務，為黨政文獻對外譯介傳播工作提供基礎數據、智力保障和決策諮詢。數據庫從建設到管理，都應該以嚴密而具有前瞻性的規劃為前提條件，各領域翻譯項目應用為堅實有力支撐，并服務各方為主旨目的，其具體實施路徑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通過中國翻譯協會專家人才庫等公開徵集人才入庫信息，打通封閉式數據庫與外界聯繫。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未來建設方向應從政產學研四類管道入手，以擴充語種和專業領域為具體指標，通過籌建各機構專家人才庫，組

織開展年度《全國（各地方）翻譯人才資源調查》等，廣泛收集國際傳播翻譯人才等信息，兼顧全國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培養狀況調查等，為國際傳播和翻譯專業教育、企事業單位翻譯人才招錄提供優化語種專業設置和培養需求趨勢等對策建議。對加入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人才資源也要提供各種優越條件，例如可為其打通申請中國翻譯協會專家會員綠色通道等，建立中國翻譯協會專家會員可加入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的雙向流通機制等。此外，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的人才來源應充分吸收出版界資源以及國外人才資源。由此，數據庫建設需要與各大出版社達成有效合作關係，吸收優質國際傳播翻譯人才。一些國外外籍華裔優秀翻譯人才，如金庸武俠小說和劉慈欣科幻小說外籍譯者安娜·霍姆伍德、劉宇昆等。

第二，通過全國翻譯資格（水平）考試、翻譯職稱評審等級等信息關聯，實行分級培養管理。中國外文局翻譯院等掌握對中國翻譯協會、參與翻譯職稱評審人員等信息，可對相關信息逐步完善，將人才庫翻譯人才分等級管理使用。由此，人才庫項目內部可具備“傳幫帶”機制高端師資和培訓對象，根據翻譯人才擅長領域及人才層級，與各部委、高校、科研機構、中央地方企業事業單位通力合作建設從翻譯人才理論培養、實習實踐到人才招聘錄用等全鏈條翻譯人才孵化式培養。孵化式培養項目可根據不同專業特點、面向不同層級翻譯人才開展時政社科、電子科技、外貿財經、生物醫學類孵化培育項目。中國翻譯協會企事業會員單位可為孵化項目提供實踐基地，實現翻譯人才層級突破水平測試，進而滿足用人單位對高端翻譯人才從量到質的需求。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培養還可考慮採用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適當傾斜的幫扶性政策，進而改善不同省市地區翻譯人才數量、水平差距問題。作為全國性的翻譯專業組織，應發揮中國翻譯協會在高端翻譯人才培養方面的積極作用，中國翻譯協會能夠積極為翻譯人才統籌培養發揮組織、引導和支持作用。

第三，國際傳播人才庫與地方外辦翻譯人才資源形成雙向交流機制，服務中央地方重大外宣外事項目。以人才庫為依托，可跨部門、跨地區實現人才庫在行業內外部的公開使用，切實發揮行業內全整合、共享國際傳播翻譯人力資

源的重要作用。2019 年由中國翻譯協會建立的國際傳播翻譯人才庫與天津市外事辦、湖北省外事辦、深圳市翻譯協會等單位為試點，首先實現人才資源雙向互通，為天津達沃斯會議、國際智能大會、武漢國際軍運會等地方承辦的大型國際活動提供翻譯人才資源支持。

此外，在一些有共性需求的方面，如省市公示語研討機制建設，承辦大型體育賽事外語翻譯、商務外語翻譯、長三角、大灣區以及東三省等具有共性需求領域，可以加強對翻譯人才聯合培養、測試和流動使用等。

結 論

國際傳播翻譯人才是中國國際化進程中溝通中國與世界的重要橋梁，是中國國際化新征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亟需一大批胸懷祖國、政治堅定、業務精湛、融通中外、甘於奉獻且兼具翻譯與國際傳播能力的人才。由此，應全面整合兩個專業現有人才資源，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提升人才質量，形成規模合理、素質過硬、梯次分明的高端人才隊伍，統籌政產學研各方資源分步驟、有規劃、多維度實現國內和國際高端國際傳播翻譯人才為我所用的良好局面。

參考文獻

1. 理查德 D. 布萊希特，威廉 P. 裏弗斯. 21 世紀的語言與國家安全：在支持國家語言能力中的作用[M]. 肯德爾/亨特出版公司，2000 年。
2. 李宇明：國家的語言能力問題[N].，中國科學報. 2013 年 2 月 25 日第 7 版。
3. 文秋芳. 國家外語能力現狀[M]. 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 2012.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
4. 強 劉欣. 從網絡大國向網絡強國闊步邁進——奮力譜寫新時代網信事業發展新篇章. 法治日報[N]. 2023-01-11

5. 徐清軍. 英語也是生產力 英語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顯優勢[N]. 國際先驅導報. 2006 年 2 月 21 日。
6. 殷志平. 外企職場語言生活狀況：以上海爲例[M]. 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 2008.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
7. 趙蓉輝. 國家安全視域的中國外語規劃[N]. 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2 期。
8. 周慶生. 國外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進程[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年，第 7 頁。
9. 周音. 人才缺乏制約中國旅游企業“走出去”[N]. 中國新聞網，2010 年 5 月 27 日。

On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Talent Pool Construction and Data Management

HE Xiaoxiao

(Academ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IPG,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ooperat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power and digital China,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ll-media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talent pool based on learning from relevant talent database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language map and the Interactive Language Map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f regional talent databases in some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it has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problems and obstac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talent pool in China,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nlin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talents,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legal disclosure of personal data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he use of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means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real-time update of data. Because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open the database of talents through the expert talent pool of the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open the closed database and conne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implement hierarchical training management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Translation Qualification (level) Examin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level of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 titles, to form a two-way exchange mechanism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alent pool and the translation talent resources of local foreign affairs offices and to serve central and local major foreign affairs project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alent pool;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投稿日期	2023. 9. 6	審查日期	2023. 10. 9	刊載日期	2023. 12. 28
------	------------	------	-------------	------	--------------

漢語文化負載詞英譯策略研究

韓 赫 宮英瑞¹

(青島大學 外語學院, 山東 青島 266071)

摘要: 由于歷史、經濟、政治、習俗等存在差異, 各個國家在發展中都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文化負載詞。通常, 譯者對應的常見翻譯策略有二: 以目的語為歸宿的歸化和以源語為主的異化。中華文化經歷了上千年的發展, 出現了數不勝數的文化負載詞, 折射了濃厚的中國文化底蘊和中國智慧, 進而對譯者形成了一大挑戰。對此, 本文從漢語的文化負載詞入手, 研究如何在不改變詞句內涵的情況下, 通過歸化和異化的靈活運用, 將其譯成英語, 讓外國受眾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讓中華文化進一步走出國門。

關鍵字: 漢語文化負載詞; 歸化; 異化; 翻譯策略選擇

引言

歸化和異化是一組二元對立的概念, 源于德國早期思想家施萊爾馬赫(F. Schleiermacher)於1813年在柏林皇家科學院發表了題為《論翻譯方法》的演講: 一種是譯者儘量不打擾作者, 而讓讀者接近作者; 另一種是儘量不打擾讀者, 而讓作者來到讀者身邊(施萊爾馬赫, 1992:36)。施萊爾馬赫認為, 歸化和異化兩者完全不同, 所以無論採用哪一種翻譯策略, 我們都必須堅持到底, 不能把它們混為一談。如今, 在歸化和異化的選擇上, 譯者更關注如何在日常生活和文學翻譯中加以使用。許多譯者都討論過是將這兩種策略結合起來, 還是只選用其中一種, 以及在不同的語境下哪種方法更適合。因此, 儘管文化專

¹ 作者簡介: 韓赫(2000-), 女, 山東青島人, 青島大學外語學院翻譯碩士在讀研究生; 宮英瑞, 通訊作者, 山東青島人, 博士、教授, 博士生合作導師, 碩士生導師, 青島大學外語學院副院長, 研究領域: 認知語言學, 文體與翻譯。

有表達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少被提及，但它們是人們交流和寫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它們也是翻譯過程中的困難所在。在當今社會，翻譯過程中採用“歸化”和“異化”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影響這兩種策略選擇的主要方面是文化因素，因為語言是意識的外殼，是文化的載體。

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施萊爾馬赫提出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歸化和異化的概念，並將殖民主義引入其中，於是歸化和異化開始具有了政治色彩。但是，經過後人的不斷發展和文化背景的加入，開始出現片面認識，西方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異化，提出了文化轉向的理論。當把歸化和異化放到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背景之下，並著眼於西方 17 世紀至今的翻譯研究時，韋努蒂在其《譯者的隱身》（1995）中提出了歸化和異化。歸化是指以目標文化為導向的翻譯，即利用目標文化中不尋常的表達方式，將其轉化為一些熟悉的表達方式，從而使目標讀者易于理解和掌握譯文。異化是一種以源文化為導向的翻譯，它力求盡可能地保留外國風味，以便將源語言和文化轉移到目標語言和文化中（Lawrence Venuti, 1995）。前者指的是採用透明、流暢的風格，以儘量減少外國文本對目標語言讀者的陌生感的翻譯策略，而後者則是指目標文本故意打破目標語慣例，保留原作的一些外國性的翻譯類型（Shuttleworth & Cowie, 2007:59-79）。作為翻譯策略，歸化和異化被視為直譯和意譯的概念延伸，但它們並不完全等同於直譯和意譯。直譯和意譯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語言層面的形式和意義，而異化和歸化則突破了語言因素的限制，將視野擴展到語言、文化和美學因素。

自從深圳大學劉英凱教授於 1987 年在《現代外語》發表了“歸化：翻譯的歧途”一文，國內關於歸化和異化的爭論達到了高潮。一些學者認為，歸化會抹殺民族特色，但大多數學者認為，異化是一種必然的趨勢，而歸化是一種必要的手段。在這兩種策略的運用中，有人認為翻譯的目的是讓讀者感受到異域特色，也有人贊同翻譯要貼近讀者。影響翻譯策略選擇的因素眾多，如作者的意圖、文本類型等。在過去的幾年裏，國內對歸化和異化的討論主要集中應該以哪一種翻譯策略為主，或者優先選擇哪一種翻譯策略。

美國著名翻譯家奈達 (Eugene. A. Nida) 在《語言、文化與翻譯》(2001: 20) 中提出, 語言在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對辭彙和成語意義的影響是非常普遍的, 如果不考慮語言文化背景, 任何人都無法正確理解。文化學家愛德華・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書中首次提出文化這一概念 (2009: 85), 認為文化是一個複雜的, 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 以及他們在社會中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文化差異, 對其語言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文化是一個複雜的系統。

一、文化因素

(一) 文化因素與語言的聯繫

語言作為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反映了一個民族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在漢英翻譯過程中, 我們必須對其給予足夠的重視。英漢一刀切的理論、方法和技巧是建立在英漢對比的基礎上的。語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 這意味著翻譯和文化之間的關係是密切的。翻譯之所以困難, 是因為語言反映著文化, 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並且受到文化的限制。一種語言一旦用於交際, 就出現了對文化內涵的理解和表達問題, 這就要求譯者不僅要有雙語能力, 而且要有雙語言甚至多文化知識, 特別是要對兩種語言的民族心理意識、文化形成過程、歷史習俗、宗教文化、地域特色等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因素有一定的瞭解。由於上述突變因素的存在, 英漢兩種民族的語言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民族色彩。在漢英翻譯過程中, 由於涉及的文化背景知識比較複雜, 有些詞語一般都有特殊的含義, 這就導致了在翻譯過程中詞語的情感色彩不同。考慮到專業情況, 在漢英翻譯過程中, 有必要對辭彙的表層含義進行挖掘, 發現辭彙背後的文化背景和深層含義, 這樣, 我們在將一篇文章從中文翻譯成英文時, 才能充分滿足受眾的需要。

(二) 文化因素對漢英翻譯的影響

鑒於文化因素與語言的聯繫, 有必要對漢英翻譯過程中文化因素的影響進行分析, 以提高最終作品的準確性、可懂性和流暢性。例如, 英語和漢語一樣

也有褒義詞、貶義詞、中性詞、大詞或小詞。英語單詞的屬性一般是由詞根決定的，這就要求我們對每個單詞背後的深層含義和使用方法有所瞭解，以保證譯者在翻譯中不犯錯誤。此外，在五千年的歷史發展中，中華民族創造了一些特殊的表達方式，儲備了深厚的文化積澱，尤其是一些承載著人們對故鄉、家人、朋友等情感的漢語專有名詞，如唐詩、諺語、成語等，都是在豐富的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其中大多包含了民族發展的歷史、個人成長的經歷以及在成長過程中形成的思想、情感和價值觀。因此，譯者需充分理解、掌握這類表達的深刻含義和文化背景，以將其翻譯得生動形象。在進行漢語文化負載詞的翻譯時，文化因素對譯者選擇歸化或異化具有很大影響。下麵將通過舉例來探討譯者在將漢語文化負載詞譯成英語時，如何運用歸化或異化的問題。在 20 世紀 80 年代，西方的翻譯研究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蘇珊·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列弗維爾（Andre Lefevere）提出了翻譯的“文化轉向”，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兩位學者嘗試證明，對翻譯實踐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形式，而應擴展到對背景、歷史、文化和社會環境，讀者可以從不同的語言中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內涵。通過深入瞭解原作的社會背景、作者的寫作目的和寫作方法，譯者可以更好地挖掘原作者想表達的深層含義或思想。此外，譯者在翻譯時還應考慮到地域文化因素。

二、翻譯案例分析

（一）漢語詩歌的英譯

提到漢語中最典型文化負載表達，詩詞必屬其一，詩詞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精華，也是中國文化的象徵。

1. 《靜夜》——A Tranquil Night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A bed, I see a silver light,

I wonder if it's frost a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此詩由唐朝詩人李白撰寫，許淵沖英譯。許淵沖的翻譯主要採用了異化的策略，即直接翻譯，完全保留了原文的表達。這是一首現實主義詩歌，作者以直截了當的方式描述了他的所見所感。儘管李白沒有使用華麗的語言和晦澀的詞語，但讀者仍能在複雜的思鄉之情中與他產生共鳴。讀者在閱讀這首詩時，可以很容易地直接理解和感受到這種情感。許淵沖考慮到了此詩產生的文化背景，加之該詩的特點是樸素、自然而又感人，易於閱讀和理解，所以在翻譯時，許淵沖選擇了異化的策略，以保持原文率直的表達，準確地傳達核心的意義和感受，盡可能地傳達出原文的風格和味道。

2. 《清明》——The Mourning Day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A drizzling rain falls like tears on the Mourning Day;

The mourner's heart is going to break on his way.

Where can a wine shop be found to drown his sad hours?

A cowherd points to a cot 'mid apricot flowers.

此詩由晚唐詩人杜牧撰寫，許淵沖英譯。在上述翻譯中，許淵沖主要採取了歸化的策略，也就是間接翻譯，並增加了闡釋。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清明節是中國特有的傳統節日，許多以英語為母語的受眾並不瞭解這個特殊節日的文化背景。清明節又稱掃墓節，是人們懷著悲痛的心情悼念自己所愛的人并向祖

先表示敬意的特殊日子，每到清明節，都會下小雨。此外，大多數人都會通過喝酒來緩解對已故親人的思念之情和痛苦。考慮到這些文化背景，許淵沖選擇了歸化的策略，在譯文中加入一些細節，讓目標讀者知道作者寫的是什麼，營造一種悲傷的氛圍，讓目標讀者體會到與原文讀者同樣的感受。

根據上述示例，可得如下結論：在翻譯之前，可以先分析文本的體裁和風格，以及作者的表述方式，同時考慮文本的文化背景。如果原文語境簡單明瞭，易于閱讀和理解，譯者可以考慮采用異化法。但是，如果原文中涉及一些文化因素，如中國特有的節日，譯者可以考慮采用歸化。這一方式不僅適用於詩歌，也可用於其他專有名詞的英譯。

（二）諺語的英譯

諺語是指廣泛流傳于民間的簡明表達，有些諺語是中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在《2020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句話“要堅決把減稅降費政策落實到企業，留得青山，贏得未來”，其英語譯文為“All tax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must be fully implemented for our business, so that they can sustain themselves and assure success for the future”（新華社，2020）。這裏的“青山”一詞被譯為“themselves”，是指“企業”。此詞在中文中不僅有“綠樹成蔭的山”的意思，而且還有一個特殊的含義，即一個人或一項事業的基礎。實際上，“青山”是從中文諺語“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中提取出來的，意思是“有生命的地方就有希望”。因此，在瞭解了這個具有文化內涵的特殊辭彙的深層含義後，考慮到語言環境，譯者選擇了利用其延伸意義進行歸化，在報告中把“青山”譯為“企業”。

漢語中的一些詞可能同時具有指稱和內涵，特別是諺語中的抽象詞。諺語往往隱含著特殊的含義，或者背後的故事，這就使得一些普通詞也有了延伸的含義。如果譯者遇到這類詞語，首先需要分析語言環境。如果該詞指的是另一種含義，譯者可通過運用擴展的含義來進行歸化翻譯。

（三）成語的英譯

在李克強總理 2019 年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有這樣一句話“這位記者朋

友喜歡單刀直入，那我也開誠佈公”。張璐(2019)將其譯為 “You went straight to the point in your question and I will not beat about the bush” 。“拐彎抹角”的意思是當某人談論某事時，並不直接說出來，而是以一種含蓄的方式談論。此外，“開誠佈公”在中文中是指公開談論某事，所以張璐在翻譯這個詞時，直接使用了相應的英文習語，這樣不僅可以生動地表達說話人的意思，而且可以使讀者容易理解。

綜上所述，漢語中的一些成語在英語中可能有相應的表達。如果能在英語中找到意思相近的成語，譯者可以考慮運用歸化法，直接使用對應成語，這樣有利于生動地表達意思，使表達更加自然。

(四) 朝代的英譯

中國的古代王朝是一種非常獨特的表達方式，每個朝代皆為古代皇帝統治國家的某一段時期。幾乎每個朝代都有一個以上的皇帝控制著這個國家，所以中國人經常用年號來表示一個皇帝統治的年份。皇帝稱號是評價皇帝統治的一個標志，是根據該皇帝統治期間的所作所為來命名，或贊美或批評他。以“永樂七年己醜”為例，一位英國學者將其翻譯成 “in the seventh year of the Yung-lo period, the cyclic year chi-chou, ” 之後加上註腳 “That is, 1409” 。這是一個典型的翻譯中國朝代的例子，它不僅忠于原文——保留了“永樂”和“己醜”，而且還根據世界上的通用法則，對它的確切年份作瞭解釋。一位美國外交官用同樣的方法將其譯為 “in the seventh year su-chou of Yung-lo (A.D.1490)” 。不同的是後者增加了文中注釋。這兩位譯者都采取了相同的翻譯方法，即將歸化和異化兩種翻譯策略結合起來。兩位譯者都保留了原文的表達方式，並對年份進行瞭解釋。但也有另一個荷蘭高級官員的翻譯——“in the year 1409” ，這是歸化的一種應用。

綜上所述，對於中國朝代，譯者可採用歸化與異化相結合或純粹的歸化方法進行翻譯。這兩種方法可以幫助讀者瞭解準確的年份，避免混淆。同時，它也是大多數人接受的表達方式。

(五) 文言文的英譯

文言文是漢英翻譯中非常困難的一部分，也是瞭解中國歷史的一大重要部分。許多優秀的古代作品或歷史都是用文言文記錄。以《滿刺加國》中的“上命正史太監鄭和等”為例。其譯文為“the emperor ordered the principle envoy the grand eunuch Cheng Ho”。在此翻譯中，譯者選擇了使用歸化的翻譯策略，他對這句話的解釋使人們很容易理解作者想表達的意思。在中文裏，“上”是指皇帝，“命”是對某人下命令。因此，通過翻譯，人們可以知道，皇帝給鄭和下了一個命令，讓他做一些工作。

譯者在翻譯文言文之前，須先轉化成現代漢語，解釋清楚其中的深層含義，以便在翻譯時，讓目的語受眾理解含義。

結 論

選擇歸化還是异化的翻譯策略取決於許多因素，如文學形式和文化背景，包括一個民族的歷史、發展、價值觀、道德觀等等。根據以上譯例，如何應用歸化和异化翻譯策略可總結如下：

首先，在翻譯之前，譯者需要考慮原作的風格——浪漫、現實或激進等。如果原文的表達方式簡單易懂，爲了保持其中的韵味，譯者可以考慮采用异化的策略，保持源文本特色的表達方式，讓目標讀者在欣賞譯文的同時，在情感上與原文讀者產生共鳴。

其次，如果漢語原文中含有一些專有名詞，如中國特有的節日或習俗等，含有豐富的文化資訊，英語受眾對此可能難以理解。這時，譯者可以採取歸化的方法，如在翻譯過程中對源文本進行細節，補充說明，使目標讀者能更好地理解作者在原文中想表達的意思，體驗情感。

第三，譯者在處理多義詞的延伸意義時，應考慮到一些漢語文化負載詞表達背後的深層含義。漢語中許多專有表達方式背後都含有典故，如諺語、習語、格言等。因此，在翻譯過程中應同時考慮其內涵和外延，以避免歧義，保證準確性。

第四，如果漢語中的文化負載詞在英語中有直接的對應表達，如諺語、習

語等，可以直接使用，這不僅使表達更加自然、樸實，也能使讀者更好地理解 and 體驗其中的文化氣氛。在這種情況下，譯者可以考慮選擇異化，直接引用這些對應表達。這樣的表達方式更加原汁原味，目標讀者也能迅速理解作者的意恩。

第五，如果有關於中國朝代的表達，譯者可考慮將歸化和異化相結合，或直接將其翻譯為對應的西曆年份，使譯文更容易理解。對於文言文，譯者可考慮使用歸化。使用簡單的辭彙或表達，理清句子邏輯。

綜上，譯者決定採用歸化或異化之前，他們首先需要考慮的是文化因素。此外，譯者還需要觀察作者的寫作方式，思考原文的表達風格。儘管歸化和異化各有其優點和缺點，但它們都是譯者必備的翻譯策略。

參考文獻

- [1] Man Luo.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of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Research, 2021(3): 80-84.
- [2] 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3] Nida, Eugen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5.
- [4] Rui Ya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Chinese Culture-specific Terms Translation -- A Case Study of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2020 [J]. World Scientific Research Journal, 2020(00): 11-15
- [5] Shuttleworth, M. & 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SFLEP, 2004:59-79
- [6] Taylor Edward. Primitive Culture [M].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2009: 80.
- [7]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8] 鄭德虎.中國文化走出去與文化負載詞的翻譯[J].上海翻譯, 2016, No.127(02):53-56.

- [9] 郭建忠. 翻譯中的文化因素：歸化與異化 [J]. 外國語, 1998(02).
- [10] 黃勤. 歸化與異化相得益彰——評張愛玲譯《海上花列傳》[J]. 外語與外語教學, 2007(08):54-57.
- [11] 劉淑玲,孔德明.新時代中華文化外譯的教育路向及其實踐進路——評《許淵沖英譯白居易詩選》[J].教育發展研究, 2021,41(21):2.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21.21.001.
- [12] 梅啟波.杜詩英譯的原則、策略與跨文化傳播的話語權——以許淵沖與宇文所安的杜詩英譯為例[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62(05):101-109+155.
- [13] 許淵沖. 300 Tang Poems [M]. 五洲傳播出版社, 2011.
- [14] 傅敬民,張開植.翻譯的社會性與社會的翻譯性[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22,45(01):120-127+161.
- [15] 邵霞,馬會娟.中國鄉土小說中的文學方言英譯與接受研究——以《到黑夜想你沒辦法》英譯為例[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21,44(02):74-82.
- [16] 孫海波.文化差異下的英漢成語翻譯[J].學術探索,2013,No.165(08):105-107.
- [17] 新華社. 總理答記者問（雙語）[EB/OL].
<https://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1903/19/WS5c904fa5a3106c65c34ef63a.html>, 2019-03-19.
- [18] 新華社. 2020 政府工作報告（雙語）[EB/OL].
https://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2006/01/WS5ed46379a310a8b241159ce5_1.html, 2020-06-01.
- [19] 章學清.我同許淵沖在譯杜問題上的兩次論戰[J].中國翻譯,2012,33(02):86-91.

A Study on the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Culture-loaded Words

HAN He GONG Yingr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history, economy, politics and customs, each country has developed its own proper expressions, of which translators usually choose two approaches: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But the question of which of these two approaches is more applicable has been debated internationally. Chinese culture has evolved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creating countless culture-loaded words which contain a rich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immortal wisdom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per Chinese expressions and researches how to translate these Chinese expressions into English without changing their connotations through a flexible choice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so that not only can target audiences understand them, but also feel the profundity of Chinese culture, allowing Chinese culture to go further beyond the borders.

Keywords: Culture-loaded words;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投稿日期	2023. 8. 6	审查日期	2023. 9. 9	刊载日期	2023. 12. 28
------	------------	------	------------	------	--------------

美國漢學家李克《管子》英譯本譯者引論的 漢語回譯策略研究

馬 曉 孫繼成¹

（山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淄博）

摘要：中華典籍是中華學術對外傳播的重要載體，典籍翻譯對譯者的翻譯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本文以美國漢學家李克的《管子》英譯為例，重點梳理了典籍翻譯所必備的相關知識儲備及其互構關係，比如中國古典文獻學、訓詁學、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譯本特徵等之間的關聯性。典籍譯者只有加深中國古典文獻研究，才能做好典籍翻譯，為傳承和傳播中華典籍文化做出積極貢獻。

關鍵詞：典籍翻譯；古典文獻學；訓詁學；多元互補論

《管子》李克英譯本是學界公認的“權威譯本”，也是厚翻譯特徵比較明顯的譯作。中國人自己翻譯出版的典籍，一般都不會給讀者提供百科全書式的介紹。能這麼不厭其繁地做文獻甄別與釋讀的譯者，只有潛心研究中國典籍的學者型外國譯者。那麼，典籍英譯應該怎麼做？還可以怎麼做？中國典籍譯者到底需要哪些翻譯能力？在英譯《管子》時，漢學家李克又是如何提升自己的這些翻譯能力？筆者結合李克《管子》英譯本的譯者引論的回譯就上述問題進行探索。

一、典籍翻譯與古典文獻學

漢學家學漢語，也像中國學者考究中文一樣，需要追根溯源，找資料是最

¹ 馬曉，山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MTI 筆譯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漢學和文學翻譯。孫繼成，通訊作者，山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際漢學和文學翻譯。

複雜的過程，也是最有趣的一個步驟。因為一旦開始找，書裏的一句引語就能連帶著找出好幾本書來；翻譯過程中，相關文獻就會越找越多，譯者就會形成某個知識點的譜系雛形。

中國古典文獻學是典籍整理校對的學問，是典籍翻譯的必備技能之一。王宏印把中國古典文獻學最要緊的三項——目錄、版本和校勘做了介紹（王宏印，2010）。2021年第6期《當代外語研究》的卷首語是“翻譯是文化還是知識？”楊楓在文中提出“在翻譯學體系中要為知識留出一席之地”，由此，知識作為翻譯研究領域的構成元素得以正名。我們學習中國古典文獻學，不正是為翻譯典籍學習具體的學科知識嗎？將不同地域的地方性典籍文獻翻譯成外文，不也是將地方知識傳播到域外，進而成為世界性知識的一個過程嗎？下面筆者就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目錄、版本和校勘知識做一梳理。

1.1 目錄

目錄是對文獻分類整理編排的方法，最開始是查詢典籍思想流派的重要依據。西漢劉歆《七略》將文獻分為六類加序言輯略。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承其體制，將目錄分為六類。西晉荀勗《晉中經簿》分為甲乙丙丁四類。東晉李充《晉元帝四部總目》按經史子集排列。從此，官修目錄都按照經史子集來排列了。學習版本學對典籍翻譯的好處是，典籍有所屬的分類，根據典籍的分類，可以確定內容的翻譯基調，對主要思想傾向也能準確理解。比如說，李克翻譯《管子》時，並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文獻學訓練，但從《管子》譯本篇前的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採取了上述分類方法：首先確定《管子》各篇的思想流派歸屬，這對確定譯文中的術語含義起到關鍵作用，進而才能準確地翻譯成英文。

1.2 版本

典籍版本是對文獻內容的考證。典籍在流傳過程中必然產生過多種版本。就典籍的載體來說，從最早的殷商甲骨到金石銘文，再到汗青竹簡、絲綢絹帛，以及各種紙書版式，變化的不只是文字。李克英譯《管子》時，選擇的原作是

哪個版本？李克參考了哪些版本，其中的文本差異又是如何處理？在譯本前言中，李克對自己選用的《管子》原本有過介紹和交代：譯本以兩部《管子》為底本：一是宋代楊忱《管子》刻本，宋本是現存最早的《管子》刻本，清光緒五年張瑛影刻宋本進行推廣；二是明萬曆十年趙用賢以宋楊忱本為基礎，詳加校訂過的《管子》版本，他汲取了明劉績補注本的相關成果，成為明末以來最為通行、影響頗大的版本。因此，李克在選擇底本時就做了一番研究才謹慎選擇了這兩個版本，這也是可選版本中最為權威的兩個版本。至于原文中的用字不同，那是校勘的工作。

1.3 校勘

校勘，顧名思義，就是對文獻中的錯誤內容進行校對勘正。按照語言單位來看，字的錯誤通常指訛、脫、衍、倒四類，句的層面則是句讀標點，篇章錯誤主要是次序，還有正文和注解的關係。校勘之學不得不提校勘四法：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這四種校勘方法不僅適用於中國古代文獻，對我們尋找合適的譯本也很有幫助。校勘四法類似於翻譯批評。在引論裏，李克提到不少校勘名詞，最多的是與善本保存有關，或因竹簡不完整而歧義了幾個字，或散佚了一些篇章。陳垣曾引段玉裁的話說：“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¹“何謂底本？著書者稿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¹況且先秦作品，底本自然難找，就連作者也說法不一。這樣一來，多半要靠研究者沿著傳抄這條綫索來尋找蛛絲馬迹，這個過程就需要充分發揮理校的能力了。

訓詁學的方法必然少不了理校，而言之成理就能立說。古譯和英譯都得推敲。推敲作者的想法，推敲哪個詞更合適。讀者也就在對較中篩選出來較好的譯文。

¹ 段玉裁. 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經韻樓集》卷十二. 《段玉裁全集》之二《經韻樓集》附“補編”“兩考”本，（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0 年版，趙航、薛正興整理。第 313-317 頁。

二、典籍翻譯與訓詁

古語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訓詁就是解讀上述內容的這個“器”。在典籍翻譯裏，語內翻譯就是訓詁。訓詁有正文式訓詁、注疏、專著、考訂（即學者筆記）。其中的正文式訓詁，就是學者邊讀正文，便隨手記錄引得及心得，而考訂則是經過嚴謹查證整理而成的系統筆記，目的性比較強。李克的篇前譯者引論則屬考訂。

2.1 語內翻譯與訓詁

既然訓詁是解釋古代文獻語言，那麼，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包含的內容還不一樣。換言之，典籍翻譯的第一步是語內翻譯，語內翻譯的主要工作是訓詁。然後，在理解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完成語際翻譯。實際上，語際翻譯的源文本是以古文和訓詁文為主，而字面上還是與古文意思相對應的。至于李克的篇前譯者引論，是對原文訓詁之後才形成的系統而詳細的筆記；翻譯訓詁筆記時，由于文中引用了大量古代文獻原文以及受考證資料影響的文體因素，因此，筆者把回譯作為翻譯的第三個環節，提出了語內翻譯、語際翻譯和回譯而成的“三度翻譯”概念：把回譯貫穿到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的全過程中，讀英語也像讀中國學者的筆記一樣，試探性地潛入作（譯）者的心境，廓清其考證過程。

在典籍翻譯的訓詁環節中，最費力的就是確定詞義，選擇合適的詞進行表達。漢譯英時，更是如此。筆者在查閱字典時找到一個好用的字典網站——漢典，裏面收錄的漢字含義非常全面，而且帶有讀音，基本能滿足譯者的學習查閱之需。

2.2 典籍翻譯與訓詁條例

訓詁的目的為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古代學者用訓詁釋意典籍可謂由來已久，而學界公認的訓詁條例有三：聲訓、形訓和義訓。用訓詁釋英語，聯繫英漢雙語，回譯古漢語，聲訓和義訓可創新性地為翻譯服務，形訓解讀漢語也可為英譯服務。

2.2.1 聲訓

聲訓，因聲求義，即通過語音尋求語義。用來解釋的詞和被解釋的詞或音同，或音近，或音轉。（周大璞：2014）英美經典文學作品常會出現一些巧妙的用詞，除了一部分起擬聲作用的詞，我們還可以通過元音或輔音的搭配規律來推測說話人的心理特點。語言學上的開口呼、合口呼、齊齒呼、撮口呼能夠體現人物性格和心情，其中的道理是一樣的。在一句話中，除了雙聲疊韻詞之外，同聲母的字儘量不要重複使用，以保持用詞的多樣性。這是考慮到發音的舒適性，也符合音步的協調性。

聲訓運用於翻譯中，不同於語際翻譯將兩種語言分開來看，而是古代漢語的語音規律在一定意義上與英語的語音有共通之處。古漢語的聲訓用於說明文字通假，探索詞語來源，保存古音的歷史面貌。聲訓的求義方法可以運用到英語的遣詞造句中，英語可能也存有類似的方法。

2.2.2 義訓

義訓是直陳語義的方法，不借助語音和字形，也就是將字詞的語義一一列出。義訓大致有五：同義相訓、反義相訓、設立界說、描寫形象、比擬事物。（周大璞：2014）

和英語一樣，漢語詞語是以本義為中心，呈多方向引申發展。字典通常羅列的是詞語的相近意義；既然詞語的意義是多方向發展，有相近方向，必然也有相反方向。漢語有用反義詞解釋本詞的方法，英語翻譯中也有正話反說的表達技巧。設立界說就是給詞標志的事物下定義，這種用法在學術論文中較為常見；描寫形象用於描寫詞所標志的事物的形狀和性能等；比擬事物是把兩種類似的事物加以比擬。

《爾雅》《說文》中有許多義訓的例子，拿同義相訓來說，用一個詞去解釋另一個同義詞，用一個詞去解釋多個同義詞，同義詞展轉遞訓，用今語解釋古語，用通語釋方言等。義訓在翻譯中的應用可作為譯者理解原文的輔助。做文學翻譯的時候，偶爾出現的一個生僻詞，在字典中給出的英文解釋類似於設立

界說，漢語意思就是同義相訓。但是，機械地看一遍漢語意思有時不能準確地理解單詞在英語語境中的原本意味。例句可以幫助構築語境，大都要靠我們自己去體味其中的微妙差別。義訓運用到翻譯中，可以對學習者學習生僻詞或新單詞更有幫助。比如，用 Word 批注功能羅列與該單詞相近相反的義項，盡可能全面，因為這樣不僅可以幫助理解這個單詞，還可以拓展我們翻譯用詞的多樣性。在李克《管子》英譯本中就出現過很多近義詞比對，翻譯時需要體現這種“相關性”。漢語的近義詞基本上都含有同類項，因此，我們在回譯時就應該儘量選擇含有相同漢字的近義詞，這個字就是把幾個詞串聯起來的綫索，也是幫助讀者體會關鍵術語英譯的主調。這也是同義相訓的慣用方法。

2.2.3 形訓

形訓是以形求義的方法，通過對字形的分析來尋求字義是形訓的理論根據。漢語是表意文字，有迹可循，而英語是表音文字，不適用於形訓。利用形訓發揮好解讀漢字的功能，可以為英譯做好譯前準備。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提出漢字“六書”：

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

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

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揮，武信是也。

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

詮釋或翻譯中國古代典籍，尋求漢字的本義很重要。典籍中的很多字容易讓人望文生義，即便是權威學者也很難將每個字的本義解釋到位。從語源說起很多字必有爭議，甚至錯誤。例如，《康熙字典》收錄了四萬七千多字，雖是學者奉昭編纂，其中也存在不少問題，單是王引之就找出兩千多條引書錯誤。一方面，這說明尋求漢字意義需要謹慎和邏輯推敲，翻譯中國典籍是將中國文化傳播出去的工程，譯者應該負責，並積累基本的文獻學素養，警惕望文生義，這也是理校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面，譯者在翻譯中國典籍時，查找參考資料要

注意文獻互證，這是訓詁的原則，也是典籍翻譯中不可或缺的步驟。

漢字的六種造字方法可以帶領譯者進入典籍翻譯的語內翻譯環節，解開漢語的層層面紗，然後，再踏入另一語言的河流中。李克憑藉良好的中文功底查找資料，解讀《管子》，不僅將漢語字詞融會貫通，而且憑藉其母語優勢，轉換成英語解釋，翻譯典籍的優秀外國專家不止他一人，但能做到如此詳細考證中國典籍的漢學家，李克實屬難能可貴。

2.3 典籍翻譯中的訓詁語言

李克《管子》英譯本中的譯者篇前引論在典籍翻譯中可謂獨樹一幟。回譯譯者引論需要注意的最大問題就是語言風格。這就要區分“本地化翻譯”與“風格指南”。風格指南是編寫與設計文檔時的參照標準。例如，IBM 的風格指南包含語言語法、標點符號、排版格式、文本結構、參考資料、數字單位、電腦界面、區別讀者、術語詞典、項目索引等。從目錄可以看出，風格指南是為規範本地化語細節設置，其中語言語法一項中列出大寫、縮寫及各種詞類的用法，由此可見，“Style guidance”字面意義是風格指南，但很容易讓讀者望文生義，其實這個詞指的是國際公司本地化指南中的文本書寫規範與標準。翻譯風格指南在風格指南基礎上增加了對翻譯的指導。指南中包含的許多語言規範及知識內容同樣需要外語及翻譯專業學生加以掌握和執行。

而翻譯風格實則是譯者對於原作風格的充分再現，即譯者的隱身。奈達等人（Nida et al. 1982: 12）給“翻譯”定義了兩個層次：“在譯語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對等語再現源語的信息，首先是意義，其次是風格”。翻譯是在譯入語中找到與源語信息最貼切、自然的對等物，首先是就意義而言，其次是就風格而言。（周領順：2019）文學翻譯要體現原作者的語言風格。典籍翻譯也有語言風格，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在用詞上也有顯著不同。比如，從《管子》各篇體現的思想就可以看出各篇內容并非出自管仲一人之手，這一判斷是從思想內容反映在用詞風格而推測出來的。李克研究《管子》的語言風格應符合中國訓詁所承襲的方式，因此翻譯譯者篇前引論時，筆者還需要多讀些訓詁著作，熟悉並且模仿王引之等訓詁大家的造句方式，才能讓讀者如臨其境，進入訓詁的

研究境地。

可是，做中國典籍翻譯、研究中國典籍翻譯的學者大多數來自英語專業，而研究典籍，研究《管子》的讀者不少來自于中文系和歷史系，所以筆者認為翻譯《管子》各篇的譯者引論時，應該以更高標準來校準語言風格，典籍文言肯定艱辛晦澀，但這才是典籍的語言風格。訓詁雖說是解釋意義，解釋古文的語言風格究竟是要與古文擁有相同的土壤，自然要遵從古制。翻譯的作用就是再現其原義，只是個中間商，畢竟李克翻譯的是古文，譯者引論的研究對象也是古文，雖說正文譯文和引論聚焦的是同一件事，但二者內容又不盡相同。譯者引論在古文的基礎上又參考了許多研究它的古文和今文，考慮到這些文字的源頭，翻譯出來的譯者引論也要盡可能古色古香才好。這是回譯中國典籍的起點，也是其特點。回譯，即回到最初的文本起點。

三、典籍翻譯與翻譯標準的多元互補論

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對中國典籍翻譯的適配性源自二者相同的思想土壤，是中國典籍中的哲學思想產生了對應的翻譯理論，翻譯理論再反作用于中國典籍原文，這也符合譯學的內部發展規律。

3.1 基本理論要點

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是一個翻譯標準的系統，這個系統包含三個標準，即絕對標準、最高標準和具體標準。辜正坤（1989）認為，要解決翻譯標準問題，首先要從多元認識論角度來審視翻譯，不存在唯一、永恒的翻譯標準來評價所有翻譯作品并指導所有翻譯實踐，翻譯標準應該因客觀現實而具有多元性。因此，為了滿足人類的主觀需要，也為了理論構建本身，理論要展開就必須有一個出發點，這個出發點就是——原作——這也是翻譯的絕對標準。因為一切譯作都來自原作。辜正坤用最佳近似度來形容譯作模擬原作內容與形式最理想的逼真程度。“一個翻譯標準所具有的優點，正是別的翻譯標準所具有的缺點。所以翻譯標準的多元化本身就意味著翻譯標準的互補性。各式各樣的翻譯標準

代表了譯作價值的各個方面，每個標準在各自發揮自己的功能的同時其實就是在和所有的標準相輔相成。”（辜正坤：1989）各種要素在翻譯標準體系中相互關聯、相互補充。辜正坤運用多元認識論構建翻譯標準體系，即具體的翻譯標準是多元的，而這種多元性由客觀現實決定，即翻譯的多重功能、人類審美標準的多元性和多層次的讀者和譯者。翻譯史的研究證明，最佳近似度取決于具體情況，而目標文本只能成為源文本的變形。至于如何變，則取決于譯者與讀者的認知能力和感知角度，採取不同的具體標準。因此具體標準在整個體系中在不斷變化，正如辜正坤所說，在整個翻譯歷史的長河中，翻譯標準的穩定性是相對的，而變異性却是絕對的。（辜正坤：1989）因此，不存在適用於所有翻譯的唯一標準，翻譯的標準應以具體條件為轉移。

3.2 哲學基礎

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的哲學基礎與《管子》的思想語境一致，二者都蘊含了典型的道家辯證思想。典籍翻譯和漢學家典籍研究的回譯都要以典籍原文為絕對標準，立足源語和譯語的多元文化，面向譯語的多元讀者，根據具體情況採取具體翻譯標準和翻譯策略，實現語內翻譯、語際翻譯和回譯的有機結合以及譯文與原文語境的最佳近似。作為文學理論家和翻譯名家，辜正坤深諳中國古典文學和哲學，其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就表達了其中所蘊含的辯證法觀點。

3.2.1 老子的統一整體觀

老子主張人類社會的發展應該遵循自然規律，即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把天、地、人視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人對世界的認知也離不開天地。孤立地看待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是狹隘和偏見的。老子“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質特徵是承認聯繫的普遍性。他不僅重視自然系統中眾多要素的因果關係，而且強調人類社會中多種要素的和諧。也就是說，只有多角度審視事物，才能避免偏見；只有採取多元思維模式，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事實上，“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這個名稱已經充分體現了老子的上述觀

點。根據《現代漢語大詞典》，“多元”的意思是“多種多樣”。“多元論”在《語言大典》中的意思是，“認為世界是由多個不同本原構成的哲學學說”。

“互補”即“相互補充、互相填補”。總之，標題中的兩個術語都表明了“一個統一的整體”不同要素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辜正坤把翻譯標準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包含了很多要素。這些要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關聯和互補的。

3.2.2 莊子的相對主義

莊子雲：“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而知識是無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尋無限的知識，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在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中，具體標準有很多，我們要根據需要，選出若干相輔相成的標準。

莊子在《逍遙游》中傳達了多元認識論思想。從大智小智大年小年的小大之辯中可以看出，莊子反對主觀偏見，激勵人突破局限，開闊眼界。《齊物論》中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件事從這個角度看是對的，從那個角度看就不對。從那個角度看是對的，從這個角度看又不對。因此，人們應該多角度看問題，看多了就會發現，“惡乎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換言之，這件事為什麼是對的，自然有它對的道理。這件事為什麼是不對，自然有它不對的道理。這也就到了“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的境界。

老子的多元認識論、莊子的相對主義等道家觀點在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中表現明顯。在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中，沒有哪個翻譯標準是絕對正確或不正確的，因為沒有一個翻譯標準可以適用於所有情況。以此為前提，辜正坤運用多元認識論的觀點來構建自己的翻譯標準體系，即具體的翻譯標準可以是多元的，而這種翻譯標準的多元性是由客觀現實決定的，即翻譯的多重功能、人類審美標準的多元性和讀者譯者的多層次性。

3.3 對中國翻譯研究的啟示

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對中國翻譯理論的建設以及其他學科的建設大有啟

發。在弘揚傳統、借鑒西方理論的過程中，我們要取長補短，充分發揮自己的長處，具體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考慮。

3.3.1 中西理翻譯論互補

英漢語言文化的特點造成了英漢兩種思維模式的差異。中西翻譯理論各有優劣，沒有絕對答案。但是，我們可以互相學習以彌補各自不足。比如，中國翻譯理論的特點是模糊性，而西方翻譯理論的特點是明確性。在這裏，模糊性并不是指中文翻譯理論是模稜兩可或莫名其妙；相反，中國翻譯理論的模糊神韻為譯者充分發揮其藝術才能提供了廣大空間。在做文學翻譯時，例如“神似”、“化境”、“三美”、“和諧”等是合適的，但應用于科技文獻翻譯時，以明確性為特徵的西方翻譯理論就可以彌補中國翻譯理論的上述不足。

3.3.2 傳統與現代翻譯理論的互補

中國傳統翻譯理論的系統性不足和可操作性不强，這是由多方原因所致，但是，這些翻譯理論却具有高度綜合性和深刻的哲學意義。為了推動翻譯研究的進步，最好用現代翻譯理論來補充傳統翻譯理論。事實上，中國的一些翻譯理論家一直在進行這樣的研究。例如，王宏印教授出版了《中國傳統譯論經典詮釋》一書，他運用現代理論思維闡述了中國傳統翻譯理論的一些代表性概念。

一般來說，傳統翻譯理論與現代翻譯理論是繼承和提升的關係。可以說，繼承翻譯傳統有助于促進現代翻譯理論的創新。當今譯論層出不窮，更加注重系統性，這是對傳統譯論的繼承，也是創新發展。譯者在選擇翻譯理論時也要注重甄別，根據文本特點和實際需要來選擇適合的翻譯理論。

3.3.3 翻譯研究的多學科互補

根茨勒說：“在這一全球化時代，為人所知甚少的語言尤其受到威脅，翻譯和翻譯研究顯得愈發重要。”因此，中國典籍文化走出去、走進去就很有必要。許鈞指出，借助不同學科的理論對翻譯問題進行研究，是翻譯研究發展的一條必由之路。（許鈞：2011）這是由翻譯學科的性質所決定的。目前，翻譯

的跨學科研究非常廣泛，不僅與中國語言文學聯繫密切，同時涉及哲學、心理學、美學、社會學、認知科學、計算機科學等人文學科以及一些自然科學領域。對此，我們要考慮翻譯研究中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聯繫、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

各學科知識單元的靜態複合和動態組合相結合。靜態複合就是指語言學、文學藝術、文化學、符號學等學科單元曾經是一維的，即人們在進行研究時只是集中在各個學科孤立的研究內容和對象上，具有“靜態複合”的特徵。但是當這些單元應用於翻譯研究時，研究內容和對象就不再孤立了。因此，翻譯研究者必須對相關學科的知識結構和概念體系有深刻理解，才能充分利用多學科知識，對翻譯進行全方位的研究。

各學科內在邏輯結構的比較與互補相結合。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不同學科的內在邏輯結構加深對它們的理解，然後，將所需的要素應用於翻譯研究。各學科的結構發展與翻譯學結構發展相結合。不同學科快速發展，也加速了翻譯研究的進一步的發展。

總的來說，辜正坤通過建立翻譯標準的多元體系，解構了中國傳統的翻譯理論，打破了建立一個可以指導所有翻譯實踐的單一翻譯標準的嘗試。此外，在多元互補論的指導下，翻譯研究領域那些有爭議的問題可以從新的角度得到解決。這種多元體系對中國翻譯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給中國翻譯理論界帶來了一個新思路，即崇拜一個統一的翻譯標準在當前的翻譯研究中已不再正確。根本不存在一種可以指導所有的翻譯實踐的獨特翻譯標準。

事實上，通過對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的綜合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個理論的强大生機。如果它的本質被更好地理解并以靈活和現實的方式得到最佳利用，它對翻譯研究會有很大幫助。尤其是在“多元”和“互補”成為諸多研究領域的普遍趨勢的當下，多元互補論在哲學思想的前瞻性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必將是翻譯研究以及其他領域研究的理論利器。

四、李克《管子》英譯本的譯文特徵

漢學家的中國典籍翻譯可以為中國典籍翻譯者帶來啟示，美國漢學家李克為中國譯者提供了一個典籍本地化的先鋒指引。

4.1 術語格式

異域文化讀者最難理解的譯本部分就是術語翻譯。李克在英譯《管子》時，將原文中首次出現的術語均做了雙語標記，基本格式為英語譯法（漢語原字和漢語拼音），拼音不帶聲調。《管子》各篇標題譯文均統一採用了這一譯文形式。並且，李克將《管子》英譯本的兩卷本各自出現的術語還匯總到文後索引中，方便讀者查閱。

4.2 回譯格式

李克在譯者篇前引論中引用了大量先秦典籍的原文，全部採用現有譯本呈現。漢譯這部分文本時，筆者傾向於原原本本地核查出典籍原文。但經驗告訴我們，把自己回譯的現代漢語放在典籍原文的前面，把典籍的文言原文放入回譯的後續括號中，可以保留譯者譯文風格的一致性，進而，讓讀者自行對比漢語回譯與原文，讓讀者的閱讀在比較中凸顯理解的深入，閱讀效果會更好。如果在回譯中直引原文，就默認了李克英譯文的完美與絕對，就不符合上文提及的多元標準互補論的內在要求，回譯的現代漢語是譯文的相對標準，而文言原文就是絕對標準。

4.3 譯本注釋

李克翻譯的《管子》幾乎每頁都有腳注。這些腳注包含詳盡的解釋信息，有些是術語來源，有些是知識拓展。注釋同引論一樣屬典籍英譯的副文本，這些副文本信息無論對於讀者、譯者還是研究者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典籍翻譯的作用主要是給相關研究者提供參考，筆者翻譯的譯者引論同樣是為中國的先秦典籍研究者提供參照。因此，翻譯的方式應該符合讀者的需要和閱讀習慣，從而實現回譯譯本價值的最大化。

4.4 參考書目

李克將翻譯過程中參考的所有書目悉數列出，僅參考書目就多達二十余頁，尚有中外歷代訓詁學家及學者的相關研究文獻，可謂卷帙浩繁。因為李克附帶的漢語拼音不帶聲調，有時國內學者閱讀或查證起來不太方便。參考書目不但拓展了研究者的研究視野，而且節省了查找書目的功夫，可以點對點找到相關資料。

4.5 機器翻譯

典籍回譯不適合機器翻譯。譯者的篇前引論是李克根據《管子》原文進行解讀和研究的詮釋性文本，不僅大量引用了各類典籍原文，還包含很多文獻學術語，不管是基于統計還是神經網絡的機器翻譯，普通機翻工具積累的語料庫遠遠達不到翻譯《管子》各篇譯者引論的水平，更不用說典籍翻譯。何況對機器翻譯來說，典籍翻譯比文學翻譯還要多一步語內翻譯。文學翻譯需要解讀作者的言外之意，典籍翻譯需要解開作者的古意。神經網絡如果能自動聯網查找到正確的術語解釋，然後基于語內翻譯而譯成外語，那麼機器翻譯將會是革命性突破。

結 論

中華典籍源遠流長，承載了各學科門類曾經最前沿的理論。而典籍翻譯更是一個富礦，譯者不僅需要加強翻譯能力培養，自覺提升中國典籍翻譯所需的文獻學、訓詁學、翻譯標準、原文及譯文的文體分析等相關知識儲備。只有這樣，才能做好中國典籍的回譯，方便讀者瞭解中國典籍的國際傳播路徑及文本研究實況。典籍浩瀚，翻譯路遠。吾輩攜手，文化流傳。

參考文獻

[1]陳修亮,武良成.《管子》版本文獻的集大成之作.中國社會科學網,2014:
<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2803861/2d90cxFRyOSVh3VILkpN4NwPwam8FCwEcMRHJnbIVW0KcJuxcaUhChPRdRszLVpRX2gCt1PkwyTGfPqqHUFHHPir1NUT>

- [2] 陳垣. 校勘學釋例[M].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7.
- [3] 正坤. 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J]. 中國翻譯, 1989(1): 19.
- [4] 宏印. 中國文化典籍翻譯——概念、理論與技巧[J]. 大連大學學報, 2010(1).
- [5] ——. 中國傳統譯論經典詮釋[M].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6] 三夕. 中國古典文獻學[M].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
- [7] 大璞. 訓詁學初稿(第六版)[M].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4: 174-260.
- [8] 領順. 譯者行爲批評:理論框架[M]. 商務印書館, 2014.
- [9] ——. 構建基于新時代譯出實踐的翻譯理論[J].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20(1706).
- [10] 鈞. 翻譯概論[M].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1.
- [11] . Allyn Ricket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Early China[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85.

On the Back Translation Strategy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Guanzi* by W. Allyn Rickett

MA Xiao SUN Jic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Abstract: Chinese classic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exter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works.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places higher demands on the competence of translators.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nslator should deeply grasp the essence and artistic charm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ntegrate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and subject knowledge. This paper uses W. Allyn Ricket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Guanzi* as an example to sort 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lassic translation and ancient Chinese bibliography, commentariology, plural complementarity of translation standards, and translation features. Only by deepen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can translators do a good job and contribute positively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culture.

Keywords: Classics translation; Ancient Chinese bibliography; Commentariology; Plural complementarity of translation standards

投稿日期	2023. 8. 6	審查日期	2023. 9. 9	刊載日期	2023. 12. 28
------	------------	------	------------	------	--------------

Literary Studies and Cultural Comparison

文學研究與文化比較

論《大湖消息》的“自然”意識及“生態寫作”實踐

劉詩姣 趙斌¹

（衡陽師範學院文學院）

摘要：《大湖消息》作為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有著濃厚的生態價值觀，在特定的地域空間裏，加深了對社會、文化、人性等更深層面上的探求，在學界、業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一方面，在現實生態語境下，沈念基於自身生命體驗，重訪自然之根，帶著敬畏和悲憫之心走訪洞庭湖，以詩學敘事手法追溯洞庭湖的歷史性與現代性，其創作靈感源於他的鄉土地緣情結。另一方面，沈念選取一系列有關生態、自然意識的素材，刻畫了有情有義的動物與人物，是其生態文明理念下的沉思，作者借田野行動實踐反思自然，文字飽含深情地記載了大湖與它的江湖兒女之間的故事，以此投射了生態批判視域下的文學自覺。

關鍵字：《大湖消息》；沈念；自然意識；生態寫作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生態系統平衡因受技術革命的影響而被打破，隨之，美國興起了一種新的文本研究視角——人與自然的思考帶到文學研究中，“生態批評”應運而生。正如王順天所說：“‘生態批評’作為頗具現代性意味和危機感特徵的批評範式，其誕生之初便與日益凸顯的環境問題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態現狀相聯繫。”²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被逐步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生態意識在社會發展中一次次覺醒，促進了生態意識

¹ 劉詩姣（1997-）女，湖南衡陽人，衡陽師範學院文學院 2022 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趙斌（1982-），通訊作者，安徽霍邱人，中山大學文學博士，衡陽師範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² 王順天：《“生態批評”的理論輸入與本土化實踐》，《文藝爭鳴》，2022 年第 11 期，第 130 頁。

在人民群眾思想中深耕厚植。所以說，建構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生態批評，是新時代中國生態批評的最大特色。¹沈念作為中國文壇頗受矚目的湖南作家，其近年來因關注洞庭湖等地方生態而創作的一系列作品是“生態寫作”的重要創獲，散文集《大湖消息》是一次重要的“生態寫作”實踐。《大湖消息》2021年12月由北岳文藝出版社付梓發行，剛已出版就產生了很大反響，卓今、劉長華、王瑞瑞等學者從非虛構、物性、生命詩學的角度做了非常精細的解讀。²卓今認為，沈念在非虛構寫作方面進行了新的嘗試，知識密度和情感力量的粘合度很高，沉重的社會實踐與輕盈的藝術手法渾然一體。他以內在邏輯和形式安排上的創新，打開了生態文學書寫一扇新的大門。《大湖消息》的“生態寫作”特徵是不言而喻的，除了“物性”“生命”意識，其中的“自然”意識及其“生態寫作”實踐展現出沈念創作中的生命視野與自然情懷，有必要對之加以梳理及分析。

一、“自然”意識中的人物群像與當地語系化實踐

《大湖消息》圖文并茂，為我們揭開了洞庭湖深處的一角。作品通過大湖的地域環境，真實的再現了自然與人類的交流互動。沈念在寫作之初，力圖呈現洞庭湖一帶的原始之美。但在沈念的筆端下，人物形象的多樣性與物種多樣化交相輝映。毒鳥人一類是作為反襯者出現的，相比較而言，毒鳥人是局限于一己私利、不擇手段的代表人群，毒鳥人雖狠毒，但也受其精神和物質上的束縛，所以字裏行間又流露出人性情感之複雜。第一章用脚步的足跡引出毒鳥人的形象，並將湖面上的生機打破，表現出毒鳥人罔顧生命的價值觀，而與之對應的是，護鳥人堅守生命陣地，維護生物多樣性，文中著力聚焦在毒鳥人形象的塑造上，將護鳥人與毒鳥人加以對比，突出毒鳥人“平庸”“俗套”的惡，

¹ 汪樹東：《構建生態批評的中國學派——中國當代生態批評發展綜論》，《長江學術》，2023年第2期，第36-46頁。

² 卓今：《鳥獸率舞萬物生長——沈念非虛構作品〈大湖消息〉分析》，《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4期；劉長華：《〈大湖消息〉與物性書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2期；王瑞瑞：《身體意識與生命本體詩學的建構——評沈念散文集〈大湖消息〉》，《文藝論壇》，2022年第6期。

帶給自然的毀滅性破壞。在這裏，生態問題反映了人類的道德底綫及其生存意識。

文章中順著“我”的所見所聞，對保護區的人們進行刻畫，洞庭湖保護區老張、老高等人員是歸來者，是家鄉文化的守望者，他們對這片湖有著的責任意識，既彰顯出群體對生態保護的堅定，也體現出一種現代文明下的焦灼。大湖有一群有情有義的生態守護者，如，崔福在面對父親沉浸在黑楊致富的夢幻中，也堅決守住最後的原則和底綫，不越過傷害自然的紅綫。他時刻警醒著：“環境破壞了，陷入惡性循環，又想著千方百計去治理，治理的代價更大。”保護區人員老朱和老張來到大湖，也都有著自身的使命，老高作為經常走訪“一綫”的資深保護者，從實地考察學習之後，掌握了用痕迹追蹤鹿群的方法；拍鳥狂人寫下護鳥心切的主題詩，老鹿從打鳥人轉變為護鳥人，在白鶴飛往天空那刻，他脫口而出白鶴的名字——“飛飛”，還有許多愛鳥之士因鳥結緣，戀愛修成正果，護鳥隊的老張回憶起祖父輩對待湖上自然死亡的大雁野鴨，都會撿起來填埋，甚至是折段柳枝插在坑頭上。老鹿從打鳥人到護鳥人的身份轉變，突現出人性的覺醒，點燃了生命意識。這些常年疾行在湖區洲灘上的人，他們對這片湖飽含深情與大義，才組合成了大湖故事。人類對自然生態系統給予道德關懷，從根本上說也是對人類自身的道德關懷。¹在人類精神家園陷入坍塌之際，沈念嘗試救贖迷失的人性。誠然，生活於這片大湖之中，人類從依賴自然到改造自然，生態焦慮也必然會觸及到每一個保護區工作者的敏感區，城市化的進程也伴隨著犧牲與對賭。

大湖水底的魚腥味、大湖水面的江湖兒女是沈念著力描摹的畫像，是地域文化的象徵。當一個人的身體納入其周圍的環境，超出了表皮的常規邊界，可以滿足其呼吸和營養的基本需要。²基於身體哲學理論，可知人的鄉土情懷與身體意識息息相關。這來源于他作為洞庭湖人對於這片水土的生命感

¹ 葛紅兵：《憂患、信仰與拯救——當代生態文學的三個向度》，《社會科學》，2010年第8期，第180-186頁。

² 舒斯特曼：《身體意識與身體美學》，程相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297頁。

知，一是發現大湖的面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 世紀 40 年代中期洞庭湖已是洲灘廣袤，湖體支離破碎，港汊交織，灘地發育係數達 0.4 左右。洞庭湖灘地發育程度如此之高，表明洞庭湖已進入它的衰老階段。”¹大湖的老去也呼籲著社會應該對自然環境多一點的關注度。二是大湖與它的系統相互聯繫，不可分割。“人性系統的存在和發展絕對地依賴于大自然，大自然的生態完整性和複雜多樣性以及由此決定的生命力，也根本上決定著人性系統的‘生態’整體性、複雜多樣性和生命力”。²“所有候鳥的一生都會等待一次萬裏飛行嗎？”³在肆意捕殺的形勢下，動物的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面對劫難，候鳥夜間遷徙，這種被迫選擇的自我保護，是人類的反思，亦是諷刺，曾經的棲息地，現在的囚籠，候鳥面對這支離破碎的洞庭湖自顧自地滿世界逃亡。

沈念筆下的動物具有典型性，爲了探索、展現人性的複雜，他借助了對動物的生命力描述來反映自然生命力量的強大，突出人性與生態的悖論層面的迥異。人類因爲欲望膨脹而不斷試探道德底綫。如，江豚本該毫無束縛的馳騁在江湖之中，但受到生存空間的壓迫，江豚出于本能作出自我保護的反應，其無意于傷害人類。江豚作爲靈性動物代表之一，尤其是體現在搶食方面，它們不傷人，却好像要用“搖搖晃晃”的行爲和人玩遊戲，它們以獨特的眼光與人類打交道，甚至是識出了結下了“梁子”的匡爹，白鶴的仗義，救了鹿後義落水的孫女等等。在對生物鏈中最底層的動物進行描述時，作者以極爲感性的文字充分展現出他的人文關懷。張穎說，所謂“精神家園”，是人面對自然所感受到的那種強烈的皈依感，恰恰來自于人內心“未知的刺激與恐懼”，也即來自于人對自身脆弱、渺小屬性的確認。⁴洞庭湖是我國的第二大淡水湖，是湖南人的魚米之鄉，也是一代又一代人記憶的港灣，是湖

¹ 李躍龍：《洞庭湖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6 頁。

² 吳文新、王豐華：《論生態倫理學中的人性問題》，《哲學與文化》（臺灣），2006 年第 6 期，第 68 頁。

³ 沈念：《大湖消息》，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21 年版，第 18 頁。

⁴ 張穎：《開拓生態散文寫作的新疆域——評陳應松的“神農野割”系列散文》，《當代文壇》，2023 年第 2 期，第 180-185 頁。

湘文化的獨特意象，唱響著湖南人的歸屬感，這也是作者沈念對鄉土之根的追尋，他于歷史與現實之間穿梭，將地域文化、歷史記憶、個人體驗完美融合在一起，向讀者鮮活地展現了洞庭湖畔的生態圖景。

二、“自然”意識中的詩意建構與地緣情結

“穿過村莊，翻上長堤，洞庭湖咫尺之間。東經一百一十度，北緯三十度，是洞庭湖的主座標。這一緯度上的冬天，湖水退去，廣袤的湖州濕地一片蒼茫，齊整裸露，草葦瘋長，坑窪與水溝交錯，牛腳踩出一個個堅硬腳印，小路上泥轍結凍，像伸向湖心的鐵軌。”¹沈念通過詩一般的敘述，向讀者定位大湖的地理位置，為讀者翻閱大湖的地圖，掀開大湖沉重的記憶。在農村和城市的交叉下，動物有生物的生存法則，人類有人類的道德原則。

“候鳥在洞庭湖濕地上連接的不是烏托邦的理想，而是人類詩意栖居的現實與田園理想。”²這是屬於洞庭湖獨有的烟火氣，《大湖消息》以詩學般的語言向我們展現了洞庭一帶的鄉村慢生活，延伸了我們對自然的理解。

沈念在語言上的詩學構建離不開表達形式的多樣性，相比較敘事來說，沈念對動物的闡述多了一絲浪漫的氣息，並以生動趣味的描寫，將鳥的存在與生活空間結合起來，“無法想像沒有羽翼的飛行，如同沒有風的天空”。³保護區的老張感歎著風是候鳥生命的一部分，天地之間，因為風的力量，才促使候鳥的飛行成功。其語言的獨特性在於他對生物的刻畫極其細緻，“那些叫聲，泣叫、雕鳴、低吟、顫鳴、喘叫、咆哮、沙啞、呻吟、嘶鳴和尖叫，似乎有著各種色澤和形狀，依舊是孤獨的彙集，即使是飛翔的翅膀也像是孤獨在天空撲騰的象徵。”⁴沈念關懷的不僅僅是個體的生命層次，而是向讀者展示出洞庭湖自然生態的美好。

¹ 沈念：《大湖消息》，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5頁。

² 同上，第48頁。

³ 同上，第32頁。

⁴ 同上，第34頁。

文學視閥中的自然、生態書寫，顯在層面是寫景、寫物、寫環境，隱在層面則是抒情、言志，尤其是表達對環境破壞、生態惡化以及個體、社會异化的不滿和對抗，這是任何一種藝術形式的本能與天職。¹自盧梭以來，“自然”和“自然狀態”成為許多哲學家 and 文學家寫作的對象。盧梭筆下充斥著“自然”“自然人”“自然感情”和“自然狀態”一類詞語。他說：“我並不從高超的哲學中的原理推出為人之道，可是我在內心深處發現的為人之道，是‘自然’用不可抹除的文字寫下的。”²在大湖中，詩意化的靈性動物為大湖氣息增添了神秘色彩，“在蘆葦叢偶遇一隻受傷的白鶴，低囀的痛苦哀鳴，讓那雙長滿硬繭的拿槍的手無端地抖動起來。特別是對視中白鶴眼神裡的恐懼和絕望，突然勾起一陣痛徹心扉的震顫。”³《大湖消息》是一部生態的命運之書，其中有哀婉，有歡喜，更多的是親近自然、反思自然。在洞庭湖架構人與自然這一創作的重要母題，並力圖發掘候鳥、江豚、麋鹿中豐富的生態學、文化學意義，寄托了研究者的人文情懷與情感視域。生于洞庭湖，長于洞庭湖的沈念，其創作凝聚了他對故鄉的深情與眷戀、憂思與憧憬。⁴他呼籲人們保護自然，守護家園，並肯定了動物的內在價值。另外，文中將鳥和魚作為湖的兩大主角，也指向了生物的多樣性正是湖的靈性所在。

20 世紀以來，表現與塑造文學地方性、尋找與建構文學原鄉是中國文學的重要內容與重要母題。“鄉土”“自然”成為思鄉的符號，激起許多作家的地緣情懷。⁵地緣情結指的是人們對某特定的地方有根的感覺，人的記憶會影響他們對環境的認知。作家在鄉土記憶裏構建自己的文學世界，這種特定情感積攢了作家的創作能源。當然，“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是

¹ 王傑泓：《原鄉情結與中國生態文學批評的發生》，《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2 期，第 158-162 頁。

² 舒斯特曼：《身體意識與身體美學》，程相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版，第 297 頁。

³ 沈念：《大湖消息》，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21 年版，第 39 頁。

⁴ 教鶴然、沈念：《將屬於江河、湖泊的時光溫柔挽留》，《文藝報》，2022 年 11 月 9 日。

⁵ 張穎：《開拓生態散文寫作的新疆域——評陳應松的“神農野劄”系列散文》，《當代文壇》，2023 年第 2 期，第 180-185 頁。

人們活動與地形、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物產等自然環境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影響下的行為方式、審美愛好、價值觀念等等。”¹對於一個文學家、藝術家的生長發育來說，早期經驗更具有重大意義，它可以持久地影響到文學藝術家的審美興趣、審美情致、審美理想。而如此重要的早期經驗正是從一個文學藝術家童年時代所處的“生境中獲致的。”²生長的土地是作家的精神故鄉³，沈念離鄉之後來到洞庭湖，當自然與故鄉相結合，記憶中的故鄉與走向現代化的故鄉進行整合，這便形成了一種地緣情結。

三、“自然”意識中的物種危機與地方生態

王諾認為：“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之關係和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並從事和表現獨特的生態審美的文學。生態責任、文化批判、生態理想、生態預警和生態審美是其突出特點。”⁴從《大湖消息》的形式和內容上來看，其生態意味都較為顯著。生態文學這種對生態環境的關懷，自然離不開對環境的關注，作者由洞庭湖的歷史性和現代性進行連結，多元化呈現洞庭湖的地方生態。

生命系統具有自我淨化和修復能力，人類往往忘記甚至無視生命共同體的存在，只有當它面臨崩塌危機之時，人類才意識到它的反噬效應。長江白鱀豚的先例警醒著江豚保護者，國際頂尖級的科考隊曾經用世界上最先進的觀測設備搜尋了 3400 公里，得出一個殘酷結果：零。2007 年 8 月 8 日，組織方正式宣告，長江白鱀豚“功能性滅絕”。正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物種滅絕的危機與大湖的生態休戚相關。

然而，現代化的加速發展，不斷壓縮自然原生態的空間，全球氣候異常、生態環境惡化、自然資源枯竭、生物多樣性銳減等問題頻發，嚴重改變了不同

¹ 張嵐：《論女性創作的地緣情結》，《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5 期，第 126-132 頁。

² 魯樞元：《生態文藝學》，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10-211 頁。

³ 楊道：《魯獎散文獎得主沈念：生長地是寫作的根據地》，《海南日報》，2022 年 11 月 7 日。

⁴ 王諾：《歐美生態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 24 頁。

物種的生存狀態，也重塑了人類的可能未來。¹現代工業文明加快發展，資源掠奪、與水爭地，於是湖泊變洲灘，人進水退，遼闊變乾涸。生態環境不容樂觀，回歸自然成為後現代主義尋求精神家園的路徑。正是因為作品將對生態環境的關照帶到讀者的跟前，呼籲人們拿起重新審視環境的眼光，與此同時，也回應了國家追求綠色和諧的理念。

學者劉曉飛指出，“生態”這個詞彙本身源于古希臘，是住所或者栖息地的意思，更強調在地性和成員之間的關係，著力于維護整體生存狀態。²《大湖消息》作為一部生態主題散文，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表現出人類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的理想。跟隨沈念的步伐，看到洞庭湖的前世今生。沒人會相信這是上下天光、一碧萬頃的洞庭湖，酈道元記載的洞庭湖是“同注洞庭，北會長江”，范仲淹吟誦的洞庭湖是“北通巫峽，南極瀟湘。”大湖記憶固然真實，但八百里洞庭湖已然成為歷史，真實的資料令人震撼。據可靠資料顯示，大湖的異化的原因：洞庭湖的動物與這大湖形成命運共同體，從鼎盛、衰落，再進行修復，令人感慨洞庭湖滄海桑田的變化，經受圍湖造田、濕地縮減、產業變更這一系列變遷，使文本具備了很强的生態氣息。

詹姆斯·喬埃斯曾指出，現代人征服了空間與大地，甚至征服了疾病，只不過這些偉大的勝利最後會在精神的熔爐裏化為一滴淚水。³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危機告誡著人類，違背可持續發展理念，就必然要花更多代價去救贖，去彌補生態窟窿。“湖所承載的那些氣象萬千的美好，伴隨候鳥的漂泊、流浪、冒險而變得破碎與脆弱。”⁴作者借動物的命運去思考人類的生命，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或許正如尼采曾經指出的，藝術原本就是人類“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來的形而上活動”。⁵這種生態意識來自人的本心。無法逃避城市

¹ 陳彪、曹晗：《人類“它者”：全球生態危機背景下人類學的多物種關懷》，《雲南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第161-170頁。

² 劉曉飛：《生態文學：特徵與概念》，《揚子江文學評論》，2022年第4期，第86-90頁。

³ [法]詹姆斯·喬埃斯：《文藝復興運動的普遍意義》，《外國文學報導》，1985年第6期，第20頁。

⁴ 沈念：《大湖消息》，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7頁。

⁵ [德]尼采：《悲劇的誕生》，周國平譯，北京：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2頁。

文明，也無法拒絕工業喧嘩。大環境的漸變下，作品高揚生命主體意識，將生態觀念與生態保護行動統一起來。曾提出“敬畏生命”的史懷澤說：“善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的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¹基于中國道家文化宣揚個體生命與自然萬物平等共生的思想，文章中聯繫到“天人合一”的傳統哲學，換而言之，“萬物其一”“道法自然”是一種人與自然的辯證關係，是先輩們留下來的精神財富。人類以欲望改造世界，却也因為欲望遭受自然的譴責。

結 語

對於人類社會發展而言，生態環境是人類最原始的家園，自然始終是作家們一個的研究母題。深層生態學家奈斯也曾指出，世界並不是一個個體獨立事物的集合，是相互聯繫又相互依賴的，包括人類在內的任何生命都在一張巨大的生命網中，而人類只不過是其中小小的一條綫。²由此可見，自然與生態、人類和社會之間是密不可分的。生態寫作作為一種具有社會影響力的、能有效傳遞人們生態情懷的文學形態，也將繼續艱難地負重前行。³今後在學者們對生態文學的不斷的探索之中，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將重新被審視，在文學書寫生態之境時，研究者們的視角也將從理論之思回歸到行動之思。沈念作為湖南的青年作家，他邁出了這為之關鍵的一步，即深入自然，解析人與自然。

美國學者艾愷曾指出了現代性的兩個核心概念，即“擅理智”和“役自然”。他解釋道：“其中‘擅理智’在這裏的意義最接近于‘科學的’及‘合理可用’……也就是說，它和最科學的思考相合一致。”⁴現代人將目光轉向崇尚科學的精神境界裏，批判人類中心主義，強調可持續發展與和諧共生。沈念立足于大湖的生態危機，以自身的行踪為定位點，在《大湖消息》中體現出

1 [德]阿爾伯特·史懷澤：《敬畏生命》，陳澤環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頁。

2 李卓馨：《論新疆作家王族作品的生態書寫》，《喀什大學》，2023年，第79頁。

3 馬兵：《自然的返魅之後——論新世紀生態寫作的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6期，第196-205頁。

4 程光燁：《怎樣研究新時期文學》，《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第5期，第40-50頁。

他強烈的生態意識和宏大格局。他是大湖的生態保護實踐者，是生態批判理念的撰寫者，是自然保護的宣傳者，他果斷地將生命的存在投向自然，記錄了一群群愛鳥人士和護鳥群體，拿起鏡頭追尋那些美好的畫面，面對轉瞬即逝的生態美好，他背負著故鄉的傷痕，一次一次急切的敲響迷失的毒鳥人的警鐘，並對這樣一種惡性循環的關係提出的深刻質疑，重申人和自然的相處之道，突現出洞庭湖的現代價值，追問歷史、直面生態焦慮，為受眾呈現了他的赤子情懷。高歌社會發展的同時，也要對生態存有敬畏之心。

參考文獻

- [1] 舒斯特曼. 身體意識與身體美學[M]. 程相占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1: 297.
- [2] 李躍龍: 《洞庭湖志》, 第 6 頁,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 [3] 吳文新、王豐華: 《論生態倫理學中的人性問題》, 《哲學與文化》(臺灣) 2006 年第 33 卷第 6 期。
- [4] [德] 尼采: 《悲劇的誕生》周國平譯, 北京: 三聯書店, 1986 年, 第 2 頁。
- [5] [法] 詹姆斯·喬埃斯: 文藝復興運動的普遍意義[M]. 載外國文學報導 1985 年第 6 期。第 20 頁。
- [6] [德] 阿爾伯特·史懷澤著; 陳澤環譯. 敬畏生命[M].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09.
- [7] 沈念: 《大湖消息》, 北嶽文藝出版社 2021 年版。
- [8] 教鶴然. 沈念: 將屬於江河、湖泊的時光溫柔挽留[N]. 文藝報, 2022-11-09(002).
- [9] 舒斯特曼. 身體意識與身體美學[M]. 程相占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1: 297.
- [10] 沈念: 《大湖消息》, 北嶽文藝出版社 2021 年版。
- [11] 魯樞元《生態文藝學》 西安: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第 210—211 頁。

- [12]王諾:《歐美生態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24頁。
- [13]劉曉飛.生態文學:特徵與概念[J].揚子江文學評論,2022(04):86-90.
- [14]程光輝.怎樣研究新時期文學[J].當代作家評論,2018(5):40-50.
- [15]張嵐.論女性創作的地緣情結[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05):126-132.
- [16]馬兵.自然的返魅之後——論新世紀生態寫作的問題[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06):196-205.
- [17]葛紅兵.憂患、信仰與拯救——當代生態文學的三個向度[J].社會科學,2010(08):180-186+192.
- [18]王順天:《“生態批評”的理論輸入與本土化實踐》《文藝爭鳴》2022年第11期.
- [19]汪樹東.構建生態批評的中國學派——中國當代生態批評發展綜論[J].長江學術,2023(02):36-46.
- [20]卓今.鳥獸率舞萬物生長——沈念非虛構作品《大湖消息》分析[J].當代作家評論,2022(04):167-173.劉長華.《大湖消息》與物性書寫[J].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02):171-178.王瑞瑞.身體意識與生命本體詩學的建構——評沈念散文集《大湖消息》[J].文藝論壇,2022(06):87-90.
- [21]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3-11-9(01).
- [22]李卓馨.論新疆作家王族作品的生態書寫[D].喀什大學,2023.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ure” and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Writing” in *the Great Lakes News*

LIU Shijiao ZHAO Bin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Abstract: *The Great Lakes News* is an award-winning work of the eighth “Lu Xun Literary Prize.” With strong ecological values in a specific regional space, it has deepened the search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industry at the social, cultural, human nature and other deeper levels, which has had a broad impact. On the one hand, Shen Nian, based on his own life experience, revisited the roots of nature and visited Dongting Lake with a sense of awe and compassion, tracing the historicity and modernity of Dongting Lake in a poetic narrative; his creative inspiration comes from his local geographical complex. On the other hand, Shen Nian chooses a series of materials about ecology and nature consciousness to depict the animals and characters who are affectionate and meaningful, which is his medit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text records the story between the Great Lake and its sons and daughters affectionately, thus projecting the literary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vision of eco-criticism.

Keywords: Great Lakes News; Shen Nian; Nature consciousness; Ecological writing

投稿日期	2023. 9. 6	審查日期	2023. 10. 9	刊載日期	2023. 12. 28
------	------------	------	-------------	------	--------------

文化數字化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公共文化 協同發展的機遇與路徑

汪 薇 王 肯¹

（深圳職業技術大學，廣東，中國）

摘 要：隨著《關於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的正式出臺，中國正式將文化數字化的實施上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在此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人文灣區的建設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公共文化，因其“全民性”的覆蓋範圍及“引領性”的價值引導功能，是人文灣區建設的重要載體。粵港澳三地不同體制下的公共文化能否協同發展，關乎人文灣區建設的成功與否。文化數字化的國家戰略為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提供了發展機遇，而數字技術在文化領域的應用為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提供瞭解決路徑。

關鍵詞：文化數字化；公共文化；粵港澳大灣區

引 言

粵港澳大灣區（以下簡稱「大灣區」）建設是順應全球化發展趨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區域實踐，也是我國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塑造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在大灣區建設國家級政策文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中，對大灣區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等領域進行了全面的

¹ 汪薇，女，深圳職業技術大學，講師，主要從事文化研究和文學批評。王肯，男，深圳職業技術大學，講師，文化產業管理博士，主要從事文化產業研究。本文係深圳職業技術大學 2023 年度校級科研項目“政策網絡視域下粵港澳大灣區公共文化治理協同發展研究”階段性成果。

布局、定位和規劃，人文灣區建設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建設人文灣區的重要性不僅在於滿足灣區民衆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美好生活所需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更重要的在於以文化人，推進文化強國的區域建設，為大灣區的全面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助力大灣區實現富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的建設目標。

文化與科技的融合是近十年來文化發展的主旋律。數字化是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强大動力，在文化內容建設、文化展示方式、文化傳播途徑以及文化交互手段等方面革命性地提升了文化體驗。¹文化數字化是時代賦予文化建設的新命題。文化數字化是指依托數字技術進行文化內容的創作、生產、傳播、消費和服務，是數字技術在文化領域的應用及擴展，也是文化內容在互聯網時代產生的新的載體及表現形式。文化數字化已經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選擇。2022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關於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以下簡稱《文化數字化戰略意見》）。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對「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實施文化惠民工程」作出戰略部署，為推進公共數字文化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動數字文化產品和服務在公共文化場館的應用，豐富公共文化空間體驗形式和內容，是國家推動文化數字化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指導意見，²也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水平的重要舉措。文化數字化所具有的文化內容和數字技術雙重屬性，為粵港澳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提供了高度契合的發展內涵，為公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了强大的動力，也為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提供瞭解決路徑。

一、粵港澳大灣區公共文化建設目標

粵港澳大灣區由香港、澳門及廣東省九個城市共同構成，是一個巨大的城

¹ 周建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數字化：邏輯進路與實踐創新》，《理論月刊》，2022年第10期。

² 參見《文化和旅遊部關於推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文化和旅遊部，2020年11月18日。

市群。不同于其他國家由城市群組成的灣區或國內其他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獨特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種法域、多種語言」等區域特徵。¹目前，粵港澳區域是我國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地區之一，也是我國多樣化文化匯聚和中外文化碰撞最突出的區域之一。近年來，文化逐步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新動力，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文化軟實力也成為國家綜合實力的主要構成，全方位助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一種特殊範疇，以具有公共屬性的設施活動為基礎，既具有文化的物質形態，也具有文化的精神內涵和人文意蘊。公共文化因其公共性和一致性的特點，具有核心價值引領和公共需求導向的功能；此外，公共文化因其整體性的特點，能夠發揮「對不同主體的文化觀念進行整合，對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進行整合」²的作用。

2019年2月18日發布的《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要塑造灣區人文精神，增強大灣區文化軟實力，完善大灣區內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互鑒，創新人文交流方式，豐富文化交流內容，提高文化交流水平。³隨後，在2020年12月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中提出了增強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堅定文化自信，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人文灣區的目標。在具體的規劃措施中，該規劃強調要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推動公共文化數字化建設，推進公共文化服務機構數字化共建共享，探索創新且高效的公共文化傳播模式，加強粵港澳三地公共文化的交流合作，打造一批優秀的公共文化品牌活動。⁴推動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是人文灣區建設的重要內容。大灣區十一城共同建設公共文化，能夠通過公共文化的無形力量，在潛移默化中對大灣區居民的思想意識、價值取向和行為習慣起到感化、教育和引導的作用，從而讓個體在瞭解的基礎上認同，以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念為其自我發展提供內驅力，于潤物細無聲中促進社會的和

¹ 李磊、柯慧敏、馬韶君：《群際互動與區域文化協同發展：基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案例研究》，《公共行政評論》，2020年第2期。

² 萬林艷：《公共文化及其在當代中國的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³ 參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共中央國務院，2019年2月18日。

⁴ 參見《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文化和旅遊部，2020年12月24日。

諧發展。公共文化的協同發展能夠促進大灣區文化的融合，文化的融合有利于大灣區各項建設的協調推進，從而使大灣區各區域從競合關係走向真正的高水平一體化建設夥伴關係。大灣區的公共文化建設，因其建設對象的經濟體制不同、文化特色各异、技術發展不一的差異性特點，必須將情感認同、文化包容和協同發展作為重要的建設目標。

情感認同，是大灣區公共文化的重要內核。情感認同是指個體對特定群體或價值觀的認同感和情感投入程度，是個體與社會之間互動的基礎。情感認同是一個雙向的互聯互動行為，既是群體被個體自覺認同的過程，也是個體被群體感化和引導的過程。從微觀層面講，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情感的存在與個體的人的存在密切相關，一個人的情感結構決定了一個人的存在範疇。從宏觀層面來看，情感與人類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情感是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更是人類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生成的承擔者。建設公共文化是群體情感感化和引導的重要渠道。粵港澳三地不同城市的居民在情感上認同並支持大灣區一體化建設，是大灣區公共文化建設的基調和目標。通過情感認同的構建，公共文化能夠形成一種具有精神能量的公眾意識，從而為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動力和深厚的文化軟力量。

文化包容，是大灣區公共文化建設的堅實基礎。文化包容是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礎上的求同存異及兼容並蓄。文化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關係框架內，被納入「上層建築」的範疇，屬於意識形態的產物。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加強公共文化建設不僅有利于優化文化治理，還能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提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韌性。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的目標不是追求同質化發展，而是要打造「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態，在堅持和包容文化差異的基礎上，秉持開放的文化發展策略，互學互鑒，共同推進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人文灣區。

協同融合，是大灣區公共文化建設最基本的發展方向。大灣區的建設實質上是通過優勢互補、資源共享提高區域創新能力，提升整體競爭力，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實現社會全方位的高質量發展。大灣區的協同發展，既需要基

礎設施建設的「硬連接」，也需要規則對接、平臺空間搭建的「軟聯通」，更需要基于文化建設的「心融合」。文化建設主要可以分為公共文化服務和文化產業兩大板塊。公共文化作為政府主導的基于全民覆蓋範圍的文化形式，是實現大灣區「心融合」的重要載體，也是文化產業繁榮發展的有力助推器。目前，大灣區各城市在公共文化建設方面存在文化資源發布不均、文化共享程度較低以及文化服務水平參差不齊等問題。要打造人文灣區、實現大灣區文化軟實力的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是重要抓手，協同融合是實現路徑。

二、文化數字化關鍵屬性與大灣區公共文化建設的耦合價值

充分發揮文化數字化的戰略性作用是推動大灣區公共文化建設實現協同發展的突破口。作為文化建設新載體，文化數字化兼具文化內容和數字技術的屬性。這兩大屬性能够完美耦合大灣區公共文化建設文化包容和協同融合的目標，繼而更好地促進粵港澳三地在「一體化建設」的框架下達到高度的情感認同和文化認同，從而全面實現大灣區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願景、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內涵。

首先，文化數字化的內容屬性是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的重要基礎。文化建設，歸根結底是內容建設。大灣區公共文化要實現文化包容的目標，需要建設優質內容資源，通過文化內容的傳播及交流，大灣區各城市之間才能增進瞭解。只有在互相瞭解的基礎上，粵港澳三地的文化才有可能實現彼此尊重、互鑒學習的雙向嵌入效應，形成從文化認知到文化認同的循環過程。文化認同是情感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認同與情感認同有著互相影響的關係。文化認同的強化有助于提升情感認同，同樣地，個體對某個群體或社會的情感認同程度也會影響其對該群體或社會所屬文化的認同感。在文化認同基礎上形成的內容經過長期的積澱和轉化，就會形成新的覆蓋面更廣的所謂「制度」或「約定俗成」的文化內容。大灣區公共文化的協同發展，也就是通過這個過程，實現整體的融合提升。

其次，文化數字化的技術呈現屬性是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的強大推動

力。數字技術的發展極大地賦能公共文化服務，是實現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作為技術手段，數字化不僅能夠提高大灣區各城市公共文化的傳播效率和覆蓋率，還能豐富公共文化的呈現形式、拓展公共文化服務的邊界，極大程度地滿足不同人群的個性化文化需求。更為重要的是，數字技術能夠突破地域和制度限制，推動大灣區跨區域公共文化實現一體化協同發展的目標。文化數字化的技術驅動，一是能夠承載文化多業態的共享互通、融合文化產業的諸多形式；二是可以極為便利地進行跨越時空的文化傳播、交流；三是技術本身的發展也是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的題中之義。粵港澳三地在文化技術方面發展情況各異，通過人文灣區的建設契機，可以提升大灣區文化數字技術的整體水平。數字技術已經成為當下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大灣區公共文化要實現高質量的協同發展局面，應當認真思考如何充分利用文化科技及技術。

三、文化數字化帶來的發展機遇

數字技術在文化領域的應用，帶來了文化體驗的革命性提升。以「上雲用數賦智」為行動指南的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要求到「十四五」時期末，公共文化數字化建設躍上新台階，「形成線上線下融合互動、立體覆蓋的文化服務供給體系」¹；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邏輯關聯、快速鏈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點集成的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中華文化全景呈現，中華文化數字化成果全民共享」²。在國家《「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中，也對推動公共文化數字化建設，創新實施文化惠民工程，提升公共文化數字化水平提出了建設要求。

在大灣區的各項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大力發展公共文化數字化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其重要性，一方面根源于文化數字化從技術形態、經濟類型再到國家戰略的內生發展；另一方面，來源于大灣區規劃背景、建設目標與發

¹ 參見《關於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2022年5月22日。

² 參見《關於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2022年5月22日。

展路徑的外在牽引。文化數字化的蓬勃發展，既促使了文化需求的釋放，也為公共文化的創新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更為人文灣區建設目標的有效達成提供瞭解決方案。

（一）不斷精進的數字技術促使文化需求進一步釋放

文化體驗的提升促使文化需求進一步釋放。2022 年 5 月國家出臺的《文化數字化戰略意見》正式將文化數字化的實施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去推進。

《文化數字化戰略意見》的出臺順應了文化與科技融合的社會發展趨勢，明確了到 2025 年末建成文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服務平臺，形成文化服務供給體系的目標。文化需求的釋放和文化數字化設施的建設，實現了需求側和供給側齊發力的發展態勢，為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隨著互聯網的不斷更新迭代，數字技術在文化領域的應用和發展取得了快速的進步，數字內容的大量供給和數字文化設備的普及使得文化更易獲得、更快傳播、更加多元。數字技術首先帶來的是文化供給的便利性，從而提高了文化產品及服務的覆蓋面。通過互聯網和移動設備，人們可以隨時隨地訪問和分享文化內容。這種不受時空限制的便利性促進了文化產品的傳播和流通，同時也讓更多人能夠接觸和瞭解不同的文化。其次，數字技術實現了文化需求的有效激活。基於大數據的算法可以根據用戶的興趣和偏好推薦相關的文化產品，讓用戶能夠更加精準地獲取自己感興趣的內容。文化供給精準度的提升滿足了對於文化內容多元化和個性化的需求。第三，與文化內容生產及文化傳播相適配的網絡視聽設備、文化技術平臺等電子信息設備產業鏈的完善進一步助推了文化需求的有效滿足，帶動了文化需求的釋放。此外，利用數字技術，用戶可以參與到文化產品或服務的互動及創作中，從而在釋放文化需求的同時推動文化供給的高質量發展。

「文化數字化」的這一特性，促進了粵港澳三地文化內容的深度融合、加速了文化傳播的自由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文化包容，從市場需求端突破了粵港澳三地政治、經濟體制的不同，激活了區域多元文化的動能，助推了文化的交流。

（二）數字技術新基建助力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公共文化共享空間

文化數字技術的發展推動了文化市場需求側的改變，需求側的改變必然會對供給側提出改革的要求。人文灣區建設的供給側改革，可以藉由數字技術新基建，積極構建大灣區公共文化共享空間，從而有效推動人文灣區的建設，推進粵港澳三地文化的融合發展，「讓大灣區民衆正確理解和準確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立對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從而促進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激發其贊同國家意識形態的文化心理和情感表現」，¹強化大灣區文化治理的效能。

大灣區公共文化共享空間的構建，在數字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可以藉助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契機快速實現。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簡稱「新基建」，是指「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技術創新為驅動，以信息網絡為基礎，提供數字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等方面基礎性、公共性服務的物質工程設施」。從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新基建」這一概念到2020年國家發改委明確「新基建」建設範圍，「新基建」圍繞高質量發展這一目標，持續深化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不斷完善基於新一代數字技術的新型社會性設施建設。「新基建」中的技術設施體系建設為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持，5G、VR/AR/XR、人工智能等廣泛應用在博物館、文化館、圖書館、藝術館等典型的公共文化服務場所。在粵港澳三地，諸如博物館數字化展覽、文化館沉浸式演出、圖書館智能化讀者服務、藝術館虛擬仿真藝術品展出等不斷涌現，極大地豐富了公共文化服務內容、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務品質、擴大了公共文化服務範圍。

基於粵港澳三地公共文化數字化內容的建設成果和「新基建」提供的技術支持，大灣區公共文化共享空間可以先建設在線虛擬空間。較之實體公共文化共享空間，在線虛擬空間具有建設周期短、低碳環保、使用方便、不受時空限制等特點，可以讓大灣區民衆方便、快捷地瞭解大灣區各城市的文化。與實體公共文化共享空間一起，在線虛擬共享空間的建設可以豐富大灣區公共文化物

¹ 汪薇：《文化認同與粵港澳大灣區公共文化建設研究》，《特區實踐與理論》，2022年第2期。

理空間的建設，從而共同構築大灣區文化心理空間，實現大灣區公共文化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雙協同發展。

四、大灣區公共文化數字化發展路徑

以數字科技引領高質量發展已經日漸成為全球共識。面對數字技術在公共文化需求側和供給側所帶來的發展機遇，大灣區公共文化如何突破體制障礙、要素制約、區域阻隔、創新困境，實現協同發展和創新融合是現階段建設人文灣區面臨的現實問題。現在，數字技術已經全鏈全面地融入文化之中。¹「文化數字化」的實踐，貫穿了文化領域的創作、生產以及流通傳播全鏈條，覆蓋了文化的多模態表現形式。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數字技術擴大了文化輻射範圍、提升了文化到達效率、提高了文化治理效能、增強了民衆文化獲得感、加速了文化傳播進程。數字技術賦能文化領域所產生的效果，諸如能夠以極快速度在極大範圍內生產文化內容、突破時空限制傳播文化、顛覆性地創新文化流通固有模式等，給大灣區實現公共文化協同發展提供了可以借鑒的思路。當文化數字化帶來的機遇與提供的發展路徑都能助力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那積極探索大灣區公共文化數字化建設創新路徑就非常必要且至關重要。因此，隨著大灣區整體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需要在公共文化產品數字化、多樣文化融合深度化、區域文化發展分工精細化、文化國際影響力提升等方面具備更開闊的視野、探索更創新的思路。本文擬就「文化數字化」實踐背景下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提出以下建設路徑：

（一）多維構築文化場景，創新公共文化表達

文化場景是人們在特定環境中所共同創造和體驗的文化現象，是某個區域人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的反映。文化場景主要由文化符號、文化敘事和文化體驗等層面構成，包含藝術、音樂、建築、民俗、宗教等不同類型的文化產品。近些年來，數字技術對文化場景的再造和再現極大地豐富了文化場景的表現形式，拓寬了文化場景的輻射範圍。

¹ 江小涓：《數字時代的技術與文化》，《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8期。

粵港澳三地具有形態豐富、種類多元的優質文化資源，同時該地區的文化科技也走在全國前列。大灣區公共文化建設，要積極打破地域局限，盤活文化資源，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對文化場景進行多維構築，從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的源頭進行創新表達。首先要多維構築文化資源。運用數據采集、資源檢索、雲存儲、高速傳輸等數字技術，最大限度地整合粵港澳三地的文化資源，通過大數據分析，篩選符合大灣區核心價值觀、能引起高度文化認同的文化資源作為公共文化產品的創作來源，構築文化資源的多維。其次是推動表達形式的多維。充分發揮數字技術所具有的多元性特徵，挖掘表達形式的多種樣態，以視頻、音頻、文字、圖片等形式，輔之 VR、AI、4K 等高清數字視聽裝備，豐富文化資源的呈現形式。最後是實現內容類型的多維。數字技術的多樣表達決定了它可以承載多樣的文化內容類型，通過集合文化符號、文化敘事和文化體驗多個層面不同類型的內容，打造大灣區生動立體的文化場景。

大灣區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還是一個文化概念。大灣區的一體化建設，需要同步推動高度協同的文化建設，因此推動大灣區公共文化產品數字化高質量發展，構築多維文化場景，創新公共文化表達，助力實現大灣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必要且重要的。

（二）全鏈貫通文化傳播，完善區域發展分工

互聯網和數字技術在公共文化領域的應用，不僅助推了新的文化生產，還給文化傳播帶來了顛覆性的革命。人文灣區建設背景下的大灣區公共文化建設，需要藉助數字技術的發展實現文化傳播的全鏈貫通。全鏈貫通包括物理層面和內容層面兩個方面的貫通。物理層面的貫通，是比較容易實現的，即通過數字技術，突破文化傳播的時空障礙、語言差異，實現大灣區十一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鑒，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內容層面的貫通，是文化傳播環節中重要但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方面。公共文化是大眾文化的重要載體，很多小眾文化或者被稱之為「高雅藝術」的文化門類，由於各種原因，一直無法進入公共文化的傳播範疇。但是，在數字時代，這種局面正在悄然發生著變

化。數字時代文化的大眾屬性更強，¹社會全體成員都在創造文化、分享文化，文化消費者和生產者的身份可以在同一個人身上靈活切換。隨著數字技術的深入發展，很多小眾文化或「高雅藝術」能夠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得以順暢地傳播及交流，使得公共文化的「全民性」更強，覆蓋面更廣。數字時代大灣區公共文化的協同發展，既要實現傳播區域和傳播路徑的全鏈貫通，更要積極推動傳播內容的受眾面貫通。這就要求粵港澳三地政府充分協調各地公共文化管理部門，分析各區域文化數字化發展優勢，重構區域公共文化價值鏈，完善區域發展分工，合力推動大灣區公共文化的協同發展。

（三）全面深化文化融合，提升大灣區國際影響

面對粵港澳三地豐富多樣的文化形態，人文灣區的建設可以藉助數字技術對文化融合的自然助推作用，使灣區民衆在相互文化認知的基礎上逐步形成文化認同。但更重要的是，大灣區的公共文化要充分發揮其「價值導向」的精神引領功能，全面推進粵港澳三地文化的深度融合，形成和諧、繁榮、有生命力的大灣區文化，為大灣區一體化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此外，大灣區還要充分發揮其區域優勢，匯聚文化創新要素，發揮港澳國際文化交流平臺的作用，加強大灣區公共文化的國際交流合作，提升人文灣區的國際影響力。

結 語

數字技術已經全面進入文化領域，並且以其強大的能力或改變或影響文化的方方面面。文化數字化這一國家發展戰略，為粵港澳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帶來了發展機遇和政策支持。文化數字化建設與大灣區公共文化建設是一個同步共軌、聯動耦合的過程，其耦合價值能夠為粵港澳三地公共文化的協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文化數字化所具有的文化內容和數字技術雙重屬性，為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提供了高度契合的發展內涵，激活了發展潛能。文化數字化的創新實踐為大灣區公共文化協同發展提供了開闊的思路和可行的指導方案，讓人文灣區的一體化建設落地開花，助力打造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區域建設

¹ 江小涓：《數字時代的技術與文化》，《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8期。

的新標杆，推動「一國兩製」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參考文獻

- [1] 周建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數字化：邏輯進路與實踐創新[J].理論月刊，2022(10):82-88.
- [2] 李磊、柯慧敏、馬韶君.群際互動與區域文化協同發展：基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案例研究[J].公共行政評論，2022(2):160-175.
- [3] 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8(4):3-5.
- [4] 萬林艷.公共文化及其在當代中國的發展[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1):98-103.
- [5] 汪薇.文化認同與粵港澳大灣區公共文化建設研究[J].特區實踐與理論，2022(2):96-102.
- [6] 江小涓.數字時代的技術與文化[J].中國社會科學，2021(8):4-34+204.
- [7]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共中央國務院，2019年2月18日.
- [8] 《文化和旅遊部關於推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文化和旅遊部，2020年11月18日.
- [9] 《關於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2022年5月22日.
- [10] 鄭永年.大變局中的機遇：全球新挑戰與中國的未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 [11] 鄭曉雲.文化認同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 [12] 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Z].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On Opportunities and Paths for Public Culture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gitization

WANG Wei WANG Ken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official release of the “Opinions on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Digitization Strategy,” China has officially eleva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digitization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In this contex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has ushered in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Due to its “national” coverage and “leading” value guidance function, public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onstructing the humanistic Bay Area. Whether the public culture under the different systems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can develop in synergy is related to the suc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humanistic Bay Area.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cultural digitization provides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policy support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In contrast, applying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cultural field provides a solution path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 Cultural digitization; Public culture; Greater Bay Area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投稿日期	2023. 8. 6	審查日期	2023. 9. 9	刊載日期	2023. 12. 28
------	------------	------	------------	------	--------------

論“女俠”書寫的現代性演進

李 言¹

摘 要：“女俠”作為中國文學史獨特的寫作對象，其形象的獨立性和複雜性值得被更多關注。從傳奇到小說再到現當代通俗文學，幾千年來女俠的文學形象一直在變化中。隨著通俗小說在 20 世紀後半葉的不斷興盛，女俠在小說的分量持續增大，部分小說中女性角色的塑造與生髮，占據了叙事的主幹。本文以創作詩學的角度對現當代文學中女俠的寫作方式進行探討，並以創作詩學的視角窺探“女俠”寫作的奧秘。

關 鍵 詞：通俗小說；武俠小說；女俠；創作詩學

緒 論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逐漸下新視域拓展，對於通俗文學研究逐漸成為新的視點。通俗文學屬於大眾的文學，雖然其嚴肅性受到質疑，但是其創作所勾連起的讀者閱讀欲望依然成為許多學者所好奇的要點，當然其中也隱藏著關於小說創作學的秘密。就當下的研究來看，對通俗文學創作詩學層面的研究依然比較匱乏。本文借助武俠文學這一類型的外衣，通過文學細讀、理論分析和比較研究等策略，把目光聚焦至“女俠”這一群體，並以 20 世紀中國商業文學的建立到 21 世紀網路文學的發展為時間軸，形成對女俠創作學特徵的把握和研究。

本文創新點在於關照了女俠性別研究的動向之餘，以創作詩學為基礎，從女俠寫作的動因、變化以及表現特徵等方面對女俠創作學的內容進行分析，並此基礎之上反照當下中國文學中女俠現代性書寫特徵，由此形成關於女俠創作

¹ 李言，全南國立大學東亞學研究所在讀博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現代通俗文學、創作詩學。電郵：commonyz240@gmail.com。

學的多元比較研究意義。此外，本文借歷史小說創作文本來關照當下，形成對當下中國通俗文學女俠書寫的互鑒。

一、女俠現代性的書寫動因

中國俠客精神的延續，是文學重要載體之一。如果以性別觀來探討中國的俠客文學的演化，男性顯然占據絕對的主導權。以至于在大眾潛意識中，俠客概念自覺與超凡身體動能的男性畫上了等號。對於女俠的文本研究游離于主流學者的認知之外，且與社會學形成了複雜且模糊的牽連。女俠議題的“被忽略”似乎是俠客研究的宿命，創作詩學影響了小說家創作的無意識狀態，女俠角色的自省性亦可在角色塑造中看出端倪。

從字面意義去感受“女俠”二字，會發現其極具東方特質。它根植于東方俠客體系，但又無法被集中定義化。不同朝代、不同文體、不同類型、不同作者的俠客文學中，女俠的文本寫作樣態則呈現極大的差異化。陳平原則認為俠客形象之得以形成及發展，與讀者大眾的心理需求大有關係。¹

通俗小說的創作必須考量商業機制的介入。從晚清到新中國成立，中國通俗文學的發展始終與報業密不可分，報紙本身的商業屬性也決定了連載物的部分屬性，報紙具備發行量大、傳播速度快和及時性高等特徵，以此搭載通俗小說類目，並實現快速變現的商業目標。現代報刊出版事業—現代稿酬方式—作為自由職業者的專業作家“三位一體”體制的確立，起了決定性作用。²世情、武俠、偵探、志怪和科幻等小說巨著出版形態的變化，可見“鴛鴦蝴蝶派”在報紙商業機制的催化下，改變了中國小說的書寫形態。

就受眾來看，都市報紙的主要消費者為“稍有文化水準的都市男性”，為了滿足他們的精神“爽感”。在角色塑造的無意識和意識層面，均不自覺向“女俠”這一集群靠近。其實筆者在此論及的女俠，并非文學層面的女俠。“女

¹ 陳平原. 千古文人俠客夢[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2: 7.

² 範伯群. 市民大眾文學—“鄉民市民化”形象啟蒙教科書[J]. 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3(4): 31-38.

俠”由文學辭彙逐漸向社會學轉化，和民國都市新女性的超驗層面的表達。¹ 女俠化爲女性獨立自主和自我意識覺醒符號的能指，放置城市美學中她們代表著女性都市文化的新鮮感，是女性自主權提升的投射。

同時，女性體態和氣質的雙重變化，和都市男性的欲望注視密不可分，大眾審美的商業化和都市化漸漸形成。女俠的現代性演進中，讀者趣味向觀察構成變化的重要外部因素。當然之于大眾趣味的迎合調動了觀察者感官效能，現代女俠的涌出也滿足了投資者的商業願景。對於部分以藝術價值為高追求的左翼文藝工作者來說，於“低格偏低”通俗文藝的不屑，似乎亦在情理之中。

通俗文學的革新歷程中，思想性之于傳統文學的涌入衝擊了通俗小說的原有表達模式。在內容的表達層面，現代通俗文學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思想的衝擊，在向現代性邁步時，是積極且不排除的，成為啟蒙主義的先行者。²20年代通俗小說在保持了明清小說章回體的建構模式、沿襲了章回體小說“以故事性強的情節—核心為中心組織結構”之外，保留了“功能層單位是核心多、催化少”的特點。但內容產生的自由度，讓流動的力量得以生髮。契機來自商業環境和政治時局的變更，由內而外的轉化體現了小說家們的自省。

對“女俠”在類型文學中的產生，進行追根溯源可發現，唐傳奇在女俠文學構建中的基礎分量，“俠”在敘事文學中開始綻放生命力。“神秘性女俠”和“人間性女俠”³的劃分讓“女俠”的定位形成了兩種特質的分野，一種以對現實的超脫完成女俠的自我救贖，另一種則把自己歸化為農耕文明的社會體系中，形成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民國武俠小說家白羽曾在長篇小說《十二金錢鏢》中塑造了兩位女俠，分別為古靈精怪的少年女俠柳研青和沉穩內秀的中年女俠丁雲秀，雖二位女性的創作筆法大相逕庭，但女俠現實主義意識的逐步強化，與作者創作的心流變化密不可分⁴。還珠樓主則縱容了女俠的無意識漫游，李英瓊占據了性別表達和敘事表達的絕對主導權，成為玄奇世界的命定主宰。

¹ (美)李歐梵. 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修訂版）[M].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85.

² 範伯群. 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8.

³ 林保淳. 古典小說中的類型人物：古典小說中的女俠形象[M]. 臺北：裏仁書局，2003：72.

⁴ 葉洪生. 論劍—武俠小說藝談錄[M]. 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157.

“女俠”文本寫作的演化效應與作者的境遇亦有極大的關聯。生存觸及作者創作的理念，並非只來自文學，除了社會大環境之外，作家自我內省力的交感和激蕩，也演變了“女俠”文本的近代構建形態。《蜀山劍俠傳》的裘芷仙便完成了“附庸”到“獨立”的女性獨立意識轉變。此外，文人抱負在投身商業寫作時，人格的二重性成為表達女俠文本異質化內涵的重要入口，這在王度廬和宮白羽身上最為明顯。一方面作者成為女性的“勇”和“智”的化身，在對抗社會秩序的同時，最大限度保持人格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作者須遵從通俗故事的圓滿性編排，讓自我放逐的女性回歸至故事的“圓環”結構當中。“女俠”從放逐到依從再到回歸的過程，何嘗不是作者內心叛逆和妥協的激烈交戰過程？

其實依附於男性主導的文學體系且最終獨立於體系的“女俠”，其游離狀態決定了敘事層面的獨特性以及多變性，包括在跨文化的女俠表現中，胡金銓導演的《俠女》以女俠楊之雲為第一視角，女扮男裝的姿態出現在螢幕中。

國外學者認為，女俠作為他者常常陷入不同形式的從屬關係¹，通過對六七十年代螢幕形象的觀察，我們發現了一個典型的“現代”形象——主動而活潑的身體、無畏和獨立的精神。²林保淳曾認為女性俠客的出現，整個影響到江湖結構上的體制改變，連帶影響了英雄俠客的形貌與性格的描繪³。早前的電影《大醉俠》和《龍門客棧》中，在武學上學有所成的女性同樣以女扮男裝的身份出現，這一裝置被稱為“女性陽剛”，她們為作品帶來更具彈性的空間系統⁴。

二、女俠書寫的現代性嬗變

20世紀20年代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俠傳》之於“女俠”書寫還略有生澀感，封建小說的痕跡依然濃重；可到了趙煥亭的《奇俠精忠傳》之後，一些實

¹ (美)葉曼豐. 武俠電影與香港現代性[M]. 香港: 手民出版社, 2020: 181.

² (美)葉曼豐. 武俠電影與香港現代性[M]. 香港: 手民出版社, 2020: 186.

³ 林保淳. 蒙塵的明珠——司馬翎的武俠小說[M]. 縱橫武林——中國武俠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1998: 271.

⁴ (美)葉曼豐. 武俠電影與香港現代性[M]. 香港: 手民出版社, 2020: 203.

質性的變化發生了。趙煥亭對“女魔頭”田紅英的塑造，其身體的反叛能量已經十分充沛，“反派正寫”的巧妙筆法，甚至打破了正邪結構和敘事重心策略，以構築起了整部小說的靈魂。

人物意識內，還珠樓主和金庸等作家為女俠種下了不同的“心魔”，欲望和神性的交戰一度被“超時空”宇宙實體化，演變為拿捏角色存亡的命門。包括天狐寶相夫人“渡劫”時的心魔糾纏，天山童姥在“六合八荒”功法上的走火入魔等。這一橋段設計，仿如讓讀者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部分氣質，《地下室手記》人物內心的複雜糾纏，“心魔”是通俗小說家之于潛意識東方化探索嘗試，更可看做現代性在小說內部的萌發。

雖然金庸並沒有如趙幻亭一般極力搖擺于故事縫隙的異質性女性，但空間的給予以及內容未完結的終局，已經給予文學極大的表述空間和延續性價值。值得肯定的是，在《荒江女俠》和《劍膽琴心》的基礎上，黃蓉、李莫愁、何鐵手和葉二娘等人實現了對女俠欲望的多種形態的書寫；在豐富了“女俠”文學的內心世界同時，完成了對不同身份、階層和派系女俠的多維度搭建。尤其在超時空體系下，關於女俠內心的文學性的掌握過程中，不僅看到了作者的現代性意識，更看到了“女俠”在特殊境遇下的悲劇性的永恒意義，放置在創作話語中，便為個體悲觀主義對秩序樂觀主義一次次悲壯的反叛。

還珠樓主以宏大的時空觀賦予的“女俠”之于“女性”鮮明的屬性，廣闊的視野、豐富的內涵等文本創新，已被 20 世紀通俗文學廣泛借用，包括《臥虎藏龍》中的玉嬌龍、《鷹爪王》中的女屠戶、《七殺碑》中的虞錦雯、《倚天屠龍記》的周芷若等，均有“蜀山女俠”的影子。對於武俠小說史中女俠刻畫的複雜性質變，《蜀山劍俠傳》必須有其一席之地。而人物情感的“真誠化”文學書寫，背後是女俠之于個體意識的迫切渴求，無論裘芷仙還是紫雲宮“三鳳”亦或天狐寶相夫人，她們在對於個體意識的呼應的過程中，“女俠”的文學空間之存在被徹底打開了，應指擴散了能指的效能。

此時的女俠不僅成為了“平視”超時空體系的發起者，變為更改中國俠客敘述體系的決定者；“蜀山女俠”的存在，讓敘事的個體意義被無限放大的同

時，更在每個個體中生髮出“本我”的靈動性和“欲望”的動機，以上何嘗不是“女性”現代性意識在通俗文學中的覺醒和復蘇呢？

在古龍之于女性意識的探討中，亦出現了諸多偶然性和現代性的寫作方式。思維方式的現代性是基於文化的現代性，而把這種現代性帶入到文本當中，則呈現出一個超脫儒家秩序的存在。俠客的江湖是反秩序的，但跳不出農耕文明秩序的限定。而女性的獨立張揚則是反江湖的，其現代性的彰顯導致了角色關於欲望的原本動能上被無限強化。處境和自我約束之間構成了性格書寫的巧妙張力，他們的現代性也在一個相對真空和反秩序的環境中得到了釋放。林仙兒、水母陰姬和惡人穀即是對江湖秩序的割裂，割裂的表現則貫穿于她們的行為方式中。

在女俠的出場意義時，或許理所當然把其當成夢想烏托邦之于人間的迷你投射。女俠應當具備應有的現實意義，而現實化之外的生命流失以及情感糾葛構成了一個獨特的，足以囊括悲劇的矛盾體，女俠的現代性“真偽”便成為了文學被質疑的斑點。思維方式引導了情感方式和話語方式；背後之于時間的感知，則進一步讓女俠變得少女化和獨立化。江湖的反叛感和獨立性在崩壞的秩序面前讓人物變得濃烈。濃烈的人格投注到感情中，執念的強屬性則文本中凸顯了出來。造成了情感的悲劇性引發。這一具備傾向于浪漫主義，而其現代性意義在農耕文明的秩序面前，則有一種掙脫的意味。

女俠文學人格的轉變并非用一個形象便能徹底完成，女俠特徵的現代性演進是長期的。若以金庸的小說為例證，我們發現家庭的原生意識成為了《射雕英雄傳》黃蓉樹立社會觀念的根基，恰巧忠孝核心來自儒家。少年時代黃蓉古靈精怪私有突破儒家規則的動能，但是忠孝于她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隨著年齡的增長，價值的傳統性在黃蓉身上加重了，少年的自由爛漫到中年的聰慧守中，黃蓉的性格轉變正是現代性向傳統性的人格回歸。金庸完成了這一角色突破的背後，對女俠文學價值的思考帶動了後續女俠書寫的轉向。

在新派小說的書寫中，價值轉變和身份轉變密不可分。女俠若要丟棄“三從四德”這一儒家準則，向佛道的投誠便能合情合理。對於儒家觀念的背棄，

似乎和俠客的行俠仗義準則不符，但是社會所賜予的傳統重壓，進一步擠壓了女俠得以選擇的空間。在性別和道德雙重壓力之下，游離狀態和叛逆狀態則并存于女俠的精神氣質中，無論是至來去無影踪的飛紅巾和練霓裳、還是因愛恨糾葛一生李莫愁和瑛姑，皆能在文本中看出端倪。

比起玉嬌龍這一現代性和傳統性搖擺的矛盾體，新派小說女俠的個體屬性與社會的邊界感被作者完全打破，她們并非借助瘋癲和遁世來回歸角色的原始性，而是投向于人格的現代性，一件道袍和僧袍只是實現現代性的一層偽裝，自由獨立、因情而動、懲戒負心人等行爲，正是女俠人格的現代性的體現。對于以上女俠的情緒構建和文本特徵同樣具備強烈的現代性，突破邊界的辭彙的使用，“憤恨”“大驚”“恍惚”等現代詞語的介入，讓女俠具備了活在當下的意義。

女俠依然沒有擺脫“身體寫作”，但現代性所構建出的女俠文學人格的特徵，借助言語、動作和描寫等外部樣態煥發出生命力、借助于價值反叛具備了深刻性，以至于女俠得以跳脫小說原本設定的農耕文明世界觀，拓展到一個只關乎于“人”，從而讓關乎“個體”的獨特文本形態的建立。

三、女俠現代性的文學表徵

戰後香港“女俠”的現代性強化幾乎改變了武俠文學的表達形態，就這座商業文明搭建的都市而言，文化生態與社會生態聯繫密切，香港處于基本正常、從未失衡、從未受到政治幹預的狀態中¹。香港文學興起的50年代，通俗小說之于香港，也獲得了地域性進化和質變的可能性。香港的都市樣態一方面隔絕了江湖之于現實平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戰後自由主義于都市的興起，讓女性獲得了相對的經濟獨立和審美自由。結合女俠形象的創作土壤，其獨立樣態也隨著社會活躍度逐漸增加，女俠文化輸出具備了宰治的力量和反駁那些宰治性力量的機會²。關於“女俠”這一命題，在影像和文學的雙重關照下，延續成一種特异性的話語表徵。

¹ 嚴家炎. 金庸小說論稿[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6.

² (美) 費斯克. 理解大眾文化[M].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1: 25.

“女俠”的文本形象在文學、社會學、歷史學、宗教學等維度的延伸，讓女俠的創作遺產構成了一個關乎性別文化的大型表達場域。從胡金銓的《大醉俠》《俠女》《迎春閣之風波》等，再到徐克的《新蜀山劍俠》《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和《新龍門客棧》等，“女俠”借助媒介完成再生，“清晰”取代“曖昧”、“陽剛”取代“陰柔”¹，成為更複雜的認同對象。似乎我們在香港的武俠小說（電影）中看到了“女俠”在文學藝術層面可被解答的多重可能性，而解決的路徑放置到創作詩學研究中，便形成了一股新鮮的、關於“女俠”寫作的新範式。

在《鶴-鐵》五部曲中，“女俠”憑自我的成長動能，可以突破原有武林秩序，並獲得新的敘事體系和邏輯；另一方面在與傳統秩序的對話中，“女俠”的存在形成了一股“角力”，自身能量的充沛和文本表述的飽滿，本身之于武俠文學“第二性”甚至“無性”的推崇，一種反性別定式的敘事反差已然在延續到了當下通俗文學的寫作中；但如果把女俠的文學特性附著于小說的敘事體系內，女俠的變化共性且更被容易被察覺。她們往往不是絕對意義上的正面形象，而是帶“邪”氣的那一類“妖女”²。

金庸在小說中實現了“女俠”主體性的書寫之後，關於“女俠”的“超時空”意義的表達，也在讀者和 IP 的持續再造中延續。人格的意義在金庸小說中散發出別樣的光輝，而“女俠”這一群體的文本特殊性寫作則愈發明顯。梁羽生也試圖遵循東方情感，在武當劍客尋訪魔女練霓裳的過程中，白髮魔女之于“超時空秩序”的存在，具備了幾分蜀山女俠的氣質。但是儒家文化的浸潤，正統思維的强行注入，抹殺了超時空體系內相匹配的人格和氣質。“女俠”一旦在梁羽生的文學中落地，便惹上了塵埃。她們的超脫性一旦被現實消解，人物魅力也隨之消失。

金庸的部分小說中，女性的過度張揚和男性的過度中庸，性別和人格的反差，構成了性別敘事的“陰陽兩極”。阿紫的甘願殉情、周芷若的愛而生恨，

¹ 倪子荃. 性別曖昧與非二元主體——論胡金銓武俠電影美學中的“冷戰”反思[J]. 電影新作, 2021(03):99-106.

² 王陽. 西方女吉訶德與中國女性武俠[J]. 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5):35-39.

均是“女俠”情感過度釋放的表徵，性別表達的慣性直到《鹿鼎記》才完全反轉。張力的擴大化，正是女俠之于江湖體系的彈性化和差異化的表現，性別的“二重性”在女俠身上得到了集中彰顯。這放置在 20 世紀 90 年代的武俠作品中，成了突破原有性別固化的新路徑。在電影《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中，性別構成的人格差異被強行磨平，性別模糊的背後是人之于故事的吞沒和壓制。一旦把女性放置于男權主導的江湖內，通過螢幕所表達的“溢出感”就十分明顯了。

“溢出感”放置到現代武俠文學中，加速女性存在狀態的全方位“放大”，這不僅挑戰了明清通俗小說的性別書寫，對古典文學的繼承以及對女性身體的書寫，源于超越農耕文明關乎現實之外場域的性別想像，借助一個俠客的“超時空”烏托邦，作者便借助臆想來構建女俠文本的性別平等、身份平等和意識平等。

獨立的女人有冒險的嗜好，但無法突破男性世界的藩籬¹，作為女性獨特權利的女俠，她們的存在、界定和獨立性與真實女性之間形成既相連又分離的關係，女俠放置在文學中除了具備獨立女性含義外，這一群體的幻想式、浪漫式樣態特徵，更讓其文學意義變得獨立且混雜。

或許在古龍的小說中，我們能看到“女俠”的獨立性存在，之于欲望的放縱、男性的平時和個體生命的超脫；然而在體系化的構建中，古龍則喪失了人生之于世界存在的終極目的，古龍把“女俠”的存在意義投向了虛無，女性在無欲望的追逐過程中，迷失本心的狀態是極具現代性的。而這一現代性和當下我們的生存環境形成了對比，都市和虛無之間的便利性，構成了當代人在文學中對於虛無的感念，這投射到武俠小說和女俠寫作中，便加速了“女俠”的現代化書寫的演進，但是也消解了女俠之于通俗文學存在的血肉感和必然性。

女俠書寫的現代性困境，構成了自我生長的“正向”能量和社會對抗的“負向”能量的碰撞。碰撞形成的“合力”，可以看成女性在文學內部的自然

¹ (法)波伏娃. 第二性[M].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9:274.

覺醒，包括知識的完整、人格自主性的天然渴求。

四、女俠書寫的當代變化

21 世紀網路通俗小說對傳統紙媒的通俗小說來說，敘事形態上具有顛覆性的變革¹。從樣態分析，女俠的依存且獨立的文學能力才被重視，加上網路文學蘊含的多元價值觀和廣泛分發的多次元受眾，有學者認為在女俠身上具備男性所不常見的羅曼蒂克式的孤絕氣質²，也有學者覺得女俠在獲得情感訴求過程中獲取了向內生長的現實力量³。得益于互聯網傳播機制，文學的寫作工具、分發形態和受眾均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女俠所能呈現出的寫作範式不再固定化和模式化，女俠經歷了由欲望客體到敘述主題的轉變⁴，在傳統讀者印象中被當作江湖秩序附庸的女俠，她們的依附性和從屬性已在當下網路文學的表達中逐步消解。

大陸新武俠文學而言，包括在滄月的《七夜雪》和步非煙的《海之妖》等小說中，女性的主體地位則被進一步強化。由刻板、男性角色的附庸，再到決定敘事走向的核心存在，女俠之于文學的價值變得愈發凸顯，而由俠女群體構成的敘事關係、表達技巧以及小說節奏均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女俠的“俠”旨在無限模糊化的同時，也意味著她們形象的自由度在進一步釋放，包括與小說整體節奏的融入感、行為自發性的達成以及角色精神能量的延展。

新生代網文作家而言的生長環境和習性早已經遠離農村和農耕秩序，在都市感知和都市經驗的浸染中，網文中女俠的現代情感意識是十分充沛的，甚至某種程度上是張恨水、朱貞木和古龍等前輩關於女俠思想的延展。畢竟，現實感并非來源於故事世界塑造的真實和虛無，而是源自女性體內自行生髮出的精神力，甚至我們能察覺到大女主武俠小說諸多都市現實以及當下女性困境表達

¹ 湯哲聲. 價值與意義：對中國武俠小說的幾點思考 [J].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 2022(01):26-30.

² 楊至元. “女主向”武俠小說創作形勢觀察 [N]. 文藝報, 2021-9-17(6).

³ 李文玉. 春風踏破玉門關——評尾魚《西出玉門》 [J]. 中國文學評論, 2018(1):114-115.

⁴ 韓雲波, 夏洛. 女性武俠的三步邏輯與現代悲劇 [J]. 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2004(4):153-155.

的影子；而現實訴求無法得到合理伸張之時，武俠小說成為了女性的避難所，她們化身為江湖中具備話語權和執行力的女俠角色，且完成了女俠精神世界的自主性和表達的文學性。

但是女俠之所以為俠，他們的形成則不得被放置于中國農耕文明所派生的江湖體系中，即便作家們一度想摒棄這一不熟悉的人物依存環境，散發的不適感和扭曲感則在小說中得到了映照。光為了消除這一不適感，網文作家就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包括過于兒戲的修真世界、包括極具現代性的臺詞用語，以此抵消農耕文明“田園式”的烏托邦，而部分作家則借助武俠和仙俠等外殼，來實現都市女性的獨立意識表達。

其實，劉垚（Priest）完成了對女俠的另一種“想像”敘述¹，但也看到了女俠存在有限性，在與常規江湖秩序的碰撞中，她一度讓角色擺脫了男性主導的江湖體系且完成了獨立生存，但引發的一連串敘事悲劇却化作了女俠們成長需要克服的阻力。比起古龍之於女俠“物”的存在和異化，《有匪》的“平視”樣態帶有強大的自發性。這背後是否蘊含著作者借助網路創作的自由，以此促進社會意識的整體進步以及消解男女性別差異化的價值意圖呢？我們有待進一步考量。

此外，女扮男裝的橋段在當下的網路文學中復活了。她們的存在像是為了進一步趨近讀者的內心訴求，也可看作女性在外在形態上的妥協。有學者認為來女扮男裝蘊含的女性身體一身份的認知，都顯示出複雜的意味²。其實這樣的設定，早在李翰祥導演的黃梅戲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中，女性獲得了男性角色的主體地位，而小說中的黃蓉和柳妍青已在“變裝”橋段上進行充分的詮釋。但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是，在武俠小說無限趨于現實的過程中，女性力量因為現實的牽引力而變得厚重，這放置在當今網路文字中，一定程度上湮滅了性別存在的必要，尤其在一個隨時可能喪命的江湖秩序中，性別崛起一度讓位

¹ 寇鵬程. 俠客的身體：金庸武俠小說身體敘述策略研究[J]. 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6):40-43+202.

² 陳豔. 女性易裝與文學想像—論女性向網路小說中的女扮男裝敘事[J]. 揚子江文學評論, 2022(6).

于江湖本身規律的實現和滿足，女扮男裝的頻繁設置，是女俠的新崛起還是又一層女俠創作的悲劇？這有待時間來驗證。

這一敘事環境的出現，遠非傳統文學那麼堅固和有迹可循，內心自洽的圓滿性、故事邏輯的自洽、作者價值觀的更新以及商業機制等問題均成為女俠精神畫像完成自足的重大挑戰。可見，21 世紀作家如要形成關於女俠系統性創作詩學的搭建，則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等多重機緣的疊加。

“女俠”的文學書寫在 21 世紀獲得的文學生命力值得讚歎，可在女俠和超時空秩序對抗的過程中，人物的單薄感和無依存感再度發生；在現代性文學向前邁進的同時，始終沒有解決超時空下人物個體應該有的命運以及她們的必然心靈歸宿。新派武俠小說家依舊在舊派武俠小說家（還珠樓主和朱貞木）所設定的圓環內徘徊；或許無限時空和個體感知本身就存在著矛盾。即便如此，如何在文學時空中保持特定角色每一刻的新鮮感和人格敏銳度，是通俗小說家們需要認真考量的。

結 論

本研究在對女俠書寫的現代性把握上做了一個嘗試性的分析和探討，以創作詩學為圓心，形成自我的研究論述與分析，包括對女俠現代性的書寫動因、女俠書寫的現代性嬗變、女俠現代性的文學表徵、女俠書寫的當代變化等四個方面。論文結構以微觀視角進行整合，且進行由表及裏、由遠向近的研究探索嘗試。文章通過對女俠創作史的梳理，能窺見到個體和整體、內心和秩序、靈魂和存在之間的多重層次的碰撞，由此引發關於通俗文學創作理念現代性的反思。比起女俠的文本強表現力，背後人格的獨立性之于時空的意義，才是女俠文學生命的真正歸宿。畢竟俠義精神走向內在人道主義，才能成長為成關於人的文學。

文本在案例梳理和文本細讀層面稍顯欠缺，需要在後續研究中進一步完善，關於女俠的文學史研究也會成為本人今後研究的重點。21 世紀是資訊的世紀，是人工智慧的世紀，這些反作用于文學之後，關於“女俠”的現代性意義終不會被消解，反而會催生出新的現代性表徵，這都值得更為深入和廣袤的研究來

跟進分析。未來或許在一個豐富廣袤的創作形態中，“女俠”寫作必將擁有無限變化的可能。

參考文獻

-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 陳山.中國武俠史[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2.
- 範伯群.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 範伯群，孔慶東.通俗文學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 範伯群.中國市民大眾文學百年回眸[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4:30.
- 範伯群，徐斯年，劉祥安.中國現代通俗小說史略[M].南京：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20.
- 龔鵬程.俠的精神文化史論[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
- 韓雲波.俠林玄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 賈磊磊.中國武俠電影史[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 薑守誠，張海瀾.道教女仙考[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
- 孔慶東.超越雅俗[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
- 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修訂版）[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
- 劉若愚.中國之俠[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
- 孫金燕.武俠文化符號學[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
- 湯哲聲.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流變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
-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汪湧豪.中國遊俠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 汪湧豪，陳廣宏.俠的人格與世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徐斯年.俠的蹤跡——中國武俠小說史論[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 徐國楨.還珠樓主論[M].上海：正氣書局,1949.

- 王立.武俠文化通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 葉洪生.論劍—武俠小說藝談錄[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
- 葉洪生.天下第一奇書—《蜀山劍俠傳》探秘[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
- 葉曼豐.武俠電影與香港現代性[M].香港：手民出版社,2020.
- 張贛生.民國通俗小說論稿[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
- 張元卿, 王振良主編.津門論劍錄—民國北派武俠小說作家研究文集[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1.
- 周清霖.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觀[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

On 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 Modernity in

“Chinese Female Chivalry”

LI Ya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Yeosu)

Abstract: As the unique writing objec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independence and complexity of "female chivalry" deserve more attention. From legend to novel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opular literatures, the literary image of female chivalry has been chang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prosperity of popular novel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omen's weight in novels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the shaping and hair growth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some novels occupy the backbone of the narrativ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riting methods of female chivalry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etics and explores the mystery of "female chival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etics.

Keywords: Popular novel; Martial arts novel; Female chivalry; Creative poetry

投稿日期	2023. 10. 7	审查日期	2023. 11. 19	刊载日期	2023. 12. 28
------	-------------	------	--------------	------	--------------

An Analysis of the Three “Isolations” in *Jane Ey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WANG Dongyun ZHU Yulu¹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feminist analysis of the three “isolations” experienced by the novel’s protagonist, Jane Eyre, in Charlotte Brontë’s *Jane Eyre*. It delves into how Jane’s defiance and resistance with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align with feminist theories termed by Lorber (2001): reformist feminism, resistant feminism, and rebellious feminism. Exploring Jane’s confrontations with oppressive figures from the upper class and her pursuit of self-realization underscores her defiance of prevailing norms and her quest for equalit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ree “isolatio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Jane Eyre*’s feminist themes resides in how Jane Eyre’s unwavering spirit and her challenges to established norms have inspired discussions on feminism, gender equality, and female empowerment.

Key Words: feminism, *Jane Eyre*, isolation, patriarchy, gender inequality

1. Introduction

Jane Eyre, written by Charlotte Brontë and published in 1847, is a world-famous novel still prevailing today. Compared with works before the 19th century, it is one of the few works created by a female author and featuring a female protagonist. The story’s theme is not only the emotional entanglement with men, which was the

¹ WANG Dongyun,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mail :1551006878@qq.com; ZHU Yulu,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nglish,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 English Linguistics; Email :zhuyulu77@qq.com.

stereotyped image of women in the literary works written by male authors but also involves social criticism and feminist elements. In contrast to other contemporary works of the 19th century, *Jane Eyre* diverges significantly. Its titular protagonist, Jane Eyre, does not possess the conventional allure, wealth, or high social status that often characterizes protagonists of that era. Her unadorned appearance and modest social status epitomize her ordinariness. It is the tale of an everyday individual. Then how does an ordinary person's story attract readers' love worldwide? The essence of *Jane Eyre*'s universal appeal lies not only in the protagonist's internal virtues – qualities like independence, courage, and passion but also in the underlying feminist spirit the book tries to convey.

The Victorian Era was characterized by profound gender inequality, where women were perceived as inferior and suppressed by social norms (Louis, 2015: 34). With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women lived in the shadow of men, with limited social roles and reduced access to rights. Charlotte Brontë's novel *Jane Eyre* represents a feminist awakening during this period, as it challenges the norms of a male-dominated society and advocates for women's rights (ibid.). The novel portrays the life of Jane Eyre as she confronts various forms of isol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within a patriarchal structure.

Charlotte Brontë deliberately stripped away all conditions that might benefit Jane Eyre at the story's beginning, allowing readers to see how a pure and natural woman gradually awakened her self-consciousness and developed into a respectable woman with an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The marginalization of her surroundings accompanies Jane's self-realization. The marginalization is manifested fiercely by the "isolations" in three stages of her life: "isolation" at Gateshead Hall, "isolation" at Lowood School, and "isolation" at Thornfield Hall. The three "isolations" during which Jane showed her feminist spirit resulted from her confrontation with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eminist elements in *Jane Eyre* by

examining the three “isolations” experienced by Jane Eyre and their alignment with feminist theories outlined by Lorber (2001), ultimately shedding light on the novel’s contribution to feminist advancement.

2. Literature Review

2.1 Women in the Victorian Era

Jane Eyre was first released in 1847, a period marked by the rule of Queen Victoria. The Victorian Era was characterized by profound gender inequality, where women were perceived as inferior and suppressed by societal norms (Ahmed, 2020; Beaty, 1996; Gao, 2013; Gilbert and Gubar, 2020; Godfrey, 2005; Han, 2020; Louis, 2015; Lu and Zhao, 2015; Penner, 1999). Women lived in a society dominated by men, subject to the authority of men, with the domestic sphere serving as a place of social, economic, and emotional confinement for women (Gao, 2013; Penner, 1999).

With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women’s lives were reliant on men, both financially and spiritually, and women faced considerable pressure from conservative forces (Lu and Zhao, 2015; Louis, 2015). Additionally, the rights that are considered fundamental in modern society were “denied to women of every social class, racial category, ethnicity, and religion” (Lorber, 2001: 1). At home, females were often reduced to decorative objects for their fathers or husbands (Gilbert and Gubar, 2020; Lu and Zhao, 2015; Penner, 1999). In the broader society, women had limited social roles and were frequently discriminated against and underestimated (Lu and Zhao, 2015; Penner, 1999). In literature, the portrayal of females was predominantly controlled by males, who categorized them as either “angels” or “devils”, relying on extreme stereotypes that failed to recognize the complexity and humanity of women (Gilbert and Gubar, 2020; Louis, 2015). Women were “literally confined to the house, figuratively confined to a single place, enclosed in parlors and encased in texts, imprisoned in kitchens and enshrined in stanzas”

(Gilbert and Gubar, 2020: 85).

2.2 Feminism

The historical tendency to view human differences in binary terms, as articulated by Lorde (1984: 114), where Western European history conditioned people to perceive differences in simplistic, oppositional terms like dominant/subordinate and superior/inferior, is what feminism opposes (Allen, 2023: 900). Furthermore, western societies often constrain individuals to fit into just two socially accepted and legally recognized genders, “men” and “women”, which were expected to be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this binary gender system forms the foundation for various aspects of social life, contributing to gender inequality (Lorber, 2001: 7)). Gender inequality typically results in women being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similarly situated men (ibid.: 4). This inequality has led to a variety of feminist movements that have instigated significant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The evolving socio-cultural changes and women’s progress have created an environment where conventional perceptions of femininity are increasingly under scrutiny, and due to feminism’s inherent diversity, fragmentation, and ongoing debates, its meaning is also frequently in question (Budgon, 2011: 280).

Feminism is a complicated concept. Rosalind Delmar (2018) elaborated on feminism and feminists in the article “What is Feminism?” Without regard to its diversity, there was a general concept of feminism that would be agreed upon by the majority:

Women suffer discrimination because of their sex, and they have specific needs that remain negated and unsatisfied,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se needs would require a radical change (some would say a revolution even) in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der (2018: 21).

She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diverse forms of feminism were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movements launched to defend women's rights, but also in the intellectual trends outside the movements (2018: 17-18). Although women are intellectually no different from men, they always encounter societal inequality. Women's lack of access to the same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as men because of their gender has led to an ideological shift and the adoption of a series of movements for rights. Resistance to the male-centered society involves protests for equal rights and the liberation of female spirits.

Generations of feminists have been dedicated to advocating for women's equality across various domains. Firstly, they initiated social movements. According to Han (2020:13), feminism has been an organized movement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experiencing a substantial reinvigoration in the late 1960s, with a core goal, as highlighted by Lorber (2001: 14), to address and eliminate the structural disadvantages endured by women living in patriarchal societies. The first wave of feminists during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as Lorber (2001: 1) notes, fought for numerous rights, including suffrage, property ownership, financial autonomy,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more, rights that are now often taken for granted. Meanwhile, the women's movement of the 1960s and early 1970s, as emphasized by Rivkin (1998: 765), centered on exploring women's experience under patriarchal dominance, a tradition of male authority that had historically suppressed women's voices, distorted their lives, and marginalized their concerns.

Secondly, feminists pioneered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rocess involves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which, as Allen (2003: 900) underlines, revolves around critiquing and comprehending the uses and misuse of power, ultimately striving to create a more just society for all. Rivkin (1998: 769) further notes its evolution from merely critiquing male-authored works and exploring female-authored literature to a broader examination of the very nature of language. This criticism encompasses three primary strands: American feminist critics, who

center on women's experiences as the foundation for differences in women's writings; French feminist critics, who scrutinize how the male-dominated language system objectifies or erases women's voices; British feminist critics, who accentuat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and economics in shaping "masculine" and "feminine" categories" (Hoeveler, 2003: 45-46).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developing feminist theories.

Thirdly, feminists have actively engaged in creating feminist literature.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women were constricted by male-owned houses and literary works (Gilbert and Gubar, 2020: xii). Females became increasingly discontent with the confining domestic sphere, ultimately challenging patriarchal conventions and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female voice in fiction (Gilbert and Gubar, 2020; Penner, 1999; Lois, 2015; Lu and Zhao, 2015). By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middle-class women had begun producing literary works that featured female characters as autonomous individuals rather than mere adjuncts to male characters, with notable authors like Charlotte Brontë and Jane Austen exemplifying this transformation (Lu and Zhao, 2015: 100).

In summary, feminism, as defined by Allen (2023), represents a dynamic and evolving worldview of theory and action aimed at challenging and dismantling various systems of oppression, such as patriarchy, colonization, and multiple forms of privilege-based discrimination, with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fostering equitable social change. This multifaceted movement encompasses a range of face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nitiating social movements, advancing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creating feminist literature. The eventual goal of feminism is to establish legal, social, and cultural gender equality for both women and men (Lorber, 2001).

2.3 Feminist Elements in *Jane Eyre*

Jane Eyre is celebrated in British women's literature for its pioneering feminist themes and Charlotte Brontë's dedication to advocating women's rights

during a time when gender inequality was prevalent. In a male-controlled society where women's works faced challenges in being published, Brontë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attributing her work to male pseudonyms to ensure her voice was heard (Ahmed, 2020: 45). As a result, *Jane Eyre* has achieved iconic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women literature, representing a significant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Louis, 2015: 34). Charlotte Brontë,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early feminist writers, employed the novel as a means to convey feminist ideas to a Victorian society that regarded women as inferior and repressed (ibid.). The story's protagonist, Jane Eyre, exemplifies a journey from a life marked by suffering and mistreatment to one of opportunity and triumph (Ahmed, 2020: 48). The underlying feminist perspective reflects Brontë's endeavor to assess women's circumstances in historical Britain society and advocate for women's rights (ibid.: 50).

Lorber (2001) outlined three feminist theories, each finding echoes in *Jane Eyre*. The first, reformist feminism, addresses gender inequality related to the division of labor, devaluation of women's work, and women's underrepresentation in major societal institutions. The novel reflects this through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male gaze and female perception, showing Jane's transformation from being objectified to an empowered individual. The second theory, resistant feminism, emphasizes patriarchy, a system that oppresses and exploits women in various aspects of their lives. This theory is evident in the changing roles of women like Jane Eyre as governesses in a shifting society, creating resistance to gender constraints. Lastly, rebellious feminism views gender inequality as ingrained in societal constructs, reflecting Jane's defiance of injustice and pursuit of love and independence.

Jane Eyre's pursuit of equality and her resistance to mistreatment by the upper class symbolizes her feminist spirit, which challenged the norms of her time. Her defiance of male dominance was unsettling to those accustomed to the status

quo, leading to her marginalization and isolation from society. Peters (1996: 57) argued that Jane's existence threatened the characters who feared that Jane would undermine the established social system, so they marginalized Jane and her ideas and isolated her from the social group. The marginalization is evident throughout the book and is highlighted in three "isolations": at Gateshead Hall, Jane was sequestered in the red room by Mrs. Reed because of her resistance to John Reed's bullying; at Lowood School, she was punished by Mr. Brocklehurst to stand on a high stool because she was labeled as a liar; at Thornfield Hall, she was excluded from the party that held for gentlemen and ladies, and was merely a spectator sitting by the window throughout the party. In the subsequent section, the three isolations will be analyzed with the feminist theories outlined by Lorber (2001).

3. Three "Isolations"

Jane Eyre's life can be segmented into five stages. The initial stage unfolds during her youth at Gateshead Hall, marked by oppression from the Reeds, her affluent relatives. The second phase encompasses her schooling at Lowood School, characterized by Mr. Brocklehurst's ostracism, countered by companions like Miss Temple and Helen Burns. Her third stage occurs at Thornfield Hall, where she experiences rejection from the upper class, symbolized by Blanche Ingram, yet also finds love in her master, Mr. Rochester. The fourth phase is her recovery period at Moor House, reuniting with the Rivers, her cousins. Lastly, in the fifth stage at Ferndean Manor, she marries Mr. Rochester and forms her own family.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the initial three phases, depicting the fierce confrontation between Jane Eyre and the conservative patriarchal society, highlighting the isolation she endures and her resistance and subversion of societal norms.

3.1 "Isolation" at Gateshead Hall

Jane Eyre, a mere ten-year-old girl at Gates Hall, constantly questioned the

reason for Mrs. Reed's disregard, her cousins' disdain, and the unfair treatment she endured. Miss Abbot, who was Mrs. Reed's maid, told the truth:

Moreover, you ought not to consider equality with Misses Reed and Master Reed, because Missis kindly allows you to be brought up with them. They will have a great deal of money, and you will have none: it is your place to be humble, and to try to make yourself agreeable to them (Brontë, 2018: 21).

At Gateshead Hall, Jane was inherently the lowest class, vulnerable to bullying. Miss Abbot stressed that Jane needed to be "humble" and "agreeable" to the Reeds. Her social class and lack of property justified their indifference, but Jane refused to compromise her self-respect for them. This resistance culminated in her confrontation with John Reed. Mrs. Reed punished Jane by being locked in the red room, and after being released due to illness, she was still only allowed to sleep in the closet, confined to the nursery, and forbidden to have contact with other children. After realizing she could not get along with her relatives, Jane departed.

During this phase, Jane sought equality, but her lower social class stifled her ideas and resistance to injustice. Consequently, she was excluded from the Reed family, even though they were her relatives. Fortunately, Jane's spirited nature empowered the ten-year-old girl to leave in pursuit of acceptance elsewhere.

"Each heroine's rebellion against her oppressions marks the beginnings of her individualism, her desire for self-possession and expression" (Penner, 1999: 134). The Reeds disfavored Jane's rebellion, representing the wealthy upper class, which revered wealth and power. They treated Jane as an object that could be oppressed and abused freely. However, this unequal treatment ignited Jane's resistance, symbolizing the beginning of her individualism. Her choice to leave Gateshead Hall also demonstrated her resistance to inequality.

3.2 "Isolation" at Lowood School

Jane Eyre decided to start a new life at Lowood School. Although the living conditions were harsh and so many constraints inflicted on her, she believed others would respect her through good acting. However, all her efforts were rendered useless by the visit of Mr. Brocklehurst who was convinced that Jane was a liar. Mr. Brocklehurst's prejudice against Jane came not only from the influence of Mrs. Reed but also from the intrinsic arrogance of the people in high rank. Jane was branded as a liar and was punished by Mr. Brocklehurst to stand on a high stool in public, which was humiliating and agonizing for Jane, and other girls were prohibited from communicating with her. On that stool, she endured a severe mental shock and survived the toughest half-an-hour at Lowood School. Helen Burns' company and Miss Temple's decent treatment helped Jane Eyre overcome her grief. Jane Eyre accepted Miss Temple's advice and continued to behave sincerely. She eventually made many friends, earned respect, and won affection as she wished.

Jane Eyre's tenacity earned her esteem and friendship at this stage. The attitude of resistance she adopts against injustice seems more than correct when contrasted with Helen Burns' unfortunate experience. Helen Burns was not an orphan. She was a poor girl who was sent to Lowood School because her mother died and her father remarried. Helen chose to bear when she was treated cruelly. She told Jane, "It would be your duty to bear it if you could not avoid it; it is weak and silly to say you *cannot bear* what it is your fate to be required to bear" (Brontë, 2018: 70-71). The girl ended up dying of tuberculosis quietly at school at a very young age, and the death of such a child "was all too familiar in the Victorian reader's experience" (Beaty, 1996: 38). Helen Burns' thoughts were typical of what the people in superior rank instilled in the lower class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do not resist, bear it. However, the end of bearing is further oppression and, ultimately, death. This is what the high-rank people desire, but not what the lower-class people deserve. The brilliance of Jane Eyre is that she says no to the unfair social norms that have been established. It

further demonstrates how intolerable Jane's rebellion seems to the man-controlled groups.

As articulated by Godfrey (2005: 856-857), the clash between the Lowood girls and Mr. Brocklehurst represents an irreconcilable conflict between the working class, exemplified by Jane Eyre, and the middle class, embodied by Mr. Brocklehurst. While the girls abandoned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femininity in favor of a more gender-neutral appearance and fought for equality, the middle class preferred to maintain social class distinctions. It taught the girls to endure and accept the established social hierarchy. Charlotte Brontë's narrative foreshadows the results: compliance with the oppression leads to further subjugation and eventual death, whereas resistance, though unacceptable to the superior class, paves the way for progress.

3.3 "Isolation" at Thornfield Hall

At eighteen, the yearning for the unknown and the spirit of adventure made Jane Eyre accept a job as a governess at Thornfield Hall. Here, she experienced an invisible "isolation" not imposed by explicit authority but stemming from the inherent clash between two opposing groups: the middle class, represented by the gentlemen and ladies, and the working class, personified by Jane Eyre. The third isolation was specified at a party Jane attended unintentionally. It was the demand of her master (Mr. Rochester) and her duty as the governess of Adele (the ward of Mr. Rochester) that had brought her to the occasion where she was not welcome. Jane sat in a window seat and calmly watched how the "fine, fashionable people" (Brontë, 2018: 190) abused their governesses when they were children. During this period, Jane was already an educated and intelligent adult woman who knew her responsibilities and what she cared about. The harsh words from the privileged class could not shake her firm will. She said, "I have not been buried with inferior minds" (Brontë, 2018: 301).

The firmness and independence of her spirit we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love she pursued.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Mr. Rochester (Jane Eyre's beloved) was not handsome. He had no outstanding exterior, and his temper was capricious. His position and fortune attracted Blanche Ingram (Mr. Rochester's prospective wife). When Blanche Ingram discovered Mr. Rochester's property was not as great as she thought, she immediately acted cold and uninterested in him.

In contrast, Jane cherished her shared values and emotions with Mr. Rochester. Her concept of soulful equality transcended the societal norms of rank and wealth. However, upon recognizing the existence of Bertha Mason (Mr. Rochester's mad wife), Jane's principles and rationality led her to leave Thornfield. As Beaty (1996: 130) elucidates, Jane's prudence aligns with her strong sense of independence, and her repartee is genuinely delightful. Jane's wit primarily arises from a fundamentally healthy self-esteem, a refusal to subdue her selfhood to sentimental ideas of self-sacrifice, whether for love or any other cause (ibid.).

Bertha Mas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Like Jane Eyre, Bertha was also "isolated" by society, and her madness made her husband, Mr. Rochester, isolate her in the attic. Bertha's insane actions are portrayed by Penner (1999: 136) as a symbol of female rebellion against domestic imprisonment. Louis (2015: 35-36) mentioned that during the Victorian period, women writers sought to express their desire for freedom and equality, reacting to women's constrained emotional and social status. These writers used the portrayal of rebellious mad women as a means to resist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patriarchy. They believed that the madness exhibited by these female characters was not accidental but a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of their profound dissent against patriarchy, serving as a potent voice for feminism.

Jane Eyre's role as a governess also represents an act of rebellion and resistance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in the mid-1840s, gender divisions of male and female roles among working-class laborers were blurred but polarized in the middle class, and societal anxieties about gender identities were increased (Godfrey, 2005: 854-856). A woman from the working class walked out of the male-dominated house to serve as a governess for the middle class, which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of society (Beaty, 1996: 49) but also is disdained by the middle-class. Because governesses posed a threat to gender stability in the eyes of Victorians, primarily due to middle-class concerns that they might impart ambiguous ideas about gender and class to their children. (Godfrey, 2005: 859) Although Jane's occupation as a governess did not directly subvert the social hierarchy, it embodied her courage to resist and contributed to the evolution of feminism.

4. Discussion

Jane Eyre's exclusion from the societal order is a reaction to her perceived threat, leading to her isol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by those who fear her influence. Peter (1996:60) noted that "separating the other from society is perhaps the oldest and most basic of acts against those we regard as enemi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three "isolations" of Jane Eyre, it is clear that the agents responsible for her isolation all hail from the same upper class, represented by the Reeds, Mr. Brocklehurst, and gentlemen and ladies at Thornfield Hall. The reason that they marginalize Jane is that Jane poses a threat to those around her. Throughout the novel, she is regarded as someone who challenges established patriarchal norms and is seen as an outsider. The middle-class endeavors to marginalize Jane spatially by isolating her in the red room, on the high stool, and the window seat; they also try to separate her from society mentally by labeling her with dehumanizing terms such as "angel," "cat," "sprite," "rat", etc. (ibid.: 59). The fear of Jane's potential to subvert existing norms and disrupt prevailing power structures motivated them to minimize Jane's influence.

The isolation imposed on Jane acts as both “a blessing and a curse”, cultivating self-reliance and inner strength while simultaneously subjecting her to the solitude of an outsider (ibid.:66).

The three feminist theories (reformist feminism, resistant feminism, and rebellious feminism) outlined by Lorber (2001) get a salient reflection through Jane Eyre’s resistance to the “isolations”. In the first isolation at Gates Hall, Jane’s confrontation with her oppressive relatives illustrates the reformist feminist idea that women sought gradual improvements with the existing system. Her resistance to unfair treatment and her determination to seek equality align with reformist ideals as she challenges the established norms that marginalize her. The second isolation at Lowood School showcases the resistant feminism that Jane embodies. Her refusal to accept cruel treatment and her desire for equal rights demonstrate her resilience in adversity. This isolation is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feminist belief that women must withstand and resist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patriarchal structures. The third isolation at Thornfield Hall is a reflection of rebellious feminism. Jane’s decision to become a governess and pursue love on her terms challenges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and societal expectations. Her independence and determination to be treated as an equal rather than a subordinate exemplify rebellious feminism, which seeks to overturn and redefine existing power structures.

Besides these, this novel embodies feminist ideas in various other ways. Brontë intentionally endowed Jane with a plain appearance, challenging the patriarchal societal norm that values good looks as a crucial criterion for virtuous women (Lu and Zhao:101). Furthermore, Jane’s creative abilities disrupt the patriarchal belief in artistic creativity as an inherently male trait (Han, 2020:15). Jane’s courage to love, hate, rebel against injustice, and defy conventional patriarchal norms exemplifies feminist spirits. Her resistance to middle-class injustice is demonstrated when she takes on the role of a governess, challenging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the patriarchal conventions (Beaty, 1996: 49). The final marriage between Jane and Mr. Rochester also illustrates a unique reversal of power when the older man becomes “subordinate to the younger woman whether psychically, sexually, or economically” (Godfrey, 2005: 861).

“Women must kill the aesthetic ideal through which they have been “killed” into art” (Gilbert and Gubar, 2020: 18). In essence, they need to break free from the limitations and stereotypes imposed on them by patriarchy in order to assert their own identities as creative individuals. This is exemplified by authors like the Brontë sisters and Jane Austen, who created independent female characters to explore diverse female identities within their works.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there was a notable abundance of female characters and an emphasis on female subjectivity in many novels (Fanning, 2017: 75). Marking a shift toward challenging male dominance and portraying dynamic female characters who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act upon their thoughts. These literary explorations of creative individuals with independent thought and self-realization reflect the spirit that feminism requires.

The ending of *Jane Eyre* is somewhat of a pity. Readers expected *Jane Eyre* to end happily as most of the Victorian novels invariable did (Beaty, 1996: 159). So, Jane received an inheritance from her uncle, married Mr. Rochester, and got an “ostensibly happy conclusion” at Ferndean Manor (Penner, 1999: 145). A remarkable feminist adventure eventually ended with a return to the domestic sphere, demonstrating Brontë’s compromise to reality. As concluded by Bellis (1987: 640), Brontë’s novel does not ultimately break free from the dominance of male power structures but makes a concerted effort to challenge and change these structures. Although Jane’s overall relationship with society remains largely unchanged from how it wa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ovel, there is hope for change as she represents the potential for transformation, particularly through her equal marriage, which can challenge and transform family, social, and even religious structures if emulated

(Peter, 1996: 68).

5.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Jane Eyre* by Charlotte Brontë offers a compelling exploration of feminism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Victorian Era. The three “isolations” experienced by the novel’s protagonist, Jane Eyre, at Gateshead Hall, Lowood School, and Thornfield Hall are emblematic of her resistance to the oppressive patriarchal norms of her time. During the first isolation, Jane faced oppression from her relatives, which spurred her resistance; in the second isolation, she grappled with stringent rules but ultimately garnered respect and friendship through her determination; in the third isolation, she endured disdain from the upper class but blossomed into an independent woman of unwavering principles and morals. Although the “isolations” exposed Jane to the loneliness of being an outcast, the experiences nurtured her self-reliance and inner strength. These experiences reflect the principles of reformist feminism, resistant feminism, and rebellious feminism as Jane confronts gender inequality, social constraints, and societal expectations. Jane’s unwavering spirit and the challenges she posed to established norms continue to inspire discussions on feminism, gender equality, and female empowerment.

References

- [1] Ahmed, H. R. (2020). Philosophy of Feminism and Suffering of Western Women Concurring to Charlotte Brontë’s Novel “Jane Eyre.”. *Electronic Research Journal of Literature*, 2, 45-52.
- [2] Allen, K. R. (2023). Feminist theory, method, and praxis: Toward a critical consciousness for family and close relationship scholar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40(3), 899-936.
- [3] Beaty, J. (1996). *Misreading Jane Eyre: A Postformalist Paradig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4] Bellis, P. J. (1987). In the Window-Seat: Vision and Power in Jane Eyre. *ELH*, 54(3), 639-652.
- [5] Brontë, C. (2018). Jane Eyre. In *Medicine and Literature* (pp. 53-72). CRC Press.
- [6] Budgeon, S. (2011). The contradictions of successful femininity: Third-wave feminism, postfeminism and 'new' femininities. In *New femininities: Postfeminism, neoliberalism and subjectivity* (pp. 279-292).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 [7] Delmar, R. (2018). What is feminism? In *Theorizing feminism* (pp. 5-28). Routledge.
- [8] Fanning, S. E. (2017). 'A Soul Worth Saving': Post-Feminist Masculinities in Twenty-First-Century Televised Adaptations of Jane Eyre and Wuthering Heights. *Adaptation*, 10(1), 73-92.
- [9] Han, C. P. (2020). Picturing Charlotte Brontë's artistic rebellion? Myths of the woman artist in post-feminist Jane Eyre screen adaptations. *Adaptation*, 13(2), 240-269.
- [10] Gao, H. (2013). Reflection on Feminism in Jane Eyre. *Theory &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3(6).
- [10] Gilbert, S. M., & Gubar, S. (2020).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1] Godfrey, E. (2005). "Jane Eyre", from Governess to Girl Bride.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853-871.
- [12] Han, C. P. (2020). Picturing Charlotte Brontë's artistic rebellion? Myths of the woman artist in post-feminist Jane Eyre screen adaptations. *Adaptation*, 13(2), 240-269.
- [13] Hoeveler, D. (2003). Frankenstein, feminism, and literary theory.
- [14] Lorber, J. (2001). Gender inequality. *Los Angeles, CA: Roxbury*.
- [15] Lorde, A. (1984).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 Crossing Press.
- [16] Louis, G. (2015). Comments on Jane Ey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World*, 2(2).

[17] Lu, L., & Zhao, Y. (2015, September). A Feminist Analysis of Jane Eyre & Pride and Prejudice. In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p. 100-103). Atlantis Press.

[18] Penner, L. (1999). Domesticity and Self-Possession in The Morgesons and Jane Eyre.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27(2), 131-147.

[19] Peters, J. G. (1996). Inside and Outside:” Jane Eyre” and Marginalization Through Labeling. *Studies in the Novel*, 28(1), 57-75.

[20] Rivkin, J., & Ryan, M. (1998). Introduction: Feminist Paradigm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2, 765-69.)

從女權主義角度分析《簡·愛》中的三次“孤立”

汪東蘊 朱雨露

摘要：本文從女權主義的角度，對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女主人公所經歷的三次“孤立”進行了分析；並結合洛伯（2001 年）總結的女權主義理論（改革女權主義、抵抗女權主義和叛逆女權主義），深入探索了簡·愛對父權社會的反對和抵抗。通過探討簡·愛在三次被孤立的環境中，與來自上層社會的壓迫性人物進行對抗，揭示了她對自我實現的追求，強調了她對現有制度規範的反抗以及追求平等的渴望。從女權主義的角度分析，《簡·愛》的女主人公對於三次“孤立”進行了堅決的反抗，其重要性體現在，簡·愛堅忍不拔的精神和對既定規範的挑戰，激發了讀者和社會對於女權主義、性別平等和女性賦權的討論，並進一步促進了女權運動的發展。

關鍵字：女權主義；《簡·愛》；孤立；父權制；性別不平等

投稿日期	2023. 9. 6	審查日期	2023. 10. 9	刊載日期	2023. 12. 28
------	------------	------	-------------	------	--------------

概念隱喻在《傅青主女科》中的應用研究

楊茜茜 段紅梅¹

摘要：概念隱喻理論認為，隱喻是人類認知事物的一種重要的思維方式，包括結構隱喻、空間隱喻和本體隱喻三大類型。中醫學與中國哲學聯繫緊密，其理論建構的認知工具“取象比類”就是典型的隱喻認知模式。《傅青主女科》是中醫婦科學的經典書籍，全文蘊含豐厚的中醫思想，並應用大量的概念隱喻。本文從五行學說、帶脈和濕邪三個角度分析概念隱喻在《傅青主女科》中的具體應用，以證明概念隱喻在中醫診斷、治療、闡釋病因病機中的廣泛應用及意義。

關鍵字：《傅青主女科》；五行學說；帶脈；濕邪；概念隱喻

引言

中醫學深受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以其卓越的治療效果在全球享有盛譽。然而，該學科涵蓋的晦澀抽象的理論，例如“天人合一”、“陰陽五行”及“藏象”等學說，對其在不同文化中的傳播和傳承形成了一定阻礙。20世紀80年代在西方興起的概念隱喻理論，為解讀中醫基礎理論提供了新的視角，並對推動中醫學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一理論與中醫學特有的思維認知模式——“取象比類”在某種程度上有所契合，一些學者甚至認為，“取象比類”的實質就是“中國式隱喻”。²

¹ 楊茜茜，就讀於全南國立大學東亞學系，研究方向為中醫文獻英譯和對外傳播。電郵：1329397454@qq.com；段紅梅，四川文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譯介學。

² 馬子密、賈春華。取象比類——中國式隱喻認知模式。《世界科學技術》，2012年第14卷第5期，第2082-2086頁。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國內學者對概念隱喻在中醫基礎理論中的應用進行了初步探討，有學者從隱喻認知的角度研究中醫藏象學說¹，有研究從陰陽五行的語境下分析中醫隱喻思維和隱喻話語²，還有學者研究中醫學病因的隱喻特徵。³然而，系統地、在更深層面上分析中醫專著中概念隱喻應用的研究依然相對匱乏。本研究將中醫婦科學的經典之作《傅青主女科》作為研究對象，從概念隱喻的視角出發，進行多維度的分析，旨在探討概念隱喻在中醫學經典中的廣泛應用及意義。

一、概念隱喻理論及其與中醫學的關聯分析

（一）概念隱喻理論簡介

20 世紀 80 年代，認知語言學在西方得到迅猛發展。《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Johnson & Lakoff, 1980）指出“隱喻於語言和思想中無處不在，人類的概念系統就是建立在隱喻之上的”⁴，並進一步提出了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s）。這一理論的核心內容有以下幾點：

1. 隱喻的實質是人類通過借助一類較熟悉、具體、有形、容易理解的事物—始源域（source domain）來幫助理解和認知另一類陌生、抽象、無形、難以理解的新事物—目標域（target domain）。2. 隱喻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現象，更是一種人類重要的思維方式和認知手段。人類利用已知事物來理解未知事物，利用具象事物來解釋抽象模型，這種思維範式具有能動性和創造性。3. 隱喻可大致分為三大類別：結構隱喻、方位隱喻和本體隱喻。三大分類之間並不完全孤立，而是交叉重疊的關係。結構隱喻（Structural Metaphor）即為借助始

1 穀浩榮、賈春華、謝菁. 基於概念隱喻理論的中醫藏象學說考察. 《世界科學技術》，2012 年 05 期，第 2092-2095 頁。

2 石 勇：《陰陽五行語境下的中醫隱喻思維與隱喻話語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2016。

3 賈春華. 一種以身體經驗感知為基礎形成的理論——以“六淫”中的風為例分析中醫病因的隱喻特徵. 《世界科學技術》，2011 年第 13 卷第 1 期，頁 47-51。

⁴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源域的結構去認識未知的目標域的結構。如耳熟能詳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就是典型的結構隱喻，以“基礎”和“上層建築”這類建築學的語言和它們間的結構關係來闡述經濟和社會意識形態以及相應的制度、組織和設施的關係。空間（方位）隱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指的是：以空間概念為始源域，通過空間概念映射到目的域中。即上下、高低、遠近、裏外等本來用于表達空間方位的詞語，也可用于表達地位的高低、事態發展的程度等。“士氣高漲”、“情緒低落”、“交淺言深”等成語就運用了空間隱喻，給人們以更直觀的理解。本體隱喻(Ontological Metaphor)也即是實體隱喻是指：人們將思想、感情、實踐、行為等抽象概念看作有形實體和物質。實體隱喻中較為重要的一種隱喻方式是容器隱喻(Container Metaphor)。容器隱喻將本體不是容器的物進行量化、邊界化，讓其可以容納東西，也可以從中拿出東西。比如在容器隱喻中就經常將心境和視野等事物比作一種可以容納和拿出事物的容器。如“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在這個隱喻中，人的身心是一個容器，哀樂等情感是外在、抽象的物質。

值得注意的是，隱喻映射的產生不是隨意的，而是由人們根據長期的、自身的身體經驗感受、歸納出來的。一個隱喻映射一旦建立起來，如果被大多數語言使用者所接受，它就會反過來將自身的結構更廣泛地應用在生活、學術中的方方面面。

（二）概念隱喻理論與中醫學的關聯分析

概念隱喻理論在闡釋和表述中醫基本理論及臨床疾病診斷、治療中起到重要作用，多借引自然、社會現象來解釋人體生理、心理狀態與疾病的發生原因和發展進程。這些隱喻的構建與產生，乃是基于特定民族的認知模式對其文化的感悟，因而呈現出一定的概括性、系統性與邏輯連貫性。

中醫學，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展現出獨特的隱喻特色。其理論支柱之一，即“取象比類”，映照了一種中國式的隱喻認知方法。《周易·系辭下》記載：“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取象比類”通過抽象的邏輯推理，借由比照

人體與自然界的各種現象，旨在探究人體內在的生理與病理變遷。此處的“象”指的是可感知的實體屬性，“比類”則是對相似或相同屬性的抽象歸類及綜合。在中醫理論中，“取象比類”通過對始源域“自然”與目標域“人體”之間的取象、歸類、類比、推理，從而把握人體臟腑經絡，推斷病因病機，并擬定治療方案與養生法則。進行類比的理論基礎便是“天人合一，同氣相求。”由此可以看出，“取象比類”暗合隱喻的認知過程。¹

中醫文獻中的隱喻和類比俯仰可拾，例如，《黃帝內經》中的“藏象”學說將自然界的五行隱喻為五臟；《素問·靈樞秘典論》運用君臣關係隱喻十二臟腑的層級地位；《傷寒論》以戰爭辭彙如“攻”、“進”、“勝”等隱喻人體抵抗疾病的過程。關於中醫學中廣泛采用隱喻的深層原因，一些學者認為，中醫學屬於自然哲學醫學模式。受限於當時低下的生產力和科技水準，中醫學者只能依賴肉眼對自然界的細緻觀察和身體的感知體驗，來構建中醫理論體系，并以自然現象、社會架構作比喻，來闡釋、證明自己的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有學者指出，概念隱喻并不能完整覆蓋“取象比類”的意義。“取象比類”作為具有中國哲學鮮明特徵的思維方式，表現出特定的歸類型映射結構，而目前的概念隱喻理論尚未明確地體現這一點。²考慮到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如何促進中醫文化的國際傳播，在此選擇使用國際通用的概念隱喻來解釋中醫經典。但中醫文獻具有很高的隱喻性，這一現象是毋庸置疑的。

二、五行學說隱喻在《傅青主女科》的應用

《傅青主女科》的作者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醫學家、書畫家、學者傅山（1607-1684 年）。該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包含帶下、血崩、鬼胎、

¹ 方信盛、賈春華. 由〈易經〉切入〈黃帝內經〉探討與中醫理論思維之相關性.《世界中醫藥》，2015 第 10 期，第 706-709 頁。

² 石勇. 醫取象比類與概念隱喻理論.《中華中醫藥雜誌》，2019 年第 7 期，第 2893-2897 頁。

調經以及種子五章；下卷包含妊娠、小產、難產、正產、產後以及附產後編等六章。《傅青主女科》對清朝中後期乃至現代中醫婦科學的影響深遠。

五行學說作為我國古代主流的思維方式之一並沿用至今。是構成中醫理論的基石之一。周書《尚書·洪範》明文記載：“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古人在和大自然的相處過程中，通過自我的最基本的感知提煉出了“水火木金土”這五種物質各自的不同的特性和相互之間的運轉原理，再逐漸超越這五種物質本身，形成了對五行的根本特性的高度而濃縮的概括，進而將宇宙中所有的事物都涵蓋在陰陽五行之中。在中醫這一領域內，古人將五行學說應用并類比于其中，誕生了中醫學內兩個非常重要的理論：五行-五臟配屬理論和五行之間的生克乘侮-臟腑之間的生克乘侮理論。

（一）五行與五臟配屬隱喻的應用

將五臟視為一個整體並作為人體的中心是藏象學說的主要特點。這種整體性在內體現在人體的五臟與六腑、五臟與精神情志和五臟與形體官竅的整體性上；在外則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整體性，“天人合一”。五行學說作為其理論構建基礎，通過“取象比類”和推演，將五臟與五時、五氣、五行、五方、五官、五體、五色、五音、五志、五味、五液、五情、五臭、五聲等方面進行相對應的匹配。《黃帝內經·五藏生成篇》記載：“色味當五臟，白當肺辛，赤當辛苦，青當肝酸，黃當脾甘，黑當腎鹹。故白當皮，赤當脈，青當筋，黃當肉，黑當骨。”五行對五臟、五色，肝屬木，色青；心屬火，色赤；脾屬土，色黃；肺屬金，色白；腎屬水，色黑。鄧鐵濤教授認為，臟腑配五行這一抽象概念，是經過無數醫療實踐提煉出來的。¹

“五行-五臟”解釋了心、肝、脾、肺、腎五大內臟的形色、各自的生理功能及其與自然界的聯繫，從而形成了中醫理論中特有的整體觀。五行-五臟配屬關係的本質是實體隱喻，即通過隱喻映射，五種物質各自的特性和相互之間

¹ 鄧鐵濤. 國五臟相關學說研究——從五行到五臟相關. 《中國工程科學》，2008年第10卷第2期，第7-13頁。

的運轉原理映射到人體的內臟器官中。正如王冰注《素問·五臟生成論》“五臟之象，可以類推”所說：“象，謂氣象也。言五臟雖隱而不見，然其氣象性用，猶可以物類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靜，肺象金而剛決，腎象水而潤下。”進而以屬性做其在人類身體中的作用類比，如：“腎屬水為萬物之本，脾屬土為萬物之母”。

《傳青主女科》將五行學說作為其基礎理論之一，大量的應用了五行隱喻。書中多處出現“脾土”、“心火”、“肝木”、“腎水”、“肺金”等中醫學術語。例如，此處的“脾土”一詞來源於中醫學中的“五行對五臟”，脾在五行中屬土，從功能上來說，土孕育萬物，而中醫認為“脾為後天之本”，運化水穀精微，供應維持人體生存、發育的需要，正如土地生養萬物。這是典型的實體隱喻。《傳青主女科》運用隱喻的另一例證為，在《傳青主女科·帶下篇》中，傅青主以帶下顏色作為診斷病因時的參考，如青帶下中“肝屬木，木色屬青”¹，故青帶乃“肝經濕熱”所致等。這些實例都顯示了傅青主如何廣泛地運用概念隱喻解釋中醫基礎理論和病因。

（二）五行之間的生克乘侮-臟腑之間的生克乘侮隱喻的應用

五行學說不僅分析五行各自的自然屬性和映射到人體臟腑的功能特徵，更重要的是推理得出五行之間的相互制約、動態平衡的關係，即五行之間的生克乘侮關係。五行生克是一個統一的、複雜的、動態平衡的有機系統，“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間相生相剋，相乘相侮的關係圖映射到人體五臟六腑，形成了描述內臟間的生理、功能聯繫，解釋病機病因、疾病傳變和治療預防疾病方法的基礎。包括傅青主在內的歷代名中醫無不精通且靈活應用五行生克理論。中醫病理術語基於五行生克乘侮關係形成的隱喻術語有：以“木克土”描述“肝乘脾”，用“水火不濟”描述“心腎不交”等，同時也有大量的隱喻用於治則治法，如“培土生金”、“抑木扶土”等。石勇認為這些隱喻屬於過程隱喻範疇，能詮釋五行間的生克乘侮關係進而映射臟腑間的生克乘侮關係²。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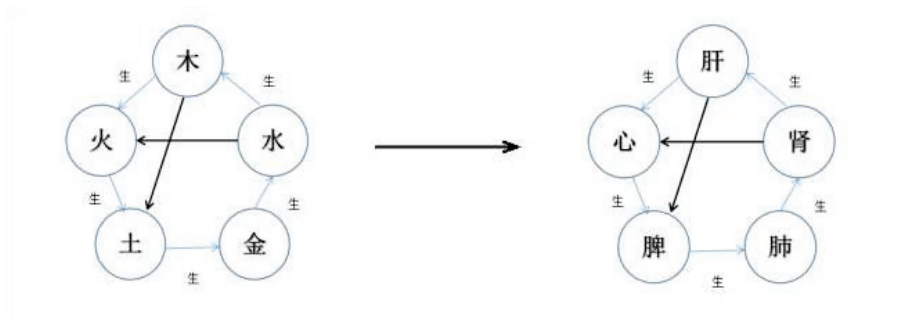
¹ 傅山.《傳青主女科》.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

² 石 勇.《陰陽五行語境下的中醫隱喻思維與隱喻話語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

程本位作為過程隱喻的思維原點，意象圖式反映了動態的發展變化過程而被稱之為始源域，通過對宇宙萬物中某一個既定領域的動態關係的持續映射，而將某種隱喻的思維形態投射到該動態關係的某種邏輯過程之中。五行所包含的五大子系統之間的生克關係高度靈活、變通，最終形成動態平衡。如果五行之間的相生或相互克制的關係發生異常的變化，那麼自然界的萬事萬物的協調性也會便遭到相應的影響，反映到人體則體現為疾病。

《傅青主女科·帶下篇》記敘：“夫白帶乃濕盛而火衰，肝鬱而氣弱，則脾土受傷，濕土之氣下陷，是以脾精不守……治法宜大補脾胃之氣，稍佐以舒肝之品，使風木不閉塞于地中，則地氣自升騰于天上，脾氣健而濕氣消，自無白帶之患矣。方用完帶湯。”¹即是上述隱喻的應用。

傅山認為，濕亦水之積，水太勝而傷火，火弱生土不利，加之患者肝氣不疏，木鬱土虛，土在火弱木鬱的情況下，土氣下陷，需培土抑木，土壯即可抑水，去除濕氣。治療原則為健脾、疏肝、燥濕、止帶。在此，“水勝火”利用了自然界水能熄滅火的特性，來比喻腎功能失調對心臟產生的負面影響；“木鬱土虛”則用過多的樹木在土中生根，吸取養分的形象，隱喻肝氣的鬱結傷及脾胃。



如圖所示：木克土隱喻肝鬱則致脾虛

2016

¹ 傅山.《傅青主女科》.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

綜上所述，詮釋五行與五臟配屬的實體隱喻和詮釋五行之間的生克乘侮—臟腑之間的生克乘侮的過程隱喻相互補充，共同映射演繹了中醫五行學說《傅青主女科》借助自然界五種物質的特性和相生相剋的關係，隱喻了人體內臟間的功能聯繫，解釋病因病機。概念隱喻在書中的應用有利于幫助讀者和患者形成疾病的整體觀念，為人們對生命和病因病機提供了更直觀的認識，有助于中醫在普羅大眾中的普及，并讓中醫學散發出獨特的文化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傅青主在診病時雖基于五行學說，但在臨床辯證時，却不落窠臼，根據實際情況靈活用藥，對中醫婦科理論和實踐多有貢獻及創新。

三、帶脈隱喻在《傅青主女科》中的應用

經絡，是人體中經脈和絡脈的統稱，“經脈”一詞也是一個隱喻。“經”、“絡”兩字原是古代紡織行業的專業術語，豎著擺放在織布機上的綫稱為“經綫”，“絡”，本意指呈現分叉形狀的絲線，也就是絲絮。因此，經脉是聯繫臟腑和體表、運行氣血及于全身各部的通道，而絡脉是自經脉別出的分支，又稱“別絡”。經絡在中醫理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靈樞·經脉》指出：“經脈者，所以能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不可不通。”

在人體眾多的經絡中，帶脈屬於奇經八脈，環腰一圈，約束諸經。傅青主非常重視帶脈，他認為帶脈在人體中起到的作用無可替代：維持胞胎的存在、升舉髒腑中的器官以及調節臟腑的各條經絡，和婦女的月經、帶下、孕育胎兒以及生產密切相關。¹帶脈這一命名具有鮮明的隱喻特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帶脉的巡行路綫與衣帶在身上的位置大致重合

帶脈是人體唯一的一條橫行經脈，環腰腹一圈，與人身上多條縱行經脈相連。張子和說：“十二經與奇經七脉，皆上下周流，唯帶脉起少腹之側，季脅之下，環身一周，絡腰而過，如束帶之狀。”《辭源》解釋：“帶，也即是束

¹ 楊昭鳳、顏平.《傅青主女科》所述“帶脈”淺談.《甘肅中醫》，第2003第16卷第9期，第24-25頁。

衣用的帶子，是用絲製作而成的捆束在外衣的大的帶子，將之圍在人體的腰間，結在衣服的前面，兩頭自然的垂下，而稱之為紳。”從“帶”的字面解釋可想像出帶脉的形態是圍腰一周。帶脉雖然不是從胞中發起，但其帶脉經過的地方卻和胞宮非常相近，因此，帶脉對於婦科疾病的治療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在人身上的位置大致重合，而以衣帶這一具體的生活物品來隱喻和命名一條看不見、摸不著的經絡——帶脉。這一隱喻可被歸屬於概念隱喻中的結構隱喻範疇，在中醫學中運用這一隱喻可增強讀者對抽象的經絡的直觀感受并加深記憶。

（二）帶脉對人體的總束諸脉的功能與衣帶的固定衣物作用相似

帶脉居於腰臍，為聯繫諸經絡臟腑之樞，總束諸脉。《雜病源流犀燭·帶脉病源流》亦雲：“是知一身上下，機關全在於帶，帶不能自持其氣，其症皆陷下而不上矣。”帶脉的“總束諸脉”的功能可以被隱喻為一條腰帶，正如腰帶束縛支撐著我們身體上下的衣物。從這個角度看，帶脉的功能可以被歸類為結構隱喻。這種隱喻通過對比帶脉和腰帶，生動地強調了帶脉在約束全身縱行經絡，調節氣血運行中起到的樞紐作用。

（三）帶脉雖無形，卻通於任督二脉，與脾、肝、腎三髒關係密切。六淫可通過經絡傳給帶脉，引發諸多病症。

傅青主認為帶脉在人體中起到交通樞紐的作用，與諸多重要臟腑、經絡相通。《傅青主女科》中記載“蓋帶脉通於任督”，“脾胃氣虛，則腰臍之氣閉，腰臍之氣閉，則帶脉拘急”，充分說明瞭帶脉與任脉、督脉以及肝、腎、脾、胃的密切聯繫。正因為帶脉與這些人體重要經絡、臟腑相通相連，熱邪、濕邪等致病因素通過這些網路傳遞、擴散。而且這種傳遞是雙向的，帶脉不通可影響經絡臟腑，經絡臟腑病變也可累及帶脉。例如《傅青主女科》中論道因為帶脉與任脉相連，熱邪通過盤踞在人體下焦的帶脉，可到達任脉，所以導致“黃帶下”的症狀。據書中論述，帶脉無形無相，而病症通過帶脉傳遞，隱喻了帶脉的實體化和有邊界，能進可出。在這裏，傅青主應用了典型的容器隱喻的思維方式。

綜上所述，《傳青主女科》篇中的帶脈隱喻從多個角度（形體、特性及功能）對比、歸納始源域（衣帶）和目標域（帶脈）的相似之處，並綜合應用了多種隱喻方式，以加深讀者對帶脈在人體的分佈及其重要性的理解。

四、六淫概念中“濕邪”隱喻在《傳青主女科》的應用

六淫是中醫學中一種重要的病因理論，統稱導致人體感染疾病的風、寒、暑、濕、燥、火六種因素。古人基於“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導，通過對大自然各種自然現象的觀察和體驗，用天、地、風、寒、暑、濕、燥、火等具體概念來解釋導致人體生病的原因，這類隱喻屬於實體隱喻，體現了隱喻病因替代真實病因的歷史進程。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裏六淫並非六個個體，而是指代六類病因範疇，是對自然界存在的致病因素的一種歸類。

濕，是常見於《傳青主女科》中的一個病因。在古代的文字中寫作為“溼”字。漢代著名學者許慎在其名著《說文解字》中將其解釋為“溼，幽溼也，從水”。“濕”字在字體結構上以水為偏旁，而水的本性表現為寒冷，且具有很強的流動性，經常從高處往低處流下。而若在水準情況下，水沒有無外力的推動就會呈現靜止聚集的特性。水的這一特性與中醫中對於濕的表述如出一轍：濕為陰邪之物、容易損傷人體的陽氣；而濕的本性較重，喜歡自上往下流動，因而經常會侵犯人體的下部；濕氣還具有容易停滯固定的特性。古人在和大自然的共存中還發現在一定的物質中摻入一定量的水之後，會讓這個物質變得粘滯，比如，在泥土中摻入一定量的水之後，泥土就會變得粘滯。而水的這一特性與中醫中“濕邪”容易與風、寒、熱、暑等病因參雜在一起，導致人體生病，並且病程較長，纏綿難愈的特性相一致。¹

《傳青主女科》尤其強調濕氣致病的觀念，“夫帶下俱是濕症”。白帶下篇中多次提到“濕熱”濕熱留于肝經，則為青帶下；濕熱存于下焦，注入任脈，

¹ 謝菁，穀浩榮，賈春華：《從認知語言學角度探討中醫六淫概念隱喻——以濕邪概念為例》，《中醫藥學報》，2012年第40卷第3期

則爲黃帶下；濕熱之氣醞於帶脈之間，易患赤帶下。充分闡釋了“濕”兼挾致病、粘膩難解的特徵。

《傳青主女科》中應用的“濕邪隱喻”屬於實體隱喻，以自然界中“水”的物理性質生動地形容了“濕邪”這一病因在人體的致病原因和感染濕邪的症狀，爲醫患雙方理解“濕邪”這一病因起到了積極的提升作用。不同文明的人們對身體的感知是一致的，因而中醫文獻中概念隱喻的應用無疑也促進了外國友人對中醫“濕邪”這一病因和感染濕邪症狀的理解。

結 論

概念隱喻作爲人類理解世界的重要認知工具，在中醫典籍中有著廣泛、顯著、多角度的應用。從概念隱喻理論的視角分析，中醫婦科經典《傳青主女科》靈活運用了多種隱喻方式，主要體現以下幾個方面：1. 應用實體隱喻、過程隱喻，借助自然界五種物質的特性及其相生相剋的關係，隱喻人體內臟間的功能聯繫，解釋病因病機。2. 應用結構隱喻、容器隱喻來對比、歸納衣帶和人體經絡之一帶脈的相似之處，加深讀者對帶脈在人體的分佈及其重要性的理解。3. 應用實體隱喻，以自然界中“水”的物理性質隱喻“濕邪”這一病因在人體的致病原因和感染濕邪的症狀。概念隱喻在《傳青主女科》中的應用，保留了中醫獨特的文化魅力，並有效增強人們對抽象的中醫理論的理解，爲人們對生命和病因病機提供了更直觀的認識，有助於中醫在國際上的傳播。

本文也有以下不足之處：1. 概念隱喻的應用貫穿《傳青主女科》全書，囿於本文篇幅所限，僅對五行學說、帶脈和濕邪在書中的隱喻進行了具體分析。2. 近年來有學者提出概念隱喻與中醫的“取象比類”隱喻思維還是有一些差異，當前的概念隱喻理論並不能完全、充分地闡釋中醫基礎理論的全部內容，期待認知語言學的學者們對此進行進一步的研究，補充和完善概念隱喻理論。

參考文獻

專著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傅山：《傅青主女科》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

博士論文

石 勇：《陰陽五行語境下的中醫隱喻思維與隱喻話語研究》[D]，南京：南京師範大學，2016。

陳 易：《概念隱喻視角下中醫婦科術語的英譯研究》[D]，南昌：江西中醫藥大學，2021。

期刊論文

穀浩榮、賈春華、謝 菁：《基于概念隱喻理論的中醫藏象學說考察》，《世界科學技術》（中醫藥現代化），2012 年 05 期，頁 2092-2095。

謝菁、穀浩榮、賈春華：《從認知語言學角度探討中醫六淫概念隱喻——以濕邪概念為例》，《中醫藥學報》，2012 年第 40 卷第 3 期，頁 3-6。

賈春華：《具身心智視域下的中醫五行概念隱喻的認知心理語言邏輯研究方案》，《世界中醫藥》，2013 年第 8 卷第 1 期，頁 91-95。

方信盛、賈春華：《由〈易經〉切入〈黃帝內經〉探討與中醫理論思維之相關性》，《世界中醫藥》，2015 年 2015 第 10 期，頁 706-709。

賈春華：《一種以身體經驗感知為基礎形成的理論——以“六淫”中的風為例分析中醫病因的隱喻特徵》，《世界科學技術》，2011 年第 13 卷第 1 期，頁 47-51。

楊昭鳳、顏 平：《〈傅青主女科〉所述“帶脈”淺談》，《甘肅中醫》，第 2003 第 16 卷第 9 期，頁 24-25。

李成華：《藏象術語的隱喻認知及其英譯研究》[D]，濟南：山東中醫藥大學，2016。

張登本、孫理軍、李翠娟：《論五行理論在〈黃帝內經〉建構中的作用及其意義》，《河南中醫學院學報》，2007 年 22 期，頁 13-18。

馬子密、賈春華：《取象比類——中國式隱喻認知模式》，《世界科學技術》（中醫藥現代化），2012 年 05 期，頁 2082-2086。

石勇：《中醫取象比類與概念隱喻理論》，《中華中醫藥雜誌》，2019 年第 7 期，頁 2893-2897。

The Application of Conceptual Metaphor in “Fu Qingzhu’s Gynecology”

YANG Xixi DUAN Hongmei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Abstract: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 posits that metaphors are fundamental to human cognition, encompassing three primary categories: structural, spatial, and ontological metaphors. In Chinese medicine,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 the cognitive construct of “employing imagery and analogies for comprehension” represents a metaphorical cognitive approach. “Fu Qing Zhu’s Gynecology,” an authoritative text in the field, is imbu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wisdom and utilizes many conceptual metaphors.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use of these metaphors in “Fu Qingzhu’s Gynecology,” exploring their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lenses of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the Girdling Vessel, and the concept of Dampness. The analysis underscores the pivotal role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the diagnostic, therapeutic, and etiological aspects of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Fu Qingzhu’s Gynecology*; Five Elements Theory; Girdling Vessel; Dampness; Conceptual Metaphor.

投稿日期	2023. 9. 6	审查日期	2023. 10. 9	刊载日期	2023. 12. 28
------	------------	------	-------------	------	--------------

漢語“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語法化考察

鄭 宏¹

（深圳職業技術大學 職業技術教育學院）

摘 要：“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的產生和發展演變在漢語史上具有規律性，“被/遭/蒙/著（著）/吃（吃）+V”和“被/遭/蒙/著（著）/吃（吃）+N+V”的句式結構是“遭受”類動詞向被動標記轉化的核心關鍵。在發展過程中，雖然不同被動標記在成熟過程、消亡時間、地域分布和語義語用上略有差異，但整體上“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的發展演變模式和語法化機制是類似的。從世界語言來看，“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具有鮮明的類型性。

關鍵詞：“遭受”義 被動句 虛化 類化

“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是漢語史上有標記被動句來源的一種類型，也是較早出現的一種被動句演變類型。被動標記有“被”“遭”“蒙”“著（著）”“吃（吃）”，均是由動詞“遭受”“蒙受”義演變而來的被動標記。“被”表被動萌芽於戰國時期，“遭”表被動於東漢時期，“蒙”表被動至遲在三國時期，“著（著）”表被動於唐代，“吃（吃）”表被動於晚唐。在漢語史上，這幾個被動標記的演變具有相似性和規律性。

一、“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被/遭/蒙/著（著）/吃（吃）”的演變²

（一）“被”字句

¹ 鄭宏（1978- ），女，山西太原人，深圳職業技術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漢語史。

² 文中語料檢索來源瀚典全文檢索系統（sinica.edu.tw）和國家語委古代漢語語料庫（www.cncorpus.org/login.aspx）。

“被”在上古時期一般用作動詞，義為“覆蓋”，在句子中充當謂語，如：

(1) 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荀子·不苟》）

由“覆蓋”義引申出“遭受”義，如：

(2) 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逸周書》卷九）

從動詞“覆蓋”義到“遭受”義的轉化，表明了主語施受關係的變化，主語由施事向受事的轉變。當“被”的賓語是一個純粹的名詞，“遭受”義動詞的性質不會發生變化，當賓語是一個動名兼類詞，“被”的詞性就不明確了，如：

(3) 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韓非子·五蠹》）

(4) 萬乘之國被圍於趙。（《戰國策·齊策六》）

正如蔣紹愚所述：¹在漢語中，名詞固然常常充當賓語，但動詞充當賓語，也是很常見的現象。所以，在“被”字後面是一個名詞性成分（如“水旱之害”），固然說明“被”是一個動詞而不是被動的標志，但如果“被”後面是一個動詞（如“攻”或“害”），“被”也仍然可能是一個動詞而不是被動的標志。所以重新分析的關鍵，主要不在於“攻”或“害”是名詞還是動詞，而在於它們和“被”構成什麼關係。不過，只有當“被”字後面跟一個動詞時，才有重新分析的可能，如果“被”字後面跟的是一個名詞，就不可能發生重新分析了。綜上，“被+V”或“被+N+V”的重新分析，是“被”字句產生的關鍵。

（二）“遭”字句

“遭”在上古時期本為動詞“碰上”“遇見”之義，當其後的賓語為不幸或危險的事物時，引申出“遭受”“受到”之義。如：

(5) 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左傳·宣公十二年》）

漢代，出現了“遭+V”和“遭+N+V”的結構，如：

(6) 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論衡·幸偶》）

(7)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世說新語·傷逝》）

¹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200頁。

“遭+V”和“遭+N+V”結構中，後者在“遭”和動作V之間插入動作V的施事，使得“遭”的被動義更為清晰。動詞V前出現施事，V主要謂語的可能性增強，“遭”作為被動標記的作用也隨之增強。“遭+V”結構因“遭”的詞性不易判斷，其結構與“受事主語+弱性動詞被動標記+及物動詞謂語”形式一致，促使了“遭”表被動的產生。

（三）“蒙”字句

“蒙”在先秦時期一般作為動詞，義為“覆蓋”之義，如：

（8）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向宮守護？（《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也有動詞“遭受”“蒙受”之義，且與動詞“被”同義對舉或同義連用，如：

（9）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灾蒙禍之驗也。（《論衡·命義》）

（10）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眦，遐眠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文選》卷九）

根據袁賓所述¹，《漢書》中的兩個例子將“蒙”字被動句的研究向前推進了，如下：

（11）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漢書·蘇武傳》）

（12）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綿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漢書·貢禹傳》）

“其賞賜”意謂漢朝的賞賜，是個定中結構，其中“賞賜”還是名物化用法，“蒙+其賞賜”屬動賓關係。但例（12）“賞賜四時雜繒……”是個動賓結構，“賞賜”的及物動詞用法終於完全顯露。此例出于光祿大夫貢禹上漢元帝書，“賞賜”的施事為元帝（在書信中可省去）。這是謂語由給予類動詞充當的表被動的“蒙”字句。在此式“蒙”字句裏，謂語動詞“賞賜”的賓語“四時雜繒維繒……”系賞賜之物，句子的主語“貢禹”（書信中省去）系賞賜對象，兩者均系“賞賜”的受事。在施、受關係十分明確的及物動詞“賞賜”之前，“蒙”字的動詞性質及其“蒙受”詞義均因與“賞賜”產生衝突而有所減弱，遂而演

¹ 袁賓《“蒙”字句》，《語言科學》，2005（6）：12-13。

化爲被動標記。“蒙+賞賜四時雜繒……”已非動賓關係，而成了“蒙 V”式被動句。

（四）“著（著）”字句¹

“著（著）”最先作爲“附著”義動詞出現，《國語》中已有用例。《國語·晉語四》：“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與興。”韋昭注：“著，附也。”從“附著”義引申出“穿著”義和“遭受”義。“著（著）”的這兩個語義發出動作作用力方向剛好是反向的。如：

（13）呂氏子靈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韓愈《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銘》）

（14）如何急灘水，更著打頭風。（楊萬裏《北風》）

例（13）“著”爲“穿著”義，“著”的動作施爲者即“呂氏子靈”，其動力的方向是從施事者“呂氏子靈”指向受事者“道士衣冠”，“著”是一種主動的行為；例（14）“著”爲“遭受”義，“風”是動作的施爲者，其動力的方向是從施事者“風”指向受事者“灘水”，“著”是一種受動的行為。被動介詞“著（著）”正是來源於“遭受”義動詞“著（著）”，動詞“著（著）”具有受動性，它與後面的名詞組合，常用來表示處於不利的境地。如：

（15）汝為病耶？為著風耶？（《百喻經·人效王眼胸喻》）

唐代，出現“著（著）+N+V”句式結構，如：

（16）一朝著病纏，三年臥床席。亦有真佛性，翻作無明賊。（寒山《又見出家兒》）

（17）郗公不易勝，莫著外家欺。（王維《戲題示蕭氏甥》）

例（16）（17）“著（著）”在“著（著）+N+V”句式結構中的中心動詞地位已經逐漸減弱，作爲輔助性動作出現，在句子語義表達中處於輔助詞的地位，其句法位置被固定下來後，就會進一步抽象化、虛化，語法功能就會逐漸改變

¹ 需要作一說明：“著”字作爲“著”“著”兩種寫法的代表，在舉例時，仍按文獻原文引用。

最終發生重新分析。¹

(五) “吃(吃)”字句²

“吃”在《說文》中解釋為“言蹇難”，即“口吃”義。大約在唐代出現了動詞“食”義，並逐漸與動詞表“食”的“吃”混用，最終取代了“吃”，在唐宋時期的文獻資料中使用較普遍。如：

(18) 但使殘年飽吃飯，只願無事長相見。(杜甫《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唐五代文獻中，“吃”從“食”義又引申出了“遭受”義，如：

(19) 義存喫鐵棒有分。(《筠州洞山悟本禪師語錄》)

(20) 陵母遂乃吃苦，不禁撲却，槍枷如倒。(《敦煌變文集新書》卷三)
動詞“吃”後的賓語可以是“棒”“杖”等具體的不可吃之物，也可以是“苦”這類抽象之物，與先前的“吃飯”“吃茶”迥然不同，因為“吃”後的賓語由所食之物向所承受之物轉變，“吃”引申出動詞“遭受”義。此外，還出現了“吃跌”“吃官司”“吃暴”“吃撲騰”“吃交”“吃嗔責”“吃罵”“吃驚”“吃氣”“吃虧”等。

晚唐時，出現了“吃(吃)+V”和“吃(吃)+N+V”句式結構，“吃(吃)”開始由動詞“遭受”義向被動標記轉化，如：

(21) 火急離我門前，少時終須吃捆。(《敦煌變文集新書》卷七)

(22) 我欲笞汝一頓，恐天下人稱你雲：捺得李日知嗔，喫李日知杖。(《朝野僉載》)

(23) 黃羊野馬撚槍撥，鹿鹿從頭喫箭川(穿)。(《敦煌變文集新書》卷五)

江藍生將這(22)(23)兩例中的“吃”均看作是被動介詞，引出述語動詞的施事者。³晚唐時期“吃(吃)+N+V”結構處於萌發階段，反映了初期被動介詞的特點。句式“吃(吃)+V”和“吃(吃)+N+V”的出現，使句子得以重新

¹ “著(著)”字被動句的來源有二，“使役”義來源的著(著)字被動句，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

² 需要作一說明：“吃”字作為“吃”“吃”兩種寫法的代表，在舉例時，仍按文獻原文引用。

³ 江藍生《被動關係詞“吃”的來源初探》，《中國語文》，1989(5)：370-377。

分析，“吃”表被動成爲可能。

二、“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的語法化機制

（一）“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的演變路徑

從“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被/遭/蒙/著（著）/吃（吃）”的演變上，我們清晰地看到：“遭受”義動詞的語義均指向受事主語，“遭受”義動詞的賓語是施事，而主語是動作的受事，語義指向有利于向被動標記的轉化：“被/遭/蒙/著（著）/吃（吃）+V”和“被/遭/蒙/著（著）/吃（吃）+N+V”句式結構的出現，是促成“遭受”義動詞向被動標記轉化的核心關鍵。

我們暫把“被/遭/蒙/著（著）/吃（吃）”記作Y，其演變路徑爲：“S+Y_{動詞}+V”隨著Y的虛化，Y的動作義逐漸減弱，且Y經常處於V前，於是“S+Y_{動詞}+V”重新分析為“S+Y_{助動}+V”，當Y不再表示具體的意義時，Y虛化為介詞。Y與V間出現了關係詞（施事）N時，即“S+Y+N+V”結構，Y虛化為介詞，即“S+Y_{介詞}+N+V”。簡而言之，“虛化”和“重新分析”在“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語法化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石毓智、李訥認爲，從動詞到介詞的演化上，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普通動詞—經常或只出現在次要動詞的位置—退化掉普通動詞與指示時間信息有關的句法特徵而轉化爲介詞……語義範疇決定動詞用作次要動詞的頻率，用作次要動詞的頻率又決定哪些動詞最容易演化成介詞。¹石、李的觀點，實為“遭受”類動詞語義的虛化，與“被/遭/蒙/著（著）/吃（吃）+V”和“被/遭/蒙/著（著）/吃（吃）+N+V”句式結構的重新分析，使“遭受”類動詞轉化為被動標記。

（二）“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同類化機制

“遭受”類來源的被動句在產生過程、語序結構、語義關係和句型變化等方面均具有相似之處。隨著“被/遭/蒙/著（著）/吃（吃）”字句的發展與成熟，在句式結構的寬鬆化、複雜化和多樣化上，“遭受”類來源的被動標記有

¹ 石毓智、李訥《漢語語法化的歷史——形態句法發展的動因與機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385頁。

相似的演變趨勢，這是同類化機制在起作用。

1. 謂語結構均趨於複雜化。具體體現在謂語本身和謂語動詞前後成分如補語、賓語、狀語的複雜化和多樣化上。

謂語趨於複雜，如：

(24) 但鷄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煮吃了。(《朱子語類》卷三十四)(連動結構)

(25) 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爲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爲奇優名倡。(《紅樓夢》第二回)(連動結構)

(26) 小可宋江，自蒙救護上山，到此連日飲宴，甚是快樂。(《水滸傳》第四十二回)(連動結構)

(27) 我心裏也想來，不是著他大舅主張著納甚麼中書，丟這們些銀子，弄的手裏醺醺的，我有不替你買得麼？(《醒世姻緣傳》第八十七回)(複謂結構)

(28) 我回去時須吃他耻笑不是好漢。(《水滸傳》第二十三回)(複謂結構)

補語均趨於複雜，如：

(29) 我被你前七八棍，後七八棍，打得我不疼不癢的，觸惱了性子……(《西游記》第五十六回)(“得”字補語)

(30) 已經遭擾了幾日，又拿著走，越發心裏不安起來。(《紅樓夢》第四十二回)(時間補語)

(31) 平日自己不知病痛，今日得蒙點破，却望指教，如何醫治？(《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八)(結果補語)

(32) 我單爲你，著那厮打了一頓。(李文蔚《燕青博魚》)(數量補語)

(33) 郭排軍吃她相問的無言可答，只道得一聲“得罪”。(《碾玉觀音》)(“的”字補語)

賓語趨於複雜¹，如：

¹ 按照賓語類型的不同，可以分爲并列性賓語、隸屬性賓語和複指性賓語三種。並列性

(34) 空使心作幸，被小夫人引了我魂靈。(《元刊雜劇三十種·詐妮子調風月》)(並列性賓語)

(35) 無子娶妾，遭光棍串同王氏，證去銀七十兩。(《型世言》第二十六回)(隸屬性賓語)

(36) 蒙將軍救了女兒，滿飲此盞。(《水滸傳》第九十三回)(隸屬性賓語)

(37) 不是弓兵護從嚴，險些著他殺了我。(《全元曲·梁山七虎鬧銅臺》)(並列性賓語)

(38) 我吃這婦人氣殺我也。(《全元曲·邯鄲道省悟黃梁夢》)(代詞性複指賓語)

狀語趨於複雜，如：

(39) 母在家中，被嚴賊數十人以繩貫母掌驅劫而去。(《敦煌變文集》卷八)

(40) 呆霸王調情遭苦打，冷郎君懼禍走他鄉。(《紅樓夢》第四十七回)

(41) 我本鄆城小吏，身犯大罪，蒙衆兄弟于千槍萬刃之中，九死一生之內，屢次舍著性命，救出我來。(《水滸全傳》九三回)

(42) 被玄女娘娘將照妖寶鏡空中懸起，照破原形，使他變化不能，就著雷部登時震死，以全白猿神石壁之誓。(《三遂平妖傳》第四十回)

(43) 他自吃人在他跟前那等花麗狐哨，喬龍畫虎的，兩面刀哄他，就是千好萬好。(《金瓶梅》第二十回)

2. 與處置式、使令式等句式結合，如：

(44) 然人莫不有此心，多是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將這個心包了。(《朱子語類》卷十八)(“將”字處置式)

(45) 祝彪見莊兵走來報知，不敢回，直望扈家莊投奔，被扈成叫莊客捉

賓語，賓語與主語的關係是並列關係；隸屬性賓語，賓語或是主語所領有，或是主語的一部分；複指性賓語，賓語是主語的複指，可以是代詞性複指，也可以是名詞性複指。

了，綁縛下。（《水滸傳》第五十回）（使令式）

（46）到了這裏，又蒙安老爺、安太太把他配給隨緣兒，成了夫婦。（《兒女英雄傳》第二十二回）（“把”字處置式）

（47）彼時蒙兄長著小弟同張清往高平療治他。（《水滸全傳》九八回）（使令式）

（48）叫你鬼混的著薑爺家把親都退了，你還說這個？（《醒世姻緣傳》第四十六回）（“把”字處置式）

（49）我只一雙紅睡鞋，倒吃小奴才將一隻弄油了，那裏再討第二雙來？（《金瓶梅》第二十八回）（“將”字處置式）

綜上，“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在產生過程中具有規律性，在發展與成熟階段也具有規律性，謂語結構的複雜化是語義豐富化、表達精細化的體現，也是“遭受”類來源被動句功能拓展的標志。

（三）“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演變的差異性

雖然“遭受”類來源的被動句有諸多相似的發展演變規律，但具體到“被/遭/蒙/著（著）/吃（吃）”這五個具體的被動標記上，其產生時間、發展演變、地域分布、語義語用等方面都略有差異。

首先，產生時間有次第。“被”表被動比較早，于先秦時已始，“遭”表被動大約在東漢時期，“蒙”表被動最遲在三國時期，“著（著）”表被動于唐代，“吃（吃）”表被動于晚唐。“遭受”類被動標記在產生時間上有先後次第，不乏同類化機制的推動。

其次，發展演變過程中成熟程度不同。“被”從先秦時產生，在中古逐漸成熟，到近代漢語“被”字句句式結構複雜化、自由化、多樣化，至今“被”字句依然活躍於現代漢語中。“遭”字句自東漢產生以來，在後續的演變中發展比較緩慢，在句式結構的精細化程度上明顯不足，比如“遭”字被動句謂語動詞比較單一，動詞賓語、補語的類型相對簡單，狀語成分基本為單音詞，可見“遭”字被動句的發展較為遲緩，現代漢語共同語中已然消失。“蒙”字句在唐代發展成熟，在明代達到鼎盛，句子結構複雜化、表達更為準確生動，但

現代漢語共同語中已未見“蒙”字句表被動了。“著（著）”字句跟“遭”字句類似，發展比較緩慢且不够成熟，晚清消亡。“吃（吃）”字句始于晚唐、發展于元明，消亡于清代，在“遭受”類來源的被動句中歷程最短。如果按照“遭受”類來源被動句句式結構的複雜化和精細化作一排序的話，大體應為“被>蒙>吃（吃）>遭～著（著）”。

第三，現代漢語中分布與留存有差異。“被”字句至今還出現在現代漢語共同語書面語中，而在方言中的使用并不普遍。“蒙”字句在明代使用場合逐漸擴大到生活中的各方各面，達到鼎盛，但在現代漢語中，不論共同語還是方言，均未見“蒙”字句表被動的情況。“遭/著（著）/吃（吃）”在現代漢語共同語中并不用于表示被動，但在方言中保留了被動的用法。寧夏固原話¹、湖南湘潭話²、四川成都方言³表被動用“遭”字句，施事可出現也可不出現；西南官話的四川話和雲南話，湖南的湘潭，湖北的孝感、宣恩、隨州，貴州的清鎮、赫章、遵義、貴陽，甘肅的龍迭（今舟曲）用“著”字句表被動，施事可出現也可不出現；⁴湖南隆回方言保留著“吃”字被動句，施事可出現也可不出現。⁵“遭/著（著）/吃（吃）”字被動句雖然在漢語史上已經消失，但在方言中還是保留了下來。

第四，被動語義再分化不是共性。“被/遭/吃（吃）”字句在宋代出現了分化，分化為表“致使”或者“原因”或者“強調”之義，在語義上繼續虛化，這種發展趨向與“遭受”類來源的其他被動句并不同步。

1. 致使義“被/吃（喫）”字句，如：

¹ 黃伯榮《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頁。

² 鞠彩萍《“遭”字句——兼論被動標記詞的界定與優勝劣汰》，《貴州大學學報》，2007（1）：119。

³ 崔榮昌《成都話音檔》，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頁。

⁴ 丁崇明、榮晶《昆明方言的“著”字》，《方言》，1994（4）：277；黃伯榮《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出版社，1996年版，第527頁；李海霞《四川方言的被動式和“著”》，《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94（1）：87-90；莫超《白龍江流域漢語方言語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頁；張一舟、張清源、鄧英樹《成都方言語法研究》，巴蜀書社，2001年版，第315-319頁；許寶華、宮田一郎《漢語方言大詞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5805-5815頁。

⁵ 盧曉群《湘語語法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頁。

(50) 不知意之所不備處，才有縫罅便被賊人來了。(《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一)

(51) 且喜姐姐，那棍子則是滴溜溜在我身上，吃我直說過了。(《全元曲·西廂記》)

“被/吃(吃)”致使義的出現，與其動詞“遭受”義和其使役式所表達的語義不無關係。遭受或承受了某種影響、結果與某條件致使某主體承受了某施事者發出的動作行為的後果，在語義上有相同之處，加上“被/吃(吃)”字句大多用來表示不幸或不愉快的事情，這種不幸或不愉快有可能導致另一情況的發生，由此分化出致使義來。

2. 原因義“被/遭/吃(吃)”字句，如：

(52) 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四)

(53) 三年之後，遭倭寇作亂，擄他到倭國去了。(《喻世明言》第十八卷)

(54) 吃我不肯，他便將手把我胸前抓得粉碎，那裏肯放。(《喻世明言》第三十八卷)

“被/遭/吃(吃)”經常處於原因分句的位置，緊接結果小句，“被/遭/吃(吃)”也就具有了表示原因的語法意義，被動關係詞具有連詞化的傾向。

3. 強調性“被”字句，如：

(55) 遠公當即不語，被左右道：“將軍實是許他念經。”(《敦煌變文集》卷六)

“被”字看似多餘，如果去掉，句子仍然成立。句子意念上大致是爲了敘述一種不幸或不愉快的事情，故意作出這種姿態。“被”字突出了主語的地位，強調了句子的視點，“被”字有無，直接影響句子的敘述重點。

最後，語用上分逆意和順意被動句。“被/遭/著(著)/吃(吃)”是以逆意爲主的被動句，如：

(56) 早被妻兒送墳塚，獨臥荒郊孤土堆。(《敦煌變文集》卷四)

(57) 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杜甫《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58) 沈鏈謗訕大臣，沽名釣譽，著錦衣衛重打一百，發去口外為民。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59) 原來我的丈夫也吃這廝殺了，又連累我家二姐與那個後生無辜受殺。(《錯斬崔寧》)

“蒙”是表順意為主的被動句，如：

(60) 小子乃垂死之人，得蒙公公救拔，實再生之父母。(《醒世恒言》第十卷)

“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在發展演變中逐漸形成了逆意傾向和順意傾向這兩種功能的分工和互補，這種分工和互補有利于語言的平衡，情感傾向更加明確。

三、結語

劉堅、江藍生所述，“大凡有‘遭受’義的動詞都有虛化為被動關係詞的可能。”¹以上考察，我們清楚地看到“遭受”類來源的被動句在產生過程、語序結構、語義關係和句型變化的相似之處。不僅漢語，侗臺語、苗瑤語族的壯語、水語也是“遭受”類來源被動標記“被”“遭”“挨”引入施事，表示被動。²石毓智引用 Heine 和 Kuteva 的著作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從 500 餘種語言中歸納出哪些語義特點的詞匯傾向於發展成哪種語法標記，結果顯示越南語、朝鮮語等被動標記來自動詞概念 suffer (遭遇)，它們著眼於受事者對事件的被動遭遇，從被動式的受事主語的角度看，某一事件的發生是一種被動的遭遇，即強調不是受事者按自己意志遇到的行為。³可見，“遭受”類來源的被動標記的發展演變，不只是漢語有標記被動句演變的一種方式，應該是世界語言被動的一種類型。

¹ 劉堅、江藍生《近代漢語虛詞研究》，語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頁。

² 黃行、唐黎明《被動句的跨語言類型對比》，《漢語學報》，2004（1）：16-22。

³ 石毓智《被動式標記語法化的認知基礎》，《民族語文》，2005（3）：14-15。

參考文獻

1.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2. 石毓智、李訥.《漢語語法化的歷史——形態句法發展的動因與機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3. 黃伯榮.《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青島出版社,1996年版
4. 崔榮昌.《成都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 莫超.《白龍江流域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6. 張一舟、張清源、鄧英樹.《成都方言語法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版
7. 許寶華、宮田一郎.《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
8. 盧曉群.《湘語語法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9. 劉堅、江藍生.《近代漢語虛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年版

A Study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Passive Markers of Chinese Meaning Caoshou (Suffering)

ZHENG Hong

(School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assive markers of 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have a regularity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of *bei* (被) / *zao* (遭) / *meng* (蒙) / *zhuo* (著/著) / *chi* (吃/喫) +V and *bei* (被) / *zao* (遭) / *meng* (蒙) / *zhuo* (著/著) / *chi* (吃/喫) +N+V are the key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verbs into passive markers. Although there are slight differences in maturity, extinction,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semantic pragmatic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y are similar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attern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s of passive markers of 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languages, passive markers derived from 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are a distinct type.

Keywords: Meaning of suffering; Passive sentence; Generalization; Assimilation

投稿日期	2023. 9. 6	審查日期	2023. 10. 9	刊載日期	2023. 12. 28
------	------------	------	-------------	------	--------------

全球化時代下跨文化教育的實施

——兼論學校教育中的跨文化能力

高 帥¹

摘要：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教育面臨著重要的挑戰和機遇。全球化與教育密切相關，它要求我們培養學生具備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全球視野，以適應和參與全球化的發展。跨文化交際能力主要體現在對不同文化的瞭解與尊重，並能與人進行有效的交流與協作。國際視野意味著學生能關心國際事務，並能主動地參與解決相關問題。在學校教育中進行跨文化學習，一方面可以促進不同國家和民族的融合；二是旨在培養學生具備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全球視野。在此基礎上，結合文化背景和學生對文化觀念的差異，建立了新的跨文化能力的培養模式。

關鍵字：全球化；跨文化能力；學校教育

儘管跨文化能力的培養是跨文化教學的根本目的，但目前的相關研究很少涉及到在基礎教育階段進行跨文化訓練，更多的是借鑒了布魯納提出的“所有的知識都可以通過合適的方法傳授給每一個學生”的教學模式。但是，由於學校教育中的跨文化背景不同於成年人，而且學生的心理發育也存在著與成年人不同的特點，所以本文將對不同教學模式在跨文化訓練與跨文化教學中的異同進行比較。

一、跨文化培養基於學校與基於培訓的共性

在培養學生跨文化能力方面，以訓練為基礎的學生與以學校為基礎的學

¹ 作者簡介：高帥，碩士，全南國立大學博士在讀，研究方向：教育管理、文化經濟等，郵箱：289103353@qq.com

生之間存在著一些共性。不管是在跨文化訓練中的跨文化能力，還是在學校教學中，都需要面對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個人怎樣才能在不同的環境中化解由于文化差異而產生的誤會與衝突，從而對自己進行心理調節，進而達到與別人的有效交流。其中教師、學生和家長在學校教學中進行的跨文化磋商就顯得尤為重要。從跨文化教育共性基礎問題出發，在學習過程中，既能適應多元文化環境，又能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有效溝通，進而能保持自身的正面身份。那就是，不管是跨文化訓練，還是學校教學，都是以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雙方進行平等的互動作為根本目的，從而使工作能夠更好地完成。¹

其次，跨文化素質的形成是由一些基本元素組成的。儘管不同的跨文化能力模式在構建方向和組成元素上都有差別，因此對於不同的元素也有不同的分類。但其共性是包含了知識、情感和認知等因素，并可歸納為具有相似性的基本成分。目前，國內外學者對跨國人才培養模式的探討大多基於教科文組織、歐洲理事會等正式文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身份是最重要的。研究表明，維持正面的自我意識對個人的認知、情緒和行為具有重大的影響。在跨文化背景下，由于文化差異，個體會對自己進行再認知，並且這種持續的再認知會與原有的自我概念發生矛盾，所以，保持積極的認知狀態是學校和成人教育跨文化能力的核心內容。²

二、跨文化培養基於學校與基於培訓的不同

由於學校教育環境及學生個體的差異，以訓練為基礎與以學校為基礎的教學方式之間有很大差別。

學校教育中的跨文化能力培養面臨的外部環境與跨文化培訓的有差異。跨文化培訓是一種以企業人力資源部為主導，成人為培訓物件，與特定的工

¹ 吳霓等. 中國民族教育發展報告 [M]. 北京: 教育科學出版社, 2013:121-122

² 王鐵. 跨文化教育的內涵、意義和原則[J]. 中國教育學刊, 2012(6):25-26

作計畫任務相結合的一種教育方式，因此，在構建跨文化素質模式時，沒有太多地顧及到組織的外部環境，也沒有對所有的雇員進行培訓；但是，在學校教育中，學校所面對的外部環境，主要有政策環境、社會環境和與學校本身的社會環境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些因素共同組成了培養學生跨文化能力的外在環境。另外，在學校教學中，因為要把跨文化能力培養成可以適應多元文化社會的公民，所以，在學校教學中，對跨文化能力的培養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說，跨文化能力是每一個學習者都需要具備的能力。

學生因其認知發展的不同，其學習能力的側重點也各不相同。正如上面提到的，在學校裡進行的跨文化能力的訓練主要針對的是青少年，而青少年正處在身體和精神發展的早期，他們的心理還沒有充分地發育，他們的可塑性非常大。從文化學習的角度來看，因為青少年正處在社會化的早期階段，他們的價值觀在多元化的社會中逐漸地形成，同時也受到了不同的文化的影響。另外，在青少年自己的學習和社交活動中，也產生了新的文化內涵。所以，在學校中建立跨文化能力模式，既要考慮到青少年的心理發展水準，又要考慮到其社會化的進程。¹

其次，在國際社會中，我們應該把學生培養成一個有能力進行跨文化交流的人。這裡的不同之處就是，把跨文化能力作為公民核心素養的根本內容，這是需要學生通過學校的學習，來使其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中，能與文化的多元化相適應，所以，在學校教學中，跨文化能力的構建呈現出一種泛化的特點，也就是在構建模式時需要對情景因素進行泛化，這就導致了在學校教學中進行跨文化能力的培養存在著行為主義的傾向。另外，在以學校內的跨文化互動為基礎的情況下，進行跨文化交流的訓練，就需要在教學過程中考慮到跨文化衝突這一基本特點。

最後，在學校裏，要把跨文化能力和其它科目的能力結合起來。在現代社會中，以學科結構為基礎進行教學內容的組織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學生的跨文化能力必須與學科能力的培養緊密地聯繫起來。這一

¹ 徐試艷，玲文化教育發展階段與問題研究[J]．比較教育研究．2013(9):18-23

方面是由于在學校的各種學科中，在主要的知識、態度和技能上，還蘊含著跨文化能力的基礎元素。¹例如，在外語、歷史和地理甚至自然科學中，都包括了與文化的差異相關的內容，例如，在各個地區、各個民族的文化傳統、風土人情等方面的介紹；另一方面，由于現代的學習理論提倡合作學習，因此，跨文化能力所要求的各種技能等也可以通過學科學習而得以發展與提升。

三、學校教育中跨文化能力的外部因素

學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不同的文化所影響，當不同的文化族群生活在同一社會背景下時，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各種文化之間的衝突與融合，而學習者就是這個過程的載體。在這個多元化的社會背景下，個人的社會化不可避免地會被不同的文化所影響。與此同時，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持續革新，新的文化現象和意義也在不斷地產生，並對個人的行為產生著影響。這樣，學生就會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進行實踐與思考，從而產生自己特有的體驗與習慣。在此基礎上，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的文化或民族之間的聯繫也會對學生的身份產生影響。在多元文化的社會裡，學生生活在不同的團體、民族之間，擁有多元化的團體認同，因此，他們擁有多元化的身份，並且在這種認同的作用下，還會不斷地改變。在這樣一個多文化的背景下，個人對於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及自尊，自信等情緒的定義，都是在這樣一個多元文化背景下形成並發生改變的。

學校教育體系自身對跨文化能力的培養有著重要的作用，而這是教育的結構性因素。文章在前兩章中就學校教育制度對於跨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進行了分析，也就是說，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環境下，當社會制度與社會生活中出現了不滿與歧視的時候，學校教育系統若照搬這一社會制度，很容易會帶有文化偏見，就會給邊緣化人群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還有，就是入學的

¹ 莊勝義．經由世界走出我們的路：人的反身性與社會流動[J]．當代教育研究．2010(18):156-159

機會。不同文化間的教育必須保證其它民族的孩子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這就意味著，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其它民族學生不會因為他們的特性而失去機會，他們應當和其他孩子一起學習，而不是單獨開設專門的學校，同時也要避免強調兒童的特性差別。換句話說，就是要為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提供跨文化交流的機遇，這樣，既可以保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獲得同等的學習機會，又可以使學生在交流中學會跨文化能力。¹

四、學校教育中跨文化能力的主要構成

從態度上看，可以分為容忍、尊重、開放性和共情。寬容是一種對不同文化的包容，是指在面對不同的行為、觀點或其它不同的時候，要以包容的心態對待，包容也包含了對不確定因素的包容。以容忍為前提，尊重不同的文化差異；其次，要對由文化差異引起的行為與看法持開放的心態，開放性也就是對跨文化交流的好奇，這是進行跨文化交際的動力；這就是換位思考。

在學校教育的進程中，在學校與所處的社會的互動中，普遍存在著對其它文化的態度，例如，在受教育者與父母、受教育者與老師、受教育者之間的互動中，彼此對他們對方文化差異的看法，這就是非正式教育與正式教育的互動，儘管這篇文章主要討論的是正規教育，但如果將正式教育與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聯繫起來，那麼非正式教育就會對教學的內容與效果造成深遠的影響。容忍的意義主要是因為，在跨文化交往的過程中，個人首先會經歷一種認知衝突，也就是，對於自己不熟悉或者不適應的文化現象，會從一開始就有一種排斥的感覺，這就要求學生養成一種文化相對論的態度。另外，在跨文化背景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經驗模式都沒有用武之地。因此，人們經常會對自己產生質疑，從而使自己處於一種不確定的狀態，從而產生一種不知所措的情緒，從而引起壓力、自尊下降等心理問題，從而失去對自己的認同感。因此，對不確定因素的容忍度是跨文化交際的一個重要組

¹ 張雪雁．主體性視域下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建構邏輯[J]．民族研究．2014(6):22-34

成部分。

正如上文所述，“共情”是一種在跨文化交際中對自身的文化理念與行為進行換位思考，並由此而產生的文化批判意識。本文認為，文化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種實踐過程與成果，它通過無意識地作用於人們的思想與行為。所謂慣例化的個人實踐行為的建構，是指一個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經由不同文化的交往，他才能認識到他的思想與行動的文化要素，所以，不同文化對個人文化的自覺生成起到了催化作用。換句話說，就是可以對自己的文化理念和行為進行再理解與改變。許多學者也認為，移情也可以促使自己的文化意識的覺醒，從而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共情可以幫助建立跨文化能力理論，也就是在反思自己的文化時，通過對自己及他人已有的文化概念與行為進行自我反省，從而達到消除不同文化間的誤會與衝突的目的。

共情需要以容忍，尊重和開放為基礎。不同文化的人對同樣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在同樣的情況下，對同樣的事情會有不同的認知與行為，而共情能力需要在意識到文化差異的前提下，既能對另一種文化的理解，又能從另一種文化的角度來思考自己的文化背景。只有在培養共情能力的同時，才能培養出個人的文化批評意識。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很有可能會出現個人的自我身份的混淆甚至丟失，比如說，在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他們對彼此的文化理念完全地接受，完全地模仿另一個人的行為，最後造成了言語和行動上的失誤，所以，要想培養共情能力，就必須具備一種文化的批判意識，也就是既要能接受文化差異，又要保持積極的自我身份。

由于跨文化交際是以文化為基礎的，所以學生必須要有相應的文化理論，但這種抽象的文化理論適合於學生的認知發展層次。從文化理論與文化差異、文化與個人、團體之間的關係等層面來看，這些層面的知識是不同的。它們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聯繫，但它們的學習順序卻會因學習者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首先，我們必須對“文化”有一個全面的瞭解。在許多關於多元文化教育甚至是跨文化教育的討論中，文化被認為是某個團體所共有的特

性，這種文化觀表現在對文化結構的理解上。如果說人類學中的文化是某個團體的表現，那麼大部分文化觀都沒有考慮到個人的主動性，容易被困在本質主義的泥沼之中。所以，對文化的理解，不僅是由外部因素所決定的，而且是由參與者自身的實際互動所產生的。文化包括了諸如衣食住行等外部的、可見的內容，同時也包括了那些經過接觸就能感受到的內容，比如風俗習慣等。而且，還有一些更深層的內容，例如，價值觀念等，它們都對人們的認識和行為產生了影響。¹

對文化差異的認識，首先需要對世界各地的文化差異狀況以及有關文化差異的理論有一定的認識。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各個學派的研究成果都是針對不同族群的文化特點進行的。毋庸置疑，當個人生活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裏，文化差異無處不在，而這種誤解往往會導致種族或族群的歧視、誤解與衝突。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往往把文化差異看作是族群間的基本差別，從而產生了自己的不同文化身份。正如前面所說的，“自我”與“他”同時被“刻板化”，“文化差異”也被“內在化”了。所以，學習文化差異有關理論時，要使學習者意識到其本質主義的圈套，認知應當分層處理：從宏觀角度看，由于社會風俗與傳統的交往方式，在不同的地域中，存在著不同的文化背景，這些差異可以用文化差異的框架來刻畫。事實上，許多跨文化心理學的理論試圖揭示出不同地域，尤其是各國的文化差異。從宏觀層次看，同一片地域中的各種文化處於持續的互動之中，相互轉移，借用，融合，表現為不同族群間的文化交流；從微觀角度看，個人由于受到不同的文化環境的影響而產生了獨特的實踐自覺，它不僅與個人的成長經歷、社會關係密切相關，而且與個人的文化環境密切相關。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化的不同。

¹ Bennett, J., and M. Bennett (2002).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global and domestic diversity. In *The diversity symposium proceedings: an interim step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practice of diversity*. Waltham, MA: Bentley College. Also in Landis, D., J. Bennett, and M. Bennett (eds) 2004. *The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training*, 3rd ed, 147–65

從文化、個人、團體的關係來看，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文化不僅是一種結構，也是一種動態的現象。它不僅是一種外部的結構，更多的是它塑造了個人的理念和行為，這種結構性的特點使得文化是一個團體的表現，也就是一個群體的顯著概念。與此同時，由於時間與空間的擴展以及個人社會關係的複雜，文化又是個人實踐的產物。所以，在這一惰性的學校教育中，學習者的跨文化交流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化。在這個過程中，學習者必須認識到文化這一群體的存在，以及各類媒介對不同文化的表現形式，並從中挖掘出隱含的權力關係。同時，處在文化多樣性社會中的個體，其社會化過程是多元文化影響的過程，換言之，個體受到諸多文化的形塑，在其社會交互過程中形成獨特的實踐意識。個人在社會關係中的持續產生新的含義，這種新的含義是不斷擴充與建構的，這種重新建構使得它呈現出結構性的特點。所以，在學校教學中，學生所掌握的有關文化的知識，主要是指文化與個人、團體的關係。

在特定的跨文化背景下，人們需要掌握多種技巧來解決不同文化間的衝突。解釋技巧來源於跨文化交際中的語境，簡單地說，一個人可以判斷另一個人的行動意義，這是他作出適當行動的先決條件。在跨文化背景下，人們所處的環境與他們的生活方式迥異，這就導致了誤會與衝突的發生。所以，在進行跨文化交流時，光靠學習文化知識還不夠，不能依靠學習某種特殊的文化來獲取確切的感覺，也不能用來處理複雜的跨文化情景。因此，學習者必須具有對不同文化環境下的行為進行解釋的能力，也就是說，他們可以意識到，在相同的情況下，不同文化的人的言行可能會與自己不同，而要想瞭解巧合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就必須要經過很多次的跨文化接觸和磋商。在學校教學中，師生雙方都應該具備各自的解讀技巧，這樣才能弄清楚另一方行為背後的真實目的，比如，學習者對某個問題的答案，是否有得罪了該老師，還有，在師生之間的交流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都需要解釋技巧。

自我管理技巧是一種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進行的一種心理調整，它主

要針對由于不確定因素而產生的心理緊張、焦慮以及對自我身份的困惑。在當代，個人正處在多重文化認同的矛盾中，面對著自身身份的兩難境地。在日常的學習與生活中，如何維持較高的自尊，就是個人的自我管理技巧。在學校跨文化交流中，維護積極的身份，本質上就是一種自我持續反省的過程，這一能力首先體現為基於對文化差異的認識，認識到自我與他人之間的差異，以及通過對文化的解讀，維護自身的自尊。換句話說，在跨文化背景下，日常生活中的習慣化行為會遇到一些誤會甚至是貶低，這種情況下，對個人的自我評價肯定會有影響。另外，作為一種文化認同，在不同的情況下會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因此，在進行跨文化交流時，如何通過反省來建構自己，應該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在學校教育環境中，學習者與老師、學生的互動會逐步建立起學生的身份，在這個過程中，學習者能否充分地表達自己，並且接受別人，這是其身份識別能力的重要因素。

五、學校跨文化能力對跨文化融合的影響

對於跨文化教學來說，態度是一個基本的因素，因為寬容、尊重文化差異，並願意接受文化差異，這是學習跨文化知識與技能的先決條件。多年來，多元文化教育一直試圖達到的一個根本目的，就是要以公正的態度看待不同的文化，從而在日常的跨文化交流中，促進不同國家和民族的融合。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產生偏見與歧視的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文化處於持續的變更和發展之中，在這個時候，文化基本上就等於是一個文明，也就是說，無論一個人是什麼人，它的文化要走上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也是西方工業文明自我發展的最高形態。但是，在工業文明的統治下，非工業文明的文化就成了下等文化，而那些生活在工業文明中的人，則往往占據著絕對的優勢，這就使得他們的文化取得了統治地位，從而導致他們對其他文化的歧視。第二，人類在認識系統中，對自己不熟悉的東西總是持有排斥的成見，這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正如中國古代社會，因其農耕文明而形成的文化心態，將周圍諸族視為尚待教化的野蠻人。而且，其他國家對外來的文

化也是如此。

在多元文化的社會裏，若普遍存在著偏見與歧視，而當邊緣人群的自我意識被喚醒時，就會導致不同種族間的互相融合。換句話說，在我們的種族主義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各個種族都把自己的種族當成了其他種族，從而互相排斥，並因為各種族的優勢地位不同，而把少數民族放在了弱者的位置上。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跨文化能力的融合效果在這裏就體現在，第一，通過對所有學生的文化差異的培養，從而向我族中的宗族、主義等觀念告別，告別單純地將別人分類的陳規定型觀念，讓整個社會的所有公民都在互相尊重的氣氛中。

同時，在學校教學中加強跨文化交流，也是一種文化內涵互生的過程。也就是說，要成為學校教育的主體，需要融入進學校的課程和教學活動中，學生自己也在其中。它的重要之處就是要消除由於文化差異所造成的異化。此即歐洲委員會的《跨文化對話白皮書》宣導所謂“我們”之間的對話的原因。換句話說，通過對跨文化能量的訓練，就可以消除由於文化差異導致的學習者之間的社會排斥。在學校教學中，通過學習不同的文化技能，消除了學生與社會團體、主流與弱勢群體的二元對立。¹

六、培養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學生

培育跨文化潛能以達到民族融合，反映了公民融入的理念，把跨文化能力視為每一個學習者必須具備的素質。這一點體現在 OECD 關於“公民重要能力”的定義中，它體現了在異質性團隊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成員進行協作的的能力。這表明，跨文化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將來的國民所必須具備的品質，在學校教育中應該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除上文所述的處理全球化造成的全球異質性的挑戰外，還應使其成為一名公民必須具備的一項重要能力。也包含了提高民族凝聚力的意願。²面對文化多元化的問題，大多數國

¹ Gergerl.K.J(198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3).

² Prue Holmes(2004). Negotiating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家都在上個世紀推行了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但是，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一方面促進了人們對文化平等的認識，另一方面也加強了少數民族的民族認同感，在多元文化教育視域下，過于強調少數民族群體認同，以“以質為本”的文化理念為其理論依據，從而導致了民族的分化。然而，跨文化研究却更多地站在個人的視角，重視文化的結構差異，同時也重視演員對文化的認知與解釋，即不同種族的不同成員間的相互作用。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在學校教育背景下，跨文化能力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會被政治因素所影響，比如邁克爾拜納姆在他的跨文化能力理論框架中，就把政治教育和文化批評兩個概念放在一起，作為跨文化能力的核心。跨文化交流的政治要素應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要使學生對自己的祖國有一種認同感。在多元文化的社會裡，每一位公民都擁有著多元的文化身份，而這種多元的文化身份對於他們自己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會影響到宏觀上的社會，比如在日常的社會互動過程中，它對所居住的區域造成了怎樣的影響，也就是不同的文化群體能否和諧相處。從民族的角度來說，在進行跨文化交流時，最重要的一個政治問題就是國民的多元文化身份是否會減弱。過度強調民族認同的多元文化教育弱化了國家凝聚力，因此，培養跨文化能力需要國家認同被關注，通過對所在國家的歷史、地理和國家標志等進行，自然，這些內容也要與國家的少數群體問題相聯繫，強調各民族對國家的卓越貢獻和各民族間的平等地位，從而可以在國家認同的基礎上，擔負起國家的應盡職責。¹

其次，對人的權利概念持一種普遍性的人權觀。多元文化教育最突出的問題之一，就是過于強調文化的相對性，從而導致一些少數民族，尤其是婦女地位相對較低的群體，因為他們的傳統，侵害了其成員的權利。而要想培養跨文化能力，就必須以普世的人權觀念為前提，提倡民主和平等等政治價

Ethic Chinese Students in a New Zealand University[J].Busine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ume 67, Number 3,September, 294-307.

¹ 吳大品 . 中西文化互補與前瞻——從思維、哲學、歷史比較出發[M] . 徐昌明，譯 . 北京：海 洋出版社，2014:198

值。這就是要尊重不同的文化，要尊重人權，促進民主與和平，等等。要培育具有較高層次的跨文化能力的國民，就是在尊重不同文化的基礎上，批判地審視自己及其他國家的文化，從而達到民主、平等和尊重人權的目的。

最後，要把跨文化能力和學生意識結合起來。由于跨文化能力的重點在于適應多元文化社會的能力，它可以融入到國民的參與能力中，也就是可以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可以在各個社會中進行廣泛的交流，可以批判地思考自己和別人的思想和智慧，從而建設一個民主和諧的社會。

結 語

跨文化教育的目標是通過教育來提高學生的跨文化素質，達到文化融合與培育的目的，從而達到在全球化時期對公民的要求，所以，培養跨文化能力是跨文化教育的根本目的。要實現跨文化教學由理論到實際的轉化，就必須在理論與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適合于教學內容的跨文化教學模式。現有的多種測量方法都是基於這種方法建立起來的。所謂“跨文化交際”，就是指個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能夠有效地進行交流的能力。儘管跨文化能力的研究已經進行了將近半個多世紀，但對其的探討却是近幾年才逐漸升溫，至今仍未形成統一的界定。

由于對跨文化能力的理解存在分歧，再加上理論觀點的不同，人們構建了多種跨文化能力的模式。外語教學的取向主要有交際適應型、外語教學型和綜合型。前者側重于跨文化交流與適應，後者側重于語言教學。以迪爾多夫為代表的一體化定向，其目的是從各種不同的跨語文能力模式中，總結出比較公認的跨文化素質的組成成分。整合導向的跨文化可為模式指明各因素間的聯繫，並將其融入到教學過程中。

在基本問題、目標指向和基本元素上，學校教育中的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訓練具有共同之處，但是，由于學校教育是一種特殊的領域，它所面向的物件也是不同的。在這一背景下，筆者就如何培養學生的跨文化素質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在學校教育中，通過培養不同文化間的能力來達到社會融合的目的。

參考文獻

- [1] 吳霓等. 中國民族教育發展報告 [M]. 北京: 教育科學出版社.
2013:121-122
- [2] 王鐵. 誇文化教育的內涵、意義和原則[J]. 中國教育學刊.
2012(6):25-26
- [3] 徐試艷. 玲文化教育發展階段與問題研究[J]. 比較教育研究.
2013(9):18-23
- [4] 莊勝義. 經由世界走出我們的路: 人的反身性與社會流動[J]. 當代教育研究. 2010(18):156-159
- [5] 張雪雁. 主體性視域下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建構邏輯[J]. 民族研究.
2014(6):22-34
- [6] Bennett, J., and M. Bennett (2002).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global and domestic diversity. In The diversity symposium proceedings: an interim step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practice of diversity. Waltham, MA: Bentley College. Also in Landis, D., J. Bennett, and M. Bennett (eds) 2004. The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training, 3rd ed, 147-65
- [7] Gergerl.K.J (1985).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J].American Psychologist, 40(3).
- [8] Prue Holmes (2004). Negotiating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thic Chinese Students in a New Zealand University[J].Busine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ume 67, Number 3, September,294-307.
- [9] 吳大品. 中西文化互補與前瞻——從思維、哲學、歷史比較出發[M]. 徐昌明, 譯.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4:198

Implementation of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On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in School Education

GAO Shuai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education is facing importa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Globaliz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education, which requires us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a global perspective to regulate and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i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ommunicating and collaborating effectively with other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means that students can care about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lving related problems. Cross-cultural learning in school education ca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ethnic groups. The second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On this basis, a new model for cultivating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has been established by combining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tudents'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concepts.

Keywords: Globalization;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School education

投稿日期	2023. 9. 6	審査日期	2023. 10. 9	刊載日期	2023. 12. 28
------	------------	------	-------------	------	--------------

Evaluation of Factors Affecting Transportation Mode Sel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Yeosu

Okafor Cajethan Onyekachi¹ ZHU Xinyuan² CAI Qinyuan³ Chang-
Hyun Kim⁴

(Department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South Korean)

Abstract: Transport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means of movement for passengers and goods in many nations. As the population of an urban area continues to grow, the demand for affordable and accessible transport systems grow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nsportation mode selec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s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in South Korea, focusing on Yeosu City.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afety of transport mode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when selecting transport modes, followed by speed and convenience. The cost of transportation was the least factor considered by the students. Taxi is the most preferred transportation mode followed by bus, private car, bicycle, and scooter as the least preferred transport mode.

Keywords: AHP, Transportation, Mode choic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uth Korea

¹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cajethan.okafor@futo.edu.ng.

²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zxiny20@gmail.com.

³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820918415@qq.com.

⁴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chkim@chonnam.ac.kr.

1. Int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means of movement of passengers and goods in many nation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links between countries. The transportation mode choi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perience. Over the years,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demand for public transport systems here in Yeosu and other cities like Seoul and Busan in South Korea, with a high population of foreigners. As the population of these areas continues to grow, the demand for affordable and accessible transport systems grows. Transport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to consider while studying abroad with factors such as food, clothing, and shelter.

South Kore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hubs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as a country with a high level of education, it has attracted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study abroad.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outh Korea, as of 2022, South Korea has about 166,892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k, J., The Korea Herald, 2023). So, the choice of transport modes and movement of students is very important in a country such as South Korea,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owever,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or transportation mode selection is critical and depends on personal preference. Moreov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South Korea noted that the Korean Government plans to attract more than 300,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next five years,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South Korea understand the transportation preferen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or reference in formulating relevant policies, promoting the academic and living experien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country especially in Yeosu.

Yeosu is a beautiful coastal city and thousands of foreigners visit there for sightseeing. It is a dynamic community home to diverse individuals of varying backgrounds, lifestyles, and interests. Although Yeosu is not as well-known as bigger cities, it has a lot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foreign workers. There are, however, different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 here in Yeosu to soothe the individuals' transport modes selection. These several modes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such as buses, taxis, trains, scooters, ferries, individual cars, and effective paths for walking and cycling, are for the effective movement of residents and visitors traveling within the city. So, choosing the appropriate and sustainable mode of transportation is crucial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other individuals in the city for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One of the crucial variables to consider when aiming for a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s understandi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mmuters' mode of transportation choice,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nations where this is still a relatively new idea (Mayo & Taboada, 2020).

Notwithstanding, there have been many changes in transport demand patterns. These changes result from system changes in several modes and are being extensively monitored by transport system providers, and once the environment changes, transport system providers always adjust (Sunduck et al., 2005). There is strong competition in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nd travelers have higher expectations for quality and safety (Chou & Kim, 2009). Because the need for mobility in daily life is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to meet up with a series of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places (De Witte et al., 2013). Furthermore, the continuous changes in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here in South Korea have also significantly impacted individual car ownership, which has increased over the past decades. According to Pucher et al. (2005), in 1970, there were only a few automobiles per 1,000 people in Korea, but by the 1990s, there were 215 cars per 1,000 people, and this caused serious traffic congestion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in the use of private cars, particularly in the major roads connecting rural areas and the central cities. Seok-min (2022, April 13) noted that as of March 2022, the nation of 52 million people had 25.07 million cars registered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continuous efforts by the Korean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communities to improve public transportation, which

is essential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ities, quality of life,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of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They formulate numerous welfare policies to make life easier and attract foreign talents. In formulating welfare policies, providing more convenient facilities, especially a good transport system suitable for citizens, loca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foreign workers, can encourage these individuals to live and work locally. This approach can increase the local popula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g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ause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mes of transport and level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Owen, 1959).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build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n a city is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including walking, cycling,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Ko et al., 2019). Seok-min (2022) reports that more than 1.25 million eco-friendly cars will be registered here in South Korea in 2022, which is 5% of all new car registrations. This is part of the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air quality by reducing gas emissions and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as the population increases.

Over the years, Yeosu and others in South Korea have expanded in economic and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Pucher et al. (2005) noted that rapid economic expans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freight and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According to them, the use of buses increased as Seoul expanded in the 1960s, 1970s, and early 1980s but fell significantly from 1985. Nevertheless, many students and individuals now drive personal cars in many instances. Hence, using private transportation modes might replace public transportation even though it causes higher CO₂ because there is no direct market competition for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provider (Alkharabsheh et al., 2019). This is the same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terms of transport modes choice. Danaf et al. (2014) noted that private cars are frequently used due to the slowness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affordable parking, often costing \$2 to \$4 a day in the center of Beirut. So,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private car ownership in South Korea, many people may tend toward owning a car as the years pass.

This study, therefore,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hoice of transportation mode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Yeosu region by sampl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Yeosu Campus in South Korea. By conducting in-depth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ransportation selectio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wit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transport needs and preferences, we provide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the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institutions to improve the transportation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nhance their satisfaction, and further promote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addition, to create a better travel environment and experienc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Yeosu part of South Korea.

2. Literature Review

Although there seems to be limited literature on passenger travel mode choice, some transport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experts have shown much interest in understanding the mode choice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a passenger's choice while selecting a transport mode. For many students, deciding on the different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is very important and entails considering significant factors influencing passenger mode selection. Many researchers have noted that different factors influence the mode choice of passengers, ranging from comfort, cost of transport, time of travel, safety, gender, and income level. According to De Dios Ortúzar & Willumsen (2011), the effects of qualitative factors like comfort, convenience, safety, and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demands of the driving task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other activities are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factors in travel even though they are more difficult to measure.

Mayo and Taboada (2020) seek to identify which factors and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are prioritized in the Philippines according to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groups and travel-related characteristics; they noted that public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affordability, and service quality may influence

mode choice. At the same time, Alkharabsheh et al. (2019) observed that quality aspects and accessible, fair pricing are often the main factors driving demand for transport services. However, Ko et al. (2019) explored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choice of transport modes, such as walking, cycling, and public transit in Seoul. They noted that the mode choice of transportation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income, occupation, gender, and residence duration of passengers. They further stat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ip maker, the trip'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ransit facility were recognized to impact mode choice.

Lee (2018) noted that different cities have different most competitive advanc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modes (APTMs); in their study, Light Rail Transit (LRT) was the most competitive option for the Metropolis-style city, while Bimodal Tram (BT) was the best option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Regardless of the type of city, Korean experts rated Bus Rapid Transit (BRT) as the least competitive APTM. However, there are many cities where individuals avoid using public transport. Masoumi (2019) observed that in the MENA region,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are the main reasons individuals avoid us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He noted that to transition from individual car use to more active and sustainable modes, the reasons behind mode choice can be significant for decision-making and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Modal choice is unquestionably a complex and diverse concept, due to this intricacy, researchers frequently streamline their methodologies and modify their techniques to the circumstance they seek to explore (De Witte et al., 2013). Arbués et al. (2016) tried to determine the chance of selecting a private automobile, bus, or train as the mode of long-distance transportation, but it varies based on the traveler'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t the regional level. Their study shows that the choice of long-distance mode i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raveler characteristics, trip characteristics, cost of using transport modes,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Furthermore, Kim et al. (2021) look at how COVID-19 affected people's perceptions of metropolitan areas and their choice of transportation. Their study reveals that intrinsic utility or risk

perception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in understanding why people choose travel modes. They contend that choices in terms of travel mode were altered b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at caused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In the research of Danaf et al. (2014), which modeled the travel choices of students at a private urban university in America, they observed that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mode choice are determined to be travel time, cost, income, auto ownership, gender, and housing location. The models were used to anticipate students' commute mode shares under alternative scenarios and to assist in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ies that would encourage students to switch to more sustainable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they suggest raising parking costs and reducing bus wait times by offering shuttle services or cab sharing could be effective ways to encourage AUB students to switch from driving to taking the bus or other forms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addition, Eluru et al. (2012) examine how passengers choose their mode of transport and 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various transit options in Montreal affects route decisions for transit passengers. Responses from students, employees, and faculty members indicate that factors such as journey time, the number of transfers required, walking distance, and the amount of time spent waiting for them a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endency of individuals to use public transportation. Furthermore, the choice of travel mode shows that fewer transfers between transit route choices will provide the most benefits, and shorter transit mode travel times will improve the share of transit users.

Al-Moherz et al. (2016) also considered travel time, price, comfort, and reliability as the four factors. They empirically investigated transportation passengers' decisions to ascertai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and weights of various factors. The model was based on comments from 56 passengers who participated in formal interviews. According to the study's findings, reliability, travel time, travel expense, and comfort are the factors that have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passengers'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primary criterion. Kashifi et

al. (2022) predicted the travel mode choice with interpretable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and their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factors such as trip distance, travelers' age and annual income, the number of vehicles or bicycles they possess, and trip density a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that affect their choice of travel mode. The findings can be applied to more accurate modeling an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ravelers' preferences for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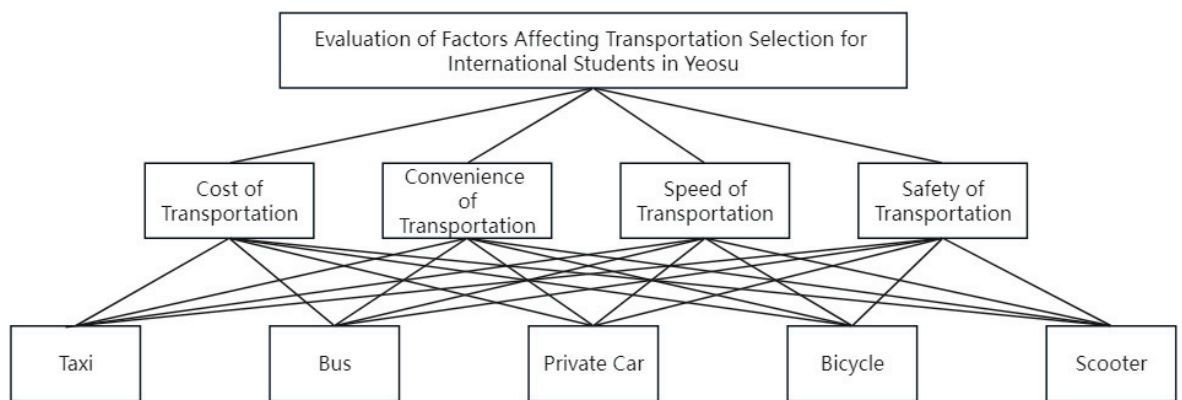
Yanar (2023) aims to comprehend passengers' choice of sustainable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Thei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a wide range of factors influences modal choices; the causes vary by place, so the policy responses in each area should vary. In recent years, private car ownership ha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as years come by. Many prefer to use their private cars for journeys at one point or the other. Most polluting emissions are caused by private vehicles; hence, it is critical to comprehe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eople's decisions to use their automobiles or other,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orms of transportation (Lanzini & Khan, 2017).

In their study, Lee et al. (2019) examined how fundamental changes in behavior toward mass transit in Seoul, Korea, have been brought about by ICT advancements. To understand how the demand for private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depends on the amount of time, money, and availability of ICT, they analyzed it using the discrete choice modeling methodology. They noted that while mass transit had previously been seen as inferior to private transportation, many Seoul residents now prefer public transportation to private, which may be partly attributable to the improved frequency of mass transit services and the amenities they offer. Hence, governments in many urban areas, at one time or another, develop transit programs and plan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eople us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3.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nsportation mode choice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Yeosu area of South Korea. Specifically, we considered the cost, convenience, speed, and safety of transportation as first-level criteria, and correspondingly, the alternatives such as taxis, buses, private cars, bicycles, and electric scooters as second-level criteria, as shown in Figure 1.

Fig 1 First and Second Level Criteria for Transportation Mode Selection in Yeos's AHP Model



3.1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level criteria:

(1). Cost of Transportation:

This criterion reflects the economic cost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transportation mod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ten consider the expenses involved in transportation, including fares and fuel costs. Lower transportation costs may be more attractive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en choosing their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2).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This criterion measures the level of convenience provided by different transportation modes. It encompasses factors such as the availability of transportation options, flexibility in travel time, and the extent of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verag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y prefer more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modes.

(3). Speed of Transportation:

This criterion reflects the speed of different transportation mod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ypically desire efficient means of reaching their destinations, making transportation speed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ir mode choic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y favor faster transportation modes.

(4). Safety of Transportation:

This criterion assesses the level of safety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transportation modes. When choosing their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nsider their safety and security. They prefer transportation options that offer higher levels of safety and security measures. The safety of transportation modes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choi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3.2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is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ecision-making method (Wedley,1990). Many researchers have used it to determine the weights of factors in different aspects. Establishing criteria and determining their weight are crucial components of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hich decision-makers and researchers have frequently used to evaluate the alternatives (De FSM Russo & Camanho, 2015). It involves dividing the factors into interrelated hierarchical levels, creating a multi-level analytical structure (Saaty, 1994). By pairwise comparisons of elements at each

level, comparison matrices were constructed, and consistency tests were subsequently conducted to ensur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AHP results.

The AHP method first places the decision problem within a large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multiple factors that mutually influence each other. By conducting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s and ranking of these first-level criteria, we determined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ode choi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Yeosu area of South Korea. This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formulating targeted policies and measures. The final weights of each alternative we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various scenarios to support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3.3 The steps for determining weights using the AHP are as follows:

Construct the judgment matrix: The factors are compared pairwise to assess their relative importance. The goal is A, and the factors are u_i and u_j (where $i, j = 1, 2, \dots, n$). The values of u_{ij} represent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u_i compared to u_j . These values are used to form the A-U judgment matrix P.

$$P = \begin{bmatrix} u_{11} & u_{12} & \dots & u_{1n} \\ u_{21} & u_{22} & \dots & u_{2n}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u_{n1} & u_{n2} & \dots & u_{nn} \end{bmatrix} \quad (1)$$

Calculate the priority ranking. Based on the judgment matrix, calculate the eigenvector w corresponding to the maximum eigenvalue λ_{max} . The equation is as follows:

$$P_w = \lambda_{max} w \quad (2)$$

The obtained eigenvector w , after normalization, represents the priority ranking of each evaluation factor, which is also the allocation of weights.

Consistency check. The consistency of the obtained weight allocation needs to be examined by conducting a consistency check on the judgment matrix. The check is performed using the following formula:

$$CR = \frac{CI}{RI} \quad (3)$$

In the formula, CR represents the Consistency Ratio of the judgment matrix, and CI represents the Consistency Index. It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CI = \frac{\lambda_{max} - n}{n - 1} \quad (4)$$

Table 1 Random Index values for matrices of order 1 to 9 are as

N	1	2	3	4	5	6	7	8	9
RI	0	0	0.52	0.89	1.12	1.26	1.36	1.41	1.46

Random Index (RI) measures the average random consistency index for order 1 to 9 judgment matrices. When the Consistency Ratio (CR) of the judgment matrix P is less than 0.1 or when λ_{max} (the maximum eigenvalue) is equal to the order of the matrix (n), and CI (Consistency Index) is equal to 0, it is considered that P has satisfactory consistency. Otherwise, if the CR is greater than 0.1 or the CI is non-zero, adjustments must be made to P elements to achieve satisfactory consistency.

3.3 Research Responden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1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studying at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Yeosu Campus in South Korea. The specific details are as follows:

Table 2 Summary of Respondents

No	Gender	Age	Degree	Years in Yeosu
1	Female	20	Undergraduate	1
2	Male	39	Master	2
3	Female	32	Doctorate	3
4	Male	28	Doctorate	3
5	Female	27	Master	2
6	Male	27	Doctorate	4
7	Male	26	Doctorate	3
8	Male	24	Master	3
9	Male	28	Master	4
10	Female	22	Undergraduate	4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1). Gender:

- Female: 4 participants
- Male: 6 participants

(2). Age:

- The youngest participant is 20 years old, while the oldest participant is 39 years old.
- Average age: 27.4 years
- The age distribution is relatively even, with no significant concentration in a particular age range.

(3). Degree:

- Undergraduate: 2 participants
- Master's: 5 participants
- Doctorate: 3 participants

(4). Years in Yeosu Campus:

- The range of study duration is from 1 to 4 years.
- Average study duration: 2.8 years

Based on the above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include undergraduate, master's, and doctoral student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age groups. This diverse sample composition provides varied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s, contributing to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ransportation selection. The transport modes include Taxis, buses, Private cars, bicycles, and scooters as the alternatives in the order choice of transportation mode.

4. Results Analysis and Presentation

Table 3 Weighting Matri for Factors Affecting Transportation Modes Sel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Yeosu

$$\lambda_{\max}=4.058; CR=0.0217; CI=0.0193$$

	Cost of Transportation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Speed of Transportation	Safety of Transportation	Weights
Cost of Transportation	1	0.7893	0.8705	0.291	0.1332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1.267	1	0.7841	0.2553	0.1413
Speed of Transportation	1.1487	1.2754	1	0.1849	0.1437
Safety of Transportation	3.4359	3.9174	5.4092	1	0.5818

Table 4 Weighting Matrix for Cost of Transportation

$$\lambda_{\max}=5.0306; CR=0.0068; CI=0.0077$$

	Taxi	Bus	Private Car	Bicycle	Scooter	Weights (wi)
Taxi	1	0.9744	0.7641	0.8032	1.6098	0.1921
Bus	1.0262	1	1.5262	1.0623	2.0667	0.2478
Private Car	1.3088	0.6552	1	0.8889	1.8428	0.2072
Bicycle	1.2451	0.9413	1.125	1	2.0562	0.2363
Scooter	0.6212	0.4839	0.5427	0.4863	1	0.1166

Table 5 Weighting Matrix for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lambda_{\max}=5.0641; CR=0.0143; CI=0.016$$

	Taxi	Bus	Private Car	Bicycle	Scooter	Weights (wi)
--	------	-----	-------------	---------	---------	--------------

Taxi	1	2.422	0.5289	2.3702	3.7131	0.2752
Bus	0.4129	1	0.379	1.3443	2.3507	0.1472
Private Car	1.8906	2.6388	1	2.7112	4.105	0.3785
Bicycle	0.4219	0.7439	0.3688	1	2.0953	0.1277
Scooter	0.2693	0.4254	0.2436	0.4773	1	0.0715

Table 6 Weighting Matrix for Speed of Transportation

$\lambda_{\max}=5.1496$;CR=0.0334;CI=0.0374

	Taxi	Bus	Private Car	Bicycle	Scooter	Weights (wi)
Taxi	1	3.8566	1.4529	4.5664	5.5099	0.4052
Bus	0.2593	1	0.4935	3.5836	4.0455	0.1704
Private Car	0.6883	2.0264	1	4.5161	5.0256	0.3006
Bicycle	0.219	0.2791	0.2214	1	1.8187	0.0718
Scooter	0.1815	0.2472	0.199	0.5498	1	0.052

Table 7 Weighting Matrix for Safety of Transportation

$\lambda_{\max}=5.1467$;CR=0.0328;CI=0.0367

	Taxi	Bus	Private Car	Bicycle	Scooter	Weights (wi)
Taxi	1	2.0527	0.9796	4.5074	5.9847	0.3463
Bus	0.4872	1	1.1372	4.6414	4.2424	0.2513
Private Car	1.0209	0.8793	1	4.268	4.5681	0.2762
Bicycle	0.2219	0.2155	0.2343	1	2.4517	0.0759
Scooter	0.1671	0.2357	0.2189	0.4079	1	0.0503

Table 8 Criteria Weight.

Level 1 Indicators	Calculated Weights
Cost of Transportation	0.1332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0.1413
Speed of Transportation	0.1437
Safety of Transportation	0.5818

Table 9 Secondary index weighting table for Alternatives

Secondary index weighting table	Weights
Taxi	0.3242

Bus	0.285
Private Car	0.2245
Bicycle	0.104
Scooter	0.0624

Table 10 Consistency of matrix total ordering

Target Level	Consistency
Evaluation of Factors Affecting Transportation Sel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Yeosu	0.0268

The consistency of matrix total ordering was 0.0268, indicating that the student's choice and preference in evaluating factors affecting transportation modes selection in Yeosu were consistent.

4.1 Results Discussion

The analysis reveals the priorities and preferen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en selecting transportation modes in Korea. The safety of transportation is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to them, with a weight of 0.5818, indicating their strong emphasis on choosing reliable and secure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The transportation speed ranks second with a weight of 0.1437, suggesting that efficiency and fast commuting are also significant factors in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ranks third with a weight of 0.1413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easy and user-friendly transport mod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st of transportation holds relatively less influence than other factors, with a weight of 0.1332.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is in line with the study of Mayo & Taboada (2020) and Chou & Kim (2009), who believe that the safety of transport modes is mostly considered during transport mode selection.

In terms of specific transportation modes, the most preferred op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Yeosu Campus here in Korea are taxis, followed by buses, private cars, bicycles, and scooters with weights of 0.3242, 0.285, 0.2245, 0.104, and 0.0624 respectively. Taxis are favored due to their convenience in providing door-to-door service, particularly when carrying heavy loads or unfavorable weather conditions,

saving time and effort for students. Buses play a crucial role as a cost-effective and reliabl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with extensive coverage and fixed routes and schedules that allow students to plan their journeys conveniently and safely.

However, private cars are popular among students who own them, providing flexibility and personalized travel options, especially in areas with limit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access. However, the expenses associated with owning a car, such as fuel, maintenance, and parking,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some students, bicycles are increasingly preferred for affordability, health benefits, and eco-friendliness. Many cities in Korea have implemented bicycle-friendly infrastructure, making cycling a convenient and safe option, particularly for short to medium-distance commutes, enabling students to avoid traffic congestion and stay physically active.

Although electric scooters are the least preferred transportation mode, they have gained popularity as a compact and efficient mode of transportation, especially for shorter distances. They also offer affordability and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fuel-powered vehicles.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regulations regarding scooter usage may vary in different regions 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5. Conclus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Yeosu area of South Korea, the safety of transport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when selecting a mode of transportation, followed by speed and convenience. The cost of transportation has a relatively minor impact on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addition, a taxi is the most preferred transportation mode, followed by bus, private car, bicycle, and scooter as the least preferred mode of transportation. This could be because of how inconvenient it can be to ride. So, understanding these transportation preferences and factors can guid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transport mode choic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Korea. By prioritizing safety, speed, convenience, and the cost of the specific transport modes preferred by students,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can be tailored to meet their needs effectively.

5.1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lies in filling the research gap regarding the choice of transportation mode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exploring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institutions.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holds the following significance: Firstly, by investigating the transportation mode choi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Yeosu Campus in South Korea, we understand their needs, preferences, and factors considered when selecting different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This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relevant institutions to develop more student-oriented transportation policies.

Secondly, the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Understanding the patterns of transportation mode choices and decision-making factor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n assist the government in formulating policies that improve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address traffic conditions, and increase convenience, thus attracting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foreign talents to choose South Korea as their preferred destination for study, research, and work.

Lastly, this study hold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im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regional areas of South Korea.

5.2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The study has several limitations that need to be acknowledged.

Firstly, the sample size was small, consisting of only 1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the Yeosu Campus of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This limited sample may not adequately represent the diverse international student population, leading to potential issues with the generaliza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Secondly,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s the primary data collection method may have limitations. While it allows for quantitative data collection, it may not capture the participants' nuanced and detailed information and feelings. Respondent bias and memory bias could also be present, affecting the accuracy of the responses.

Furthermore, the study did not consider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could influence the travel mode choice. Factors such as local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 social atmosphere could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ir experiences but were not thoroughly examined in this study. So, considering these limitations, further research with a larger and more diverse sample, utilizing mixed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sidering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re needed t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port mode sel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Yeosu area.

References

- Alkharabsheh, A., Moslem, S., & Duleba, S. (2019). *Evaluating passenger dem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transport system by an AHP model with the real-world application of Amman*. *Applied Sciences*, 9(22), 4759.
- Al-Moherz, D. S., El-Anwar, O. H., Khalil, A. A., Osman, H. M., & Ibrahim, M. S. (2016). *Factors impacting transport mode choice in Egypt: An AHP approach*.
- Arbués, P., Baños, J. F., Mayor, M., & Suárez, P. (2016). *Determinants of ground transport modal choice in long-distance trips in Spain*.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84, 131-143.

Bhat, C. R. (1997). *Work travel mode choice and several non-work commute stop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 Methodological*, 31(1), 41-54.

Bhat, C. R., & Sardesai, R. (2006). *The impact of stop-making and travel time reliability on commute mode choic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 Methodological*, 40(9), 709-730.

Choi J. (2023, May 8). *Five most popular Korean univers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Korea Herald*. Accessed on September 12, 2023.

Chou, J. S., & Kim, C. (2009). *A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of the QSL relationship with passenger riding experience on high-speed rail: An empirical study of Taiwan and Korea.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36(3), 6945-6955.

Danaf, M., Abou-Zeid, M., & Kaysi, I. (2014). *Modeling travel choices of students at a private, urban university: Insigh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ase studies on transport policy*, 2(3), 142-152.

De Dios Ortúzar, J., & Willumsen, L. G. (2011). *Modelling transport*. John Wiley & sons.

De FSM Russo, R., & Camanho, R. (2015). *Criteria in AHP: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55, 1123-1132.

De Witte, A., Hollevoet, J., Dobruszkes, F., Hubert, M., & Macharis, C. (2013). *Linking modal choice to motility: A comprehensive review.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49, 329-341.

Eluru, N., Chakour, V., & El-Geneidy, A. M. (2012). *Travel mode choice and transit route choice behavior in Montreal: insights from McGill University members commute patterns. Public Transport*, 4, 129-149.

Kashifi, M. T., Jamal, A., Kashefi, M. S., Almoshaogeh, M., & Rahman, S. M. (2022). *Predicting the travel mode choice with interpretable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A comparative study. Travel Behaviour and Society*, 29, 279-296.

Kim, M. H., Lee, J., & Gim, T. H. T. (2021). *How did travel mode choices change according to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Lessons from Seoul, South Ko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Sciences*, 25(3), 437-454.

Ko, J., Lee, S., & Byun, M. (2019). *Exploring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ommute mode choice: An application of city-level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 Transport policy*, 75, 36-46.

Lanzini, P., & Khan, S. A. (2017). *Shedding light 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determinants of travel mode choice: A meta-analysi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F: traffic psychology and behaviour*, 48, 13-27.

Lee, D. J. (2018). *A multi-criteria approach for prioritizing advanced public transport modes (APTM) considering urban types in Korea.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111, 148-161.

Lee, S., Kim, G. C., Wu, S. K., & Oh, J. (2019). *Influence of ICT on public transport use and behaviour in Seoul*. Th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um.

Masoumi, H. E. (2019). *A discrete choice analysis of transport mode choice causality and perceived barriers of sustainable mobility in the MENA region. Transport policy*, 79, 37-53.

Mayo, F. L., & Taboada, E. B. (2020). *Ranking factors affecting public transport mode choice of commuters in an urban city of a developing country us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e case of Metro Cebu, Philippine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4, 100078.

Ministry of Education South Korea (2023, August 18), South Korea unveils a 5-year plan to attract 300,000 foreign students. The Strait Times, August 18. Accessed on September 17, 2023.

Owen, W. (1959). *Transport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9(2), 179-187.

Park, J. (2023, August 16). *South Korea unveils 5-year plan to attract 300,000 foreign students. The Korea Herald*, <https://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230816000691>.

Pucher, J., Park, H., Kim, M. H., & Song, J. (2005). *Public transport reforms in Seoul: Innovations motivated by funding crisis. Journal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8(5), 41-62.

Saaty, T. L. (1994). *Fundamentals of decision making and priority theory with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RWS publications.

Seok-min, O. (2022, April 13) *Vehicle registration in South Korea surpasses 25 million*. Yonhap News Agency,
<https://en.yna.co.kr/view/AEN20220412009000320>.

Sunduck, D., Keun-Yul, Y. A. N. G., Jae-Hoon, L. E. E., Byung-Min, A. H. N., & Hyun, K. J. (2005). *Effects of Korean Train Express (KTX) operation on the national transport system*. In *Proceedings of the Eastern Asia Society for Transportation Studies* (Vol. 5, pp. 175-189).

Wedley, W. C. (1990).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factors—an analytic hierarchy approach. *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 24(1), 57-64.

Yanar, T. (2023). *Understanding the choice for sustainable modes of transport in commuting trips with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Case Studies on Transport Policy*, 11, 100964.

麗水市留學生交通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評估

奧卡福爾 C. O. 朱信遠 蔡青源 金昌賢

(韓國全南國立大學物流交通系)

摘要：在許多國家，交通運輸一直是客貨運輸的重要手段。隨著城市人口的不斷增長，對經濟實惠、方便快捷的交通系統的需求也隨之增長。本研究旨在利用層次分析法（AHP）對韓國麗水市留學生選擇交通方式的影響因素進行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在選擇交通方式時，交通方式的安全性是首要的考慮因素，其次是速度和便利性。交通費用則是留學生考慮最少的因素。在出行方式調查中，出租車是最受歡迎的交通方式，其次是公交車、私家車、自行車，而電動滑板車是最不受歡迎的交通方式。

關鍵詞：AHP；交通；模式選擇；留學生；韓國

投稿日期	2023. 9. 6	審查日期	2023. 10. 9	刊載日期	2023. 12. 28
------	------------	------	-------------	------	--------------

韓國視域下的中國精釀啤酒產業現狀及對策

李 明¹

摘要：隨著消費者對啤酒口味和品質要求的不斷提高，啤酒產業為滿足市場的需要也在不斷更新和發展。近年來，精釀啤酒的發展備受關注。本文採用 SWOT 法和文獻分析方法分析比較韓國精釀啤酒的模範案例。通過對韓國精釀啤酒產業地發展的比較分析，推測出中國目前應該採取的改進措施：1) 精釀啤酒文化觀光及宣傳；2) 精釀啤酒企業自主創新研究及技術對策；3) 精釀啤酒生產的新出路。

關鍵字：中國精釀啤酒；韓國精釀啤酒；韓中啤酒比較

引 言

作為日常消費品，啤酒是一種深受中韓人民喜愛的酒飲。從古至今更是有借酒消愁的說法，酒也有拉近人們距離的奇妙力量。隨著人們生活品質的提高，人們對啤酒品質和口味的追求逐漸增多。精釀啤酒開始出現在大眾市場上，並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歡迎，年銷售量也逐漸增加。公開資料顯示，2011~2021 年，國內精釀市場規模從 2010 年的 33 億元增加到 428 億元左右。與工業啤酒市場的飽和和緩慢增長相比，精釀啤酒的消費量從 2016 年的 3.6 億升增加到 2021 年的 10 億升²。為了滿足市場需求，陸續出現了很多投資商，開始共同參與投資（Surrey, 2013; Green, 2016）³。這都是為了滿足消費者對特殊新產品

¹ 作者簡介：李明(1992-)，女，全南國立大學東亞學系在讀博士，研究領域：中韓對比，電郵：217432@jnu.ac.kr。

²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303/29/t20230329_38470129.shtml 2023-10-13

³ Green, R. (2016). China's craft beer revolution. SIXTH TONE.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sixthtone.com/news/chinas-craft-beer-revolution>. Accessed 02 Sept 2016.
Surrey, B. C. (2013). Foreign investment tapping into China's beer market. The Global and Mail.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report-on-business/tapping-into-chinas-beer-market/article12912284/>. Accessed 06 Aug 2016.

的需求。啤酒及地方自製啤酒生產企業利用茉莉花、烏龍茶、甜棕櫚等材料開發配方 (Berg, 2013)¹，憑藉其獨特的口味不斷吸引啤酒愛好者的追捧。然而由于中國精釀啤酒起步較晚，也存在諸多安全管理問題。目前大多數自釀酒廠都是用進口材料釀造的，但有報導懷疑它們的真偽，因為從大麥、酵母等基礎材料到一些香料和其他添加劑都沒有標注的相關規定 (Abkowitz, Tian, 2014)²。因此，所有自製啤酒廠在釀造啤酒時是否採用相同標準還是個疑問。比較而言，韓國的精釀啤酒行業已經相當成熟。通過多次修改酒稅所帶來的方便，韓國的精釀啤酒已經占領了韓國便利店的貨架，並正在向外擴張³；中國精釀啤酒的銷售和管理運輸安全等方面可以借鑒韓國的經驗。本文通過採用 SWOT 分析法⁴對比分析中韓啤酒產業，通過借鑒韓國精釀啤酒產業的優秀案例找出促使中國啤酒產業的活躍因素，並期待將中國精釀啤酒的危機轉化為機遇，實現精釀啤酒產業的新發展。

一、啤酒和精釀啤酒的發展歷程

1.1 中國啤酒行業發展現狀

起源於西方的啤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精飲料。19 世紀啤酒作為商品進口到中國，被中國學者根據英語單詞 Beer 的發音譯成“啤”酒，至今仍在使用。中國啤酒市場供不應求，啤酒產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外國資金的大量流入，導致中國啤酒產業資金不足。啤酒生產商由於融資問題，精釀啤酒在發展初期多為外資。中國精釀啤酒對比外國起步較晚，卻有很多機會。在國外企業和中國品牌的合作企業中，往往由于對市場形勢的誤判而造成很大損失：一方面，無法應對市場變化的中小企業迅速被淘汰，另一方面，大企業追求規模效益，出現了行業整合和兼并的趨勢。隨著投資，隨著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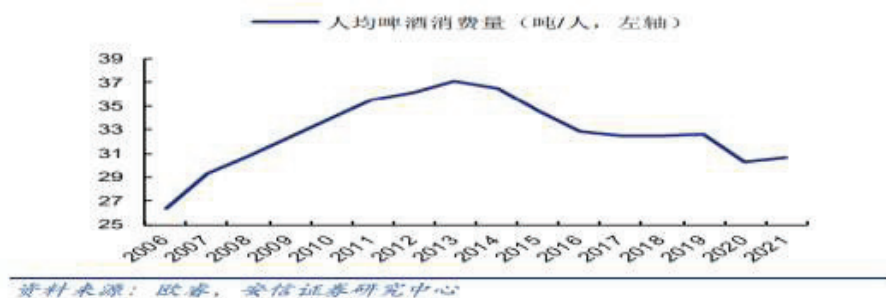
¹ Berg, C. (2013). Crafting beer for world's biggest market, China Daily.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usa.chinadaily.com.cn/epaper/2013-05/03/content_16472375.htm. Accessed 08 June 2016

² Cendrowski, S., 2017. China's new craft-beer bully. <http://fortune.com/2017/03/16/chinacraft-beer-ab-inbev/>.

³ <https://m.newspim.com/news/view/20210521001055>

⁴ Ansoff H. I. Corporate strategy[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5.

資的大量湧入，中國市場的啤酒行業可能有一定的風險，但隨著中國宏觀經濟平穩發展，中國啤酒產量進一步增加。1993 年，中國啤酒年產量達 1225 噸，成為僅次於德國的世界第二大啤酒生產國。到了 1999 年，中國啤酒產量突破 2000 噸，人均消費 17 升，占世界人均消費量的 66%。從 20 世紀末到 21 世紀初，中國的啤酒產量仍居高不下。保持了穩定快速增長的趨勢，總產量逐漸超過西方其他國家。現階段年均增產與 GDP 增速總體一致。1998~2015 年啤酒年產量增長 6.1%，GDP 增長 13.6%。但是，由於中國的宏觀經濟狀況變化和物價上漲，中國啤酒年產量增長率開始低於國民總收入。到目前為止，中國啤酒行業已逐步形成現有的市場格局，啤酒行業經歷了更為嚴峻的市場競爭和價格競爭。隨著消費者對健康認識的提高，啤酒消費人群數量減少，影響了中國啤酒市場的增長。2003~2013 年，中國啤酒主要消費人口（25~44 歲）基本維持在 440 萬以上，隨著啤酒生產能力的提高，中國啤酒人均消費量從 1.66 萬升增加到 37.22 萬升。但 2013 年以後，中國啤酒消費下降。這一時期，由於人們健康意識的提高，中國啤酒人均消費量從 37.22 萬升下降到 26.89 萬升。歐瑞資料顯示，自 2015 年以來，低價啤酒的銷售量和銷售比重逐年下降，不同價格的產品結構正在大幅升級。高端啤酒的零售比重達到 65%以上，遠遠超過銷售比重，高端化趨勢逐漸顯現¹。



隨著社會對精釀啤酒認識的逐步加深，人們對精釀啤酒的需求量與日俱增。到 2018 年，中國精釀啤酒企業已超過 2000 家。2019 年，中國精釀啤酒相關企業增加 1073 家，2020 年增加 1122 家。疫情期間，中國精釀啤酒企業經營

¹ 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205041563425636_1.pdf

數量仍在增長，但占中國總體啤酒市場仍然較少。2008 年中國第一家精釀啤酒釀造企業——高大師啤酒工廠——成立，隨後以豐收精釀、拳擊貓為代表的第一批精釀品牌出現，並在一線城市逐步擴張，精釀啤酒開始受到消費水準較高的小眾圈層的青睞。2008 年到 2017 年，外資精釀啤酒品牌在中國市場快速擴容，國內啤酒廠商的精釀意識覺醒，2018 年至今，中國精釀啤酒行業及其市場規模繼續快速發展。各大啤酒商除布局高端市場外，對精釀啤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如青島、燕京、珠江等大型啤酒企業紛紛聚集中高端精釀啤酒生產業務，使得啤酒總體銷量萎縮的情況下，精釀啤酒的銷售額仍有明顯的增長¹。

1.2 韓國啤酒和精釀啤酒的發展過程

韓國最早出現的啤酒是在 19 世紀末。從 1900 年代開始，日本啤酒企業在韓國展開競爭，隨著居住在國內的日本人不斷增加，為了節約運輸費用，日本終於 20 世紀 30 年代開始在韓國設立啤酒廠。這一時期，大日本啤酒株式會社設立了朝鮮啤酒麒麟啤酒株式會社設立了昭和麒麟啤酒。1945 年 9 月，昭和麒麟啤酒被指定為美國軍政府管理，1948 年開始由政府管理，1952 年被民間人士收購（鬥山集團，1996 年）²。朝鮮啤酒和蘇花麒麟啤酒更名為海特啤酒和 OB 啤酒，至今仍在競爭，平分韓國啤酒市場。20 世紀 60 年代生產的皇冠啤酒和 OB 啤酒多為瓶裝啤酒，罐裝也逐漸開始生產。1970 年代中期，韓國和德國合作成立了韓德啤酒，並推出了“伊澤貝克”商標，在 3 個月內實現了 15% 的市場佔有率，但由於兩家公司的經營不善和經濟蕭條等原因，後被朝鮮啤酒收購。另外，1994 年真露啤酒推出 CASS 後加入競爭，初期雖然取得了收益，但由於經營不善，1998 年被 OB 啤酒收購。在這種情況下，從 2010 年開始，各種進口啤酒紛紛湧入國內，市場佔有率持續提高，2014 年終於被一分為二的國內大型啤酒公司的格局中，樂天酒類推出了雲計算，雖然形成了三家大企業的格局，但雲計算的佔有率沒有超過 7%。在兩家大型啤酒公司正忙於生產味道相似啤酒的 2002 年，在準備 2002 世界盃的過程中，放寬了酒類生產限制，並實行了

¹ <https://m.newspim.com/news/view/20210521001055>

² 두산그룹. 배오개에서 세계로: 두산 100 년 이야기. 서울, 한국. 1996. p1-2.

“小規模啤酒許可制度”。從德國、加拿大等地進口的裝備開始在全國配備小規模“house 啤酒”。人們熱衷于精釀啤酒，雖然在一兩年內迅速流行，但由于沒有好的釀酒專業人員而導致啤酒出現品質問題，加上啤酒的供過於求、禁止從啤酒廠外運入等法律限制，在不到 3 年的時間裏就迎來了停滯期¹。2010 年梨泰院經理，以外國人為中心的精釀啤酒店經口口相傳，重新找回了活力。2002 年以後，從海外進修釀酒專家課程的衆多專業人才流入國內，加上 10 多年的實踐而發展起來的國內釀酒技術人員的釀酒實力，逐漸受到歡迎。在這種情況下，2014 年修改法律，使小規模啤酒公司能够進行外部流通，再次迎來了第二個全盛期。最近備受矚目的精釀啤酒市場從 2016 年的約 200 億韓元規模增長到 2017 年的約 350~400 億韓元²。2014 年只有 54 個韓國精釀啤酒許可證，在 2018 年超過了 100 個，對精釀啤酒的熱度持續增加³。



據韓國精釀啤酒協會和業界透露，國內精釀啤酒市場規模在 2016 年為 311 億韓元，2017 年為 433 億韓元，2018 年為 633 億韓元，2019 年為 800 億元，2020 年為 1180 億韓元，首次超過了 1000 億韓元。僅從去年的增長趨勢來看，比前一年的 2019 年足足增加了 47.5%⁴。自 2019 年 1 月起，啤酒稅標準由從價稅（價格）改為從量稅（容量），降低了自製啤酒的出廠價格。因此，便利店的“4 罐 1 萬韓元”等打折活動開始受到歡迎。另外，在獨酒、家庭酒文化擴散的情況下，新型冠狀病毒事件爆發，家庭酒類市場擴大，這一點也起到了積極作用。

¹ 원용희. 상큼한 맥주의 세계. 보경문화사, 서울, 한국. 1997. p2-4.

² Fare Trade Commission, <http://www.ftc.go.kr/>

³ Korean Sta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https://kosis.kr/>.

⁴ <https://m.ekn.kr/view.php?key=20210305010001091>

從精釀啤酒的情況看，家庭市場比重高于娛樂市場¹。

二、中韓精釀啤酒產業的對比分析

2.1 中國精釀啤酒產業的現狀

2.1.1 中國精釀啤酒產業的生產條件

(1) 中國精釀啤酒生產量

早在 5000 年前中國就有了“醴酒”這個原始啤酒，但一直到 20 世紀初，哈爾濱啤酒的創建才有了高速的發展，到 21 世紀初達到了最高峰。近幾年有所回落，但 2018 年產量仍高達 445.7 億升²。2008 年，南京歐菲啤酒廠成立，後來改名南京高大師啤酒，這是國內第一家市場化的精釀酒廠。2011 年至 2021 年，國內精釀市場規模在 10 年間從 33 億元增至約 428 億元。與工業啤酒市場的飽和與緩慢增速相比，精釀啤酒消費量從 2016 年的 3.6 億升增長至 2021 年的 10 億升。《2023 年精釀啤酒行業研究報告》顯示，2022 年中國精釀啤酒消費量 14.3 億升，預計 2025 年可達 23 億升。³中國酒業協會啤酒分會秘書長何勇指出⁴：“在中國啤酒市場日趨飽和的影響下，啤酒消費市場將迎來多元的消費升級階段。”當前，追求獨特喜好和個性化的年輕人已成為消費主力軍。精釀啤酒作為個性化特徵鮮明的酒類，註定與工業啤酒的大眾化無緣。⁵“精釀啤酒是否進入當地餐飲、賣場等主流管道，主要由本地經銷商決定。和傳統工業啤酒相比，精釀啤酒更多還是在高端銷售，”史祥傑介紹⁶。

(2) 中國精釀啤酒的主要原料

精釀啤酒對工藝要求極高，需要進口麥芽，酒花的種類也比較繁多。麥芽和酒花是釀造啤酒的兩大原料，不同產地或者不同種類原料的搭配對口味的影響較大，這主要取決於釀酒師的個人品味⁷。工藝上，微型啤酒釀造設備與大工

¹ <http://news.bizwatch.co.kr/article/consumer/2021/03/04/0012>

² 尹麗梅. 让更多的人喝到中國的精釀啤酒[J]. 中國商界, 2017(3): 116-119.

³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303/29/t20230329_38470129.shtml

⁴ 楊婧娥, 王佐民, 于宏偉, 等. 精釀啤酒的發展前景[J]. 釀酒, 2018(4): 29-31.

⁵ 劉一博. 精釀啤酒的是是非非[N]. 北京商報, 2017-09-17(D01).

⁶ <https://new.qq.com/rain/a/20230620A044KQ00>

⁷ 譚咏, 徐紹絲, 黃鸞強. 精釀啤酒用麥芽的種類和特點[J]. 福建輕紡, 2020(12): 9-14.

業生產設備還是有些許差異的。原料上，精釀啤酒一般采用全麥芽，比較注重麥芽汁的品質，在釀造過程中會添加更多的酵母，一般需要根據銷售情況合理調整溫度，半個月的時間就可以出酒¹。首先中國產的最大特點就是在原料基礎上再添加大米一類的澱粉輔料，因為這樣的配方是為降低啤酒花和麥芽的比例，如此操作之後，成本可以說是大大降低，口感還會更加的清爽，其實對於這樣的配方，已經不是製造啤酒行業的獨家消息，可以說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秘密了。所以現在有不少人開始喜歡上進口啤酒，因為這種啤酒所用的原料可從原料表上看見。以德國啤酒作為例子，大麥芽，水，啤酒花和酵母等原料製作的，進口啤酒所帶來的濃鬱感及其散發出來的香味，精釀啤酒發展也較早，對比之下，其中的差距還是很明顯的²。以全球範圍內廣受喜愛的德國啤酒為例，與國內的精釀啤酒發展狀況進行簡單對比。首先從創新角度分析，中國的精釀啤酒比較中規中矩，受各種因素的限制，還未研發出獨具特色的啤酒風味，而德國在這方面就比較優秀，德國啤酒素以口味衆多并且各具特色為名，可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儘管中國是一個香料大國，但卻沒有創造出自己的配方，因此，在品牌創新方面要多下功夫。中國精釀啤酒的發展起步較晚，還有很大的學習和上升空間。

2.1.2 中國精釀啤酒的物流條件

中國大多數啤酒企業都采用物流外包為主，自助物流為輔的方式進行物流管理。在啤酒企業臨近的地市，啤酒企業對於散裝啤酒進行自行的物流運輸管理，而對於距離較遠的地市區啤酒市場啤酒供應，則大多通過外包物流的方式進行啤酒運輸。由於中國的基本國情，在啤酒行業的物流配送情況上看，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都不能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物流水平³。中國早期啤酒行業的發展是效仿德國的模式，在各地建立許多小規模的啤酒企業，以這種分散

¹ 黃琳, 葛秀琪, 張元夫, 等. 精釀啤酒專用麥芽的研究進展[J]. 中國釀造, 2020, 39(2): 7-12. 21

² https://mp.weixin.qq.com/s/eM6CCT0fo9g_AF4BQvLuw

³ 班允鳳. 啤酒物流的信息化變革[J]. 中國物流與採購. 2006 年第 12 期: 26-27

的方式確保市場覆蓋率的穩定增加¹。但是，大量物流企業的涌現就出現了一種盲目發展、缺乏管理的現象。中國已開始逐漸重視起來，在物流行業的各個必要環節，尤其針對某一物流行業，例如啤酒行業，要制定相關的法規或者是政策標準，實行標準化的統一管理，減少物流事故的發生，提高啤酒行業物流的工作效率。在繼承西方先進理念的同時，要結合國情，真正建立一個高效的啤酒行業物流配送體系²。

2.1.3 中國精釀啤酒的稅收要求

啤酒消費稅分兩檔從量徵收，漲價背景下稅率有望下降。啤酒企業的消費稅根據出廠價格(含包裝物及包裝物押金)從量徵收。出廠價 3000 元/噸(含 3000 元，不含增值稅)以上的，每噸徵收 250 元消費稅，約 4 萬 5 千韓幣；出廠價格在 3000 元(不含 3000 元，不含增值稅)以下的，每噸徵收 220 元消費稅(約 4 萬韓幣)。在不跨越 3000 元的分檔綫時，啤酒出廠價格上升將使消費稅稅率持續下行。當價格上升剛過 3000 元/噸時，企業通常會採取合理的方式避免提價紅利小於消費稅增加的情況。娛樂業、飲食業自製啤酒，單位稅額 250 元/噸。長期看，隨著啤酒行業價格持續提升，啤酒的消費稅稅率呈下降趨勢。目前，國內啤酒市場進口啤酒的份額約在 1.7%左右。其中德啤佔領中國啤酒市場最大，啤酒進口都是 0 關稅的，繳納 17%的增值稅，因為 0 關稅，也大大吸引了國內進口啤酒代理商的大量採購。

2.2 韓國精釀啤酒產業的現狀

2.2.1 韓國精釀啤酒產業的生產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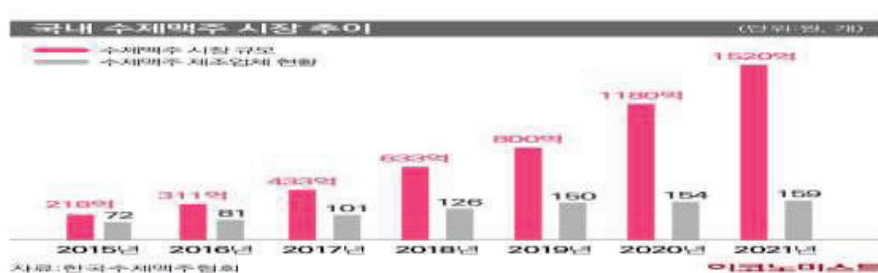
(1) 韓國精釀啤酒產量

2000 年代初期，韓國的手工啤酒引入小規模啤酒製造許可制後，BrewPub(具備釀酒設施的酒吧)等個人營業場所就以 House 啤酒的形式首次登場。2010 年以後，隨著對小規模酒類的酒稅法的修訂，市場開始逐漸活躍起來。雖然手工啤酒市場在國內啤酒市場的佔有率還不到 1%，但是手工啤酒

¹ Bowerson D J. The Strategic Benefit of Logistics Alliance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ly-August, 1990: 85

² 李岩. 运输与配送管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釀造廠數量自 2013 年以後增加了約 1.7 倍，以去年為基準，統計為 95 家，市場規模從 2016 年的 200 億韓元大幅增加到 2017 年的 400 億韓元，呈現出等級快速增長的勢頭¹。據韓國精釀啤酒協會預測，國內精釀啤酒市場規模將從 2013 年的 93 億韓元增至 2017 年的 433 億韓元、2019 年的 800 億韓元、118 億韓元。2020 年為 1520 億韓元，2021 年為 1520 億韓元。同期，國內精釀啤酒生產企業數量從 2015 年的 72 家增加到 2021 年的 159 家，增長約 2.2 倍²。



隨著其他酒類市場的擴張，精釀啤酒市場的擴張暫時將會不可避免。當合作啤酒代表作“金瓶小麥啤酒”走紅後，精釀啤酒企業紛紛與便利店、餐飲行業進行各種聯動行銷。當時，出現了各種與拉麵、牙膏、口香糖合作的獨特精釀啤酒。然而，雖然這本來可以增加消費者的興趣，但却被人解讀為忘記了精釀啤酒的獨特口味，可能還會產生一些負面想法。

(2) 韓國精釀啤酒的主要原料

雖然韓國精釀啤酒市場呈增長趨勢，但啤酒大麥、啤酒花等原料國產化比率較低。據估計，國產麥芽用於精釀啤酒的比例不到 10%，啤酒花比這更低。相比之下，用於自製啤酒的麥芽進口量逐年增加，從 2016 年的 1286 噸增加到 2018 年的 3325 噸，2020 年的 3729 噸。隨著韓國精釀啤酒市場逐漸成長，啤酒原料麥芽（發芽大麥）和啤酒花大部分依賴進口，但 Saenggeuk Brewing 正與國產有機大麥釀造的精釀啤酒去競爭，注定會擁有自己的獨特故事³。The

¹ 파이낸셜뉴스 (2018. 7. 12.) 편의점 수제맥주 대전 본격화. <http://www.fnnews.com/news/201807121522438111>

² <https://economist.co.kr/article/view/ecn202305310064>

³ <https://kr.aving.net/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777975>

Hot Brewery 代表金娜萊解釋說：“美國、德國、澳大利亞等啤酒花主要生產國正用啤酒花專用拖拉機將酒花農活進行自動化，而在國內，每朵啤酒花都是手工摘取。”僅從經濟回報來看，使用外國產啤酒花顆粒雖然更為有利，但是為了啤酒花的國產化，最好自己直接栽培。有人指出，精釀啤酒業界有必要制定制度性扶持政策，讓國產原材料得以廣泛使用。現行《傳統酒類產業振興相關法律（傳統酒類產業法）》規定，以釀酒廠所在地和鄰近地區種植的農產品為主要原料的酒類，屬於地區特產酒類，適用較高的稅收優惠，也可進行網上銷售¹，精釀啤酒市場掀起了國產熱潮。因為，強調與進口原料製作的精釀啤酒不同的釀酒廠層出不窮。據分析，在新型冠狀病毒前後，在家喝酒的“家庭酒族”日益增多，這對於挽救國產啤酒的試圖會產生一定影響²。

2.2.2 韓國精釀啤酒的物流條件

從 1933 年“朝鮮啤酒株式會社”成立到 2014 年“Beer For Gee”引進冷鏈系統為止，81 年間，所有啤酒通過普通卡車在常溫下暴露在陽光下流通，至今仍有很多精釀啤酒在常溫下運輸。常溫流通一直是 2014 年啤酒發生氧化臭味等多種品質問題的直接原因，尤其是精釀啤酒，很多產品都未經殺菌處理。因此，對於供應鏈來說，冷鏈系統至關重要。2002 年酒稅法修訂後，引進了小規模啤酒製造許可證，在國內也形成了精釀啤酒市場。初期只允許在生產的賣場銷售，無法在外地流通，因此供應鏈簡單，不需要冷鏈系統。但隨著 2014 年酒稅法的修改，可以外地流通。2018 年小規模流通企業也可以供貨，流通變得活躍，供應鏈變得複雜，冷鏈系統變得十分必要。首先，在物流、流通領域，計畫在主要旅遊景點或公車間隔較長的地區依次引進超精密諮詢服務。以港口附近及釜山、驪州等物流中心較為集中地區為中心，還將擴大貨車的停車空間和提供即時資訊。為了制定無人機、機器人作為生活物流運輸手段的法律依據，人們將會加快《生活物流服務產業發展法》的修訂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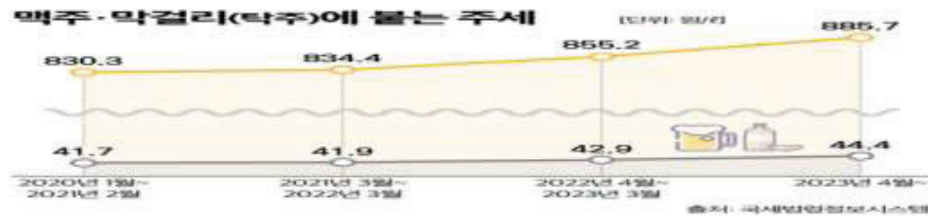
2.2.3 韓國對精釀啤酒的稅金要求

¹ <https://www.nongmin.com/article/20210813343276>

² <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25081991#home>

³ <https://www.eroun.net/news/articleView.html?idxno=35191>

2002 年酒稅法修訂後, 小規模啤酒製造許可證得以引進, 韓國國內也形成了精釀啤酒市場。精釀啤酒是作為新鮮食品, 供應鏈管理和冷鏈系統直接關係到啤酒的味道, 但由於冷鏈系統的高費用和供應鏈管理不足, 在流通賣場中, 在常溫下啤酒的保管或使用都需要冷卻服務。到目前為止, 冷鏈還沒有連接到最終消費者。2019 年修改酒稅法, 採用了從價稅(按出廠價格徵收稅金)。當時政府改變酒稅體系時的目的是“徵稅公平性”和“培養酒類產業”, 但爭議依然存在。這也是出現酒稅法需要不斷追加修訂的原因。¹啤酒附加的酒稅從 2020 年的每升 830.3 韓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834.4 韓元、2022 年的 855.2 韓元、2023 年的 885.7 韓元。也就是說, 購買啤酒的稅金比 3 年前每升增加了 50 韓元以上²。



因此, 稅金高於 830.3 韓元的高價進口啤酒因引入從量稅而稅金減少, 但低價進口啤酒會產生稅金增加的效果。相對來說, 容器價格較高的罐裝啤酒如果轉換為從量稅, 將大幅減稅, 但啤酒以可再使用的 20 升罐裝啤酒流通, 稅負反而會大幅上漲。如果啤酒稅金急劇上漲, 生產比重相對較高的精釀啤酒行業將受到打擊, 因此, 政府決定在 2 年內將稅率減少 20%。把 830.2 韓元的稅率降低到 664.2 韓元。金炳圭室長表示: “啤酒行業會收集成本上升部分, 一般 4~5 年提高一次價格, 因此認為稅率每年變動不會直接反映在價格上³。”

2.3 韓中精釀啤酒產業的 SWOT 比較分析

以下是筆者利用 SWOT 對中國和韓國啤酒進行分析。

優勢: 中國作為製造國, 擁有龐大而高效的生產體系。與韓國相比, 中國的

¹ <https://news.mt.co.kr/mtview.php?no=2023053016281311798>

² <https://www.taxwatch.co.kr/article/tax/2023/08/07/0002>

³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605001500002>

啤酒生產成本相對較低。日本大型啤酒公司麒麟控股公司報告說, 2021 年世界啤酒消費量約為 1 億 8560 萬升, 比去年同期增長 4.0%, 中國將連續 19 年成為世界最大的啤酒消費國。韓國海關總署發布的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顯示: 2022 年 1 月, 中國啤酒進口額為 3116.1 萬美元, 比 2021 年同期 (3025.1 萬美元) 增長 3.0%。中國的啤酒進口額在 2021 年以 3674 萬 9000 美元位居第二; 2022 年青島啤酒在韓國熱銷, 超過荷蘭而位居第一¹。中國市場規模、成本低是未來發展的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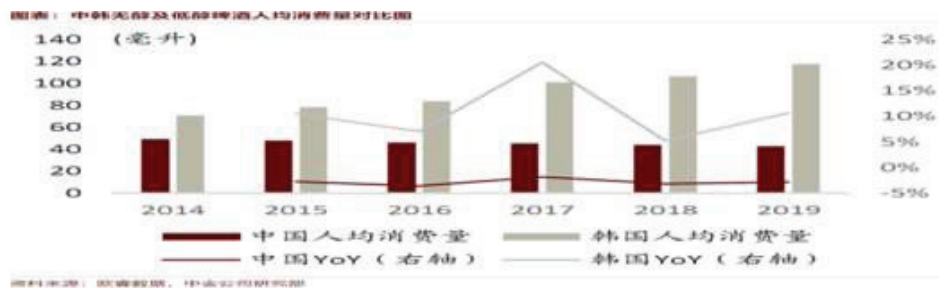
弱點: 通過以上對比可知, 中國精釀啤酒起步較晚, 對啤酒成分控制沒有明確要求, 近年來持續增加的小企業增多, 競爭激烈。韓國東洋啤酒廠和海特啤酒占據了韓國啤酒市場的 90% 以上, 與中國小品牌之間的競爭會更加激烈。從生產條件來看, 中國應出臺明確規定, 提高生產條件的具體要求, 規定啤酒的含量要求標準。韓國是亞太地區最成熟的啤酒市場, 啤酒增長率主要來自進口啤酒高端化帶來的均價。與中國的情況相比, 韓國可以通過模仿歐美市場、進口機械化機械、投資大量種植等方式, 降低用人成本, 提高效率。對於物流公司來說, 中國以物流外包為主, 以完善自助物流的方式進行物流管理, 這些對於韓國啤酒的發展都具有指導作用。

機會: 根據 1 月韓國關稅廳的進出口統計, 去年各國啤酒進口量中, 來自中國的啤酒最多, 為 46504 噸, 其次是荷蘭 (5124 噸)、日本 (18940 噸)、德國 (17855 噸)、愛爾蘭 (17189 噸) 等²。韓國最近因日本污染物排放問題, 國民拒絕日本產品, 這可以在今後中國啤酒發展中考慮增加合作。中國的啤酒年產量高, 但大部分仍在國內銷售。以韓國為例, 2014 年修訂了酒類稅法, 將營業許可標準從 15 萬升下調至每年 5 萬升 (2011 年為止為 100 萬升), 允許精釀啤酒商向便利店、超市等流通管道和當地餐飲管道供應啤酒。一方面, 精釀啤酒在釀造過程中使用較多的麥芽和啤酒花, 添加獨特的成分 (如咖啡、蜂蜜等), 吸引對啤酒品質有較高要求的消費者。韓國將 2020 年開始對進口啤酒

¹ <https://www.sedaily.com/NewsView/29KOU3NBMZ>

² <https://www.foodtalks.cn/news/41276>

和國產啤酒每升徵收 830 韓元，進口啤酒的競爭壓力將減弱。從量價來看，韓國的成熟度比中國高。韓國啤酒量化市場規模在 20 世紀末進入飽和期，總體價格受政策抑制，並未與日本同步實現高端化，2012 年左右開始快速增長，中國啤酒市場總銷量在 2013 年左右達到頂峰，韓國啤酒生產企業從 2005 年左右開始面臨產能過剩問題。從整體啤酒價格上升的角度來看，雖然與韓國目前的工藝有一定差距，但高端化速度也比較快。韓國市場的量價表現更接近于日本和歐美成熟市場；在社會經濟層面上，相比于歐美國家，韓國更接近于中國，因此韓國啤酒的發展歷程對中國啤酒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其次，中國可以利用本國國土優勢，加強國家在啤酒原料小麥種植和出口方面的合作。根據歐睿資料，2014-2019 年間韓國無醇、低醇型啤酒產品銷量平均年增長 10.7%，反映了韓國消費者健康意識的提高。發達市場的自飲需求和零售化水準使得無醇和低酒精度具備較大市場空間。而中國啤酒高端化進程開始不久，飲用啤酒依然主要圍繞現飲管道的社交場景，微醺狀態是很多社交場景下最理想的飲酒需求，因此，高濃度目前仍為高端市場的主要趨勢，無醇和低醇尚不是風潮¹。



OB 在 2020 年推出了無酒精啤酒品牌 Cass，圍繞電商管道主打零售市場。OB 還通過授權方式引進了許多高端品牌，涵蓋各個啤酒品牌。中國可以瞄準市場走向，加大對健康啤酒方向的研發，創新之後加以推廣和合作。

威脅：中國目前的小啤酒廠較多，企業知名度低。放眼國際市場，目前中國

¹ <https://mp.weixin.qq.com/s/UsntjMrY5RRI1JF4yLq6xg>

的精釀啤酒發展較晚，管理起來較為不易，需要國家政策上的一些規定和扶持政策幫助發展。面對惡化的競爭環境，韓國啤酒公司海特在 2019 年推出了新產品 terra，代替了原來的 hite，集中管道資源進行推廣，並針對韓國市場獨有的燒啤文化進行了 terra 和真露的捆綁行銷。OB 啤酒在 1999 年收購了真露的啤酒業務，並將其旗下的 cass 啤酒替代為自己的旗艦品牌。OB 後來先後出售給比利時啤酒巨頭英博集團和知名投資機構 KKR。面對進口啤酒在政策下的快速擴張，OB 採用了進一步擴大產品組合並退出高端產品放量的政策，成功走在了韓國高端化市場的前列。通過韓國企業的案例可以看出，企業在做大做強的同時，合作相容是不可避免，中國的啤酒企業應該避開單打獨鬥的想法，多研發新的健康產品，同時尋求合作雙贏，力爭進入高端化市場。

三、應變和發展方案

目前，中國精釀啤酒市場尚處於發展階段，尚未實現高端化。為了促進中國啤酒事業的順利發展，在韓國啤酒事業的成功經驗和相關資料的比較基礎上，筆者提出以下預案，以期有助於中國啤酒產業的健康發展。

1) 精釀啤酒文化觀光及宣傳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健康的關注也越來越明顯，對比普通啤酒，精釀啤酒含有更豐富的氨基酸和維生素；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以健康為理念的無酒精、果味、茶味等健康概念的精釀啤酒也逐漸出現。如果能加大宣傳和銷售研發一定會取得比較好的結果¹。例如，在歐洲、北美等地區，啤酒是重要的旅遊資產，目的地發展的基礎啤酒旅遊也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但其學術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²。Plummer 等人的研究不僅是啤酒旅遊研究的先導，也是啤酒旅遊研究的典範。他們沿著加拿大安大略省中南部的滑鐵盧-威靈頓大道對 6 個釀酒廠進行了為期 3 年的調查。結果發現，啤酒旅行的設立不僅減少了釀酒廠之間的競爭，而且還植入了釀酒廠之間的文化合作。他們得出結論，成功的啤酒旅行對當地發展的潛在好處不僅可以增強當地釀酒廠的自豪感，吸引游客到當地，還可以

¹ MUNAR A M. Reveal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outrageous beer tourism [R]. CLCS Working Paper Series. Copenhage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2012.

² ROGERSON C M. Craft beer, tourism and local development in South Africa [M]. HALL C. M, GOSSLING S. Food Tour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Networks, Products and Traject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244-258.

發展合作網路和夥伴關係，促進啤酒銷售和旅遊業的進一步發展¹。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們消費商品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但人們更喜歡具有地區文化意義的商品。因此，商品消費會促進人與商品和場所的相互作用。中國應該抓住這個機會，發展具有當地特色的啤酒文化。旅遊餐飲消費不僅是旅遊者在目的地的必行活動，也是旅遊者體驗目的地文化、進行社會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²。呂含孫說：“應重視酒和旅行的融合，啤酒節是很好的表現。”³

2) 精釀啤酒企業自主創新研究及技術對策

從企業內部來看，目前大多數啤酒企業對技術創新的支援力度不够，產品技術創新的激勵政策不多，人才流失嚴重等，這都是抑制啤酒行業進步和創新的原因⁴。要積極開展產品升級換代，走高端路線，突破技術壁壘，整合生產能力，提高啤酒工業競爭力。⁵

3) 精釀啤酒生產的新出路

目前中國精釀啤酒還沒有實現高端化，雖然在持續增長，但這在萬千餐飲市場裏，不過是滄海一粟。啤酒新品牌如果成功被推銷出來，最重要的還是要背靠大山，獨立的精釀啤酒品牌最好還是被行業龍頭企業收購，在強大的資源扶持下才能更好地開花結果。縱觀市場，像海底撈、盒馬、星巴克也都推出了自己的精釀啤酒，精釀啤酒最大的亮點就是口味比工業啤酒更好。如果想持續走下去，精釀啤酒一定要想辦法多管道尋找與大企業的合作方式，想辦法實現多管道銷售，讓更多的普通大眾能接觸到，才能實現最終獲益。據韓國 CU 便利店等統計，精釀啤酒銷售排名中出現了“熊牌小麥啤酒”的新品牌，大受歡迎。該精釀啤酒超越了 Cass、Terra、Hyneken 等，成為便利店罐裝啤酒總銷售額的第一位⁶。中國以通過開發便利店等線下國家管道，推廣精釀啤酒，使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方便地飲用精釀啤酒。在未來發展中，要提升啤酒品質，打造品牌，應該加強市場宣傳和行業合作。

¹ PLUMMER R, TELFER D, HASHIMOTO A, et al. Beer tourism in Canada along the Waterloo Wellington ale trail[J].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3): 447

² 林俊帆，林耿. 意义、权力与再物质化：食物消费，地理新进展人文地理, 2014(6): 40—46

³ 李颢. 从平台经济视角浅谈啤酒节与啤酒产业的关联和发展建议. 艺术地理. 2019(5): 295—

⁴ 顾雨霞. 中国啤酒业如何守住黎明？[N]. 中国食品报, 2021-05-13

⁵ 杨雪. 浅析我国啤酒企业发展现状及对策[J]. 现代经济信息, 2018(7): 351—352.

⁶ https://www.sohu.com/a/465033773_121045293

結 論

中國目前的啤酒市場已經走完了靠啤酒開拓市場的時代，新生消費群體對口感的追求、較高的消費能力，都在催化精釀啤酒市場的發展。與韓國啤酒市場相同，中國啤酒已在高端化趨勢下開啓以價格上升爲主要驅動的增長模式。不同于韓國各個地區之間的需求同質化，中國各省的啤酒消費習慣和口味偏好存在一定差異，疊加啤酒產品銷售半徑小的特點，短期內較難出現一兩家市場獨大的局面。中國如果想在精釀市場中分到一杯羹，必須尋求龍頭企業的庇護。傳統的價格戰已經不能滿足現代人對健康的追求了，中國精釀啤酒應努力在創新和健康技術方面加大投入和尋求政府支持。如若想在今後的道路中繼續發展，合作與創新是不可避免的應對之策。

參考文獻

- 尹麗梅. 讓更多的人喝到中國的精釀啤酒[J]. 中國商界, 2017(3): 116-119.
- 楊婧娥, 王佐民, 于宏偉, 等. 精釀啤酒的發展前景[J]. 釀酒, 2018(4): 29-31.
- 劉一博. 精釀啤酒的是是非非[N]. 北京商報, 2017-09-17(D01).
- 譚咏, 徐紹絲, 黃鷺強. 精釀啤酒用麥芽的種類和特點[J]. 福建輕紡, 2020(12): 9-14.
- 黃琳, 葛秀琪, 張元夫, 等. 精釀啤酒專用麥芽的研究進展[J]. 中國釀造, 2020, 39(2): 7-12. 21
- 班允鳳. 啤酒物流的信息化變革[J]. 中國物流與採購. 2006 年第 12 期: 26-27
- 李岩. 運輸與配送管理[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0
- 林俊帆, 林耿. 意義、權力與再物質化: 食物消費, 地理新進展人文地理, 2014 (6). 40-46
- 李顯. 從平臺經濟視角淺談啤酒節與啤酒產業的關聯和發展建議. 藝術地理. 2019(5) 295-296
- 顧雨霞. 中國啤酒業如何守住黎明? [N]. 中國食品報, 2021-05-13
- 楊雪. 淺析我國啤酒企業發展現狀及對策[J]. 現代經濟信息, 2018(7): 351-352.
- 두산그룹. 배오개에서 세계로: 두산 100 년 이야기. 서울, 한국. 1996. p1-2.

- 원윙희. 상큼한 맥주의 세계. 보경문화사, 서울, 한국. 1997. p2-4.
- Ansoff H. I. Corporate strategy[M].New York:McGraw-Hill,1965.
- Berg, C. Crafting beer for world's biggest market, China Daily, 2013.
- Bowerson D. J. The Strategic Benefit of Logistics Alliances[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ly-August, 1990: 85
- Green, R. China's craft beer revolution. SIXTH TONE, 2016.
- ROGERSON C. M. Craft beer, tourism and local development in South Africa[M].
HALL C. M, GOSSLING S. Food Tour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Networks, Products and Traject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244-258.
- MUNAR A. M. Reveal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outrageous beer tourism [R]. CLCS
Working Paper Series. Copenhage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2012.
- Plummer R., Telfer D., Hashimoto A, et al. Beer tourism in Canada along the
Waterloo _ Wellington ale trail [J].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3) : 447.

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Craft Beer Industry from a Perspective of Korean Counterpart

LI Ming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Abstract: As consumer demand for beer flavour and quality continues to rise, the beer industry is constantly updating and developing to meet the market's needs. Among them, the development of craft beer, which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must be mentioned. This paper uses the SWOT method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model case of Korean craft beer.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raft beer industry in Korea, it speculates the measures that China should take at present: 1) Craft beer cultural tourism and publicity; 2) Craft beer enterprise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countermeasures; 3) New way out for craft beer production.

Keywords: Chinese Craft Beer, Korean Craft Beer, Comparison between Korean and Chinese Beer

投稿日期	2023. 4. 6	審査日期	2023. 8. 9	刊載日期	2023. 12. 28
------	------------	------	------------	------	--------------

Chinese Teaching

漢語教學

“互聯網+”語境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學生媒介素養現狀調查研究

鄭茹娟 劉 玥¹

（衡陽師範學院，中國衡陽）

摘要：隨著世界“漢語熱”大潮的推進，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已然成為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在“互聯網+”時代下，傳播中國文化重要主體之一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注重提高自己的媒介素養能力更是大勢所趨。本研究調查研究的主體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從調查其對媒介資訊的認識、判斷、製作、創建等能力入手，分析其媒介素養的能力以及產生偏差的成因。在此基礎上結合經驗事實，提出“互聯網+”語境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媒介素養的提升策略。

關鍵字：“互聯網+”；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媒介素養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 2021 年 5 月 31 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的重要任務。要更好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以文載道、以文傳聲、以文化人，向世界闡釋推介更多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精神、蘊藏中國智慧的優秀文化。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跨文化傳播的“民間使者”，國際中文教師的媒介素養對於其擇取資訊、提高教學能力、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更好地落實總書記關於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講話精神，本課題展開了對於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媒介素養現狀調查研究，旨在瞭解當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媒介素養的現狀並提出針對性建議，以此促進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媒介素養的發展，從而更好更快地適應當前“互聯網+語境”下“漢

¹ 鄭茹娟（1981- ），女，湖北襄陽人，衡陽師範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漢語國際教育研究。劉玥，衡陽師範學院文學院 2020 級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生。基金專案：2021 年度湖南省大學生創新創業計畫項目“‘互聯網+’語境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媒介素養現狀調查研究”湘教通〔2021〕197 號，序號：3198。

語熱”的浪潮，以達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目的。

媒介素養指人們能夠科學地認識媒介、理性地選擇與接觸媒介，正確有效地理解媒介內容，能夠積極、主動面對並分析、判斷和傳播各類媒介資訊的能力。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美國媒體素養研究中心提出媒介素養是人們面對媒介與媒介資訊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思辨能力以及創造與製作媒介資訊的能力。與之相關的“媒介素養教育”是培養人們面對媒介與媒介資訊時的相關能力。

國際中文教師不僅是媒介資訊的接受者，更是漢語言的傳授者。作為未來的國際中文教師，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應具備良好的語言教學能力、擁有深厚的漢文化底蘊、有較強的社會適應力以及甄別媒介資訊的能力。漢語國際教育教學模式將網路教學與課堂教學相結合是時代發展的需要，而網路教學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去掌握扎實的專業基礎，該專業學生還需熟練運用互聯網等現代媒介，使網路漢語教學更加直觀化、普及化。

“互聯網+教育”模式對於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而言，除去具有公益教育職能，還具有較高的經濟效益。與漢語國際教育有關的網路平臺、app 等相繼出現，符合互聯網全體市場化理念。李瑋在《漢語國際教育教學模式在互聯網影響下的轉變》中提到：“許多企業正是抓住了這一機遇，從而獲得了可觀的收益利潤。如出自氦空間的 Chineseskill，其獲得了雲天使基金領投、真格 基金跟投的 500 萬人民幣天使輪融資，用戶數四萬左右 45%用戶來自美國。” 因此，無論從職業素養、教育職能還是經濟效益的角度，漢語教師都需將媒介素養教育作為職業發展的要求。

一．“互聯網+”語境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媒介素養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一）漢語國際教育獨特的公共外交性質的要求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是未來國際中文教育的中堅力量，國際中文教育與漢語國際傳播有著密切的聯繫。國際中文教師的媒介素養影響著漢語國際傳播、影響著漢語學習者乃至赴任地居民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認知。在當下網路時代，國際中文教師也面臨著新的挑戰，他們的媒介素養也越來越重要。因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角色定位的特殊性，其應具備的媒介素養不僅僅是作為學生需要的普適性

媒介素養、更是作為教師、作為文化傳播者所需要的媒介素養。因此，研究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媒介素養很有必要，這不僅關係到未來國際中文教師教學能力的問題，更關係到漢語國際傳播、中國國家形象的問題。

從 2013 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就多次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在十九大報告中，總書記再次強調，要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破除誤解、增進友好交流、樹立良好的中國形象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要責任。

當今時代，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許多國際間的交通、交流被迫阻斷，而為適應全球化發展趨勢、減少疫情風險，隨著互聯網的全球用戶不斷增加，建立在互聯網之上的交流、教育空前崛起。公共外交著眼於異質文明之間的溝通，那麼在不同語言的溝通中，面對龐雜的資訊時該如何進行選擇、在因語言產生的文化差異誤解時該如何理解化解、對於貼在中國身上的惡意的意識形態標籤該如何質疑反駁、如何以利用互聯網來創造與製作中國好故事來完成公共外交中的精神交流等等，都指向了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素養——媒介素養。

（二）漢語教師多重角色的要求

教師角色是指教師綜合社會期望和自身能力，為適應教學環境而表現出來的特定的行為方式，它不僅包含學校對教師的客觀要求，也包含教師因個體差異而造成的主觀色彩。¹ 社會期望、客觀要求等繪製了教師角色，要求教師要能根據場所的不同扮演合時宜的角色。黃鶯等人（2008）分別從“語言”和“文化”兩個方面定義漢語教師的角色，即漢語教師既是語言傳授者，又是文化使者，同時在互聯網時代下，在進行漢語教學、漢文化推廣工作的同時，國際中文教師還是媒介資訊的接受者。作為未來的國際中文教師，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有著具備良好的語言教學能力、瞭解深厚的漢文化底蘊、擁有較強社會適應力以及甄別媒介資訊的要求。

在“互聯網+”時代下，漢語國際教育教學模式將網路教學與課堂教學相結合是時代發展的需要，作為語言傳授者，網路教學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需要掌握扎實的專業基礎外，還需熟練運用互聯網等現代媒

¹ 鞏建華. 國外教師角色研究述評. [J]. 上海教育科研. 2011(10)

介技術，培養相應的媒介素養，使得網路漢語教學更加直觀化、普及化。作為文化使者，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在使用新媒介時應具備選擇能力，在博大精深的漢文化中學會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靈活運用互聯網等現代媒介將漢文化傳播開來，打破西方壁壘，講好中國故事，發揚中國精神。

（三）互聯網時代對漢語教師職業發展的要求

將先進的互聯網技術與課堂教學相結合，以此為基礎，打破傳統教育教學的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從而進行大規模的教學，“互聯網+”教育受到了師生的一致好評，發展規模不斷擴大。我國的傳統教育模式中，教師在教學中扮演著中心角色，在整個教學活動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學生只有跟隨教師教學這一條主要途徑來學習、吸收知識。網路教學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國這一傳統教育模式，越來越多的教師、越來越多的精品課涌入互聯網，學生獲取知識的方式更為方便快捷，這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專業要求，也對教師融入互聯網時代，提升媒介素養提出了要求。媒介素養高的教師能在網路教學模式中不斷適應新興教學模式、接觸到專業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提高自身教學能力、為學生答疑解惑等等。由此及彼，國際中文教師在網路教學模式中不僅能提高自身素質，而且能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

二．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媒介素養現狀調查分析

（一）調查對象說明

湖南省開設該專業的學校共十所，本研究採取抽樣調查的方式，選擇其中五所學校（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湘潭大學、衡陽師範學院、湖南城市學院）進行調查。本次調查起始時間為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4 月，涉及該專業不同的年級層次。採用以問卷星進行線上調查的方式發放與收集問卷。共發放 327 份調查問卷，經篩選排查，獲得有效份數 300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1.74%，大一年級占比 33.33%，大二年級占比 22.67%，大三年級占比 34%，大四占比 10%。

2. 問卷設計與效度驗證

問卷共設置 42 道題，其中 40 道客觀題，2 道主觀題，分為“個人資訊”、“從媒介認知情況”、“媒介選擇能力”、“媒介言論與資訊態度”、“媒介使用與製作情況”、“媒介素養的培養情況”六個板塊。

本問卷做到了覆蓋性和隨機性的結合，具有較好的可信度。根據表 1， $KMO > 0.6$ 且顯著值 $p < 0.05$ ，證明問卷題目設置有效。

表 1 效度分析結果

效度分析結果

KMO 值	0.658
p 值	0.000

（二）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媒介素養現狀描述性分析

1.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媒介認知情況

新媒介以數位化、互動性為根本特徵，是向所有人即時交互地傳遞個性化複合資訊的傳播介質。由表 2， $p=0$ ，各選項間的差異比較大，其中手機、網路、電視普及率和回應率較高，表明該專業學生對於新媒介的認知較清晰。55.67%的同學什麼領域的網路話題都關注一些，28.33%的同學關注 3 個及以上的網路話題，16%的同學關注 1-2 個話題，表明該專業大部分的學生關注話題範圍廣。

對於互聯網對日常生活、學習的影響，65%的同學認為影響深刻，34.33%的同學認為影響較大，僅有 0.67%的同學認為影響較小，更加印證了互聯網對該專業學生的影響之大。現今互聯網滲透進生活各個角落，如購物、線上教學等，表明了利用好互聯網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同時互聯網的作用猶如雙刃劍，表 2 顯示 $p=0$ ，說明受試者對於互聯網所帶來的影響的看法差異性比較大；其中“提供了娛樂放鬆的途徑”“豐富了知識，開拓了眼界”“提供了遊戲交友的平臺”普及率和回應率較高，說明互聯網的知識、娛樂、遊戲領域對該專業的學生影響很大，這啓示在宣傳媒介素養時要簡單易懂、有趣放鬆，同時兼顧交友交流，提供關於“媒介素養”問題的交流平臺；另一方面，有一半多的同學認為互聯網影響了正常的學習計畫，表明互聯網的消極作用較大。

表 2：回應率和普及率

1、哪些属于新媒介？				2、互联网带来了哪些影响？			
项1	响应率		普及率 (n=50)	项2	响应率		普及率 (n=50)
报刊	4	2.96%	8.00%	提供了娱乐放松的途径	48	26.52%	96.00%
广播	8	5.93%	16.00%	丰富了知识，开拓了眼界	49	27.07%	98.00%
电视	21	15.56%	42.00%	提供了游戏交友的平台	38	20.99%	76.00%
书籍	4	2.96%	8.00%	影响正常的学习计划	32	17.68%	64.00%
手机	49	36.30%	98.00%	沉迷网络与身边人疏远	10	5.52%	20.00%
网络	49	36.30%	98.00%	其他	4	2.21%	8.00%
汇总	135	100%	270.00%	汇总	181	100%	362.00%
拟合优度检验: $\chi^2=102.289$ p=0.000				拟合优度检验: $\chi^2=60.624$ p=0.000			

2. 媒介選擇能力

互聯網時代，媒介選擇能力是衡量媒介素養的重要指標。豐富多樣的媒介類型與海量媒介資訊既帶來了可選擇的多樣性，也考驗了使用者的媒介選擇能力。該專業學生提高媒介素養的同時，要注意把握時間和效度的統一，而提高媒介選擇能力是降低沉沒成本的關鍵點。

問卷調查顯示，該專業學生日常接觸最多的媒介為手機(96%)和網路(89.67%)，而報刊和廣播使用極少，不足8%。這與新媒介的廣泛使用和傳統媒介衰落的現狀相符合。且調查對象每天使用互聯網時長大於2小時的頻次高達295，有接近一半學生使用時長大於6小時。其中使用時間較長的app類型為社交類、視頻類、學習類，滿足了該專業學生查閱資料、社交聊天等的需求。有超過一半學生接觸媒介的主要原因是打發時間。對此，研究者發現學生對互聯網超長時間的投入既體現了新媒介的重要性，又要注意時間沉沒成本的問題。

在進行有目的的選擇時，一半以上學生能從百度等搜尋引擎，微博知乎、朋友圈等途徑獲取目標資訊，體現了互聯網時代資訊來源的多樣性。更多學生傾向于文字資料(86%)、視頻(83%)、聊天詢問(43.67%)的方式詢問專業知識相關的資料，與接觸的媒介的方式成正相關。這些詢問方式有獲取知識快捷、資料整合比較到位、有用資源多、資訊比較可靠的優點。該專業學生在獲取目標資訊媒介方式的選擇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和目的性，大多數選擇主流媒介進行資料收集。進行資訊篩選時，超過一半學生選擇通過搜索關鍵字篩選。

3. 言論與資訊態度

網路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及網路過濾不實資訊的能力有限，因此海量資訊資源良莠不齊。如何快速選擇出正確的、有用的資訊是該專業學生不可避免的難題。

據調查，51%的調查物件認為網路獲取的資訊對學習的說明作用需視情況而

項目	平均值	標準差	20.您會質疑媒介傳播內容的真實性嗎?	22.在您轉發或分享媒介信息時, 您會先判斷其真實性嗎?	24.在面對一些不尊重事實, 對我們社會現象曲解制度抨擊的言論時, 您會	25.當看到熱搜上爭議較大的事件, 您的態度是	26.您在網絡中遇到迷信、暴力、色情等內容時的態度是
20.您會質疑媒介傳播內容的真實性嗎?	1.20	0.44	1				
22.在您轉發或分享媒介信息時, 您會先判斷其真實性嗎?	1.46	0.56	0.39**	1			
24.在面對一些不尊重事實, 對我們社會現象曲解制度抨擊的言論時, 您會	2.83	0.98	0.03	-0.12*	1		
25.當看到熱搜上爭議較大的事件, 您的態度是	1.92	0.57	0.17**	0.17**	0.03	1	
26.您在網絡中遇到迷信、暴力、色情等內容時的態度是	1.62	0.71	0.23**	0.31**	-0.11	0.19**	1
* p<0.05 ** p<0.01							

定, 46% 學生認為網路資訊對學習有說明, 網路資源已成為學生學習的重要資訊來源。學生判斷資訊是否有用的參照標準較多, 體現學生面對網路資訊的謹慎性。其中有 85.33% 依據權威平臺判斷資訊的真實性, 79% 的學生通過資訊對比甄別資訊, 還有 46% 的學生依據發布資訊作者的身份、自行辨別的方式進行資訊判斷, 少數人通過詢問家長朋友的意見判斷資訊。由此可見, 學生主要依靠協力廠商對資訊進行初步判斷, 而依靠自己獨立判斷和自行對比資訊的占比不高。一方面因為本科學生知識儲備和社會經驗有限, 獨立判斷時能調動的相關資料少,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學生獨立思考的意識亟待增強。判斷媒介資訊的思辨能力有待提高。此外, 該專業學生對媒介資訊提出質疑的能力也有待提高。據調查, 當學生在網上看到不贊同的言論時, 55% 學生選擇不予理睬, 但也有 50.67% 學生選擇瞭解言論的源頭背景, 嘗試理解說話人的意圖, 42.67% 學生選擇有理有據地發表自己的觀點並進行辯論, 12% 學生選擇生氣並進行對質。不論孰對孰錯, 單就個人觀點不合的言論, 多數學生選擇不起衝突的方式解決。選取問卷中有關媒介資訊質疑的五個問題的相關性分析中, 對不尊重事實抨擊社會制度的言論態度與質疑媒介資訊真實性、對熱搜爭議較大事件的態度 p 值均為 0.03, 說明二者存在明顯相關性, 這體現學生關心時事且勇于表達質疑的態度。在面對不尊重事實、曲解社會現象的言論時, 單選題中選擇不予理睬的頻次 91 略低於用知識有理有據進行反駁的頻次 103, 學生選擇舉報的頻次為 73。這表明多數學生能進行理性判斷。

4. 媒介使用與製作情況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不僅是媒介的使用者, 也是媒介的回饋者、創作

者。媒介素養的提高更重要的體現是學生積極參與到媒介創作中，以媒介為中介向世界輸出新資訊，體現自己的專業知識和專業素養。

據調查，63%的學生能熟練運用各種媒介獲取學習資源，與學生接觸媒介的動機最多為查閱資料的資料相符合。學生獲取資訊的再加工方式具有多樣性，複製到文檔再進行整理加工的占比高達 79.33%，紙質整理有 58.67%，用思維導圖或和老師朋友探討占比 30%左右。學生對媒介資訊的回饋主要表現為內部消化，而非外延拓展，因此學生媒介使用熟練但使用方法有待改進。若想役物而非役于物，就要利用媒介進行有效輸出。該專業學生經常參與的媒介互動有微博空間、抖音評論點贊、遊戲娛樂等，這些互動平臺的互動參與度高，但停留於日常生活與娛樂的淺層且內容單一，沒有深入到媒介內部，學生媒介創作效率低。有 19.67%的學生不會進行創造或創作，大部分學生利用社交網站或社交軟體進行創造，僅 6%傾向發表學術論文進行輸出。創造形式多樣，有視頻、圖文輸出等。創造平臺的豐富性和輸出方式的多樣性為該專業的學生提高媒介素養提供了很好的創作條件，學生該如何提高自己的媒介素養製作能力，從而有意識地利用好互聯網資源進行有效輸出。

5. 媒介素養的培養情況

在總樣本中，學生對媒介素養概念認知模糊不清，對資訊甄別能力、創作能力都有待培養。在該現狀下，學校對於漢語國教育專業學生的媒介素養重視程度仍然不夠。網路傳播概論可以直接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媒介素養，但僅有 13%的受訪者課程中有網路傳播概論課程。文獻檢索能提高學生篩選資訊的能力，只有 38.67%的受訪者課程中有文獻檢索。同時研究者注意到，即使有 70%的受訪者課程中有現代教育技術，但是該課程的教育效果不佳，絕大部分受訪者在互聯網上進行創作的途徑是發朋友圈、qq 空間。該途徑傳播範圍較窄，技術空間小，涉及到的專業知識不多。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對媒介素養培養的認知情況是受試者對媒介素養展現出最直接、直觀的思考的議題。在培養認知情況的描述性分析中，問卷選取了五個與該專業學生對媒介素養培養的認知情況關聯程度較高的問題，考察受試者對媒介素養培養情況的認知。通過比較五個問題單個均值、標準差，我們發現，除了“您認為學校是否有必要開設與‘媒介素養’相關的教育課程”和“您認

為學校是否應該健全媒介素養師資體系”的均值在 1 左右徘徊外，其他問題平均值都在 1.4-1.9 之間，這說明受試者對這類議題均表達了較強的關注。在總樣本中，88%（共 240 人）的受訪者認為媒介素養是該專業學生必備的能力，且 61.67% 的受訪者認為媒介素養的高低對未來就業有著比較大的影響。大多數受試者都有主動提升媒介素養的意識，且將媒介素養與就業掛鉤。

項目	平均值	標準差	32. 您認為媒介素養是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必備的能力嗎？	33. 您認為學校是否必需要開設與“媒介素養”相關的教育課程呢？	38. 您認為媒介素養的高低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就業影響大嗎？	39. 認為學校是否應該健全媒介素養師資體系？	35. 您認為在疫情的影響下，使用互聯網進行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教学會更加重要嗎？
32. 您認為媒介素養是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必備的能力嗎？	1.88	0.33	1				
33. 您認為學校是否必需要開設與“媒介素養”相關的教育課程呢？	1.09	0.28	-0.07	1			
38. 您認為媒介素養的高低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就業影響大嗎？	1.81	0.61	-0.03	0.14*	1		
39. 認為學校是否應該健全媒介素養師資體系？	1.04	0.20	-0.12*	-0.01	0.36**	1	
35. 您認為在疫情的影響下，使用互聯網進行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教学會更加重要嗎？	1.47	0.58	-0.11	0.14*	0.36**	0.20**	1
* p<0.05 ** p<0.01							

三．提升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媒介素養的路徑思考

（一）創新課程設置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作為一門新興專業，專業歷史短暫，學科建設亟待完善，其中課程設置是保證教學品質的關鍵。良好的課程設置不僅能使學生掌握豐富的知識，還有助於學生在頭腦中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從而幫助其利用多種方法在專業領域中深耕，滿足未來職業對於學生專業素質的需求。我們知道課程設置是以人才培養為主要目標的，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為：本專業培養掌握扎實的漢語基礎知識，具有較高的人文素養，具備中國文學、中華文化、跨文

化交際等方面專業知識與能力，能在國內外各類學校從事漢語教學，在各職能部門、外貿機構、新聞出版單位及企事業單位從事與語言文化傳播交流相關工作的中國語言文學學科應用型專門人才¹。據調查，衡陽師範學院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本科課程設置中缺少能提高學生媒介素養能力的必修課，同時調查問卷結果顯示該專業學生大多認為媒介素養對學生未來發展十分重要，希望學校開設相關課程。當然，培養這種應用型專門人才對我們的課程設置要求很高，加之如今互聯網技術高速發展，“互聯網+”的創新潮流已是大勢所趨，社會對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專業素質也有了新的要求，媒介素養就是新的要求之一。因此，我們可以在創新課程設置中，增加講解新媒體基本知識，介紹新媒體的運作模式，探討疫情下新媒體平臺對探尋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新出路的意義，介紹新媒體的內容的策劃、撰寫、修檢、宣傳等新課時。這些課時組合為媒介素養模組，媒介基本知識作為必修課，其他延伸課可作為選修課，讓學生按照自己感興趣的領域進行選擇與進修。其中跨文化傳播媒介問題研究可作為一門必修課，使學生把所學的媒體知識與專業要求緊密聯繫，探尋新媒體對跨文化傳播產生積極動力的更多可能性。

（二）優化課程教學改革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論知識需要在多次實踐中加以甄別，對學生而言，這也是一個回爐再造的過程，付諸實踐才能在實踐中汲取新的養分，豐富和完善自身的知識，提高專業的綜合素質，為未來職業發展搭橋。據調查，漢語國際教育的專業課主要以老師傳授知識，學生接收知識為主要方式。當學生處於被動方時，其學習效果將大打折扣。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畢業後，可以報考語言文字學、國際漢語教育碩士研究生，經過繼續深造可在大學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工作，也可以在國內漢語培訓機構、漢語學校及國際中、小學從事教學或教學管理工作，也可以在其他部門從事文員工作，其專業性和應用性也決定了實踐能力的重要性。因此在優化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課程教育改革中，首先要在專業課教學中以案例式教學、互動式教學為主，充分發揮互聯網的跨界融合功能，利用媒介資訊的多樣性，收集包含有問題或者疑難情景且可能有解決方法的教學事件作

¹ 程娟，施家煒. 漢語國際教育本科專業建設研究. 2013 年全國高校漢語國際教育/對外漢語本科專業建設研討會文選[M]. 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2017. 第 301--307 頁.

為案例，增強學生的問題意識和實踐活動中解決問題的敏銳度，積累知識經驗，建立新的思維模式，把事件案例的始末在課堂中動態呈現，引導學生深入思考，加以討論，提高學生對媒介資訊的辨別能力和處理水準。隨後還可以在課堂教學中增加運用媒介的創作實踐課時，如利用新媒體的資料和多種設計手段撰寫跨文化傳播等專業相關方案，並撰寫媒介素養實踐報告，讓學生在親身體驗中增強對媒介的瞭解，並熟練運用媒介解決專業問題，提高學生的媒介素養水準。

（三）健全媒介素養師資體系

教師水準要求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教師應當具有良好的品德和職業操守，熱愛中華文化；具有堅實的專業素養和開闊的視野，系統掌握本專業的基礎理論和方法；具備獨立從事教學科研的能力，能夠適應中文學科人才培養的需求，處理好知識傳授與能力培養的關係；尊重學生人格，關注個體發展，注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引導學生進行主動而富有個性的學習¹。

據調查，衡陽師範學院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必修課中缺少媒介素養相關課程，相應地對口教師資源也較為匱乏，且學生對媒介的專業知識瞭解不深，不能滿足互聯網熱潮下學生關於媒介素質的職業需求。因此，對外漢語媒介素養教師不僅應具備以上一般教師的條件，還應該有過硬的專業素養，尤其是在對外方面的媒介素養能力。以此為出發點，我們可以考慮邀請權威媒體的對外聯絡部分負責人，外事辦的研究人員的等作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特聘教師，為學生講解國內外媒介資訊的傳播規律和社交媒體的使用技和注意事項等。這些特聘教師可以為學校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師資隊伍壯大力量，更好地提高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綜合素質，培養互聯網時代下的新型人才，更好地促進中華文化傳播，加強與世界文化的交流。

（四）利用互聯網搭建媒介素養教育平臺

考慮到線下媒介素養教學的關於時間和地點的限制性，利用互聯網搭建沒接素養教育平臺也是一種實用且實惠的新學習方式。互聯網教學的出現給漢語國際教育專業提供了很好的校企合作平臺，校企合作不僅提供了學生實踐的機會，讓學生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在學習中針對性地回爐再造，提高解決問題的力，還提供

¹ 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編. 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品質國家標準上[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第 85-89 頁。

了真實語料及用戶需求以供研究分析,使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實現產目錄相融合¹。

網路教育平臺是支援網上教學與學習活動的軟體系統,這種現代遠端教育能更好地為學生服務。一方面,學生可以合理安排閒置時間進行媒介素養的網路學習,學習媒介相關知識。另一方面,符合對外教師條件的學生可以利用媒介平臺進行實習教學,充分利用媒介,增加實踐經驗。除此之外,考慮到嚴峻的就業市場下不再滿足“專一職業”的斜杠青年大量涌現的現狀,學生們還可以考慮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加入校企合作的媒介素養平臺,這樣既能拓展未來職業的選擇項,也能為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接受媒介素養教育的網路平臺建設添磚加瓦,或者自行找準機遇進行互聯網線上教學平臺的相關創業活動,為國內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提供良好的媒介素養學習平臺。

五. 結論

本次研究中,我們通過問卷調查分析了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媒介素養現狀,並從創新課程設置、優化教學改革、健全媒介素養師資體系等角度提出了提高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的媒介素養的措施。在國家對外傳播戰略的大背景下,國際中文教師要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基礎上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當前各類社交媒體已經成為文化傳播和交際的重要平臺。對此,漢語國際教育人才要通過培養媒介話語表達能力,判斷媒介價值觀和倫理的能力等途徑,提升文化傳播的媒介素養,為我國對外傳播的軟實力築牢根基。

參考文獻

- [1]張開. 媒介素養概論. 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M]. 2006 年.
- [2]Hans N. Tuch.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St. Martin' s Press, NY, 1990.
- [3]苗苗. 重慶師範大學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課程設置學生問卷調查[D]. 重慶師範大學, 2015.
- [4]李瑋. 漢語國際教育教學模式在互聯網影響下的轉變[J]. 桂林航太工業學

¹ 張暘. 互聯網背景下校企合作在漢語國際教育專業人才培養中的應用. [J]. 文教資料. 2019(04).

院, 2019.

[5]王珏. 權力與聲譽——對中國在美國國家形象及其構建的研究[D]. 復旦大學. 2006

[6]黃鴻業. 跨文化傳播的價值觀選擇——兼談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媒介素養教育[J]. 百色學院, 2018 (03) .

[7]侯麗娟; 蔣力. 國際漢語教師的媒介素養現狀與提升對策[J]. 四川外國語大學, 2019.

[8]鞏建華. 國外教師角色研究述評[J]. 上海教育科研. 2011 (10) .

[9]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編. 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品質國家標準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Investiga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a Literacy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

ZHENG Rujuan LIU Yue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una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world “Chinese language craze” tid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to strengthe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to tell China’s stories well, spread China’s voice well, and show the real, three-dimen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China. In the era of “Internet +”, it is the general trend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Chinese languag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ne of the important subjects of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to improve their media literacy ability. The o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students majoring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arting by investigating their ability to understand, judge, make and create media information and analyzing their ability of media literacy and the causes of deviation.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empirical facts, the strategy of improving the media literacy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 is proposed.

Key words: “Internet +”; Major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edia literacy

投稿日期	2023. 9. 6	审查日期	2023. 10. 9	刊载日期	2023. 12. 28
------	------------	------	-------------	------	--------------

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助力高師聲樂教學高質量發展

程德祥¹

（淄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音樂系，山東淄博）

摘要：中國詩詞藝術歌曲是中國古典詩詞藝術歌曲和現代詩詞藝術歌曲的統稱，涵蓋從先秦以來《詩經》《楚辭》《漢樂府民歌》《唐詩》《宋詞》等流傳至今的古典詩歌及其現代作曲家改編創作的藝術歌曲。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以其鮮明的民族風格、豐富的藝術內涵、深刻的意境和特有的審美情趣，越來越受到大眾的普遍歡迎，尤其在高校聲樂教學中更是喜愛有加。高校的高質量發展更加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和綜合素質，尤其注重學生創造力、批判性思維、溝通能力和團隊合作等能力。本文以中國古典詩詞為載體探討聲樂教學的創新方法，轉換育人理念，以期踐行高校教育的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中國詩詞；古詩詞藝術歌曲；聲樂教學；教育的高質量發展

國家的希望在于人才，人才的培養離不開教師。“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師是立教之本、興教之源，承擔著讓每個孩子健康成長、辦好人民滿意教育的重任。高等師範院校作為我國師資培養的主陣地，擔負著為中小學校培養師資的重要使命。高等師範院校師資培養的質量直接關乎到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一、高質量發展對師資素質提出了更高更新要求

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和社會日新月異的進步，始於經濟社會領域的高質量發展對各行各業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與挑戰，教育行業也不例外，同樣需要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主動適應高質量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變化，積極嘗試利用好當今科技成果來不斷完善新時代的人才培養模式，積極轉變傳統固化的教育理

¹ 程德祥，男，山東淄博人，博士，淄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音樂系副教授，研究領域：音樂教育。電郵：musicnight@qq.com.

念，把人才的培養過程與社會對人才素質和能力的切實要求密切結合起來，通過一系列教育的革新和調整，提高師資培養的質量和水平，培養更多素質更高、能力更全面的優秀師資，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教育高質量發展。

音樂師資的培養是我國高等師範院校（高師）音樂教育義不容辭的職責和使命。當前，我國高師的音樂教育類專業還存在許多弱項和短板，某種程度上嚴重阻礙了高師人才培養的高質量發展。要從根本上提高音樂教育專業人才的培養質量，亟需對我國現有國情和教育發展形勢進行必要的改革和創新，努力補齊短板和弱項，積極大膽嘗試課程的創新，進一步優化音樂教育專業的課程方案和知識結構，在課程中有機地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元素，提高音樂教育專業人才培養的效率和質量，為社會培養更多素質全面的應用性人才，實現教育的高質量發展。

二、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對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意義非凡

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是教育的根本性問題，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是新時代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務。教育工作者能否真正做到堅定“四個自信”，成為培養堅定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關鍵所在。以教師自己堅定的“四個自信”影響和帶動青少年，讓“四個自信”入學生腦、入學生心，讓青少年將“四個自信”從理論自覺逐步上升為行動自覺。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國既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同時也是一個具有“天下”情懷的世界大國。博采世界衆長辦教育，汲取的是世界各國文明的優秀成果和有益經驗，體現的是當代中國恢弘的歷史視野、寬廣的民族心胸。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立足于中國基本國情，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博采各國文明之衆長。這一切都充分體現了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國際化和文化的包容性內涵要求，必然對教育的高質量發展起到積極有效的促進作用。¹

以中國古詩詞為典型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在歷史文化發展進程中逐步形成的華夏民族寶貴精神財富，其中蘊含了優秀的道德思想，承載著豐富的文化資源，具有重要的育人價值。我們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思想觀念、

¹ 舒田恬. 淺析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的音樂創作與傳承. 戲劇之家, 2023, (24): 75-77.

人文精神、道德規範等融入到高師的音樂教育人才培養體系之中，讓當代中國大學生能夠充分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營養，讓中華傳統文化能夠不斷地豐富和發展大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視域和空間，增強大學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實效性，同時又能結合時代要求不斷創新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讓學生能夠主動適應國家的經濟發展形勢和教育改革發展趨勢，主動適應快速變化的社會、經濟環境和教育改革的步伐，提高教育對象的適應性，這更符合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要求。

在聲樂教學中運用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不僅可以提高學生的理解能力，更好地培養學生的二度創作創新能力；同時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能夠提高學生的文化修養，使學生的樂感得到應有訓練；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能夠豐富聲樂教學的內容，拓展聲樂課程的知識寬度與深度；由於古詩詞藝術歌曲對於歌唱者演唱技術要求相對較高，需要演唱者具備一定的演唱和文學功底，誠然，通過大量的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的演唱，勢必會有效地提升學生的整體歌唱水平，使歌唱技巧得到更多地應用和訓練。

比如，學生在演唱青主根據蘇軾詞而創作的藝術歌曲《大江東去》時，通過反復的研究揣摩後，能夠深刻的理解詩人“懷才不遇”的悲憤心情；詩人在詩詞中除了表達了濃濃的懷舊情緒外，還蘊藏著極深的文化內涵。再如，在演唱根據宋代李之儀的詞而創作的《我住長江頭》時，除了要表達詩詞中的深切思念之外，還應該為一段忠貞不渝的愛情深深贊嘆。此外，曲作者青主還把一種強烈的愛國情感也融入其中，這也為演唱者在演唱時的再度創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通過類似作品的學習和演唱，可以從根本上提高學生的文化修養，對不同古詩詞的文化內涵都有更深入透切的理解。¹

三、弘揚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是建立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有力彰顯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運用於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之中。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反復強調，在新時期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高民族道德素養，更好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也

¹ 陳晔因. 古詩詞藝術歌曲融入高校聲樂教學的實踐策略研究. 焦作大學學報, 2023, 37(03):75-79.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的連續性文明，五千年的連續發展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徵。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一套相對完整的思想理念、價值觀和民族精神。這主要體現在：天人合一，中華民族歷來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崇尚“人道”和“天道”的高度一致，而不是強調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尤其不主張人和天的對立，而主張天和人的協調；以人為本，中國的聖人先賢們歷來主張“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者，天地之心”，在這些理論和主張中積極肯定人是宇宙的中心；崇尚德義，中華文明高度重視人的德性品格，重視德性的培養和人格的提升，那些有高尚精神追求的人士在中國歷來被高度推崇。孔子曰“殺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而取義”，他們都一致認為道德信念的信守和道德理想的堅持可以不受物質條件影響，在一定的條件下甚至於比生命還重要。除了這些核心理念，中國文明通過數千年的發展衍變從而確立了自己獨特的價值偏好，即“責任先於權利，義務先於自由，社群高於個人，和諧高於衝突”。¹

四、利用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的聲樂教學培養學生的創新和創造能力

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的聲樂教學，在傳播和弘揚中國古詩詞藝術的過程中更容易實現創造性的繼承和弘揚，尤其是依托中國古詩詞而進行的古詩詞藝術歌曲的改編創作。此外，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的演唱過程也脫離不了演唱者的二度創作，這也是培養創造能力的有力例證。同一首古詩詞藝術歌曲往往會由於演唱對象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演繹而得到不同的二度創作體現，讓一首古詩詞藝術歌曲出現更多風格迥異的創作可能性。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也是教育高質量發展所賦予高師的積極內涵，是提高學生應對未來挑戰的有效保證。²

五、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提高了學生的實踐能力

¹ 王彬彬，雒田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生成邏輯、發展歷程與實踐進路．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17[2023-11-18]

<https://doi.org/10.13764/j.cnki.ncds.20231106.001>.

² 康若雅．國學視域下高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弘揚．漢字文化，2023，(19)：46-48．DOI: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3.19.052

詩詞是語言的藝術，中國古詩詞的文化魅力首先在於它的語言之美，尤其以它的辭采豐富，表意精準、凝練而賦予其不朽的文化價值意義。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劉勰在其《文心雕龍》中更點明：“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無不強調詩詞遣詞造句的重要性。另外，中國古詩詞的語言之美還表現在它的形式美和音韻美之中，無論哪一種文學藝術形式的創作，都需要通過其外在的形式和具體的結構來體現，中國古詩詞的創作當然也無例外。漢語與世界上其他拼音文字的明顯不同在於，漢語使用單音節字，由字與字組合成為詞，再由詞組成句，最終再由字形成完整的文章。由此可見，“字”是構成中國文學的最必要、最基本的成分，要想詩詞流暢、聲韻和諧，便于讀起來朗朗上口就離不開字甚至字與字之間聲律的考究。故而，在中國古典詩詞作品中常見“雙聲、疊韻、疊字、比喻、對偶等”修辭手法，並且強調對仗和格律上的長短一致、工整和對稱性，既易于人們的記憶、朗讀，又富有其音韻之美的內涵。

比如，以陸游的詞《釵頭鳳》周易創作的古詩詞藝術歌曲，在演唱時除了要注意歌曲的氣息控制和運用外，最為關鍵的因素就是歌曲的咬字。眾所周知咬字吐字也是一項重要的歌唱技術，咬字處理的恰當與否不僅關係到能否更好的表達詩詞藝術元素的內涵，同時也關係到其情感的表達和藝術詮釋。演唱者除了應當注意到高音旋律的咬字，也應當注意由於音形的變化而導致的音調處理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更充分的展現咬字處理技術在古詩詞藝術歌曲《釵頭鳳》裏的表達作用。基於陸游的《釵頭鳳》源自於自身的真實經歷而悲情色彩濃鬱，演唱者每一句歌詞的咬字吐字處理都會對歌曲的情感表達造成直接的影響。在演唱《釵頭鳳》時，比如演唱者在演唱“紅酥手”時，應當尤其注意音頭的咬字，要拿捏好咬字力度的強弱，伴隨著共鳴腔體的配合打開，注意橫膈膜的支撐和腰部力度的控制，這樣不僅能够使演唱者能够調動和發揮好歌唱共鳴所產生的美化和放大作用，同時能够把“字”“氣”和“聲”能够結合的更好，讓聲音能够充滿了感情，也更能够準確的表達出詩人陸游的真實情感變化。經過一首首不同的古詩詞藝術歌曲的演唱實踐，學生的咬字處理水平以及歌唱的整體技術都會逐步得到明顯的提升。¹

¹ 沈丹, 李想. 文化自信視域下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的高校聲樂課程思政建設研究. 大眾文

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是以中國的古詩詞為歌詞而創作的一類藝術歌曲，它以中國古詩詞這一中國文學的特殊文體為基礎，在創作中尤其保留了古詩詞原有的格式及韻律，立足于中國歷代文人墨客的智慧結晶，又借鑒、結合和運用了歐洲的歌曲創作手法，在這個創作過程中充分體現了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與協調，從而使中國的聲樂教學具有了國際化的特點。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將中國古詩詞的內在之美與西方藝術歌曲的形式之美和音樂之美有機結合起來，從而成為了中國聲樂教學不可或缺的重要歌曲體裁。

近年來，中國詩詞藝術歌曲尤其是古詩詞藝術歌曲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喜愛和關注，以《越人歌》《錦瑟》《青玉案·元夕》為代表的大量優秀古詩詞藝術歌曲應運而生，以劉青、王龍、李硯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才華橫溢的優秀中青年作曲家紛紛涌現，他們歌曲創作的共同特徵就是利用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有著幾千年文化歷史的中國古詩詞藝術作品為歌曲創作的關鍵素材，結合高超的現代作曲技法和先進的技術手段，融入極具時代性特徵的音樂元素，讓一首首經典的古詩詞佳作名篇又重新煥發出新的時代光芒。

六、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有助于高師聲樂教學形成顯明的中國特色

古詩詞藝術歌曲是在中國古詩詞的基礎上創作產生的，因此在演唱這類古詩詞藝術歌曲時，除了要注重歌唱技術和歌曲意境之外，還尤其要注重古詩詞自身的韻律和節奏，要把中國古詩詞本來的味道盡可能的還原出來。在聲樂教學過程中，聲樂教師可以把每一首古詩詞的鑒賞融入到聲樂教學中，讓學生能夠深刻領悟每首古詩詞藝術歌曲所蘊含的意境、情感、文化和審美情趣，從而可以達到提升學生的藝術素養、情感體驗和歌唱能力的教學目標。

中國古詩詞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民族文化的瑰寶和精髓，中國古詩詞不僅僅有著精美的語言和深邃的意境，其中還蘊含著豐富的哲理和無窮的智慧，更體現了中華民族獨到的審美情趣。因而，以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為載體的聲樂教學，可以在教學過程中更好的去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資源，讓學生更好地接受優秀文化的滋養和浸潤，能夠更深刻理解其中的文化價值意義，讓優秀的民族文化能夠植根于廣大民眾的內心，更能堅定文化自信。¹

藝，2023，(11)：136-138。

¹ 孟卓．中國藝術歌曲演唱思維研究．東北師範大學，2018．
DOI:10.27011/d.cnki.gdbsu.2018.000019

高師的聲樂教學由于最初借鑒了國外的教學體系，多年來隨著教育內容和形式的不斷變化，聲樂教學現行體系的弊端日益暴露，最明顯的就是高師聲樂教學沒有形成和彰顯中國文化特色，教學過程中沒有很好地結合中國自身的優秀傳統文化，而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在聲樂教學中的廣泛使用，可以非常完美地彌補這一弊端，讓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聲樂教學中發揮其應有作用。

結 論

質量是教育的生命綫，提高教育質量是教育改革的永恒主題。伴隨著國家高質量發展的客觀要求，從中國經濟領域貫穿并滲透到社會發展各領域的“全面高質量發展”也促進了教育的高質量發展，高師教育因著高質量發展的趨勢而做出必要的革新與調整，積極更新轉換教育觀念，構建新的教育體系，實現教育的快速良性發展，為社會培養更多優秀的應用人才，更好地應對時代對高師教育所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戰。實踐證明，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在聲樂教學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不僅可以更好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創造力，更好地發揮學生個體的能動性，同時也有利于開展合作學習，有效地提高學習的效率，在聲樂教學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發揮其積極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 [1] 舒田恬. 淺析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的音樂創作與傳承 [J]. 戲劇之家, 2023, (24): 75-77.
- [2] 陳哺因. 古詩詞藝術歌曲融入高校聲樂教學的實踐策略研究[J]. 焦作大學學報, 2023, 37(03): 75-79.
- [3] 王彬彬, 雒田夢.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生成邏輯、發展歷程與實踐進路 [J/OL]. 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17[2023-11-18]
<https://doi.org/10.13764/j.cnki.ncds.20231106.001>.
- [4] 康若雅. 國學視域下高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弘揚 [J]. 漢字文化, 2023, (19): 46-48. DOI: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3.19.052
- [5] 沈丹, 李想. 文化自信視域下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的高校聲樂課程

思政建設研究 [J]. 大眾文藝, 2023, (11): 136-138.

DOI:10.20112/j.cnki.ISSN1007-5828.2023.11.046

[6] 孟卓. 中國藝術歌曲演唱思維研究[D]. 東北師範大學, 2018.

DOI:10.27011/d.cnki.gdbsu.2018.000019

On Chinese Ancient Poems and Songs in Improv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l Music Teaching in Teachers' Colleges

CHENG Dexiang

(Department of Music, Zibo Normal College, Zibo,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oem and songs are a general term of Chinese classical and modern poems and songs, covering the classic poems and songs adapted and created by modern composers since pre-Qin Dynasty, such as *Book of Songs*, *Songs of Chu*, *Folk Songs of Han Yuefu*, Poems in Tang Dynasty and Ci in Song Dynasty. With its distinctive national style, rich artistic connotation, profound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unique aesthetic taste, Chinese ancient poems and songs are more and more popular among the public, especially in vocal music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especially the creativity, crit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teamwork skills of students. Based on the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as the carri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novative methods of vocal music teaching and updates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actic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ducation.

Key words: Chinese poetry; Ancient poems and songs; Vocal music teach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投稿日期	2023. 9. 6	审查日期	2023. 10. 9	刊载日期	2023. 12. 28
------	------------	------	-------------	------	--------------

神話《大禹治水》的國際漢語教學設計

——兼論水神大禹和波塞冬的比較

樂 慧 張 冉¹

（西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國際漢語系）

摘 要：大禹是巴蜀神話《大禹治水》中的主人公，因治水有方、造福百姓而成爲水神，反映了巴蜀人民對公而忘私、人定勝天的精神追求；而波塞冬是希臘神話中的水神，反映了古希臘人對水力的敬畏和對人性的探索。本文通過比較大禹和波塞冬，探究巴蜀神話和希臘神話中典型水神形象的異同，探索大禹和波塞冬所蘊含的巴、希文化底色，並結合《大禹治水》文本設計對外漢語教學案例，期待爲對外漢語神話教學提供借鑒。

關鍵詞：水神；大禹；波塞冬；神話；漢語教學

引言

水神是各國神話中的常見角色，蘇美爾神話中有恩基，希臘神話中有波塞冬、蓬托斯，在中國神話中，水神的形象更加豐富和多元，如上古水神共工、治水有功而得以尊神的大禹等，這些水神角色寄托著各地神話的審美和個性，通過對比不同國家和地區神話中的水神角色，有利于理解不同文化之間的共性和差異。

本文希望通過對比巴蜀神話中的大禹與希臘神話中的波塞冬，探究兩位水神形象背後所蘊含的文化異同，並結合《大禹治水》文本設計對外漢語教學案例，探索巴蜀神話在國際中文教育領域的現代化傳播新路徑。

一、巴蜀神話“大禹”與希臘神話“波塞冬”的比較

大禹和波塞冬因具有安定水土、賜福百姓的能力，分別爲巴蜀人民和希臘人

¹ 樂慧，女，文學博士，西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國際漢語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較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電子郵箱：luanhui-lh@163.com。張冉，西南交通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在讀研究生。

民尊為水神，然而二者在成為水神的途徑、形象與個性以及文化意義方面，均存在顯著的差異。

（一）成為水神的途徑：治水神與水能神

大禹誕生於蜀地，娶妻於巴地，是神話《大禹治水》中的主人公，而大禹治水故事情節古已有之，在《山海經》、《尚書》、《孟子》、《論語》等古籍中均有記載。其中，年代較早且較為完備的大禹治水神話故事見於《山海經·海內經》和《史記·夏本紀》。

據《山海經·海內經》所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島。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禹治洪水，通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坐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¹據此可知，《山海經·海內經》中的大禹具有變化形態的能力，能夠變成熊的模樣，其子啓生於大石，也能够從側面證明大禹並非凡人血統。

《史記·夏本紀》并未直接記錄大禹的超能力，但大禹治水成功後，“天下皆宗禹之名，度數為聲樂，為山川神主”²的記載，則證明大禹是因為治水有功，而被天下人奉為“水神”。

因此，大禹也許生來擁有變化形態的能力，實際上始終未能掌握操控水源的能力，是因為治水有方、造福百姓，而被人們尊為“治水之神”。

與大禹不同，希臘神話中的波塞冬是二代神王烏拉諾斯之子，誕生時便擁有強大的神力，在抽中管理大海的籤後，成為了統治大海的神，擁有操縱世間一切水源的力量，既能夠翻起滔天洪水來淹沒人類，又能夠平息海浪、安定水土，是真正意義上的“水能神”。

（二）形象與個性：人定勝天與服從命運

古籍中鮮有對大禹形象與個性的直接描述，但大禹勇敢地接受治水任務，並戰勝了天降的洪水災難，足以表現他人定勝天的精神追求；大禹治理滔天洪水的

¹ 山海經[M]郭璞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4月：第十八海內經

² 司馬遷. 史記[M]中信出版社，2018年4月：十二本紀夏本紀

方略，又可見其智慧；大禹治水十三載的時間之久，則見其治水之辛勤；更有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情節，可見其公而忘私的仁愛之心。

相比大禹，波塞冬的形象更加具體。《荷馬史詩》提到：波塞冬擁有一頭黑髮，常常穿著金鑄的甲衣，手持三叉戟，坐著銅蹄金鬃馬駕的車，在遼闊的大海上追波逐浪。¹此外，史詩還提到波塞冬用有力的雙手抓起三叉戟攪蕩海面，²這也暗示著波塞冬的身體是健壯而有力的。

波塞冬的個性主要體現在他同衆神和人類的相處過程中。在奧林匹斯山上，波塞冬擁有無上的權力和神力，是僅次于天空之神宙斯的海洋之神，懷著對最高神職的覬覦，波塞冬發起了兩次反叛宙斯的活動，後被宙斯降下懲罰，封印了水神之力并貶下凡間，在大地上游蕩多年，直到為特洛伊國王建立城牆，才得以恢復神力與神職。從中可見波塞冬對於權力和神力的嚮往與追求，即便以身犯險也在所不辭，這也蘊含著古希臘人的冒險精神與鬥爭精神。

與在奧林匹斯山上表現出的冒險精神與鬥爭精神不同，波塞冬在與人類的相處過程中，表現出了恒久忍耐、屈從命運的個性特點。首先，波塞冬被貶下凡間時，便意識到自身無法違抗地母蓋亞的詛咒，必須在大地上游蕩多年；其次，當波塞冬在為人類國王建造特洛伊城牆時，又意識到自身無法違抗命運女神的神諭，必須按照神諭的指示找到特定之人，才能使城牆建成。在這個過程中，波塞冬為了儘快按照命運的指示，完成既定的結果，失去了原本勢不可擋的冒險精神與鬥爭精神，變得忍耐而屈服，這種轉變與波塞冬失去了神力有關，但是其他未失去神力的神祇，也同樣無法改變命運的神諭，而是必須按照神諭的指示走向命定的結果。因此，波塞冬的這種轉變實際上蘊含著古希臘人對於災難和未知的恐懼，縱然他們希望用不懈的冒險與鬥爭來改造世界，但一旦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遇到了看似無法戰勝的困難，他們便傾向於放棄鬥爭，服從命運。

（三）文化意義

結合上述分析，我們發現，大禹和波塞冬的神話故事蘊含著古代巴蜀人民和古希臘人的精神追求，折射出了兩地文化的深層底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巴蜀文化贊美善行，希臘文化贊美強大。從大禹成為水神的途徑來看，

¹ 荷馬. 荷馬史詩[M]陳中梅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9月：伊利亞特（30）

² 荷馬. 荷馬史詩[M]陳中梅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9月：奧德賽（10）

巴蜀人民并不在意大禹是否擁有操縱水源的力量，也并不關注大禹是否具有神族的血統，而是重視大禹治水有功、利在千秋的善行，換而言之，高貴的血統和強大的能力均無法使巴蜀人民臣服，唯有高貴的品德與真正的善舉，才能成為巴蜀人民的精神領袖，因此，大禹水神的“神”字，實則蘊含著“精神”與“信仰”之義；反觀波塞冬，奧林匹斯山上的衆神因忌憚他巨大的水神之力而對他恭敬謹慎，凡間的人類既懼怕他掀起水災，又希冀他護佑安寧，因而對他俯首稱臣、乞求庇佑。然而當波塞冬被貶下凡間，無法使用水神之力後，連凡人國王都可以捉弄他，拒絕支付他修建特洛伊城牆的報酬，可見在希臘神話中，無論是神祇還是人類，與其說他們尊敬或畏懼水神，不如說是他們臣服于比自身更加強大的力量，因此，古希臘人雖然表面上尊波塞冬為水神，實際上尊的却是蘊藏巨大能量的水源之力，水神的“神”，乃是對於水能力量的尊敬與畏懼。

第二，巴蜀文化追求人定勝天，希臘文化認同命運至上。從大禹的行為與形象來看，大禹為治理洪水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最終戰勝了天降的洪水災難，反映了他人定勝天的精神追求，也蘊藏著古巴蜀人民始終不屈從命運、奮力拼搏的旺盛生命意志；反觀波塞冬，無論他是“一神之下，萬神之上”的海洋霸主，還是被貶下凡間、為凡人國王修建城牆的落魄神祇，他始終無法違背和改變命運，只能按照命運的神諭完成既定的結果，因此，古希臘人認為，命運之力乃是世間所有的神祇與人類都無法抵抗的力量，傾向于服從命運的安排。

第三，巴蜀文化寄托完人理想，希臘文化探索真實人性。從大禹的形象與品質來看，大禹的形象始終缺乏實體，這似乎暗示著，對於大禹來說，外表的形象是無需關注的，大禹所具備的內在精神品質才是值得代代相傳的，如聰慧、善良、辛勤、仁愛、恒久努力、公而忘私、人定勝天等，這些品質是古巴蜀人民價值觀中最渴望與推崇的美德，而大禹就是這些美好品質的抽象集合，代表了古巴蜀人民對於完人理想的最高寄托；反觀波塞冬，與人類相比，他擁有無限的神力、高貴的血統以及恒久的生命長度，而他的形象與個性和人類並無差別，他既表現出對宙斯神王之位的覬覦，又畏懼并臣服于宙斯強大的神力，儘管作為海洋霸主時高高在上、俯瞰衆生，作為凡人時也仍需服從命運、忍氣吞聲。推而遠之，希臘神話中的其他神祇也和波塞冬一樣，具有神身人性的特點，因此，無論是波塞冬還是宏大的神祇世界，均是為了擺脫人類能力與生命的局限，探索更加全面與真

實的人性，無不印證著希臘德爾菲太陽神廟的古老箴言，即“認識你自己”。

二、《大禹治水》的漢語教學設計案例

（一）篇目選擇

本課選自《中華歷史故事（第2季）》¹的《大禹治水》。大禹在中國神話中象徵著智慧、勇氣、品德和大公無私，他的傳說不僅代表古代歷史的精神，也是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考慮到學習者的漢語水平，筆者選擇了比較經典、難度適中的篇目，確保故事完整性，保留文章的趣味性，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故事脈絡瞭解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審美觀。

（二）課程設置

本次文化課分為兩個課時，一個課時 50 分鐘。第一課時是生詞教學、課文講解；第二課時是文化交際活動，通過小組彙報，提升漢語能力，加深對巴蜀文化理解，拓展國際視野，達到跨文化交際的目標。

（三）教學對象：來自北歐的留學生，漢語水平皆在 HSK5 級及以上

（四）教學目標

1. 熟練順暢地朗讀完文本，簡要複述故事內容；
2. 理解成語文化內涵，能夠熟練運用到交際中；
3. 通過視頻輔助教學，激發對中文的學習興趣；
4. 通過大禹和波塞冬形象對比，以多文化視角欣賞不同的審美、理解各地文化的意義；
5. 通過本課學習，能體味《大禹治水》背後反映的巴蜀人民對公而忘私、人定勝天的精神追求，聯繫當代中國人舍小家為大家的可貴精神品質。

（五）教學方法

1. 視聽法

視聽法通過多媒體資料如音頻、視頻等，學生可身臨其境地瞭解中國文化。通過欣賞音樂、觀看電影片段等方式，直觀感受中國美學文化，營造輕鬆愉悅的氛圍的同時，拓展文化背景知識。

¹ 中華歷史故事（第2季）[M] 吉林出版社, 2019年6月:大禹治水

2. 演示法

演示法為學生提供一種深入理解和親身體驗文化內涵的途徑。不僅可以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還能培養學生的審美力和創造力。

3. 任務型教學法

任務型教學法通過教師設計各類任務，如語境下的角色扮演、文化項目的策劃與實施，讓學生自主實踐，完成學習任務。最後以教師的反饋評價完成教學環節閉環。任務型教學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和團隊協作精神。

（六）教學原則

本案例運用上位教學原則，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主要表現為培養學生運用漢語進行交際的能力，將結構、功能、文化結合，充分利用現代化教學技術手段。在內容上堅持全面性、針對性、交際性、趣味性和階段性原則。

（七）教學重難點

教學重點：首先是生詞部分，其次是課文講解、梳理故事情節、認識人物形象。

教學難點：比較異同，把握人物形象，體味精神文化；分析人物精神，對不同文化民族精神的理解。

（八）教學內容

課文為《大禹治水》（選自《中華歷史故事（第2季）吉林出版社）。以影視作品央視動畫《大禹治水》作為輔助教學工具，該動畫以中國上古傳說為藍本，講述了大禹臨危受命，帶領百姓與洪水抗爭，並逐漸成長為民族英雄的故事。巴蜀人民對公而忘私、人定勝天的精神追求，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九）教學設計

第一課時（50 min）

1. 導入（4 min）環節：

老師：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河嗎？（圖片展示黃河）

學生：黃河。

老師：黃河是中國的母親河，但是因為它水量大、泥沙多，很容易決堤，千百年來中國人都在治理黃河。那你們知道中國神話裏誰是第一個治理黃河的人嗎？

學生：大禹？（也可能說別的名字或者回答不知道）

老師：嗯，大家都有自己的答案，接下來老師會放一些片段，請大家看完以後告訴我他是誰，好嗎？

2. 人物信息介紹（1min）：播放第一集選取片段介紹禹和鯀的關係，說明大禹因何治水，幫助學生瞭解大禹基本信息，為講解課文作鋪墊。

3. 講解課文（15min）：PPT 展示大禹的圖片，提問大禹治理黃河的原因。請同學朗讀課文，並要求學生思考這幾個問題：

- （1）大禹帶領村民治水的辦法是什麼？
- （2）他們花了多久的時間才治理好水患？
- （3）大禹為了治水，一共有幾次到家門口却還是沒進門？

4. 生詞講解（20min）

老師領讀生詞表：無家可歸、水患、流放、河道、勞心費神、粗茶淡飯、疏通、平原、溝渠、表彰、威望、天子

（1）展示方法：綜合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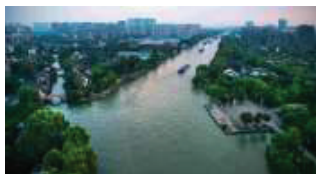
（按照名詞、動詞、成語分類排列，教學順序由易到難）

名詞：水患、河道、平原、溝渠、威望、天子；動詞：流放、疏通、表彰；成語：無家可歸、勞心費神、粗茶淡飯。

（2）解釋生詞：

名詞部分：

① 形象釋義：圖片展示（河道、溝渠）



hé dào
河道



gōu qú
溝渠

¹ 大運河-江南運河杭州段圖源 <https://www.ccmapp.cn/news/detail>

² 灌溉渠圖源 <https://www.veer.com/photo/170211437.html>

②近義詞比較：（河道與河流）

河道是河流的路綫, 通常指能通航的河。

河流是地球表面較大的天然水流(如江、河等)的通稱。

③翻譯法：平原（^{píngyuán}plain）、威望（^{wēiwàng}prestige）

④以舊釋新：水患，用學過的^{shuǐhuàn}水災來解釋。

⑤根據語素推測詞義：^{tiān zǐ}天子，引導學生猜出是天的兒子的意思，然後說明古代人用天子指代皇帝。

動詞部分：

①翻譯法：表彰（^{biǎozhāng}Recognition）

②情景法：

^{shū tōng}疏通：教師給出兩個例句，引導學生總結意思：

a. 河裏全是泥沙，大禹用挖溝渠的方式疏通了河道。

b. 田裏的水堵住了，我去疏通一下。

③根據語素推測詞義：^{liú fàng}流放，引導學生說出流浪、放逐的意思，教師說明是古代懲罰犯人的一種方式，把犯人放逐到偏遠的地方。再給出句子：

a. 許多名人都被流放過，比如李白。

b. 他因為偷東西被流放到很遠的地方。

成語部分：

形象釋義（圖片）+情景法+根據語素猜測詞義：

①^{wú jiā kě guī}无家可归：沒有家可以回。引導學生說出：因為洪水，老百姓無家可歸。

②^{láo xīn fèi shén}勞心費神：花費心思和精神，形容人很操勞、很辛苦。給出句子：

a. 爲了提高大家的漢語成績，王老師勞心費神。

b. 大禹爲了治水，勞心費神。

③^{cū chá dàn fàn}粗茶淡飯：讓學生猜是什麼意思，然後說明是指飯菜很簡單，形容人生活儉樸。給出句子：

- a. 王老師生活很儉樸，一日三餐，粗茶淡飯。
- b. 粗茶淡飯也很幸福。
- c. 大禹讓老百姓們吃的很好，自己却是粗茶淡飯。



wú jiā kě guī
无家可归



cū chá dàn fàn
粗茶淡飯

5. 回答閱讀課文的問題（5min）：體味大禹人物形象，為第二課時人物對比做鋪墊。
6. 複習總結，布置作業（5min）：複習本課所學生詞，簡述課文內容。布置小組作業：分成兩組搜集大禹更多的資料，和希臘神話裏的“波塞冬”進行對比，每組展示 10 分鐘，形式不限。

第二課時（50min）

1. 課前導入和複習（5min）：課前播放剩餘動畫節選片段，教師抽一個人簡要複述課文內容。
2. 小組彙報（20min）：學生分小組彙報，老師實時記錄，鼓勵學生分享交流，并且及時反饋作業完成情況。運用任務型教學法，提高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使他們能够更靈活地運用所學的語言知識。鼓勵學生自主學習。通過學生合作完成任務，有助於培養團隊合作和溝通能力。彙報中，可以分享不同的觀點、經驗和技能，促進彼此之間的學習。
3. 對比大禹和波塞冬人物形象（10min）：

姓名	形象	代表事件	個性
大禹	威武、強壯	接受治水任務、三過家門不入。	仁愛、智慧、大義、人定勝天

¹ 图源 <https://m.quanjing.com/imgbuy/QJ8711709581.html>

² 中华历史故事（第 2 季）[M] 吉林出版社, 2019 年 6 月: 大禹治水

波塞冬 黑髮，手持三叉戟， 發起了兩次反叛宙 冒險、鬥爭、恒久忍
身體健壯而有力。 斯的活動。 耐、屈從命運

4. 對比文化意義（10min）：巴蜀文化贊美善行、人定勝天、寄托完人理想，希臘文化贊美強大、命運至上、探索真實人性。

5. 總結複習、布置作業（5min）：

通過對比大禹和波塞冬的人物形象，品鑒各地神話的審美和個性，理解不同文化之間的共性和差異。布置作業：角色扮演，分別扮演大禹和波塞冬，形式不限，要求體現巴蜀文化和希臘文化的交流，製作成五分鐘以內的視頻發送至教師郵箱。意在提高學生文化素養，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

三、結論

大禹是巴蜀神話《大禹治水》中的主人公，因治水有方、造福百姓而成為水神，而波塞冬是希臘神話中的水能神，本文從成為水神的途徑、形象與個性以及文化意義三個方面對二者進行比較，探究巴蜀神話和希臘神話中典型水神形象的異同，發現巴蜀文化贊美善行、追求人定勝天、在神話中寄托完人理想，而希臘文化贊美強大、認同命運至上、在神話中探索真實人性，並結合《大禹治水》文本設計了對外漢語教學案例，為國際中文教育中的神話教學提供借鑒。

參考文獻

- [1] 山海經[M]. 郭璞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4月：第十八海內經
- [2] 司馬遷. 史記[M] 中信出版社，2018年4月：十二本紀夏本紀
- [3] 中華歷史故事（第2季）[M] 李申編，吉林出版社，2019年6月：大禹治水
- [4] 荷馬. 荷馬史詩[M] 陳中梅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9月：伊利亞特（30），奧德賽（10）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Design of the Myth “DaYu Controls the Water”

——A Comparison of the Water-gods DaYu and Poseidon

LUAN Hui ZHANG Ra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DaYu is the protagonist of the Ba-Shu myth “DaYu Controls the Water” and became the god of water because of the good way of controlling the water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 reflecting the spiritual pursuit of the Ba-Shu people who forget their selfishness and win the day. Poseidon is the god of water in Greek mythology, reflecting the ancient Greeks’ reverence for water power and exploration of human nature. By comparing DaYu and Poseid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ypical water-god images of DaYu and Poseidon in Bashu mythology and Greek mythology and designs a teaching case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ext of “DaYu Controls the Water”, hop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mythology as a foreign language.

Keywords: Water god; DaYu; Poseidon; Mythology;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投稿日期	2023. 9. 6	審查日期	2023. 10. 9	刊載日期	2023. 12. 28
------	------------	------	-------------	------	--------------

女性發展與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係探究

崔萍¹

摘要：女性發展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尺規，也是推動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力量和保證。本文論述了新發展階段女性發展的新特徵與新趨勢，分析了女性發展與和諧社會之間的相輔相成辯證關係，並提出女性發展與加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路徑，以人文視角解讀現代女性發展，推動實現男女平等和諧發展環境，促進社會公平，更好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關鍵字：女性發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政策保障；女性權益

引言

人類文明自誕生以來，已經實現了幾次大的跨越，女性在其中充當著重要角色，有著不容忽視的決定性地位和作用。縱觀歷史長河，從生理的角度來講，沒有女性的貢獻與付出，就沒有人類社會的繁衍與生息；從精神的家度而言，沒有女性文化的參與與交流，和平、包容、奉獻、和諧等文化發展進程緩慢且不够穩定。人類文明步入了新發展階段，女性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家庭生活等領域有了新角色、新特徵、新趨勢。

目前國內外學術研究中，對於女性的發展問題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研究探索比較廣泛，但把女性發展與和諧社會之間的關係聯繫起來研究比較少見，本文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對女性發展與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間的關係進行深入研究，希望能進一步加速推動中國女性良性發展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為國家穩定發展保駕護航。

文章采取文獻分析法，通過對相關文獻資料和有關材料進行閱讀、整理、研究，為論文撰寫提供理論參考和依據。第一部分對新發展階段進行簡要概述，並指出新發展階段下女性發展的新特徵新趨勢，第二部分點明女性發展與建設社會

¹ 崔萍，女，南京人，全南國立大學東亞學系博士在讀，研究領域：東亞學人文學，郵箱：merrycuiping@163.com。

主義和諧社會的關係，第三部分指出現階段女性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基礎上，從科學統籌做好頂層設計與政策保障、強化民法典應用保障女性權益、創新舉措加強女性發展國際交流三個方面提出推動女性發展和加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路徑。

一、新發展階段女性發展的新特徵與新趨勢

（一）女性成為消費的主要力量

新時代新階段女性孕育出高達萬億級的消費市場，已成為新時代消費主力軍。“2023 年中國女性消費報告”顯示，女性消費整體成交額增速領先男性，珠寶首飾、服裝消費和營養保健是前三大增長類別。中國女性消費者掌控 10 萬億消費支出，女性對生活品質要求越來越高，對個體消費需求更加多元，是家庭消費的主要管理者。新時代女性經濟正在日益成為促進經濟、創新需求、推動消費的強勁動力。女性收入逐步提高、受高等教育人口數量增長、單身女性消費周期拉長三大因素直接影響女性消費行為，家庭、教育、收入等方面的變化，賦予女性消費群體更多的可能性和想像空間，女性消費意識的提高與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隨著新朝代女性經濟地位不斷提高，消費需求也隨之不斷升級，從而推動了消費市場的發展，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群體。

（二）女性成為創新的重要人才來源

新朝代高學歷女性人才規模不斷持續擴大，素質顯著提升，不僅成為社會經濟和文明風尚的建設宣導者，也是承擔孕育下一代的家庭重要角色。現代女性具有較強廣闊的視野和自主創新精神，現代與傳統共同構建新的價值觀念和行為選擇，呈現出一系列的新傾向、新特徵。新時代女性高學歷人才資源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2009 年我國在校女大學生人數已超過男生，2010 年女研究生規模超過男生，2014 年海外留學和回國就業女性超過男性。高學歷女性人才職業選擇呈現出集中分布的趨勢，主要集中于教育、公共管理與服務和社會衛生工作等方面，占比高達過半以上。高學歷女性人才已成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最大限度調動廣大婦女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戰略要求，在“十四五”時期重要人才轉型窗口期，開創新時期女性人才輩出的

新局面，已成為人才可持續發展和人才培養的重要保障。

（三）女性成為推動社會治理體系完善的重要動因

隨著現代女性地位上升和認知能力提高以及女權主義運動興起，越來越多的現代女性進入社會經濟社會管理和公衆決策領域，打破了以往社會中公私領域二元對立問題。由于女性的性別差異而獨具的心理、情感和認知等方面的優勢特點，諸如女性具有更加的語言溝通能力，更加敏感，具有更細緻的觀察能力，俗稱“心細”，女性具有更豐富的情感，具有更强的人文關懷倫理，具有無可替代的女性立場等方面，使現代女性在參與經濟社會管理和公衆決策過程中體現出一定的性別優勢。隨著現代社會女性參與經濟社會管理和公衆決策的頻率越來越高，可使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的利益受到更多的重視，有助於改善涉及女性生活和需求方面被決定的命運，矯正一些公共管理和決策偏差，同時，可以改善部分弱勢群體的現實處境，從而對推動治理體系完善具有引導作用。

二、女性發展與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係

（一）女性發展與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相輔相成

從數量上而言，女性約占人類總人口的二分之一，與男性等同，同樣是一支不容忽視的偉大力量，與人類生產生活有著莫大的聯繫。雖然在古代，因為長久以來的父系社會的因素，女性被迫在社會和家庭中屬於從屬的地位，但却也是家庭生活的主力，承擔著“相夫教子”，照顧家中“衣食住行”的責任，是男性生產生活的保障；而在現代社會，男女平等意識已深入人心，“女性撑起半邊天乃至一片天”的理念已逐漸普及，正同大多數男性一樣，廣泛而活躍的參與到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生活中來，成為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力軍。

從性別的角度而言，女性比男性擁有更多包容、平和、細膩、善良、勤儉等品質，更便于傳播優秀精神內核以及先進文化，更加有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先，在家庭教育當中，女性往往是核心角色，對於子女甚至於父母都有這重要影響，而大多數女性都宣導健康和諧、積極向上的家庭文化氛圍，這種文化氛圍容易形成良好的家風，促成家庭美德，進而引領社會公德，最終對於整個社會都能起到良好地的精神文明帶動作用，有助於和諧社會的建設。其次，在整個社會體系當中，女性發展對於維繫社會穩定具有積極作用，通過宣導女性發展提

高女性地位，賦予女性更多地話語權和選擇權，保護和捍衛女性的合法權益，這在當下離婚率居高不下的現代社會，具有一定的抑制和扭轉作用；最後，在經濟領域，女性是消費品經濟的主要客群，因為女性維繫著家庭的日常消耗，因此女性生態、綠色、環保的消費觀念和購物趨勢對於消費品經濟的影響較大，可以直接影響生產結構的改變，加速生態經濟的形成，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

（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推動女性發展的基礎支撐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基本社會特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為加快推進女性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性別平等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兩性關係的和諧融洽是家庭關係和諧美滿、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石。社會公平正義是和諧社會的關鍵目標和基本價值取向，為增強社會向心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提供了必要保障和重要動力，也為男女平等基本國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和政策支持，使男女平等的理念和主張成為社會的共同認知。構建和諧社會，堅持以人為本戰略思維，為推動女性全面發展提供更加廣闊的舞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更加注重人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和主體地位和作用，強調在社會多樣性中，不同利益的群體協調共贏、合作共進，追求社會發展成果惠及全民。和諧社會的發展，為廣大女性參與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了理論、政策和法規的支持，營造更加文明健康的資源公平利用機制，更加充分協調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女性具體權益，促進女性和經濟社會協調同步發展。

（三）推動女性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體現了包括廣大婦女在內的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中國的發展，中華民族的發展，需要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奮鬥，需要中國廣大婦女的積極參與，而保障社會公平和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原則。因此，男女平等必然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內容，它要求保證男女兩性平等地享有發展的權利、機會和資源，平等地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兩性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男女平等又是兩性和諧的根基。實現男女兩性平等，實現婦女發展與經濟發展同步，與社會發展同步、與男性發展同步，逐步縮小男女兩性在發展資源佔有和發展收益分配上的差距，充分調動廣大婦女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全社會真正建立起男女平等的和諧人際關係，使男女兩性攜手前進，是建

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衡量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標誌。

促進男女平等與婦女發展是實現社會和諧發展的客觀要求。婦女發展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和諧發展的一項重要目標。婦女問題從本質上說是發展問題，也必須通過發展才能解決。堅持把包括婦女在內的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各項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使發展的成果惠及包括廣大婦女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是我們黨的不懈追求和奮鬥目標。因此，要堅持以人為本，推動男女兩性地位平等、關係協調，讓男女兩性共同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廣闊，如此廣大女性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便能被更加充分地調動起來，參與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事業當中。

三、推動女性發展和加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路徑探索

（一）科學統籌做好頂層設計與政策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至今已經有 100 多年的歷史，從無到有，現已經邁進了一個更高的新發展階段。站在新的起點上，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形勢和實際國情有了新變化。第一，中國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有了新變化，從原來的逐漸放寬二胎再到現在的鼓勵三胎，表明中國已經進入到了老齡化社會的發展階段，而中國人口巨大，已經有 15 億人，人口老齡化將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壓力，鼓勵生育是應對老齡化社會的主要措施。但是在這種政治決策下，無疑加重了女性就業壓力，再加上如今勞動者權益保護法律法規的健全，全方位的保護著女性帶薪休產假的權利，會讓市場主體在招聘女性群體時出現一定的心理負擔，對於未婚未孕女性有一定的抵觸，不利于女性發展。第二，中國男女比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失調現象，中國未婚男性群體數量已經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數額，這不利于社會的穩定，也不利于女性發展。如未婚男性過多增加了女性獨自出行的安全隱患；再如男女比例不協調某種程度上也可能導致離婚率的上升，這些都與女性發展背道而馳。可見唯有在安全穩定的大環境下，女性發展也才能良性和健康。

要保障女性發展有良好的大環境，需要國家和政府加強宏觀調控，科學統籌各項資源，做好上層設計，制定出符合國情民意的合理政策。首先，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堅定不移的走和平發展道路，為國家和社會發展營造穩定安全的發展環境，為女性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其次，要加強宏觀政策調整與引

導，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通過財政補貼、減免稅收等政策扶持消解鼓勵三胎給女性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減少市場主體的顧慮和擔心，為女性發展創造條件，做好支撐。三是要加強性別統計，更好摸清中國女性發展的基礎狀況，為制定和完善政策提供更多地即時性數據支持，從而制定出更加合理科學的決策，推動女性發展。

（二）強化《民法典》應用保障女性權益

《民法典》的頒布，標志著中國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是堅持人民立場，體現人民關懷的舉措，也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民法典》共分為七編，其中一編專門圍繞婚姻家庭設置，這體現了中國對於女性權益的重視和保護。但我國《民法典》編撰和實行的時間較短，部分條例還存在爭議，需要進一步細化和解讀，如“離婚冷靜期”制度，本意是保護女性權益，促進女性發展，但在具體現實中是否適用，還需要根據情況辯證看待，再如現行法律規定法定婚齡是否應下調，還有非婚同居問題，這是目前比較常見的一種戀愛觀念，但是非婚同居更容易對女性產生生理或心理傷害，非婚同居能否入法也存在較大爭議。可見，雖然《民法典》的頒佈耿更有利於社會治理，推動女性發展，但仍不完善，還需要進一步展開細節優化。

要進一步推動女性發展，便需要加強法律法規政策的研究，建立一系列的輔助性體系，確保不同女性群體的權益都能得到有效保護。為此，一要將性別平等納入相關法律規範和行業標準，並加強監管，確保各項法律法規落到實處，確保女性公平獲得就業、教育、享受服務、獲得資源等的機會和權利，讓女性發展落到實處；二是加強性別平等宣導，讓促進女性發展成為企業及各類社會組織的社會責任，並納入企業合規行為和發展指標，推動女性更多參與到社會管理、市場經濟等活動中，彰顯女性風采；三是加強公益宣傳，在全社會領域形成尊重女性權益，保護女性的良好氛圍，實現男女和諧發展，促進社會公平。

（三）創新舉措加強女性發展國際交流

女性發展從微觀上而言關乎家庭和諧穩定，從宏觀上而言，對於國家乃至世界發展都有重大影響。因此推動女性發展，不應該局限於一地、一國，應該樹立國際視野，從國際角度推動女性發展與世界接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讓女性擁有更加廣闊的舞臺，讓女性發展有更大的發展空間。為此，要在對內做好中國

女性發展工作，打造女性發展名片的同時，對外也要積極參與全球女性發展政策論壇等交流活動，講好女性故事。

加強國際交流，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出發：第一，要積極參與和承辦國際會議，推動全球婦女發展。要廣泛聽取和瞭解國際範圍內女性的發展方向和前進腳步，取長補短，為保護女性發展，推動女性發展注入新動能，為國內女性事業發展乃至全球女性事業發展貢獻力量。第二，要認真履行國際義務，體現大國責任擔當。回應與維護女性權益相關的國際公約，致力於消除教育中的兩性差距、降低孕產婦死亡率等目標任務，為全球婦女事業發展樹立良好形象。第三，要積極開展務實合作，推動共同發展。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是命運共同體，不能彼此割裂，要共同發展才能推動世界和諧、生態、可持續發展，也才能保護人類命運。綜上，通過創新舉措加強女性發展國際交流，能夠豐富各國間女性發展視野，為女性發展提供更多地可能性，有助於充分釋放女性魅力，提高女性價值認同，進而有助於推動實現和諧社會。

四、結語

總而言之，女性發展對於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乃至整個人類文明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強女性發展路徑發展的研究。進入新發展階段以來，女性的作用和地位愈發突出，對於國家發展和民族事業進步意義重大，但同樣也面臨挑戰，如生育政策的調整可能導致女性就業成本提高；人口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下如何實現女性創新等，都是著重需要探討的課題。尤其是在國內，相比較全球女性發展較為領先的國家，國內女性思想意識解放以及話語權提升方面仍有待提升，需要進一步完善女性發展制度環境，因此有必要從科學統籌做好頂層設計與政策保障、強化民法典應用保障女性權益、創新舉措加強女性發展國際交流這三個方面推動女性發展和加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路徑探索，形成系列舉措維護女性地位，宣導男女平等，更好地樹立發展中國家女性發展的標杆。

參考文獻

[1] 蘭露露, 趙金科. 互聯網時代我國女性解放實現路徑論析——以朱麗葉·米切爾女權主義思想為視域[J]. 新疆社科論壇, 2020(02): 56-62.

- [2]郭岩松, 林美卿. 我國女性走出發展困境的路徑選擇——基于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視角[J]. 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 2022, 41(01): 20-25.
- [3]李慧波. 傳承、弘揚、創新:發揮“半邊天”作用實現共同富裕——第三屆全球女性發展論壇綜述[J]. 中華女子學院學報, 2022, 34(01): 116-121.
- [4]郭雲. 民族地區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傳播: 價值、困境與突破[J]. 中華女子學院學報, 2022(02): 53-58.
- [5]李舒, 黃馨茹. 跨越百年: 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傳播的時代價值與行動邏輯[J]. 中華女子學院學報, 2021(06): 60-68.
- [6]袁祥花. 新媒體語境下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大眾化傳播研究[J]. 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 2022(02): 10-12.
- [7]左興玲. 論女性參與管理和決策之性別優勢的多維性[J]. 山東女子學院學報, 2017(7): 4-13.
- [8]蔣永霞. 激發消費新活力“她經濟”綻放消博會. 中國商報, 2023-4-12.
- [9]孫紹先. 《女性主義文學》. 遼寧大學出版社, 1986.
- [10]李銀河. 《女性權力的崛起》.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Development and the Promo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CUI Ping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Abstract: Women's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yardstick for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and an important force and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w features and trends of women'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analyzes the complementary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society. It proposes the path between women's development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interpreting modern women's development from a humanistic point of view,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a gender-equal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stering social equity, and better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Keywords: Women's development; Socialism; Harmonious society; Policy guarantee;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投稿日期	2023. 9. 6	審查日期	2023. 10. 9	刊載日期	2023. 12. 28
------	------------	------	-------------	------	--------------

中國文化融入英語教學研究

——以小學英語教學為例

劉玉坤¹

摘要：隨著素質教育理念在中國義務教育階段的落實，小學階段英語教學理念和相關方案需要進行更新和優化。在小學階段的英語學習中融入中國文化，有利於深化目前小學階段英語教育的內容，增強學生們文化自信心。文章首先說明瞭目前中國文化融入小學英語學習的現狀，然後闡述了中國文化融入英語學習的相關研究，繼而提出了中國文化融入小學英語教學的具體方式，最後解釋了中國文化融入英語學習的必要性以及結論。

關鍵字：小學教育，中國文學，英語學習

引言

在全球化進程加速和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緊密聯繫在社會各領域逐漸增強。在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我們不僅需關注經濟實力的增長，還應加強文化軟實力的建設，以加強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傳播與影響力。出于這一背景，現代化中國社會對英語人才的需求正在發生重大變革，由原本旨在向外界傳播西方文化的目標，逐漸演變為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這使得中國的英語人才需要更深入地理解中國文化。因此，培養具備準確傳達中國文化內涵的外語人才成為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必然要求，對於提升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軟實力具有顯著重要性。在小學英語教育中，融合中國傳統文化為小學生傳授英語知識，不僅有助於擴寬學生視野，同時也有助於從兒童時期就培養學生的文化自信心，為未來的中國文化傳播奠定堅實基礎。

一、中國文化融入小學英語學習的現狀

在目前主流的教學方式下，很多小學的英語課程教學主要就是圍繞教材進行

¹ 劉玉坤，山東人，韓國全南國立大學博士在讀，研究領域：教育學，東亞學，電郵：yukunliu0530@163.com。

展開，在小學英語學習現狀中所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重視課本內容，輕視文化內涵。通過查閱《義務教育階段英語授課標準（2022）》^[1]發現，在語言能力目標上小學英語課程授課內容是要求學生用簡單句型進行表達于交流；在文化意識方面，小學英語課程授課內容是要求學生能夠探究中外文化並進行對比和判斷，最後可以開展一定程度的跨文化交流和溝通。宏觀上看進行英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和提高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特別是在日常教學活動中教師應該不斷培養學生們跨文化交流的意識^[2]。

但是，由於目前義務教育小學階段的英語教學的目標和難度較低，大體上類似中國學生在幼稚園期間接觸到中文的難度，很難使學生達到在文化意識方面的要求。同時，小學英語課本中簡單的教學內容還主要是以生活場景話題進行呈現，在進行相關文化知識學習時業主要停留在單詞的字面意思上。再者，相關內容很少將中國文化與英語教學進行融合，造成學生們在英語學習的過程中對不熟悉的英語存在較大的陌生感，較難使學生對中外優秀文化進行感悟和內化。比如，在小學英語教學中有一節關於感恩節的課堂活動，英語教師從“Thanksgiving Day”的字面含義出發，引導學生們感恩老師，同學，朋友以及印第安人。實際情況是，大部分孩子連印第安人是什麼樣類型的人都不清楚，況且在英語國家的文化中對感恩節的描述也不一致。況且並不是只有西方有“感恩”這樣的節日，中國也有自己的“感恩文化”，雖然中國沒有把具體的日期作為這樣的節日，但是中國的感恩文化源遠流長，“滴水之恩涌泉相報”的價值觀是中國文化的重要一部分。

小學英語教材和教學資源通常側重西方文化，如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等國家的文化；如果大量的時間用於英語學習會導致學生們一直接觸和瞭解西方文化，並對中國文化的認知相對較少。在現行日常英語的教學很難開闊學生們的視野和提升學生的思想高度，造成大部分小學畢業生幾乎沒有能力對中國文化用英文進行有效表達，只是應付考試完成任務。在這樣英語學習過程中，小學生對所學的西方文化較難把握住精華，也不能認識到自己中國文化的特點。同時，從語言習

^[1] 趙尚華.《義務教育英語課程標準(2022年版)》解讀[J].全球教育展望,2022,51(6):13.

^[2] 敬萱.淺談小學英語課堂中提升學生跨文化意識的途徑[J].中小學英語教學與研究,2022(08):25-27+42.

得方面講，在目前小學英語教材中較少的英語教學內容與中國文化的內容和中文語言結構產生對比和練習，造成中國小學生脫離熟悉且有用的母語結構學習英語，在二語學習入門上存在困難和誤區。

二是重視英語教學，忽略學科融合。從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我們國家對英語教師的要求主要在英語學科知識方面。韓剛在《英語教師學科教學知識的建構》^[1]一書中指出，在英語這一學科中，一綫英語授課教師能夠進行高效率授課的關鍵是其教學知識的寬度和厚度，教學知識不僅要求對英語教學內容熟悉，還要求對其他學科內容有一定瞭解。比如，在小學英語的教學過程中，小學英語通常獨立於語文學科，由不同的老師進行授課，並且使用不同的教材和教學方法；這種分離式教學的過程導致學生難以將英語與漢語語文進行有機結合，加大了學生使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難度。同時，在現行的小學英語教材和教學資源中缺乏對學科語文和英語之間的交叉引用和聯繫的明確指導，造成學生很難將所學的英語知識應用到實際生活中，或反之。

隨著教學改革的不斷進行，依據《全日制義務教育英語課程標準（2022 版）》發現，新版的義務教育英語課程標準不僅強化了學生在聽說讀寫看等方面對語言的綜合使用能力，還強調了理解性技能和表達性的培養；在文化知識方面，強調了對歷史和文化等內容的關注，促使教師引導學生探尋文化價值背後的態度和邏輯，培養學生們的價值觀和道德修養。韓剛在《英語教師學科教學知識的建構》這一書還提出了兩個概念：主體和客體。主體指的就是有英語學科知識和對英語學科內容熟悉的老師，客體指的就是除了英語教學內容外其餘一切和英語教學有關的情況。在小學英語授課的過程中，授課教師較少從“客體”視角出發，通過結合不同學科中的中國文化內容進行提升學生們的情感體驗以及提高學生們的情緒價值。情感體驗和情緒價值的提升才能滿足小學生對於英語學習的潛在需求，並促進學生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語進行表達與交流，避免出現啞巴英文的現象。

三是重視英語應試，忽略傳統文化。與其他學科一樣，小學階段的英語學習還是主要以應試教育為主。語言學習的同時應該伴隨著自身文化素養的提升，英漢交互提升，對於英語學習較為重要，中文思維在英語學習中也非常重要^[2]。因

^[1] 韓剛. 英語教師學科教學知識的建構[M].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11.

^[2] 馬蓮. 英漢文化差異在漢語環境下農村中學英語閱讀教學中的體現——評《漢語環境與英語學習》[J]. 中國油脂, 2021. DOI:10. 3969/j. issn. 1003-7969. 2021. 04. 039.

此，在設計英語教學過程時應結合中國文化。當前在小學階段英語授課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一綫授課教師們過于重視考試相關內容，忽略將中國文化融入到英語課堂教學中，學生們在用英文表達中國文化時比較困難。中文思維在英語學習中搭配使用會產生較好的學習效果^[1]，能够促進對英語知識的掌握學生中國文化素養的提升對雲英語學習的重要性已經得到了很多學者的認可^[2]。

目前，大多數小學的英語學科教學目標是“通過該課程學習，學生能够掌握相關單詞和句型，會運用到日常生活中，或者有些重視價值觀念教育的教師會再補充情感目標，即通過該課程學習，能够在興趣、動機、自信、意志和合作精神等方面對學生產生期望的影響。但是，如果授課教師僅憑學校規定教材對學生進行授課，學生對英語的理解僅僅體現在簡單句型和背誦辭彙上，缺少了運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的過程，很難將英語學習與中國文化進行聯繫，更難上升到家過情懷層面。以人教版的小學英語教學大綱為例，可以發現目前小學英語的教學內容基本分為：三年級時關注生活場景的基本對話以及人與自然環境相關的話題；四年級時英語教學開始關注方位和介紹自身情況；到五年級和六年級時開始在教學較多關注語法和辭彙的學習以及如何寫句子表達自身意願。課件目前現行小學英語教學內容缺少對中國文化元素的融入，教學內容中的部分生活場景已經慢慢地退出學生和老師們的日常生活，比如：學習如何用英文發郵件，在目前多數中國小學生的生活狀態中郵件話題並沒有快遞話題常見，造成英語學習沒有應用于中國文化表達，還是服務于考試。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大戰略視角下，目前小學階段的英語授課模式不符合新時代義務教育階段的要求。

中國現代和傳統的文化元素在目前小學英語教學中設計較少，并且大部分英語培訓機構小學英語教材往往采用來自英語國家的外來教材，比如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和外國小說等，這些內容都是以英語國家的文化和一是形態為背景，強調西方文化元素，但忽略了中國文化的重要性。在這種情況下，小學生本身的分辨意識就不高，較容易陷入西方文化的薰陶中，逐漸忽視中國文化。這樣的小學英語教學模式使學生所學習的文化語境與中國文化相互分離，英語的學習過程還是生硬刻板，還是培養啞巴英語的授課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學生們較難將英語與中

[1] 魏興. 漢語思維在英語搭配學習中的作用[J]. 現代外語, 2014, 37(3):10.

[2] 李芳. 文化“走出去”戰略下大學英語導入傳統文化研究[J]. 繼續教育研究, 2021(11):3.

國文化進行聯繫，小學生在英語啟蒙的時候就逐漸失去了用英語進行表達和傳播中國文化的意識，簡要來說，這就是“中國文化失語現象”^[1]。

二、中國文化融入英語學習的相關研究

自從中國學者從叢於 2000 年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中國文化失語：我國英語教學的缺陷”文章後，“中國文化失語”這一概念才逐漸引起了中國外語界學術研究者的興趣和關注。隨後，有較多學者在很多方面對“中國文化失語”這一概念進行研究，研究領域主要集中于中小學以及大學階段。新時代背景下英語作為語言工具學科的同時，還承擔著跨文化交流的作用，目標是向世界傳播和表達中國。在日常學習中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我們改變對英語這門學科的學習方式。教師授課的過程中不僅需要關注外國文化，還要將中國文化融入到日常英語教學活動中，有利于培養學生們用英文表達中國文化的主動性，為培養跨文化交流人才做好鋪墊和準備。研究發現在中國目前的英語教學中，對西方文化元素的偏重過高，與中國文化元素相關的內容缺失較為嚴重。面對複雜的國際輿論環境和國際形式，在進行英語教學時要堅持弘揚中國文化，瞭解西方的同時還要樹立本民族文化自信心，避免“中國文化失語”這一現象的發生。

中國文化與英語教學融合方面，中國研究者在不同的時間段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在外語教學中融合中國文化的重要性。陳學芬^[2]（2011）在《中國英語教育變遷研究》中揭示了從 19 世紀中葉以來不同時間段學習英文條件和目的的變化，說明中國英文教育受到社會背景和升值環境的影響，以及不同階段外語人才培養方式和要求的轉變。陸全^[3]（2004）認為，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結合中國文化在提升語言學習者對學習英語的積極性的同時，還能培養語言學習者跨文化交流的素質。林娟娟^[4]（2006）提出在英語學習的過程中，語言學習者養成跨文化交流習慣的重要性，逐步形成文化與語言相結合的教學方式。袁芳^[5]（2006）在文章“試析外語教學中“母語文化”的地位與作用”中提出在外語教學中讓語言學

[1] 從叢. “中國文化失語”：我國英語教學的缺陷[N]. 光明日報，2000-10-19.

[2] 陳雪芬. 中國英語教育變遷研究[M].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3] 陸全. 論外語教學中的中國文化教育[J]. 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4.

[4] 林娟娟. 跨文化教學策略研究[J]. 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4：31-33.

[5] 袁芳. 試析外語教學中“母語文化”的地位與作用[J]. 外語教學，2006，27(5)：67-70.

習者養成知己知彼的學習習慣，才能使外語成為溝通世界的橋梁，才能向世界傳播我們優秀傳統文化，“母語文化”因素在提升語言學習者對外語掌握程度上有著重要作用。金虹^[1]（2013）強調在中國英語教學中，融入中國文化的必要性不可忽視，融入中國文化的重要性主要有以下三點：一，能夠幫助語言學習者理清脈絡，使其清楚明白的瞭解學習英語的目的和核心；二，能夠強化語言學習者的民族認同感和愛國注意精神；三，能夠讓世界更好的瞭解中國，幫助中國走向世界。王光^[2]（2020）闡述了在基礎教育階段的英語授課中融入中國文化的必要性，能夠提高語言學習者對傳統文化的認識，有利于樹立文化自信，進一步提升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馬賢龍^[3]（2023）提出在義務教育小學階段的英語教育中融入傳統文化能給語言學習者帶來豐富的感情體驗以及價值導向，提高語言學習者對國家和民族的情感以及文化鑒別能力。

三、中國文化融入小學英語教學的具體方式

融合中國文化，完善英語教學目標。融合中國文化將小學英語的教學目標劃分為兩個維度，分別為：

一是語言維度，在中英文的語言表達結構中存在較大的相似性，首先，在簡單句的表達中，中文和英文的語言表達順序幾乎一致，比如：

英文：I do not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中文：我不理解這個問題

其次，在一些較為複雜的語言結構中，中英文的表達結構也較為相似，具體是中文在表達的過程中習慣把較長的定語放在名詞前，英語則是把較長的定語修飾表現為定語從句並放在名詞後，在修飾表達結構上僅僅是前後位置的變化，比如：

英文：People who have a varied job history could have better employment prospects.

[1] 金虹. 論中國文化在英語教學中的意義[J]. 課程. 教材. 教法, 2013, 33(8):6. DOI:CNKI:SUN:KJF. 0. 2013-08-014.

[2] 王光. 貫通培養基礎階段英語教學中融入中國文化的探索[J]. Journal of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 2020, 34(4).

[3] 馬賢龍. 新課標視角下中國傳統文化在小學英語課堂中的有效融入[J]. 新傳奇, 2023(9):0057-0059.

中文：在不同企業工作過的人會有好的工作前景

除了以上的相似性外，在中英文的表達過程中還存在較大相同的語言表達結構和現象，在中國小學生學習英文的過程中，結合母語進行理解英文能夠促進基礎較差的英語學習者入門和產生興趣^[1]。通過結合中文語言結構理解英文能夠提高學生對語言的運用能力和使用頻率，逐步實現用英文講好中國文化故事的目標，在語言學習形成正向回饋的同時，還能進一步傳播中國文化內涵和精神。

二是思想維度，在小學英語教育教學中融合中國文化，可以激發小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創建出學生們熟悉的並可以真實使用的語言環境，可以將抽象知識通過具體的文化場景進行解讀，在授課過程中使課堂充滿活力，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在小學時期，一線英語教師可以結合學生們學習過的簡單中文文化知識改進英文授課內容，比如，對於高年級的小學生，在英語授課的過程中通過對比《論語》中“仁義禮智信”和《理想國》中“正義”的內容^[2]，並使學生明白中西方文化的相同點以及中國文化的優點。在小學英語授課的過程中，通過對比講授西方文化中的內容，可以幫助學生樹立文化自信，避免學生們隨著年齡增長和對英語學習的深入出現妄自菲薄的現象。同時，學生們通過中英文雙語吸收文化知識，可以拓展他們的文化維度^[3]，還可以使他們明白中國古代先哲在文化思想的高度和廣度方面不輸西方先哲，中國文化有自身獨特的美和論述方式，沒必要使用西方的評價體系評價中國文化。基于思想維度，在小學英語教育教學中融合中國文化，能夠幫助學生們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合理的理解西方文化，能夠幫助學生們在面對中西方文化衝突時可以辯證的看待文化差異。“良渚論壇”舉辦在即，不斷深化國際合作和文明對話，是建立人類文明共同體的關鍵，是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前提。

融合中國文化，創新英語教學內容。在小學英語的教學過程中，學校配套的教學課本和練習是教學過程中最重要的學習材料，教學材料的內容品質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和教師的教學效果。融合中國文化與創新英語教學內容可以為學生提供更富有深度和意義，有助於培養他們的文化意識和語言技能。主要通過

[1] 曹連文. 小學英語教學中有機滲透中國傳統文化[J]. 複印報刊資料：小學各科教與學，2009（7）：46-50.

[2]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M]. 重慶出版社，2009.

[3] 王曦. 母語對二語習得的積極作用及其策略運用[J]. 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6（09）：90-91.

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創新英語教學內容：一是設置中國文化主題單元，創建專門的文化主題單元，以介紹中國的傳統文化元素，如中國節日、傳統節令、文學、繪畫、音樂和戲劇等，在這些單元中，小學英語教師可以引入一些可以讓學生輕鬆掌握語言句型，幫助學生記憶、替換和練習，進一步在運用中掌握新知，同時也向學生傳授有關這些文化元素的背景和重要性；二是組織文化體驗活動，組織學生參與各種文化體驗活動，例如製作傳統美食、舉行中國傳統節日慶典、學習傳統手工藝、觀賞傳統表演等。這些活動可以通過英語進行溝通，從而使學生在實際體驗中獲得文化知識，并用英文表達部分語境。三是組織文化對話和討論活動，鼓勵學生在課堂上使用英文進行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討論，以探討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進一步引導學生比較中國文化和其他國家的文化，以促進跨文化思考和交流，培養學生們跨文化溝通的能力。這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文化的多樣性，同時提高他們的口語表達能力；四是表演文化話劇，學生與老師之間可以合作編寫劇本，通過話劇的形式展示中國傳統故事、寓言或歷史事件，通過話劇表演不僅提高學生們的口語和表演能力，還加深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五是利用數字資源和多媒體，利用數字資源和多媒體技術，可以在英語課堂上結合授課內容引入中國文化的音頻、視頻和圖片，以豐富小學英語教學內容并提供多樣化的學習材料。

融合中國文化，提升英語教師素養。新時代背景下，新課標英語教學要求是在體驗中學習、在實踐中運用，并要求在語言遷移的過程中創新學習理念，宣導學生圍繞真實情境參與到語言學習中去。因此，一線英語教師的文化素養直接影響其關於文化知識和語言知識等教學內容的教學設計和安排，教師的專業素養不僅包括英文方面還包括中文方面。小學在職英語教師素養的提高不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教學能力，還能促進中國文化融入到英語教學中；本文提出了小學英語教師在素養提升方面的一些方法：

一是給小學一線英語教師減負。減少一線授課教師的行政工作，優化相關課程評估和報告程式，使其有更多的時間專注于教學和提升自身的中英文語言素養，並使其在教學理念方面不斷創新，為處於語言啟蒙的小學生樹立目標和建立信心。增加授課教師數量，在授課的過程中實現小班教學，通過減少每個班級的學生人數，可以確保每個學生都能夠獲得更多的個性化關注，能夠提高教學品質。為教

師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資源，確保教師在備課的過程中有足够的教材和教學資源可以參考，并在教育技術工具上為教師提供培訓，以便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嘗試新的方法和教育技術。

二是鼓勵跨學科合作。跨學科合作可以促進不同學科教師相互共用最佳教學方案，以便互相學習和成長。跨學科合作能夠促進英語教師將中國文化融入到日常英語教學中，通過跨學科合作可以製作出符合學生們語言認知能力的英語授課方案，有利于學生將英語用于日常的生活和學習中，增加了語言使用的頻率和情緒價值，在加深對英語理解的同時還能培養學生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以及情感認同。在現代多媒體技術的交互性的輔助下，融合了中國文化的英語授課方案會增強教學感染力，豐富學生們英語學習體驗，改進後的英語授課方案可以在聽、說、讀、寫、譯等方面提升學們的語言綜合運用能力，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三是鼓勵英語教師參加培訓。通過培訓，教師們能夠有機會反思自己的教學理念和方案，并不斷改進和創新。通過培訓，教師可以學習如何更好地瞭解學生們的需求，從而將中國文化融入到日常教學活動中，以滿足不同學生的能力水準。通過培訓，教師們可以建立專業學習社群，增加與其他教師互動，有機會探討如何更好的將中國文化融入到教學方案中。培訓可以使教師能夠瞭解最新的教育趨勢、方法和資源，這有助於教師們與教育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保持同步，以更好地滿足學生的需求。參加培訓還可以增加教師的職業發展機會，幫助教師實現職業目標。

四是融合中國文化，改進英語評價體系。融合中國文化的英語評價體系，要從學生和教師兩個群體同時出發，教師是課堂授課的主角，學生表現是授課效果的具體體現。在英語評價體系改進的過程中，教師群體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評估：一是教學資源的整合能力，教學資源的豐富度是教師備課效果的體現；一線英語授課教師應該整合有關中國文化的教育資源，包括書籍座談，文化活動、講座觀等，用來豐富教學內容，幫助學生更好地通過英文理解中國文化的美和價值；最後，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實現中文母語遷移的正向引導。二是學習成果評估體系，鼓勵教師運用多樣化的評估工具，發掘學生興趣并建立學生學習效果評估體系；教師可以與學生合作制定專案和考核任務，以確保評估是多元化的，多樣化的評估方式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學生授課過程中的回饋和學生對所學內

容的運用情況。三是教師對學生的支持和指導情況，在評估過程中，要關注課外英語教師對學生活動的指導情況，比如英文教師應鼓勵學生們參與和組織融合中國文化的英文活動，並在活動進行的過程中予以指導，鼓勵學生們探索和理解中國文化的表現形式。

融合中國文化的英語評價體系，在學生考核方面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出發：一是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學生可以通過寫作或口頭表達等形式展示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以及他們如何將這種理解融入英語學習的情況介紹。二是文化專案和展示，學生可以參與文化專案和展示，展示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和應用，這些專案可以包括關於中國傳統節日、歷史事件、文學作品或藝術形式的展示，通過這些展示來評價學生的文化知識和創造性思維。三是跨文化對話和交流，考慮到學生的背景和興趣的多樣性，在評估學生的跨文化溝通能力時，評價體系應靈活，不僅需要包括他們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進行對話和合作的情況，還包括他們對西方文化批判和吸收情況，在評價體系中還可以允許學生選擇他們感興趣的中國文化元素，用英文展示他們的個性和深度。

四、中國文化融入英語學習的必要性

中國文化融入英語學習是時代要求。新時代習近平文化思想進一步指出講好中國故事和傳播中國聲音的重要性，是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體現。英語是目前使用範圍比較廣泛的一門外語，可以用這門語言為載體對外傳播中國文化，讓其他國家的人們進一步瞭解中國，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十八大以來，在文化建設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表現出黨和國家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傳播的關注，對向世界闡釋中國特色和宣傳中國形象的要求。近年來，在一些綱領性檔中突出了黨和國家對中國文化的重視程度，比如：在 2012 年頒佈的《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中，教育部強調“中小學要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要在日常的文化教學中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這為在中小學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明了方向；習近平在 2014 年強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對解決當今世界各國面臨的不同問題仍能提供智慧、啓示和借鑒；在 2021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上習近平進一步強調目前在建設國際傳播能力方面我國的重要任務是：“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

立體、全面的中國”；在 2022 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又進一步提出文化自信和文化傳播的重要性。

從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角度發現，對於學生群體而言，社會存在就是學生們現實生活過程，“現實生活過程”包括學生們的物質實踐及多種形式的總合，包括：生產力和社會交往等。在英語學習中產生的社會意識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同時這些社會意識的很多形式間也存在一定的聯繫。客觀來說，對於學生群體而言，這些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主要是因為社會意識在促進學生們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又在改造著學生們思維方式；這就像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1]一文中所提到的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目前在英語學習的過程中，一綫教學教師和學生們通常更加關注西方的生活習慣和文化類別，但是這些資訊可能不準確或者存在可以美化西方社會的行為。在學生們認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按照這樣的方式進行學習英語和跨文化理解，通常會使學生們對西方文化形成一些不切實際的固有印象，造成文化失真現象。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過多對西方文化和社會問題的關注，會使學生們對中國文化和社會問題產生一定的距離感，導致缺乏社會責任意識。由于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具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在英語學習的過程中一綫教學教師應融合中國文化，做到瞭解西方的過程中更好的瞭解本民族文化；在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間的辯證關係下，合理的在日常英文授課中融入中國文化，有利于保持文化平衡并避免文化衝突。

從語言遷移理論發現，在日常英語教學中僅用英語來進行教學的實際效果並沒有達到預期，特別是在小學英語教學活動中。桂詩春^[2]（2000）在《新編心理語言學》中基於語言的心理機制提到母語是學習二語的起點，外語和第二外語的學習並不是從零開始。王曦^[3]（2006）認為母語在學習二語時起到積極作用，促進二語的學習效率。白亞停和何文廣^[4]（2021）結合腦科學提出在二語習得的過程中會出現一定的語言遷移情況，母語充當語言仲介會更加適合年齡較小的二語

[1] 王偉偉. 毛澤東文化自信思想的歷史考察[D]. 湖南師範學, 2021. DOI:10.27137/d.cnki.ghsu.2021.002278.

[2] 桂詩春. 新編心理語言學[M].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0.

[3] 王曦. 母語對二語習得的積極作用及其策略運用[J]. 四川教育學院學報, 2006(09):90-91.

[4] 白亞停, 何文廣. 二語具身認知: 自動啟動還是母語仲介?[J]. 心理科學進展, 2021, 29(11):1970-1978.

習得者，在母語的語義概念層可以更好的啓動二語的習得過程。袁博平^[1]（2022）在研究二語習得過程中語言遷移現象時發現，母語中文的英語學習者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會受到中文較大影響，年齡越大的中國成年人在英語學習的過程中比較容易受到中文重複仿效策略的影響，并長時期影響中國人的第二語言-英語。因此，結合語言遷移理論以及相關學者的研究結果發現，在小學英語的授課過程中融入中國文化能更好的提升學生對英語語言規則的理解，比如，在對一些問句結構回答的過程中，在英語中已知資訊放前面以及新的內容資訊放後面的原則與中文語言中重複仿效策略都會使用相同的語言結構。

結 論

不同時期英語的教學內容在目標和方法等方面都發生變化，迎合時代的發展教學方法需要不斷改進，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才能適應新時代文化傳播的要求和挑戰。從分析在小學英語教學方案中，中國文化融入的研究現狀來看，目前有關中國文化融入小學英語教學的研究並不多。此外，從總結相關文獻來看，隨著中國文化融入小學英語教學的重要性的提高，文化與語言等方面的相關學者以及一線小學英語教師開始不斷在教學實踐中探索切實可行的中國文化融入小學英語教學策略，但是由于受到教材和考試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所探索出來的中國文化融入小學英語教學策略的可行性與有效性有待提高。

綜上，儘管在中國文化融入英語教學方面國內已有不少研究，但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宏觀層面進行探討中國文化融入英語教學的策略，較少有基于微觀層面對中國文化如何融入小學英語教學提出相關策略。因此，本文結合當前中國文化融入小學英語教學情況，并前人相關研究基礎為背景，提出了可行的中國文化融入小學英語的教學方式。

參考文獻

- [1] 趙尚華.《義務教育英語課程標準(2022年版)》解讀[J]. 全球教育展望, 2022, 51(6):13.

^[1] 袁博平. 論二語習得中第一語言遷移的方向性及經濟性原則——以二語句法和二語語篇為例袁博平[J]. 世界漢語教學, 2022, 36(03):379-398. DOI:10.13724/j.cnki.ctiw.2022.03.011.

- [2] 敬萱. 淺談小學英語課堂中提升學生跨文化意識的途徑[J]. 中小學英語教學與研究, 2022(08):25-27+42.
- [3] 韓剛. 英語教師學科教學知識的建構[M].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11.
- [4] 馬蓮. 英漢文化差異在漢語環境下農村中學英語閱讀教學中的體現——評《漢語環境與英語學習》[J]. 中國油脂, 2021. DOI:10.3969/j.issn.1003-7969. 2021. 04. 039.
- [5] 魏興. 漢語思維在英語搭配學習中的作用[J]. 現代外語, 2014, 37(3):10.
- [6] 李芳. 文化“走出去”戰略下大學英語導入傳統文化研究[J]. 繼續教育研究, 2021(11):3.
- [7] 從叢. “中國文化失語”: 我國英語教學的缺陷[N]. 光明日報, 2000-10-19.
- [8] 陳雪芬. 中國英語教育變遷研究[M].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1.
- [9] 陸全. 論外語教學中的中國文化教育[J]. 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2004.
- [10] 林娟娟. 跨文化教學策略研究[J]. 外語與外語教學, 2006, 4: 31-33.
- [11] 袁芳. 試析外語教學中“母語文化”的地位與作用[J]. 外語教學, 2006, 27(5): 67-70.
- [12] 金虹. 論中國文化在英語教學中的意義[J]. 課程. 教材. 教法, 2013, 33(8):6. DOI:CNKI:SUN:KJJF. 0. 2013-08-014.
- [13] 王光. 貫通培養基礎階段英語教學中融入中國文化的探索[J]. Journal of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 2020, 34(4).
- [14] 馬賢龍. 新課標視角下中國傳統文化在小學英語課堂中的有效融入[J]. 新傳奇, 2023(9):0057-0059.
- [15] 曹連文. 小學英語教學中有機滲透中國傳統文化[J]. 複印報刊資料: 小學各科教與學, 2009 (7): 46-50.
- [16]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M]. 重慶出版社, 2009.
- [17] 王曦. 母語對二語習得的積極作用及其策略運用[J]. 四川教育學院學報, 2006(09):90-91.
- [18] 王偉偉. 毛澤東文化自信思想的歷史考察[D]. 湖南師範

學, 2021. DOI:10.27137/d.cnki.ghusu.2021.002278.

[19] 桂詩春. 新編心理語言學[M].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0.

[20] 王曦. 母語對二語習得的積極作用及其策略運用[J]. 四川教育學院學報, 2006(09):90-91.

[21] 白亞停, 何文廣. 二語具身認知: 自動啟動還是母語仲介?[J]. 心理科學進展, 2021, 29(11):1970-1978.

[22] 袁博平. 論二語習得中第一語言遷移的方向性及經濟性原則——以二語句法和二語語篇為例 袁博平 [J]. 世界漢語教學, 2022, 36(03):379-398. DOI:10.13724/j.cnki.ctiw.2022.03.011.

Research on Integrating Chinese Culture into Primary School

English Education

--- Taking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LIU Yuku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South Korea)

Abstract: With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quality education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in China, it becomes imperative to update and optimize the English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related programs at the primary school level. Integrating Chinese culture into English learning at the primary school level is advantageous for enriching the current content of primary school English education and boosting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article begins by delineat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tegrating Chinese culture into primary school English learning in China. It then delves into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integrating Chinese culture into English learning. Next, it presents specific methods for incorporating Chinese culture into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Finally, the article elucidates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Chinese culture into English learning as a conclusion.

Keywords: Primary Education, Chinese Culture, English Learning

投稿日期	2023. 10. 6	審查日期	2023. 11. 9	刊載日期	2023. 12. 28
------	-------------	------	-------------	------	--------------

Book Reviews

書 評

跨學科思維下培養實用翻譯人才的教育創新 ——《翻譯項目管理：實操、案例與研究》書評

劉楚雲 林麗玲¹

（福建師範大學教師教育學院；福建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福建福州 350011）

摘 要：《翻譯項目管理：實操、案例與研究》作為一本翻譯項目管理的實操指南，它打破了傳統翻譯教學模式，借助大量真實案例和實踐經驗，鼓勵翻譯人才在多領域交叉學習。在跨學科思維下，將翻譯教學與語言服務市場相結合，為讀者提供了線上實習交流平臺，開設翻譯課程體系，提升翻譯職業素養，使所培養的人才適應多元化的職場需求。該書極具前瞻性和實踐性，填補了當前教育內容和翻譯職場對接不足的空缺，讓學生真正做到學以致用。

關鍵詞：翻譯項目管理；教學模式；跨學科思維；教育

¹ 劉楚雲，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師範大學教師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小學教育、勞動教育；電郵：1175078220@qq.com。林麗玲，女，福建省福鼎市人，通訊作者，碩士，福建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翻譯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譯與國際傳播。電郵：longyearlily@163.com。



早在古代，就有“學以致用”的觀念，即所學知識必須與實際應用相結合。然而，傳統高校翻譯教育往往缺乏實際操作環節，畢業生進入職場後難以勝任複雜的翻譯項目。作為一本翻譯項目管理的實操指南，《翻譯項目管理：實操、案例與研究》一書則打破了傳統教學模式，借助大量真實案例和實踐經驗，對國內外翻譯碩士培養模式進行分析，幫助學生更好地掌握翻譯項目管理的技能，提高其實際工作水平。

本書從翻譯項目管理的角度出發，採用了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圖片說明瞭項目管理的相關理論和方法，拓寬了學生對於翻譯職業的認識，使其不僅具備良好的語言素質，同時能夠掌握現代翻譯項目的管理理論與實際操作技能，為他們的未來就業打下了堅實基礎。該書在教育學理論方面，提出了“跨學科思維”的重要性，當今社會，為迎合市場需要，高校應培養更多高質量實用人才，各行各業之間相互依存且日益緊密，語言服務需求劇增，各類計算機輔助翻譯軟件層出不窮，通過跨學科思維，採取產教融合的實習教學形式，使所培養的翻譯人才更好地適應多元化的職場需求，具備跨領域的知識和能力。

本書對於翻譯專業學生和從業者都有很大的借鑒意義，作者在書中採用多種獨特的教學模式，有許多創新點值得我們關注。在翻譯人才培養方面，將翻譯教

學與語言服務市場相結合，充分運用現代技術手段，為讀者提供線上實習交流平臺，幫助學生更深入地理解翻譯項目管理的核心理念和方法，樹立正確的翻譯觀，提高其實踐能力；對於職場上的翻譯從業者，本書也提供了實用的管理操作指南，幫助他們更好地應對複雜的翻譯管理項目。《翻譯項目管理：實操、案例與研究》不僅是一本學術著作，也可作為翻譯教材使用，而且還是市場稀缺的教材。（岳峰，2019:3）該書的具體啟示與創新之處如下：

（一）打破傳統教法，教學與實踐相結合

方夢之在《譯學詞典》“翻譯教學”詞條中寫道：“傳統的翻譯教學以教師為中心，將改錯作為主要教學方法之一，以提供參考譯文作為翻譯課的終極手段。”

（方夢之，2007:346）這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學生的創造性，學生在學習翻譯時消極被動，不適應新時代所培養人的要求。《翻譯項目管理：實操、案例與研究》這本書在翻譯教學方面打破了傳統高校翻譯教法，不再只是單純地注重翻譯語言知識的傳授，而是將翻譯教學與語言服務市場相結合，開設翻譯課程體系，提升翻譯職業素養，引導學生從實習實踐中獲取知識和技能。

（二）打通網絡壁壘，實現線上互動

建構主義教育理論認為學生不僅僅是知識的接受者，而應該成為知識的建構者。在翻譯項目管理中，以項目為載體進行教學，充分運用現代技術手段，為讀者提供了在線交流平臺，方便讀者隨時進行互動交流。學生不僅需要掌握專業知識和技能，還應該學會如何創新和解決問題，以及如何與團隊協作完成項目。福建師範大學採用線上實習的形式進行翻譯培訓，關注學生的知識技能和課外實操，彌補傳統翻譯教學的弊端。線上實習平臺鼓勵學生在線積極互動，設置組長和班長等崗位，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將課程內容通過解決實際問題的方式呈現給學生，讓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獲得知識和技能，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學生可以通過在線交流討論自己的經驗和感受來建構知識和理解世界，積極主動地參與其中，提高學習效果。

（三）採用實習式教學方式，促進翻譯本地化

由於翻譯的“技術化”轉向，需要借助計算機等輔助翻譯來提高翻譯效率，福建師範大學通過校企合作的方式，讓實習生通過“譯國譯民”平臺瞭解翻譯市場，推崇開放式教育，鼓勵學生自主思考和探索。《翻譯項目管理：

實操、案例與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創新教學方法，實習式教學以學生為主體，採用小組討論、案例分析等教學方式，有效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主動性。這種開放式、創新性的教育模式，不僅能够提高學生實際應用能力，還有助於我國創新型複合型人才的培養。

從心理學角度看，翻譯項目管理需要獨立思考、分析判斷等高級心理活動的支持，而這些技能的培養需要一定時間和條件。該書不僅注重知識的傳授，還激發學生的自主性和創新意識，使學生不斷開拓自己的思維邊界。書中提到了“團隊協作”的概念，包括翻譯公司外部的交流協作、公司內部的團結協作，這種學習方式通過團隊合作的方式進行學習，能够促進學生之間的交流和互助，培養學生的團隊協作精神。

“社會學習理論”強調，人們要通過參與社區活動和實踐，從而獲得新的知識和技能。該書重視產教融合的教學實踐形式，學生在真實實踐翻譯過程中促進翻譯本地化。

《翻譯項目管理：實操、案例與研究》極具前瞻性和實踐性，填補了當前教育內容和翻譯職場對接不足的空缺，其跨學科思維和實用性的理念符合當今時代背景下培養實用型翻譯人才的需求，為翻譯人才的培養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動了翻譯教育的改革與創新。本書不僅提供了翻譯項目管理的實操指南，還融合了多種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對於翻譯人才的培養和職場上的從業者都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正如古語所雲：“千里之堤毀于蟻穴，九層之台起于壘土。”這份堅實的“壘土”將為民族翻譯事業的發展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礎。

參考文獻

- 岳峰. 翻譯項目管理：實操、案例與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3
- 方夢之. 譯學辭典[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346.

Interdisciplinary Cultivation of Translators: A Review of *Management of Translational Projects: Operations, Cases & Studies*

LIU Chuyun LIN Liling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11)

Abstract: *Management of Translational Projects: Operations, Cases & Studies* is a practical guide to transnology. Based on real case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t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translation with cross-disciplinary training for translator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language service market,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provides readers with an online internship and exchange platform, establishes a translation curriculum system to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translation and trains translator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diversified workplaces. With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and a focus on markets, the book fills the gap between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service.

Keywords: Management of translational project; Model of teaching;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Education

投稿日期	2023. 9. 6	審查日期	2023. 10. 9	刊載日期	2023. 12. 28
------	------------	------	-------------	------	--------------

個體經驗、公共經驗和詩意的連接 ——談蕭相風的《詞典：南方工業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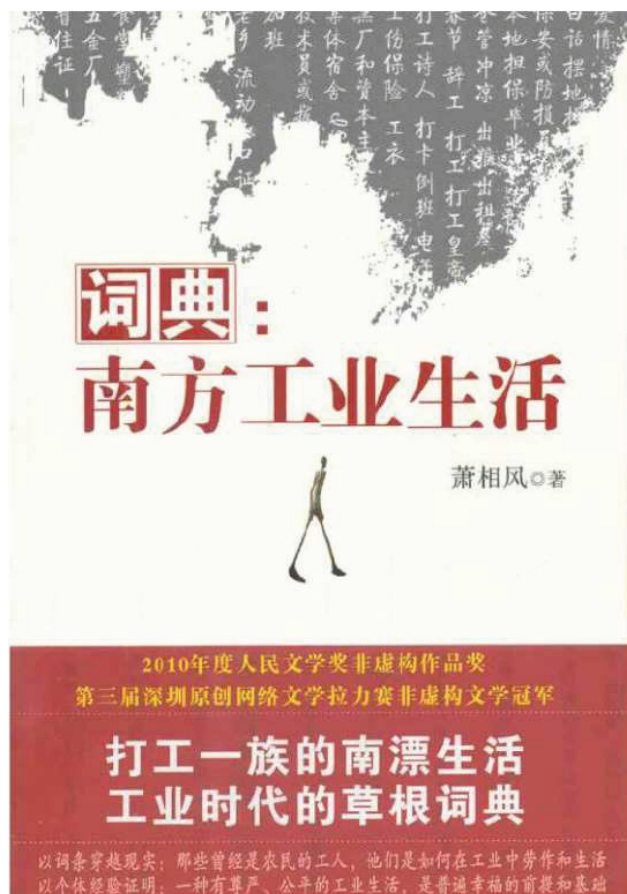
裴蓓¹

（深圳職業技術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

摘要：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中，蕭相風提供了極其豐富和極其寶貴的來自一線工作現場的個體經驗，努力挖掘個體經驗的公共性和生髮性，以實現個體經驗和公共經驗的有效對接，並嘗試使用意象、場景、聲音等詩意的手法將它們一一展現。人格語態是個體經驗詩意呈現的主要手段，潛文本是公共經驗對個體經驗的篩選和對接，反詩意是公共經驗與詩意的逆向連接。

關鍵字：個體經驗；公共經驗；詩意；連接

¹ 裴蓓（1980-），女，湖北黃岡人，深圳職業技術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項目來源：本文系深圳職業技術大學2023年校級質量工程項目教研項目“非虛構寫作與學生成長”階段性成果。



一、人格語態——個體經驗的詩意呈現

張積家、于宙、喬艷陽認為：人格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包括人的思想、人的情感和人的行為。它一般非常穩定，是區別于其他存在的心理習慣和行為模式。人格的結構很複雜，大致涵括氣質、性格、認知和自我調控等。¹每個個體基于不同的成長背景、人生經歷和性格特徵，形成各具特色的思維方式、情感模式和行為慣性，這些人格特質表現在語言文字上就是人格語態。人格語態透露了寫作者的個人化視角，展示了寫作者對於寫作內容的思考、選擇和呈現。

人格語態需要作者以主動摒棄和積極擁抱的姿態來實現，否則它很容易被模仿和習慣所遮蔽，消失在龐大的庸碌的文字泥沼中，寫作者的人格特質和個人視角再無處可覓。正如《非虛構的藝術》一書中所說：“文章要寫得清晰明瞭，生動有力。大多數作家希望實現這個目標。大多數還希望實現更高一層的目標：被稱之為‘風格’的特質。這是一種很難實現的目標，可是要接近它，最可靠的手段就是避開很多送上門來的風格。世界充滿了對作家的誘惑：流行語，未經審視的用語，模仿他人的語調，還有所有這些所代表的思維習慣。創造一種風格經常從一種否定的成就起步。只有拒絕太容易到手的東西，才能開拓出一片自己的天空”。²

人格語態也是個體經驗詩意呈現的主要手段。關於何為詩意，何其芳認為：所謂詩意，就是詩人從自然社會和現實社會中提煉出感動自己的東西，然後使用優美的文字和形式去感動別人，它是文學藝術的內容要素，也是詩歌最基本的要素。³阿城認為：詩意是“詩裏面的那種表達與關於詩外的一種理解，讓你想像、感受的東西特別多”。⁴同詩歌裡的詩意一樣，我們可以認為，非虛構寫作中的詩意是經過寫作者個人化視角處理之後形成的人格語態的外顯。

蕭相風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中，努力根據自己的主觀審美和價值判斷，對個體經驗進行篩選和處理，選擇經典意象、核心場景、典型聲音，用獨屬於個

¹ 張積家、于宙、喬艷陽《語言影響人格：研究證據與理論解釋》，《民族教育研究》，2017（28）：74-82。

² 特雷西·吉德爾、理查·陶德《非虛構的藝術》，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11頁。

³ 何其芳《工人歌謠選序（A）》，《何其芳文集第6卷（C）》，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15頁。

⁴ 孫萌《詩意是思維的——田壯壯訪談》，《電影藝術》：2023（4）：88。

人的語言系統，把自己對生活的體驗、觀察、思考和分析灌注其中，創造出自己的人生格語態，對個人經驗做了詩意的呈現。

意象是文學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提到了意象：“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¹艾略特則認為：“以藝術形式表達情感的唯一途徑是找到一個‘客觀對應物’，換言之，一組物件、一個情景、一系列事件將成為特定情感的公式；這樣，當必須在感官體驗中終止的外部事實再次出現時，情感會立即被喚起”。艾略特的“客觀對應物”并非僅指客觀事物，而是一系列意象，其構成使讀者產生一種盡可能接近詩人體驗時的心理狀態。²我們可以把意象理解為經過寫作者個人眼光觀察、判斷、尋找合適承載個人體驗和思考的具體事物，對它們進行重構和再現，表達自己獨特的藝術情感。

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中，蕭相風努力發現和尋找一些經典意象，經過再加工和重現，展示自己對生活的獨立思考。比如：

2002 年我穿過鮮紅色的工衣，那時我在電池廠做 IPQC 員。紅是火焰，是血，在中國傳統文化裏是喜慶、忠烈和莊重。紅色在安全標志裏表示警告、禁止。在工廠裏，穿著紅色也表明了重點關注，代表了一種權力和激烈。在判定 NG 產品時，我們的 NG (No-go) 印章就是紅色的。當物件器具被貼上了紅色，昭示著它血的不祥。³

蕭相風選擇了紅色工衣這個意象，描述了現代工業生活井井有序背後對於人的工具性的過分張揚，以致于在悄無聲息中完成了對人的壓制和異化。

核心場景是衛毅在《人物特稿就是去掉報告文學背後的光》一文中提出的。他提到自己在寫《莫言的國》時，在不同的場景對莫言有不同的稱呼，有的時候叫他管謨業，有的時候叫他莫言，這兩個不同的稱呼實際上對應的是生活在不同時代和生活背景下的莫言，兩個稱呼一起出現，對比和衝突非常強烈，極具戲劇

¹ 劉勰著，韓泉欣校注《文心雕龍》，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51 頁。

² 黃立《“意象”與 Image 之辯——以〈文心雕龍〉與意象派理論為例》，《中國文學批評》，2022（4）：37-44。

³ 蕭相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花城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23 頁。

性。¹核心場景是內涵豐富的場景，它可能是兩個場景的對比和聯繫，形成戲劇張力，也可能是一個場景中環境、人物、事件特別完美的糅合到一起，信息量飽滿而富有深意。

蕭相風在“五金廠”這個詞條下，給我們展示了這樣的核心場景：

在五金廠裏行走，原料是鐵，設備是鐵，模具是鐵，貨架是鐵，生產指令和紀律也是鐵的。流水拉旁站著的工人，機械地重複著動作，也是鐵的機器人。走在鐵的世界，衝壓車間裏的雜訊像滿空亂飛的綠頭蒼蠅，整個車間籠罩于巨大的衝壓聲裏，我們仿佛行走于狂波怒濤之下，聽著頭頂的浪頭一個接一個砸響。²

他抓住了五金廠的核心精髓：鐵。整個五金廠就圍繞著鐵的場景鋪陳開來，堅硬、冰冷、殘酷無情。這是關於一切的鐵的場景，鐵的原料，鐵的紀律，鐵的人，它粗糲的在我們柔軟的情感上劃下一道一道傷痕，逼迫著我們去正視殘酷如鐵的生活現實。

典型聲音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個方面是寫作者的聲音，如同杰克·哈特所說：“不論主題是什麼，在吸引和留住觀眾方面，聲音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非要給‘聲音’下一個全面的定義，那麼它應該是作者個性在作品中的體現。”“如果你想將個性代入作品中，你就不得不捫心自問：‘我屬於哪種個性呢？’”³寫作時選擇的典型聲音要體現作者的個性。另一個方面是作為描寫物件存在的聲音，文字呈現出的聲音獨有的節奏、音色、音調、高低都會引起受眾情感上的波動，引發詩意的體驗。

蕭相風在“打卡”這個詞條裏寫到了兩種典型聲音：

對於一個鄉村，缺少了鷄叫，就不配叫鄉村，只是一座死寂的墓地。
2008 年我回到一個岑寂的鄉村住了三天，清晨聽到那一聲接一聲的報曉，在空曠的鄉間，嘹亮，綿長，聲音是那般自然柔和，在水田和小溪

¹ 周逵編著《非虛構——時代記錄者與敘事精神》，清華大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 62 頁。

² 蕭相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花城出版社，2011 年版，第 218 頁。

³ 見傑克·哈特《故事技巧——敘事性非虛構寫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3 年版，第 74、75、78 頁。

間隨風回蕩，如丁咚泉澗敲響了空山，剎那間讓我感覺回到了童年的夢境。

在工廠裏，打卡機代替了雞鳴或太陽，我們根據卡鐘定好鬧鐘，將鬧鐘擱在枕頭邊，清晨鬧鐘準時鳴叫，電子數碼的叫聲尖利短促，實在沒有鄉下的雞叫聲好聽。¹

雞鳴聲，鬧鐘聲，岑寂的鄉村，喧鬧的工廠，兩組對比，是聲音之間的對比，也是理想田園生活的想像和現實工廠經驗的冷硬之間的對比。尖利刺耳的鬧鐘聲響徹了我們的鼓膜，鬧鐘聲的背後，我們也聽到了作者的聲音和嘆息：“世界準時在爆炸，就像我訂的鬧鐘”。²

二、潛文本——公共經驗和個體經驗的對接與篩選

非虛構寫作是文學寫作和新聞寫作的混合體，它既繼承了文學寫作的個人視角，又天然承載新聞寫作關注現實、敘述現實、影響現實的要求。所以它提供的個體經驗不能只是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和個人關切，這樣會與大眾背離和脫節，只能成為個人的自娛自樂，最終必將走向衰敗。

正如學者林秀琴所說：非虛構寫作寫的是真實的事情，它是關注現實、直面當下的。它要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就必須討論現實的公共議題。也就是說，它被賦予了“社會公器”的身份。非虛構寫作者要很好的平衡個體經驗和公共經驗的結合，要著力挖掘出個體經驗中的公共性，這是非虛構寫作的重要特點。³非虛構寫作必須與公眾關切的問題緊密聯繫，找到與公共經驗的連介面，才能把個體經驗轉化為公共經驗，以主動擁抱的姿態參與公共話題的討論，引發公眾關注的熱情，乃至解決公共性的問題，這才是非虛構寫作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潛文本將非虛構寫作中的個體經驗和公共經驗進行了秘密勾連。申丹教授在《敘事、文體與潛文本：重讀英美經典短篇小說》一書中說：潛文本一般是藏在作品表層背後的深層次的意義理解。文字的表達雖然是確定的，但是關於文字的

¹ 蕭相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頁。

² 蕭相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頁。

³ 林秀琴《“非虛構”寫作：個體經驗與公共經驗的困窘》，《江西社會科學》，2013（11）：81。

欣賞和理解是不確定的，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理解和看法。所有的解讀嘗試都是一種努力，但並不能帶來確定性。所以可以認為潛文本是閱讀者根據自己所處的歷史語境對文本進行理解和分析得到的結果。雖然潛文本的理解沒有確定性，但是分析的時候應該緊扣文本，要根據文本事實確定和判斷解讀是否合情合理。¹我們可以認為，非虛構寫作中，表面上的文本是關於個體經驗的呈現，但潛藏在個體身後的是龐大的與寫作者有著共同經歷或者共同關切的人群。這個人群以強大却無聲的力量推動寫作者對個人經驗進行篩選，剔除只有個人小情小緒的內容，挑選背後閃耀著公共經驗光芒的場景、人、事、物。當受眾閱讀作品的時候，總能窺見自己的影子，聽到他人的聲音，感受時代的洪流。

蕭相風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裏描述了很多動人的個體經驗，表面看上去是個人的體會，實際上那是公眾的回聲。

比如他談到了“邊防證”和“過關”。

關口廣告更換了好幾次，面巾紙、LED 光電、電纜產品的廣告等像花開花謝般更換著，但有一個標語在白芒關的牆上一直掛著：“固邊愛民”。我們天天往來于白芒關之間，每天下班時排著長隊進入白芒村。²

已經成為歷史記憶的深圳二線關雖然已經在我們的生活中退場，可是對於很多人來說，外鄉人在異鄉尋找身份認同和自我定位的磋磨和煎熬直到今天也仍然普遍存在。

他談到了“電子廠”的“流水拉”。

眼睛緊緊地盯著雙手，一手捉著電子元器件，一手捏住烙鐵。產品在焊錫中不時冒出一縷青烟，沿著排風機零零散散地飄走。是焊錫，將產品和汗水焊接在一起，電容、二極體、悲歡和青春共同裝配在印刷綫路板上，這是一般電子廠常見的情景。³

流水拉上的單調、重複、枯燥，戕害了人類的情感，讓人們變得疲累、麻木，

¹ 申丹《敘事、文體與潛文本：重讀英美經典短篇小說》，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 9 頁。

² 蕭相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花城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5 頁。

³ 蕭相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花城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05 頁。

喪失了對世間美好事物的感知能力。這並非是流水拉獨有的問題，它是整個社會都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人文關懷問題。

他還談到了“出租房”。

要是你長期在一個駁雜的城中村裏居住，你會發現四周的房子不斷地更換著新的臨時主人。四川的臘肉、湖南打工妹的內衣、江西兩公婆的爭吵、廣西人一堆零亂的啤酒瓶，這些事物跟隨季節不斷地在對面和隔壁的窗臺上更替出現。鄰居變了，周圍變了，世界好像還在電視裏，還是那個老樣。¹

出租房裏的租客總在變換，可是看上去似乎一切又都沒有什麼變化。隨著工業社會的來臨，農業社會的安土重遷一去不返，我們每個人都多了一個過客身份，但內心中對安定的渴望從未停止，這也是我們終其一生都要追問的人生命題。

三、反詩意——公共經驗與詩意的逆向連接

按照一般的理解，詩意往往是指讓人感動的，能產生審美享受的東西。就像學者韓松剛所說：詩意就是詩歌裏面表達出來的美的東西，能給人美的享受。詩意是與“美”和“情”有關的文學要素。²

非虛構作品中的個體經驗往往是詩意的，不管它是歡樂的，憂愁的，還是積極的，頹喪的，它總能給人們帶來審美的體驗和享受。因為個體經驗的呈現經過了寫作者的主動挑選和過濾，使用了文字進行包裹和裝飾，它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寫作者的個人情感和思考，這些都讓個體經驗具備了充分的審美特質。

但是，公共經驗則不然。它是隱藏在多姿多彩的、經過篩選和包裝的個人經驗背後的沉默的龐大人群的低沉聲音。它往往不是給人們帶來審美的刺激和享受，而是把冰冷的、殘酷的問題和困境推向人們，降下直擊靈魂的痛苦拷問，並且不容許人們躲避。從這個角度而言，公共經驗是反詩意的，這是它與詩意的逆向連接方式。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公共經驗的反詩意。

公共經驗原生的殘酷性。公共經驗往往涉及的是公眾面臨的不可逃避却又無

¹ 蕭相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頁。

² 韓松剛《含混的“詩意”：小說寫作的一種美學傾向》，《文藝爭鳴》，2016（12）：38。

計可施的問題，人們只能妥協、投降，自我安慰，自我麻痹，它天然帶有冷酷無情的一面。蕭相風的《詞典：南方工業生活》中有許多公共經驗的殘酷性描寫。

“蹲下，趴著，跪著，他媽的，交贖金，進去，打死你，餓死你，我操，幹活，修路去，一群豬，滾”，這些詞是“暫住證”的詞語鏈條上常用的擴展詞彙。樟木頭因關押三無人員修鐵路，成為了打工世界裏一個威名遠播的地方。在惠州，惠陽是另一個讓人害怕的地名，也曾關押了不少外來工，幾十人住在一個鐵籠子裏。我有個同事住在鐵籠子裏，那是一個廢舊的倉庫，一堆人在籠子里拉屎拉尿。¹

那時收容制度還存在，外來工被粗暴的對待，人格尊嚴受到巨大的打擊，生活的殘酷一覽無餘。

公共經驗本身的粗鄙性。公共經驗有許多並不宏大和光鮮，它甚至很粗鄙，帶有底層經驗的粗糲感和衝擊性。比如罵髒話，蕭相風在書裡有非常細緻的描寫。

“屌”還有一個用法，譬如“我不屌你”，大家應該猜得到它的意思。我不卵你，我不尿你，這些都是同一端意義鏈上的宗族。在九州各地五花八門的方言裡，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共同點：下半身除了排泄和生殖，還肩負著罵人的艱巨任務。應該說方言是口語中的口語，它靈活多變，誇大其詞，不遮不掩，沒有含蓄性，最大的特點是講究效用。²

髒話無論如何說不上被人稱道，或者說具有詩意，但是它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共經驗，人們在罵髒話中宣洩情緒、確認地位，甚至拉近關係。

公共經驗的殘酷性和粗鄙性構成了它的反詩意特點，這與個人經驗的詩意表達形成了既矛盾又統一的奇妙的複調效果，最終彙聚成整體的詩意表達。

結 論

蕭相風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中努力尋找並實踐著個體經驗、公共經驗

¹ 蕭相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頁。

² 蕭相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頁。

和詩意的連接。他對自己十幾年的南方打工經歷進行回顧、審視和思考，選擇了出租屋、暫住證、流水拉等既能承載個人豐富體會和經驗，又能折射出整個時代浪潮下南方打工群體共同經驗的核心詞彙作為架構作品的關鍵，自覺的打通了個體經驗和公共經驗的連接。在個體經驗的詩意呈現中，他精心選擇經典意象、核心場景、典型聲音，透過自己觀察世界、理解世界的獨特視角，結合自己偏好的語言風格，創造出獨屬於自己的人格語態。在公共經驗的詩意呈現中，他通過反詩意的表達實現了公共經驗與詩意的逆向連接。他真誠的袒露公共經驗的原生殘酷性，並與經過審美包裝的個體經驗相結合，形成奇妙的詩意整體。當然，蕭相風還有一些表述比較接近於新聞播報的冷靜說明，缺乏個體的聲音和個性，他在詩意呈現的道路上還可以走得更遠。

參考文獻

1. 《2010 年度茅臺杯人民文學獎授獎辭》.《人民文學》，2010（12）
2. 張積家、于宙、喬艷陽.《語言影響人格：研究證據與理論解釋》.《民族教育研究》，2017（28）
3. 特雷西·吉德爾、理查·陶德.《非虛構的藝術》.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 年版
4. 何其芳.《工人歌謠選序（A）》.《何其芳文集第 6 卷（C）》.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版
5. 孫萌.《詩意是思維的——田壯壯訪談》.《電影藝術》，2023（4）
6. 劉勰著，韓泉欣校注.《文心雕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
7. 黃立.《“意象”與 Image 之辯——以〈文心雕龍〉與意象派理論為例》.《中國文學批評》，2022（4）
8. 蕭相風.《詞典：南方工業生活》.廣州：花城出版社，2011 年版
9. 周達編著.《非虛構——時代記錄者與敘事精神》.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1 年版
10. 杰克·哈特.《故事技巧——敘事性非虛構寫作》.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3 年版
11. 林秀琴.《“非虛構”寫作：個體經驗與公共經驗的困窘》.《江西社會科學》，

2013 (11)

12. 申丹. 《敘事、文體與潛文本：重讀英美經典短篇小說》.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

13. 韓松剛. 《含混的“詩意”：小說寫作的一種美學傾向》. 《文藝爭鳴》，2016 (12)

On the Connection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 Public Experience and Poetic Quality

——A Review on Xiao Xiangfeng's *Dictionary: Southern Industrial Life*

PEI Be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College,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In *Dictionary: Southern Industrial Life*, Xiao Xiangfeng provides extremely rich and valuable individual experiences from frontline work sites, striving to explore the commonality and generative nature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s in order to achieve effective integr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public experiences and attempting to use poetic techniques such as imagery, scenes, and sounds to showcase them one by one. Personality voice is the main means of presenting individual experiences poetry, the latent text is the screening and connection of public experience to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anti-poetry is the reverse connection between public experience and poetry.

Keywords: Individual experience; Public experience; Poetic quality; Connection

投稿日期	2023. 9. 6	审查日期	2023. 10. 9	刊载日期	2023. 12. 28
------	------------	------	-------------	------	--------------